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郭秀文　罗　苹

学术研究

(1958 年创刊)

2021 年第 3 期　　总第 436 期　　出版日期：3 月 20 日

哲　学

形而上学与理想主义　刘森林　1

齐泽克话语中的列宁式革命研究　夏银平　辛海风　11

相对主义论争及其理据

——与威廉森教授商榷　张力锋　17

学术为业何以可能

——论韦伯对现代学术体系的反思　郑　飞　22

礼文、人情与天道："称情立文"析义　邝其立　28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分析

——兼谈中央文献翻译的原则和策略　史亭玉　张平功　34

政　法　社会学

·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

从"一时火"到"一直火"：消费扶贫的阶段反思与长效安排　范和生　刘凯强　39

实现政府、市场与农户的有机连接：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新机制　陈天祥　魏国华　49

乡村可持续发展：四个民营企业的共享价值案例分析　房莉杰　刘　学　56

乡镇政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策略与逻辑

——基于对泉州市 H 乡运作过程的观察　侯志阳　63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乡村"微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　卜万红　68

经济学　管理学

·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劳动力市场·

互联网就业搜寻对流动人口就业与工资的影响　罗楚亮　梁晓慧　72

技术变革、流动人口就业结构与收入极化趋势　汤　璨　孙文凯　赵　忠　80

我国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及其差距变动

——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　高　帆　赵祥慧　86

(月 刊)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哲学 gzphil@126.com
经济 gzecon@126.com
政法 gzpols@126.com
历史 gzhist@126.com
文学 gzliter@126.com

产品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影响机制 杨宜苗 邓京京 郭佳伟 9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融合发展的效率分析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罗良文 孙小宁 100

历史学

1947 年上海市政府对离奇火灾案的处置与消防事业的改善 朱 英 108
云南报销案与光绪朝前期的军需奏销困局 陈 勇 120
血洗出一个“新纪元”
——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与“文明” 段 炼 133

文 学 语言学

戏曲现代戏的三个理论问题 傅 谨 144
论身体美学的“身体” 郭勇健 153
论后人类审美的三个维度 王坤宇 160
论《金瓶梅词话》的药物叙事 史小军 王舒欣 167

封三、封底：岭南人文图说
——孟鸿光生平及其印作书迹略论（下） 邝以明

英文摘要 177

Academic Research

CONTENTS

No.3, 2021

Metaphysics and Idealism ····· *Liu Senlin* (1)
A Study of Lenin's Revolution in Zizek's Discourse ····· *Xia Yinping and Xin Haifeng* (11)
The Debate over Relativism and Its Rival Arguments: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Williamson ····· *Zhang Lifeng* (17)
Why Is It Possible to Pursue Academic Career from the Reflection of Weber's Modern Academic System? ····· *Zheng Fei* (22)
Etiquette, Emotion and "The Way of Heaven"
——Analysis of the "Legi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Emotion "····· *Kuang Qili* (28)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I*)
——With a Discussion on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Literature ····· *Shi Tingyu and Zhang Pinggong* (34)
From "Momentary Trend" to "Constant Trend" : Stage Reflection and Long-term Arrang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onsumption ····· *Fan Hesheng and Liu Kaiqiang* (39)
The Achievement of the Organic Connection among Government, Market and Farmers: A New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 *Chen Tianxiang and Wei Guohua* (49)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Four Shared Value Cases of Enterprises ····· *Fang Lijie and Liu Xue* (56)
Commun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Township Government in Revitalizing Rural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H Township in Quanzhou City ····· *Hou Zhiyang* (63)
The Causes and Governance of "Micro-Corruption" in Rur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suring and Strict Governance the Party ····· *Bo Wanhong* (68)
The Impact of Internet Employment Search on the Employment and Wag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 *Luo Chuliang and Liang Xiaohui* (72)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Income Polariza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 *Tang Can, Sun Wenkai and Zhao Zhong* (80)
The Influence of Rural Land Title Registration in China on Changes in Farmers' Income and Income Gap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CHFS····· *Gao Fan and Zhao Xianghui* (86)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roduct Attributes Consistency on Time-honored Brand Extension Evaluation ····· *Yang Yimiao, Deng Jingjing and Guo Jiawei* (92)
Efficiency Analysis of Co-agglomeration and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 and Manufacturing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Micro-Enterprise Data ····· *Luo Liangwen and Sun Xiaoning* (100)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a Bizarre Fire Case and Improvement of Fire Fighting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 *Zhu Ying* (108)
Earlier Period from Reimbursement Scandal in Yunnan ····· *ChenYong* (120)
Creating a "New Era" from Revolution: "World" and "Civilization" in Li Dazhao's Thought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 *Duan Lian* (133)
Three Theoretical Issues about Modern-subject Drama····· *Fu Jin* (144)
The "Body" in Somaesthetics ····· *Guo Yongjian* (153)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Posthuman Aesthetic ····· *Wang Kunyu* (160)
On the Drug Narration in *The Golden Lotus* ····· *Shi Xiaojun and Wang Shuxin* (167)
English Main Abstracts ····· (177)

哲　学

形而上学与理想主义 *

刘森林

[摘　要] 理想主义有本体论和人生观的不同含义。观念论哲学立足于主体内在的逻辑要求而建构理想，生怕经验现实世界浸染和拉低自己。生命现实上升为第一重要后，新的理想主义需要反思旧理想主义的这种形而上学建构。传统形而上学建构的理想常常是弱者、旁观者的幻想。告别包括劳动本体论在内的传统本体论模式，告别上帝般完美无缺主体的逻辑，不再基于完美无缺来思考和设计，重新理解必然性规律，给生成性、担当、勇敢、斗争以主体性空间，以未来为导向，超越私人行动逻辑，才能走向积极有为者基于现实的新理想主义。

[关键词] 理想主义　形而上学　重建　现实的人

〔中图分类号〕B016；B01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01-10

理想主义在 20 世纪中国从风起云涌、持续高涨到遭遇低谷，构成了一个颇值得反思的重大事件。在经历了所谓“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演化轨迹和经验主义洗礼之后，理想主义只能跟我们渐行渐远吗？我们能够重建理想主义吗？如能，能够重建什么形态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重建如何避免与解除苦闷、摆脱落后、躲避沉沦、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内在关联？如何能够与更高的诉求内在关联起来？无论从本体论还是从人生观层面来说，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提供什么样的贡献？循着这些问题，本文探讨传统理想主义的一种特殊情形和特征：以传统形而上学为基础，容易导致一厢情愿、完美无缺，也容易导致灰飞烟灭、欲速而不达；这种传统理想主义无法维持，必须予以反思和重建。

一、传统形而上学塑造单纯的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在哲学上是一个较为模糊、笼统的概念，需要做出仔细的界定。它的西文对应词 Idealism 在哲学本体论上往往被译为“唯心主义”，也可译为“理想主义”“观念论”。如果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说，“理想主义意味着特别重视一些有价值的事物，如善、美、智慧、正义、神圣、完全等等”，[①] 表示对超越性的崇高价值的追求。伴随着现代性的世俗化转折，人们越来越注重现实生活，理想主义具有了崭新的特点。“近代理想主义跟旧理想主义颇有区别之处是在于注重生活及指导生活，因而亦超越当下之生活。旧理想主义对理性的气味甚重，几乎把复杂的人生全纳置于逻辑的规则之下，然而活泼的心灵是创造的，它要表现其自身在各方面的生活，如道德、艺术、经济、政治、宗教等等。”[②] 强调内在主体性及其创造性，注重生活本身的价值，注重从现实生活出发追求崇高的理想，构成了所谓近代理想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拓展性研究”（19ZDA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森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 济南，250100）。

① 谢扶雅：《近代理想主义》导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年，第 3 页。

② 谢扶雅：《近代理想主义》导论，第 12 页。

主义的几个根本特点。

虽然近代理想主义开始注重从生活本身出发寻求理想，但真正落实到位并不容易，近代以来理想的确立仍然深受传统本体论的内在影响。德国观念论哲学作为一种“理想主义”（唯心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主张，还不如说是一种理想构筑方式和论证方式。虽然艰深晦涩，观念论哲学却蕴涵着积极向上的理想气息，象征着一种文明的冉冉升起和拓展高扬。但是，理想的理论建构却不是来自经验现实，而是来自逻辑严密、自洽的理念世界。恰如舒尔茨所说，“德国观念论的出发点就在思想信任自身的那个地方，即相信自己能够在它的纯粹思想中构建起整个世界以及存在。”[①] 思想不是在对外部对象而是对自身内部存在的思考中建构自身的，理想的建构也就势必是立足于主体自身的逻辑和要求而得以完成的。于是，理想就只跟理性、逻辑、应该、整体、自洽、完满甚至一厢情愿根本相关，不但跟必定具有缺憾的经验、现实没有内在相关性，而且还尽力避开它，生怕他的粗糙、复杂、缺憾浸染自己的纯洁，拉低自己的高度、破坏自己的结构。虽然德国早期浪漫派和晚期谢林早已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这种哲学内部处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问题，开始了对经验现实的思考和重视，但终归不能根本性地改变从主体性内在与理性出发进行思想（理想）建构的根本之路。按照舒尔茨的说法，只有后观念论时代的核心问题才是理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才变为从现实出发反思和重构理性。这时，不同于理性的生命现实才被提到基础性的地位。人们日益认识到，“那个把握一切的东西和尺度已经不再是哲学思想，而是生命的现实了。”[②] 生命已上升到与上帝、理性同等重要，而且，生命还要作为哲学的基础。而生命现实显然并不完美无缺，反而呈现生成、流变、经验、有死、固有特定角度等局限性。那个无限完满的“上帝”之神越来越不再被信任，甚至不断被消解和死亡。如果说，“在一种根本的意义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运动所围绕的观念是：作为上帝般的存在的人的自我实现，或者作为上帝的人的自我实现。”[③] 那么，随着作为人之内在本质的“上帝”（如费尔巴哈的“类”）被视为一种虚构、幻想，甚至是软弱无力者的妄想，它对现实的人的决定性、辐射力不断降低，生命现实在获得自由和解放后何去何从，如何避免高度急速坠落，变成一堆碎片，甚至被虚无主义的雾霾所笼罩，就是一个越来越现实和严峻的问题。从青年黑格尔派到尼采的宗教批判，逐渐完成了上帝渐趋死亡的哲学判决。尼采在 1882 年《快乐的科学》第 3 卷开头终于说出上帝之死这个秘密后，那种依照主体内在性、出于对完满和绝对的追求而建构崇高理想的做法开始被人们质疑，新的钟声敲响了，新的时代开启了，新的做法势必呼之欲出。

不过，初期的钟声还没那么响，尚未进入人群的中心地带。以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方式构筑理想的路子仍然大行其事。真正从现实出发构筑理想，就像青年马克思所说的，“我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④] 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可以说贯穿了马克思一生的努力。这是后观念论哲学一直在努力之事。马克思的意思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是理想主义（唯心主义）本身固有的对立。如何解决这种对立，对我们来说就是近代理想主义与现代理想主义的区别所在。从感性现实出发重构理想主义，把神圣维度立足于尘世来理解和确立，而不再以不食人间烟火、超脱尘世的形式确立，是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理想主义的特征。虽然“近代”与“现代”在很多场合下几乎同义，但我们还是对两者做出明确区分。现代理想主义跟近代理想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它致力于祛除构筑理想主义的传统形而上学方法，致力于从新的现实出发重新构筑新的理想。在进行新的构筑之前，它必须高度关注构筑理想的传统方式，即传统形而上学方式。在近代理想主义中，理想构筑的方式还具有浓重的传统形而上

---

① [德] 瓦尔特·舒尔茨：《德国观念论的终结——谢林晚期哲学研究》，韩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64 页。

② [德] 瓦尔特·舒尔茨：《德国观念论的终结——谢林晚期哲学研究》，第 13-14 页。

③ [美] 罗伯特·C. 塔克：《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刘钰森、陈开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1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5 页。

学色彩。就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代”而言如此，就中国史意义上的“近代”与“现代”而言也是如此。

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世界是一个基于逻辑本身的观念世界。它无需考虑经验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异质性，无需过多考虑多种观念之间发生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甚至干脆略去现实世界的流变、个别、特殊、感性等特质，建构起一个本质、永恒、固定、纯粹的概念世界。只要逻辑上行得通，它就可以在理论上撇开现实存在中无法撇开的那些因素，在理论逻辑中建构一个单纯的理想世界，甚至径直简单地认定所有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完美无缺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完美的互补和秩序，按照某种一厢情愿的理想状况进行组合并落实。说到底，还是一种完美上帝的思维在主导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运作。它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经验上的缺陷和不足，径直按照随意的需要而承担任何功能，弥补任何缺位，堵住任何漏洞，从而产生一个要多美就多美的理想世界。即便当下不行，也可以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经历复杂的历史过程而实现。在期待实现的世界里，个体都可以不在话下地做出牺牲和贡献。个体可以渺小、卑微，但只有通过与完美整体的联系，才能获得通达完美整体的道路，触动自己身上的无限潜能，使自己获得升华。借助传统形而上学得以建构的那个完美无缺的理想世界，那个可以毫无漏洞、毫无缺陷、毫无绝对阻抗的存在，人们追求的理想，都可以安放于此。在尼采的眼里，这恰恰是虚弱者、逃避现实者设想的完美理想世界，也是最无能为力者设置理想的最极端的做法。它意味着，设想者本人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完全找不到感觉，只能完全离开这个现实世界任意幻想，在思想世界里把现实世界里无法撇开的因素完全撇开，在思想世界里把现实世界里无法调动的力量随意调动起来，在思想世界里把现实世界中无法调和整合的方面随意调和整合起来，完全不顾起码的常识胡思乱想。其实，设想得越完美无缺，越证明设想者多么虚幻，多么不食人间烟火或者无法食人间烟火。这就意味着，传统理想主义的构建基于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西方形而上学对生成性的忘却，对复杂性的简单化处理，对负面情绪、情感的有意识掩盖，对主动担当责任的弱化甚或放弃，对无能、缺陷、逃避的变相阉割与美化，促成了传统理想主义的诞生。在尼采以保罗、《新约》为典型对它的批判中，我们感受到基督教这种民众柏拉图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依赖，感受到传统形而上学作为这种传统理想主义的构筑方式、论证方式、思维方式的巨大作用。

尼采着力挖掘、批判的这种基督教理想构筑和论证方式，同样也是马克思批判反思的对象。尼采在早期的《悲剧的诞生》中就向往献身于健康事业的陶醉，把象征这种陶醉的酒神狄奥尼索斯视为勇敢、智慧、创造的化身，视为解决日神内在恐惧的关键所在。当狄奥尼索斯的对立面从阿波罗依次转到苏格拉底、耶稣基督、保罗之后，麻醉作为基督教理想的底色日益明朗化；而麻醉背后的焦虑、恐惧和急速、简易地摆脱掉这种焦虑与恐惧的冲动也更加明显。尼采认为基于麻醉的理想选择的是不解决问题却只是通过极力麻痹把问题打压、忘却的无奈之路。这种麻醉之法成就不了崇高的理想，充其量只能成就一种很低级、最多是平庸的东西，但是麻醉者会极力把这种东西美化为最高的理想。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功力和作为，也是启蒙者极力揭示的秘密。尼采对基督教那么多的分析，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说，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表达：“**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 鸦片那时就是典型的医用麻醉品，可以短期抚慰创伤，却无法彻底解除苦痛。历史唯物主义是要找到更根本的造成苦痛的成因，致力于通过生产力的增长、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来祛除生存者的苦难。所以，尼采后来极力分析的弱者通过麻醉之法解除苦痛并由此幻想一个毫无病痛、完美无缺的理想世界的做法，同样是马克思极力反思批判的对象。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为时短暂、追求极乐狂欢，常常沦落为一种典型的麻醉状态。“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 页。

长期的酒醉状态。”[①] 麻醉、酒醉状态极易产生一种不顾其他只顾一点并把这一点极端化、绝对化的绝对观念、绝对理想，并形成“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如马克思所说，“正如在锡利亚信徒脑子里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基督教的“千年王国”正是这种基于麻醉的幻想、理想。在这句话之后，马克思写下了这段名言：“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②] 在把资产阶级视为平庸者、弱者靠幻想与数量“战胜”对手以及试图把一切都变为交易对象这三点上，马克思和尼采立场高度一致。区别应该只是资产阶级平庸到什么程度，以及什么人能够替代它。尼采把不平庸的新人寄予超人，而马克思则寄予无产阶级。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避免这种麻醉模式，走向一种真正的解放。

从现实出发重构理想世界的要求，也就是上帝死了之后的目标，势必放弃上述逻辑，把从柏拉图至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世界还原为有缺陷的、必定有局限性的感性世界。这个世界即使要走向理想世界，也必须从现实出发进行建构。那种只需考虑逻辑世界，只需按照理念、愿望来组合的世界，早已没有了基本的合理性。传统形而上学的坍塌带来了理想主义的转型，旧的、单纯的理想主义越来越无法立足了。

二、单纯理想主义的出场路径：传统本体论建构与绝对必然性世界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简单理想主义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建构在简单的本体基础之上。传统形而上学需要一个根本性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建构来自某种应该、愿望、理论、逻辑、原则。其常见形式就是把万物都归于一个本体。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思想仍然潜存着这种思维方式。比如，脱离具体语境，极端抽象甚至偏执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无视马克思说这话的同时也在强调“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的统一，强调人的“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强调“**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强调共产主义理想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③] 所以，不能把上述第一句话理解为一切都是劳动创造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人的劳动，因而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都可以为了劳动而牺牲这种“劳动本体论”思想。同理也适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④] 的思想，不能把这种思想注释为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一切，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还同时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⑤] 显然，自然绝不是仅仅在实践对象的意义上存在的，它首先是实践、劳动的前提和基础。从自然出发来解释观念这个尼采后来取得重要成就的路子，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否定，只是并非他们“深入研究”的重点而已。同样，也不能把“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⑥] 理解为劳动不受任何因素的制约、反而要制约其他一切因素。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一种历史性的范畴，不是一般性的范畴，只有消灭这种劳动才能成就理想社会，“消灭劳动”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35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第 136 页。
③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2、92、90、83、81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72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46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10 页。

中明确表达了的观点。[①] 这种观点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仍然存在，只是换了表达形式。激进的、主动的“消灭”转变为历史性的、较为漫长的“消失”。[②] 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主义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观点提出严厉批评，强调“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③] 显然，马克思坚决拒斥劳动本体论。径直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劳动本体论的结果，不遗余力地在劳动这个点上努力，认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便可大功告成，这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倒是典型的拉萨尔主义。

当然，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不一定从劳动出发推导一切，完全可以从其他根本点出发，不顾现实的复杂情况，径直按照自己设想的逻辑来构造世界，构造自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时期给父亲的信中曾谈到这种做法，他说“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是理想主义（唯心主义）本身固有的对立，而自己在大学法学院学习初期的做法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建构：“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④] 躲在书房里构筑逻辑严密的理论，对社会生活浅尝辄止、隔靴搔痒，这样的思想者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火热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行动者。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传统形而上学做法，而不是马克思倡导的思想者与行动者融为一体的实践哲学做法。

传统形而上学很可能导致偏执和极端。以自己认定的根本本体对其他存在极尽蔑视和摧残。如果需要牺牲次要存在才能成全这种理想主义眼中的根本存在，它是无需什么担忧和在所不惜的。在坚持本体主义逻辑的前提下，它往往把问题发生的根源定位于根本本体定位不对，由此导致再去寻找另一种“本体”。结果，在急躁的历史境遇中，基于寻得一个最根本本体、建构一个根本世界的愿望，就可能出现基于不同本体而设计的方案一个又一个不断变换。这或许正好反映了追求者所处环境和内心向往的反差和互动关系。倍感压力、急切希望摆脱困境的人们，往往喜欢一个简单的做法，希望存在一个一通百通、一了百了的根本性存在并且尽快抓住它来获得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以便在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登上摆脱苦海的一叶小舟，尽快上岸，但这叶小舟其实通不到真实的海岸。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与尼采批评的基督教初创时期的境况或许有些类似：处在苦闷、苦痛中的人们热切盼望一个简单的理想国。不管是以西方（学）为体，还是以中国（学）为体，人们按照体用关系把这种最根本的本体先后理解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制度（从而把西方的船坚炮利理解为次要的技艺）、来自西方的某种政治制度（三权分立或者英国—日本式保留皇权的现代政治制度），还有全面西化意义上的西方体制、工业化、教育等。这种体用关系意义上的“体”，都是可以抓住一点，不管其他展开自己的理想设计，而对对手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予以否定排斥。急切希望改变苦闷、落后状态的青年人，对于象征着更好理想的各种外来“主义”抱有急切和过高的期望，导致希望与失望交替。只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水准达到相当高度之后，这个问题才逐渐获得合理解决。

第二，依赖绝对固定和必然的世界。传统形而上学世界是一种固定、永恒、必然的世界。如西美尔所说，“自赫拉克利特与爱利亚学派的争论以来，形而上学过程便游离于形成和存在之间；整个希腊哲学就是一部努力将存在——在它的概念中灵魂得到自己和世界的安宁和确定性——所具有的实质的坚固性和封闭状态与灵魂在自身之内和世界之中发现的流动和变化、多样性和生动性组合成一个统一的、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01 页。

②参见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的有关论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理论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必然会消失），不是普遍一般性存在（永恒存在），是该书的基本观点。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57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10 页。

没有矛盾的现实观念的历史。”[①] 传统形而上学把世界设想为坚固、封闭、必然、永恒的存在，认为这才是“现实”。与此相反的流变、开放、偶然、生成则是虚幻的非现实。拒斥传统形而上学意味着对生成、斗争、开放的推崇。尼采赞美“生成”和“偶然”，马克思没有尼采那么喜欢偶然，但跟尼采一样喜欢生成。变换、生成、矛盾、斗争都被视为与真实世界对立着，也就必然被视为是不真实、不正常甚至不道德的。而实际上，按照尼采的看法，这才是真实世界、真正的现实世界的内在属性。在尼采看来，世界的虚假性和现实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取决于是否将生成、变动、多样性和矛盾等性质看作世界的属性。“更迭替换，变动，多样性，对立，矛盾，战争”，[②] 就是构成世界现实性的特征。尼采曾经转引朗格的一句话：“人所想象的现实以及——假如这种想象动摇了——人所渴望的现实：一种绝对固定的、不依赖于我们却被我们认识的存在——一种这样的现实是没有的。”尼采肯定之，但很遗憾“这并没有令朗格感到骄傲！”[③] 在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的对立中，尼采终生向往后者。前者意味着对虚构的梦想、美的假象世界的追求，而后者意味着“对生成积极地理解，主观地感受，视之为创造者的狂喜”。[④] 在狄奥尼索斯作为哲人的素质得以大力提升之后，这种狄奥尼索斯就跟新偶像联系在一起，并开始被称为“神”：“生成是一种不满足者、超富裕者、无限渴望和追求者的持续创造，是神的持续创造，这个神只能通过不断变换和更替才能克服存在的折磨”。[⑤]

否定生成，设想出一个没有矛盾、对立，没有多样性，没有变动不居的本质世界，作为纯洁、单纯、善和美的“真实世界”，就是尼采所谓虚无主义的虚构。在尼采看来，这个世界通过哲人的想象表现为理性世界，通过宗教人士的想象表现为上帝世界，通过伦理学家表现为善、完美、公正和神圣的世界，但都是臆造和虚构，把现实之中那些有助于生命活力的东西诋毁了、否定了，所以，这些被构想的真实世界其实是“虚无、不生存、不想生存的同义词”；而反映这些思想的“哲学、宗教、伦理道德乃是颓废的症状”。[⑥] 显然，由此构建出来的“理想世界”就是一种标准的传统形而上学造物，是把非真实的世界当成了真实世界。“当人们捏造一个理想世界时，也就使现实失去了其价值、意义和真实性……‘真实世界’和‘虚假世界’——用德语来说就是：虚假的世界和现实性……理想这一谎言向来是诅咒现实性的，人类本身被理想这个谎言所蒙骗，使自己的天性降到最低点，并且变得虚假，以致去推崇那些有悖于人类用以确保繁荣、未来以及对未来的崇高权利的价值。”[⑦] 这样的理想世界在启蒙取得重大进展的现当代显然已无效。在这里，马克思与尼采至少在存在的斗争性、存在必然就有的矛盾性上是非常一致的。众所周知，在回答《太阳报》通讯员约翰·斯温顿“什么是存在”的提问时，马克思郑重的回答是“斗争！”[⑧] 据此，马克思显然与尼采一样都属于上述西美尔所划分的从传统形而上学否定的生成、矛盾、开放角度理解世界的哲学家之列。尼采喜欢的生成跟自然、意识形态批判具有密切关联，而马克思喜欢的生成则与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对马克思来说，生成意味着包括物质生产、理论生产（意识形态批判）、社会政治活动在内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意味着自己不懈地付出努力。对他们来说，生成都意味着责任担当，意味着勇敢和努力，虽然担当者有所差异：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超人。

由此，生成势必要剔除绝对必然性、固定性、封闭性的传统理解，重新理解必然规律。马克思不像尼采那样谈论超人的命运，即使遭遇挫败也要奋起的命运。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他对历史规律深有新体会。社会历史规律对于他来说，绝不再是外在于无产阶级实践的绝对外在，而只是一种正在生成并在调整变化着的主导趋势。“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

① [德] 西美尔：《叔本华与尼采》，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2 页。
② [德]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林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56 页。
③ [德]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第 762 页。
④ [德]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第 991 页。
⑤ [德]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第 991 页。
⑥ [德]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第 161 页。
⑦ [德] 尼采：《瞧，这个人》，黄敬甫、李柳明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722 页。

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①] 占统治地位的趋势意味着“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②] 同时，它意味着还有非主导型的趋势与之并行竞争，需要实践主体根据复杂的客观境况和主客观条件予以规整、引导、争取，做出各种积极努力；需要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具有不可忽视的主体性空间，必须付出艰苦、真实的努力，才可能使主体的实践作为与正在发生的历史主导趋势相契合。真正的理想与社会历史规律、与阶级群体的形成和做出的各种实践努力密切关联在一起。

由于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理想”常常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口头禅，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愿用这个词来界定他们推崇的共产主义社会。确立真正理想的道路必须基于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知，基于对客观必然规律的把握之上；否则理想就可能是一种盲从和迷信。在 1877 年致威·布洛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明确拒斥了这样的理想主义建构方式。他指出，“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共产主义者同盟——引者注）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摈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③] 崇拜、迷信、不问理由和根据的理想确认，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为了凸显理想的科学基础，申明信念具有现实的根基，马克思甚至不愿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理想：“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④] 或者，“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⑤] 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科学理论，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知、把握和解决以推动其向前发展的运动。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主义建构绝不是一项容易的事业，不但需要坚强的意志、先进的立场，更需要颇高的素养、科学的方法、艰苦的努力、不懈的实践。

三、实践的理想主义：超越单纯与懒惰

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探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其中蕴含着共产主义理想与资产阶级理想的区别，以及前者如何避免资产阶级单纯理想等。如果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理想主义称为“实践的理想主义”，那么，在笔者看来，它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直面现实的价值：以未来为导向。总结过去可以按照某种逻辑来进行，而且往往也只能按照某种逻辑来进行。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实际介入其中，无法以实际参与者的身份在事件的塑成中获得实际的实践经验，而只能从外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按照某种理论逻辑和方法来进行。不管你如何想方设法改变这一点，都无法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比如马克思采用的从后思索的方法，就是立足当下最丰富最发达的现实，往前追索它是如何发展而来、如何成为现实的，由此，那些以往发展历程中其他的可能性、其他未对当下现实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和力量，都可以不予考虑。但如果以未来为导向，思考从当下出发迈向怎样的未来，由于正在生成之中，多种因素和力量正在角力，该考虑的因素和力量就应该很多，诸多的可能性都不能随便撇开。面向以往历史的理论建构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但构建未来，思考者完全可以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同时占有理论思考者和实践参与者两种身份，并在这两种身份的统一中真切体悟、感受到更多的复杂性。只有真正的实践参与者才会认知到现实的复杂性，才会拒斥单纯的理想主义，而马克思恰恰就是这样。

单纯的理想者往往是迷恋过去，迷恋固定的以及被设想为完美的东西，而对开辟、应对必须解决的复杂问题之后才可能呈现的未来缺乏兴趣。被迷恋的“过去”也往往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设想出来的，并非真实。他用这个被设想的简单、完美存在来应对历史，也应对未来的复杂性；要么想不到复杂的问题，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81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第 258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89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03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6 页。

要么就把这些问题的解决视为必定能做到的、水到渠成的事情，以一种简单、一厢情愿的方式去一次次地应对。为此，马克思一开始就强调，“19 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 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①]

但马克思一贯反对随意想象未来，对很久以后的未来，不愿做出过多言说。他喜欢谈论的，只是现实的世界，即必须“是经验事实”，或者必须“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的存在。[②] 现实是涌动着的生成，是实践推动、凝聚着的过程性存在。 抛开现实，随意地想象遥远、过于完美的未来，在一个更大时段中舍弃生成、流变、偶然、复杂，抽象出一种简单、固化、永恒的既成秩序，恰恰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传统形而上学依赖和寄托于一个单纯、完美的整体，不但需要剔除异质性和复杂性，也要剔除一切设想者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努力、辛苦、斗争，比如流变、阻碍、担当，从而把理想境界设想为无须努力，无须负担，一切都已足够好，没有斗争，没有痛苦，只有享受和成功的理想国。

基督教的天堂就是这样的理想国，因此也正是马克思和尼采都极力反对的。对他们来说，那天堂是一种不可能，是一种颓废、逃避、消极选择和幻觉。这方面主要表现就是那个理想世界没有一点儿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如痛苦、斗争、矛盾、冲突、冒险、烦恼和费力等；全是快乐、舒适、保险、信手而来。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斗争，不需要费力，轻松愉快地满足欲望，正是弱者、懒惰者希望的理想世界。随意就能满足，不需要辛苦和斗争就能得来无限福祉，这是不折不扣的幻想和无能者的形而上学。设想没有痛苦、烦恼，都是安全、幸福、纯洁和美妙，是没有能力应对和处理必然遇到的问题的表现，是一劳永逸地处理掉这个问题的表现。所谓“彼岸”“真实世界”的秘密就在这里。“对那些不能克服这种阻碍和‘不想再意愿’的人来说，烦恼和痛苦变得无法忍受，并导致他们去渴望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在其中没有痛苦的世界’。”[③] 没有痛苦的世界恰是痛苦者的向往、拟想。“那是痛苦和无能——它创造了全部的彼世——以及那种唯有最苦难者才能经验到的幸福和短暂疯狂。想一跃，致命一跃达到终极的疲倦，一种可怜的、无知的甚至不愿再意愿的疲惫：它创造了所有诸神和彼世。”[④] 这就是那个单纯理想世界的底本。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的敌基督等于马克思反形而上学。

虽然马克思不愿过多谈论作为遥远之事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样子，但在那个世界中，斗争戛然而止、全是消遣并且不用辛苦劳作应该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斗争戛然而止的世界绝不是共产主义；辛苦不再、劳动就是娱乐和消遣的理想社会更不是共产主义。恰如马克思在批评傅立叶时所指出的，虽然未来理想社会里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⑤] 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理想世界的创造者是具有更多的担当、更强的创造性能力、更高的素养的努力者。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以及尼采的超人都必须是这样的担当者和创造者。就像伯纳德·雷金斯特所概括的，“就算要向往一个更好的生活，至少我们将不再向往某种类似于基督教的天堂，或者佛教的涅槃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再向往一种完全没有烦恼和痛苦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在那里，不需要太过工作或斗争来满足我们的欲望。”[⑥]

第二，现实的人现实地行动。单纯的理想是基于上帝般完美无缺的人而思考和设计的，理想是一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第 134 页。

② 相关分析参见刘森林：《回归自然与超越自然》，《哲学研究》2016 年第 7 期。

③ [美] 伯纳德·雷金斯特：《肯定生命：尼采论克服虚无主义》，汪希达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16 页。

④ [德]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0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16 页。

⑥ [美] 伯纳德·雷金斯特：《肯定生命：尼采论克服虚无主义》，第 294 页。

种靠传统形而上学论证的固定实质。实践的理想主义基于现实的人追求现实的理想，这种理想不再是实质性的，不再以形而上学为根基和理由，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必然性”“规律”，对偶然性、可能性、主体性保持足够的开放性空间。“现实的人”不仅是踏踏实实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是祛除了意识形态幻想、不以传统形而上学思考和论证的人，还至少具有另外两个特征：一是不再是完美无缺的人，二是超越了私人行动的人。

没有完美无缺的神人。理想不再是单纯、完美无缺的，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早已认识到，“现实的人”是有各种自然和社会历史的缺陷和不足的。完美无缺者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构造物。弱者才会相信有完美无缺的能人、“超人”。尼采曾经深度挖掘过基督教中这种完美无缺者的诞生秘密。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完美者的代表，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锻造品。上帝凝聚着弱者的一切希望，弱者没有的品质、能力、境界、样态等，上帝都会有；作为设想者的弱者缺什么，其创造出来的“上帝”就能补上什么，需要什么就来什么。恰如尼采所指出的，这样的完美存在恰好就是无能弱者的对立面。上帝的全知全能对应的是弱者的无知无能；上帝的瞬间对应的是弱者的永远不是；上帝的无所畏惧对应的是弱者的畏惧一切；上帝超越一切限制对应的是弱者超越不了一个限制；上帝的整全和巨大对应的是弱者的破碎与渺小；上帝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对应的是弱者的无时不在退却、无处不在隐匿；上帝的全面担当对应的是弱者的逃避畏缩。尼采用“超人”替代这样虚幻的上帝。狄奥尼索斯、查拉图斯特拉都在呼唤和塑造尼采需要的超人。尼采意义上的“超人”绝非完美无缺者，而是最现实的人，是深知自己的缺陷、可能的失败并仍然积极努力的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更不是完美无缺者，而是在对现实的认知与超越、对矛盾问题的不断求解、对复杂与生成的认可和把握中不断改造提升自己，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谋求与自己的能力、与现实的运行相一致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切近。他们抛弃幻想，坦然面对失败和不足，在存在着可能性、需要掌舵与探索、需要更大的责任与担当、需要承担风险的过程中完善自身、推动社会历史前进。

设想并依赖完美无缺的神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人”坚决拒斥的。“现实的人”是有各种自然和社会历史的缺陷和不足，但他一定在社会历史进步中不断谋求提升和改变。完美无缺者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构造物。弱者才会相信有完美无缺的能人、“超人”。1891 年 2 月 11 日在致考茨基的一封信的结尾处，恩格斯提醒我们，不能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塑造完美无缺的迷信，不能按照这种模式设想任何人，而必须针对不足和缺陷开展批评。他这样写道：“还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①] 如果无产阶级把官吏设想为完美无缺的人，就像基督徒把上帝及其代言人设想为完美无缺者一样，不仅是不现实、不符合真实境况的，也是会导致理想偏颇、个人崇拜和社会乱象等各种不利结果的。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呼应了恩格斯的这一智慧之见。他批评波拿巴利用迷信塑造完美无缺的神人来欺骗民众。他发现，在波拿巴的欺骗和民众的信奉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成、相辅相成的隐秘关系。波拿巴的欺骗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法国农民的愚昧和不开化。波拿巴试图利用民众对拿破仑的迷信来谋求人们对他的拥戴，为此他“像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②] 波拿巴获得政权就是利用了农民对“拿破仑”的迷信：“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③] 马克思的意思很明显，用这样的迷信是做不成现代事业的。尼采提醒他的超人再不能塑造崇拜者，一旦启蒙开启，被启蒙者有了自我意识的素质、习惯和能力，作为超人的启蒙者就应该躲到一边。迫切需要崇拜者的人根本承担不起未来理想的塑造。像尼采对他的“超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3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第 240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第 230 页。

人”一样，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的，也是时间的紧迫与有限性，撇开平庸者的责任推脱、左顾右盼、患得患失而去积极承担，以及不懈地提升自己能力的必要性等。对此马克思的观点很明显，第一是要提升他们，以便使之融入现代生产方式之中。

第二是要联合他们，使他们联合起来，纳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中。超越私人行动，这是现实行动的必然要求之一。对马克思来说，逃避现实的表现还有一点，就是不联合的私人行动。这涉及面对复杂多样性历史主体如何对待和处置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①] 争取更多志同道合者的支持，团结更多志同道合者一起行动，是对抗已经建立了明显优势的对手所必需的现实策略。我们知道，后来的葛兰西和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进一步拓展了可以团结和联合的对象：为了完成当下的任务、解决当下的难题，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不忘初心。马克思认为，“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②] 的小农因此没有形成一个真实的阶级，只是就与其他阶级不同这一点而言才是一个理论上的阶级，更加凸显了这个观点的内涵。

所以，即使是上述有缺点的农民，也不能把他们推给对手，而应该争取和联合。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说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③] 与资产阶级曾经跟农民联合一样，无产阶级应该与农民结盟：“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④]

超越了私人行动的社会联合，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之上，由此奠基支撑起务实的实践与创造。理想不再是实质性的、固定的东西，而是奠基于基本需要得以解决、生存实践已被超越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共产主义不是静止的美好，而是创造性空间的施展，是创造性活动频发、迸发的园地。实质性的融化使得创造性空间不但得以扩大，而且方向也变得丰富多元，在遵循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向崇高价值多向度扩展，不再像实质性理想时代只聚集于一个单一方向。在创造性活动获得更大空间、更多向度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尼采是一致的，只是两个人的关注点可能不尽一致。马克思在乎的是制度性社会关系的合理性问题，这种社会关系不是压制而是解放劳动者的创造性。社会关系是促成还是压制劳动者创造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给予重点关注的地方。而尼采关心的是创造性的内在能力和品质方面。这些品质包括承担风险而不是百般安全、乐于生成而不是固化存在、追求创新而不是故步自封、依靠自己而不是献身神灵等。马克思注重的社会现实性与尼采主张的自然现实性结合、互补才能更好地保证理想社会的现实性，保证理想社会不再陷入虚幻和形而上学，不再陷入那种靠单纯想象来生存和行动的弱者策略，而走向必须建构高水平的复杂理论及与之相适应的强者行动策略。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眼里，资产阶级是畏惧未来、保守维持的弱者，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从现实出发创造理想的强者。

总之，传统形而上学支撑的旧理想主义结束了。新的理想是一种过程，是一种创造性行动，是一种依据新式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命运（尼采）建构的目标和实践，是一种主动的担当。理想有高有低，立足于不同现实状况的不同的理想是积极有为者的必需。告别传统形而上学支撑的单纯理想主义，走向一种现实、实践、健康的理想主义，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新理想主义。

责任编辑：罗 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第 139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第 228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第 230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第 230 页。

齐泽克话语中的列宁式革命研究 *

夏银平　辛海风

[摘 要]在 21 世纪西方，很少有人能像齐泽克一样喊出“重述列宁”的口号。齐泽克区分了现实的列宁与真实的列宁，试图破除西方对列宁形象的扭曲；并且号召回到列宁，学习列宁式革命的行动姿态，穿越意识形态幻象，追寻“征兆”的踪迹，用“主体介入”的方式建构真相。齐泽克的努力旨在揭露资本主义全球化格局的裂缝，帮助我们分析这个时代的诸多怪相，却并没有真正找到破除意识形态大他者的途径。

[关键词]齐泽克　列宁　革命　全球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A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11-06

一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列宁这个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光环的角色怀有过多的偏见，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愿意为列宁讲一句公道话。当代著名的西方激进左翼学者齐泽克就曾经无奈地向他的好友阿兰·巴迪欧抱怨道：“你知道那本论列宁的书让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因为它，我丧失了自己三分之二的朋友。”① 齐泽克要塑造一个不同于西方视界的列宁形象，并重述列宁的革命经验。

一、现实的列宁与真实的列宁

以“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为坐标轴结成了冷战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基本秩序。全球化将资本主义的力量表达得淋漓尽致，它向我们深刻地展示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一切领域的适用性。物化不仅入侵我们的身体和活动，而且俘虏我们的思想和灵魂。在这一背景下，现实和真实之间不能再轻易划等号。所以，被西方学界戴上意识形态面具的“列宁”自然不是真实的列宁了，这正是齐泽克重塑列宁的初衷。

（一）现实的列宁：“无分之分”

为充分认识今天的列宁，可以借用法国当代著名左翼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概念——“无分之分”（the part of those who have no part）。② 所谓“无分之分”，也即“不属于该部分的部分”。朗西埃对它的说明颇为复杂，他重新定义了“政治”（politics），并将其与“治理”（police，又翻译成“警治”）区别开，指出今天的“政治通常被看作是一套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可以掌握集体、取得意见一致，实现权力组织、地位和角色的分配，并使这种分配合法化。这种政治只能被我想给这种分配制度和合法化的程序以一个新的命名，即警治。”③ 政治与此截然相反，它指“同现行的那种‘治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列宁对民粹主义批判及其当代启示研究”（18BKS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夏银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辛海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100084）。

① [法] 阿兰·巴迪欧、[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当下的哲学》，蓝江、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第 61 页。

② Jacques Rancie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30.

③ Jacques Rancie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28.

结构的分裂，在彼结构中，各党派、各组分以及无分者已经被提前定义，根据其定义，有一部分人在此结构中没有位置——（他们是）不构成其部分的部分。”[①] 这就是“无分之分”的原义。朗西埃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反对西方现行民主制，批评民主制把很大一部分普通民众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大众虽然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却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在齐泽克看来，列宁在今天就是一个“无分之分”的形象。作为历史人物，列宁是某种遗迹，某种凝固的客体对象，他不可更改；真正发生改变的是时空坐标，是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最大的历史事实。但无论如何，列宁在今天都是一个“无分之分”，他时常在西方世界闪现，又不被承认。

尽管如此，齐泽克依然在今天的列宁身上发现了一种颠覆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黑格尔把社会视为合理的整体（rational totality），但在马克思看来，一旦我们试着把现存社会秩序设想为合理的整体，我们就必须向其注入一个悖论性因素。作为其内在构成因素，该悖论性因素对其发挥着征兆的作用——颠覆这个整体的普遍合理的原则。”[②]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秩序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仍存在着像列宁这样的历史遗迹，它们好像沉寂于 20 世纪末的废墟之中，却又像随时会听从时代召唤，从“地中海中一跃而出”充当时代的主角。“在你之中而非你”[③] 就是列宁在 21 世纪的意义。这就是齐泽克笔下的那个悖论性因素，既具备颠覆资本主义的潜能，又成就了当代的资本主义秩序——资本主义的所谓“千年王国”是以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挫折来表现的，伴随这个挫折而来的正是列宁的现实困境；但只要列宁的真实形象被重塑起来，这个资本主义秩序就注定要破灭。

（二）真实的列宁：“坚持存在”

这样看来，列宁在西方世界就获得了一种奇异的生存方式，一方面，他的名字因为得不到认可而被尘封，另一方面，无论人们如何对他讳莫如深，他都已经被标记为一种符号存在于历史档案中。齐泽克说：“与存在（existence）相对的不是非存在（nonexistence），而是坚持存在（insistence）：它并不存在，它继续坚持存在（insist），力争成为存在（existence）。”[④] 真实的列宁就是这种“坚持存在”。列宁在冷战之后的西方世界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无法被整合到新的符号网络之中，这种存在方式并不是非存在的，而恰恰是一种持续存在。齐泽克认为，在下一次革命风暴来临的时候，列宁这样的遗迹会盛装出场，重新回到象征秩序当中。

所以在当下，列宁越是无法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他就离真相越发接近，因为他不代表现实的真理，而是代表未来的真理。而关于列宁的种种诋毁，表面上以“历史客观性”为口号，实际上只是意识形态的运作而已。在这里，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抛弃这个虚假的、建构出来的列宁形象，去重新发掘真实的列宁。齐泽克 *Repeating Lenin* 一书的结尾讲道，我们今天“重述列宁，并不是为了回到列宁——重述列宁是坦然接纳在列宁身上仍有值得拯救的内容。重述列宁是要区分他过去的实践和他打开的可能性的领域，是要发掘‘属于列宁又超越列宁’的东西：重述列宁就是勇于说明列宁的未竟之业。”[⑤] 什么是“属于列宁又超越列宁”的东西？曾经列宁领导的革命就是一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革命，它打破了整个西方由帝国主义链条结成的“矩阵”，把社会主义变得无比具体；其在不可能中看到可能，又把可能变成现实，这些历史的经验属于列宁。而今天面临的时代任务——在新的时空坐标发现征兆，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大他者，正是列宁的未竟之业。在一切说“不”的地方寻找可能性；在冲突的两端寻找第三个选项；在此世界寻找彼世界。这就是我们如今纪念列宁的意义所在。

---

① Jacques Rancie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30.

② Jacques Rancie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31.

③ Jacques Rancie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105.

④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年，第 23 页。

⑤ Slavoj Zizek, *Repeating Lenin*, London: Arkzin, 2002, p.310.

二、“穿越幻象”——重述十月革命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意识形态就存身于下列事实之中：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他们对于他们所从属的社会现实的表象是虚假的，这表象当然是由同一现实制造出来的扭曲。”[①] 如何打破这种意识形态禁锢，齐泽克认为列宁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最好的模板。

（一）十月革命与“实在界”的入侵

列宁谈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 1905—1907 三年阶级斗争中都没能被摧毁的君主制度，竟然如奇迹一般在短短三天里就土崩瓦解：“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②] 为了使这个奇迹发生，就需要许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积极条件以提供准备。这是怎样的一些条件？列宁说，是 1905—1907 年间无产阶级“进行的极其伟大的阶级搏斗”，[③] 还有反革命时期（1907—1914）沙皇君主制本质的充分暴露，以及之后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然而单纯看来，以上列举的三个关键前提——我们姑且称之为前提——在当时并不具有这样的积极意义，这种意义是被回溯性地赋予的。此外，这个奇迹，在它如疾风暴雨般突降之前丝毫没有预兆。在它终于成为现实以后，人们才纷纷去寻找历史车轮驶向当下的种种动因——也即前面提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积极条件，于是一种被广泛接纳的解释建立起来，它或者只是一种解释，或者成为了某种经验总结，深深地嵌入新的秩序中。社会现实就这样被建立起来。

十月革命同样如此。二月革命结束后，列宁已经在开始呼喊着立刻开始无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新政府也不配享有无产阶级的丝毫信任，而无产阶级也不应当予以任何支持”，此外“政权转归苏维埃目前在实践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现在拒绝武装起义，就等于背弃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口号”。[④] 列宁迫不及待地想带给俄国另一个奇迹。“这不可能！”几乎所有人向他叫喊。资本主义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的英美法德诸国都尚且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俄国怎么能够首先开始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里，“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⑤] 但历史却以十月革命做出了回答。在所有人都坚信不疑的那个象征界中，十月革命就像一次奇迹般的入侵，是实在界以毁天灭地的姿态在自我证明。它仿佛在提醒人们，它才真正代表了真相，而人们生存其间的那个现实世界，不过是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一场误认，因这个误认，他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生活的空间。为了安然无恙地生存，人们已经把这种合理性深深打进身体里，互相约定不对其发出任何疑问。而列宁就像个不循规蹈矩的叛逆者，他质疑这种约定俗成的合理性，用一场不可能完成的革命指明了真相。

（二）全球资本主义与“象征界”秩序

今天的西方世界陷入了与彼时列宁同样的困境当中，金融资本架构的整个西方秩序已经营造了一个铁桶一般的“象征界”。“象征界”是源于拉康的精神分析术语，它被齐泽克做了社会历史性的解释，代表的是现存社会秩序，而“实在界”则对应被掩盖的真相（或说可能性）。齐泽克借马克思的分析指出了这个“象征界”的必然矛盾：“自由是一个普遍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次属，如言论自由、意识自由、商业自由、政治自由等等。而且，借助结构必然性的分析就会发现，一种特殊的自由（工人在是市场上随意出售其劳动力的自由）将颠覆这一普遍概念。这就是说，这种自由恰恰是有效自由的对立物：通过‘随意’出卖其劳动力，工人失去了自由——这一自由出卖行为的真正内容是工人遭受资本的奴役。”[⑥]

---

①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第 42 页。
②《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 页。
③《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 页。
④《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38、328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 页。
⑥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 29 页。

工人的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普遍自由的例外；正是这个例外构成了资本主义永恒的矛盾。1832 年，工人革命领袖布朗基在地方法庭被法官要求陈述自己的职业时，他回答“无产者”，该官员立马反驳：“这不是一个职业。”布朗基回应道：“这是三百万依靠劳力为生且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法国劳工的职业。”[①] 无产者遭遇资本主义，是实在界遭遇象征界的隐喻，是秩序碎片开始脱落的表征。

今天，我们熟知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就是 21 世纪的象征秩序，它已经获得了完备的存在形态。一方面，伴随着股票、证券、银行业务等结构精美的资本运作体系，人们对未来抱着不假思索的乐观态度，这辆火车似乎没有刹车一般不知疲倦地疯跑；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生态灾难、贫穷、疾病和濒于崩溃的社会生活也迎头赶上，同样看不到尽头。对资本家而言，人间已经成了天堂；而对穷人来说，人间却是地狱。齐泽克为此寻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9·11”事件。他认为“9·11”事件意味着“向实在界的回归”[②]（return to the real）：“如果世贸大楼的轰塌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话，那也没有指向‘金融资本’这个曾经时髦的概念，双子塔应该象征着‘虚拟资本’，象征着与直接生产领域完全相分离的金融投资。这场恐袭的震慑力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分裂——日益数字化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真实荒漠。”[③]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之下，一切实在界硬核都被抽空了，就像曾经交换价值压制使用价值，商品压制人，量压迫质，今天是虚拟空间压迫真实空间，世界被抽象化，只剩一套规则自动运行，仿佛它超越一切。马克思曾批评青年黑格尔派：“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④] 今天也很少有人提出第一世界的繁荣和第三世界的混乱之间的联系问题。然而，在思想置若罔闻的地方，现实就会填补空白，终要以最感性的方式表达自身，这就是革命出场的时机。齐泽克正是在此处找到了列宁式革命的意义，在两个世界的平衡崩溃的时候，革命就成为打破象征秩序的最终手段。今天的西方世界要突破资本囚笼，也需要像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一样的勇气和姿态。

三、再论列宁——列宁式革命的真理之维

我们应从列宁的革命中汲取更多智慧，因为列宁式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代表了真理的维度。列宁的革命行动将主体实践纳入真理构建的进程中，对我们今天冲破西方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革命是主体介入的真理

今天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滑向了某种被称为“等价命题”[⑤]（equivalence thesis）的程序，真理本身成为了意识形态。这其实早已经由海德格尔所揭示：“陈述是真的，这意味着：它就存在者本身揭示存在者。它在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中说出存在者、展示存在者、‘让人看见’存在者。陈述的‘真在’（真理）必须被理解为揭示着的存在。”[⑥] 我们所陈述和面对的真理首先有一个被预先设定的被揭示状态，我们是在这个被设定的状态之中说明存在者的，与其说我们说出了真理，不如说我们重复了真理的被揭示过程。这恰恰再现了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此在”真理，正因我们是在这个秩序之内陈述它的存在者，所以我们无一例外是在重复这个秩序本身。“此在从本质上沉沦着，所以依照此在的存在机制，此在在‘不真’中。”[⑦] 无怪海德格尔最后得出结论：“并非陈述是真理的本来‘处所’；相反，陈述作为占有揭示状态的方式，作为在世的方式，乃奠基于此在的解释活动或其展开状态。”[⑧] 一切显而为真之陈述，其秘密在于“此在”的展开方式。既然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已经占领了“此在”的位置，那么继续迷信它的真理标准就永远得不出意外的答案，此时真理就需要被重构。

---

① 转引自 Jacques Rancie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37.
② Slavoj Zizek, *Repeating Lenin*, London: Arkzin, 2002, p.233.
③ Slavoj Zizek, *Repeating Lenin*, London: Arkzin, 2002, p.232.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45 页。
⑤ Michael Devitt, *Realism and Tru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6.
⑥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第 263 页。
⑦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267 页。
⑧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272 页。

或许黑格尔比现代人更懂什么是真理："真实和虚假属于那些固定不动地被看作自己本质的确定观念，它们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互不沟通、各自独立，并确定无疑。与此相反，必须主张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钱币，既可以付清也可以净赚"；同时，"虚假也不是作为虚假的东西而成为真理的一个环节的。"[①] 虚假只是在此在为真的东西看来才成为虚假，在适宜的条件下，虚假也可以是真实的。所以，如果将虚假放在真理的环节之下来考虑，虚假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流动的真理进程。只不过这个真理的进程在黑格尔那里是精神运动的结果，主体只是凭借自我意识参与其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②]

真理不会自动显现，它依赖主体的感性实践活动，革命是它最激烈的表现方式。齐泽克说，"列宁并不害怕去赢得胜利"（he wasn't afraid to succeed），[③] 就是肯定了他在历史关口勇于决断的革命姿态——用自我的主体介入去开创时代。这恰恰是列宁深谙之道，"主体介入"就是打破现有的可能性，对真理进行重构。

在齐泽克看来，列宁的革命就是主体介入的真理。正如马奥尼所言，"齐泽克指出了最重要的一点，即革命作为欲望的对象是不可及的，但作为驱力的对象总是可以实践的。"[④] 尽管无法明确指出象征秩序解体的位置，但齐泽克依然为革命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

（二）主体的幻灭——齐泽克对列宁主义的误读

但是，齐泽克对列宁主义的认识是抽象的，尽管他频繁使用"革命"这样激进的字眼，却在最深处同他所不愿与之为伍的那些人一样，是"伪装"的行动派。究其根本，是因为他滥用精神分析去理解唯物史观，所以不能像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真正发现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更不能去准确地说明这种必然性。

当全球资本主义被齐泽克指认为我们今天时代的"象征界"时，当他强调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穿越幻象，走向征兆"，寻找象征秩序脱落的表征时，他就已经宣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限。齐泽克并不是在重述列宁，他对列宁式革命的认识还没有触及其历史必然性，这是说他根本没有像列宁一样去认识当时的俄国怎样出现了可以革命的情势，而是在努力说明列宁最终以革命的方式建成社会主义的宏伟壮举。他甚至为此重新定义了真理，即属于革命的真理。这背后并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力量，反而充分暴露了精神分析的局限——它只能从抽象的形式当中理解问题，尽管采取了非常现实的分析手法。所谓"实在界"，它是无所指的，只能由社会秩序的"反常"来洞穿；而"象征界"必然包含的那个"基本对抗"，其本身并没有得到现实的说明。

对齐泽克的激进政治理论做一番分析会发现，他的思维方式就像自己批判资本主义时讲的那样，"形式包含先于真实包含。"[⑤] 他先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为围绕着"基本对抗"（实在界）生成的"符号秩序"（象征界）这一模型，然后去贴合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逻辑，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是从这个社会普遍的苦难（工人阶级）出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现资本运行的整个规律，才最终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而这个结论直接被齐泽克利用起来，然后配合精神分析的术语，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解读。齐泽克的贡献在于为我们解析时代病症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分析手法，但无法像马克思那样指明变革世界的路径。

齐泽克说在西方，"列宁"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能指、一个破坏性的隐喻，在政治场合被绝对地等同于极权主义。所以他要重述列宁，恢复那个生动的、在历史关头充满挣扎又最终果敢坚决的列宁，恢

---

①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4-25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7-138 页。

③ Slavoj Zizek, *Repeating Lenin*, London: Arkzin, 2002, p.6.

④ [美] 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论齐泽克的革命观》，武锡申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 年第 4 期。

⑤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 72 页。

复列宁主义的真理维度，恢复革命的名誉。但齐泽克自己也把列宁变成了一个能指，变成了“革命的代言人”，而忽略了列宁的革命是建立在现实的政治情势和经济分析基础之上的，并不是“征兆”这两个字就能够完全概括的。正如马克思当年批评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①] 朗西埃的“无分之分”以及齐泽克的“征兆”，同样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但他们无一人能够像马克思那样精准地指出社会历史的未来。因为他们的革命都只是发生在概念中，都是抽象的“斗争”和“发现”，注定无法指引时代前进的脚步。

齐泽克的理论终点之所以无法像列宁那样在现实的土壤中找到依靠，最致命的问题在于主体——他无法找到可以承担“象征界”革命任务的主体。拉克劳对齐泽克的辛辣讽刺——“等待火星人”[②]——正击中了他的要害。“因为齐泽克拒绝将霸权逻辑应用到政治策略中，他陷入了死胡同。并且由于他把一切‘部分的’斗争看作内在于‘体系’的斗争，因而不得不将它们全部舍弃；另外由于原质是不可获得的，结果他就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没有为反资本主义斗争做出任何具体的历史行动。”[③]

在发现了这一切之后，齐泽克回到了马克思语中的工人阶级范畴。真正的工人阶级之所以是革命唯一可以依赖的主体，乃因为工人——劳动力——是作为一种不能被整合的商品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的商品世界中去的。“随着对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变成一个资本投资的领域，资本之下的吸纳也就变成了总体。但确切来说也正因为是这样，它才变成了非—全体；它不可能被总体化。作为一种资本投资的劳动力本身的自我指涉的元素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给整个领域引入了不平衡。”[④] 到这里，齐泽克语中的“基本对抗”（实在界）才终于出现，他也由此将拉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但这种术语转换只是对马克思的简单重复，它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今天的现实问题是，被他称为“游牧的无产阶级”的诸众，在顽固地进行他所谓“体系内”的斗争；真正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如退隐了一般失去了革命的主动。也许正如马奥尼所言，齐泽克的激进主义存在与现行资本主义秩序的同构关系，恰恰契合了这个时代已经陷入困境又无力走出困境的矛盾，这种“狂暴的脆弱”正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绝佳隐喻。

四、结语

关于如何看待经典马克思主义，齐泽克与我们有路径区别。但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能够从他那里见到一个熟悉的列宁形象，尽管这个列宁并不是那么具体，甚至是以另外一种理论身份出现的。但我们依然借助这样一个列宁洞穿了时代的秘密，并几乎触及了变革的边缘。齐泽克通过重述列宁的革命行动证明了今天左翼斗争一再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却无法指明今天要怎样去行动，以及谁来行动。在这个体系中看起来似乎拥有数不尽的革命主体，却又好像一个都没有，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抗的普遍性维度一清二楚，却始终缺少一个偶发性将它们统一起来。齐泽克的理论由此陷入两难，如果我们要等待偶发性的奇迹，就背叛了他用心重述的那个列宁。这个矛盾让齐泽克的政治哲学到最后也陷进了时代的泥淖，它努力想寻找突破，在对一切都明确说“不”以后，还是没能独善其身。但这种声音依然是积极的，它代表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依然没有绝迹。对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人来说，齐泽克对列宁的重述就像一个宣言，它宣布自己一定要走出全球资本主义这个迷宫，它宣布资本主义为人间的幻境，它提醒众人回到尘世，回到马克思和列宁的智慧中。如果这个宣言能够吸引更多西方力量加入这个阵营，那我们就能够向共产主义再迈进一步。

责任编辑：徐博雅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45 页。

②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p.232.

③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p.238.

④ Slavoj Zizek, Nomadic // Proletarians.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nomadic-proletarians/.

相对主义论争及其理据

——与威廉森教授商榷*

张力锋

[摘 要] 自然主义与其他先验论或神秘主义方法论的长期对峙为相对主义的登场创造了可能性，但诉诸效用的相对主义真理辩护并不成功，将真理相对于可能世界、命题内容相对于语境更有前景。绝对主义者切割真理与价值评判联系的实陈趋善论证，实际上暗中运用了真理概念。威廉森反驳可错论衍推不可知论的算术论证不成立，我们可以通过区分认知模态词项“可能错”与“实际错”加以简要证明。威廉森批评道德相对主义，是建立于消解语义外在论，但价值评判词汇的文化语境敏感特征并未改变，相对主义依然如是。

[关键词] 相对主义 真理 知识 可错论 价值

〔中图分类号〕B8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17-05

在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冲击下，哲学这门本来就小众化的学科更是被日益压榨，越来越呈现出职业化、技术化或八股文化倾向，远离普通读者群，处于被时代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非但如此，因受制于写作形式，多数哲学作品（尤以肇始于弗雷格的分析哲学论著为甚）行文刻板、机械，犹如同一台机器制造的风格雷同的工业产品，鲜有创见性成果出现，更难见生机勃勃的前景。英国著名哲学家蒂莫西·威廉森的新著《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Tetralogue: I'm Right, You Are Wr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则一反常态，采用回归柏拉图式对话体写作，试图扭转这一哲学窘境，让枯燥、僵化的抽象哲学争论透过生动活泼的日常琐事显现出来，赋予古老的哲学学科以崭新的生命力。

该著作以四幕话剧展开其核心议题的讨论，通过剧中四位主要角色之口呈现当代哲学的相对主义论争以及威廉森本人的认识。相对主义是一个重要哲学传统，也是当代哲学突破语言哲学渗透至形而上学、认识论等分支的一种最初理论形态。在当代，相对主义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蒯因提出的本体论相对性学说，其后又在逻辑学、语义学、认识论及道德哲学等领域产生不同变体，影响深远。借剧中人物的对话，威廉森表达了在他眼中相对主义的产生背景和主要洞见，指出相对主义陷入的困境，并经过概念、命题的辨析，提出一种绝对主义见解。全书主题集中，各幕衔接紧凑，对话机智幽默，语言也充满着生活气息。不过，细究之下，书中不少论点及相应论证都远不够充分。据此，本着与威廉森教授深入交流的宗旨，笔者将透过该书主要剧情，剖析其主要论题及理据，批驳其中的谬误及不足，补充或新构一些关键性论证，以使大众获得相对主义论争一个更全面的概观。

一、自然主义方法论之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逻辑与语言哲学视域下的模态认识论研究”（20AZX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力锋，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210023）。

莎拉是一个科学主义者，鲍勃是一个巫术迷信者，他俩是老朋友。他们在火车上偶遇，聊起鲍勃的腿因为自家花园围墙倒塌而受伤。鲍勃认为是邻居老太太对围墙施加咒语，从而导致其倒塌并砸伤自己的腿。莎拉认为鲍勃的看法在21世纪是不可理喻的，他根本不能解释魔法、咒语起作用的机制，完美的科学则可以解释这一事件。鲍勃反驳说莎拉的观点只是对科学的一种信仰，现代科学也不能解释这件事情，科学无能为力的事情很多，自由意志难题就是一个证明："无论如何，我敢打赌，你也不能解释我要去种花的想法如何使我的腿运动，让我走进花园。"[①] 随后，两人又就科学及巫术成功运作的证据展开辩论。莎拉坚信科学可以成功地解释很多事情，这一点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或其他可靠数据得到证实；鲍勃则将巫婆不能公开站出来解释巫术如何起作用的原因，归咎于现代社会的偏见：许多巫婆因为尝试这么做而受到迫害与惩罚。两人的观点不可调和，都坚称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

在这里，他们争论的话题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解释一个现象，两人共同假设了有一个足以说明该现象出现的实在因果关系：在莎拉看来，这一实在的因果关系是自然律的一个表现；而在鲍勃眼中，它是超自然巫术或咒语的魔力显现。莎拉和鲍勃在第一幕话剧中的争论，生动地反映出自然主义方法论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处境：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哲学领域打下的鲜明烙印，它远未一统天下。早在逻辑实证主义阶段，自然主义者就提出，只有包含公共可观察、证实的经验内容，一个句子才可能为真，甚至才可能有意义。但是，一方面，在技术上全称命题无法被证实，因而会导致几乎所有以探究普遍规律为目标的自然科学论断沦为不真不假的无意义命题。另一方面，即令逻辑实证主义信条自身，也会由于缺乏经验内容，而被判定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呓语。[②] 而进入当前形而上学议题，自然主义方案面临着更多的疑难，比如鲍勃提到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将人类的一切行动都看成自然因果律机械作用的结果，这些行动似乎就都是历史、因果地注定如此；在自然主义决定论解释下，人类的意志自由实际上被消解、被解构为一个幻象，不再具有实在的形而上学意义；如果人类不再实在地具有支配自身行动（包括言论）的意志自由，则一切世俗意义上的道德、法律规范都将失去形而上学基础，没有人理应为这些规范所约束，也不会有人因为违反它们需要承担责任。[③] 基于以上理论及实践的现实状况，在抽象的人文学科哲学中，一直存在着第一哲学与自然主义两种方法论分庭抗争，并且这种局面似乎也将继续延续下去。当然，相比于莎拉的咄咄逼人，超自然力量信奉者鲍勃更多是被动地防守辩护，从社会、历史的侧面视角，将巫术作用机制的神秘与不为人知，归结为政治压迫、社会偏见。这也真实地反映出技术化时代在强势的自然主义文化氛围中弱势文化形态的退守与挣扎，排斥与歧视本身就是与文化竞争互为因果、相互渗透的东西。

二、相对主义者的困境

莎拉和鲍勃激辩正酣之际，相对主义者扎克登场了，他试图做一个调停争端的和事佬。扎克认为，对错只是相对的：从现代科学的立场看，莎拉是正确的；从传统巫术的立场看，鲍勃也是正确的。没有脱离特定视角的真理，对与错不是绝对的。在扎克看来，绝对真理观在思想上会导致不宽容的独断论，在实践上则会导致杀戮、轰炸及入侵等悲剧，他甚至拒绝使用"真""假"这样的词语，认为"'真'：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词语"。[④] 但是，相对主义遭到莎拉和鲍勃的重创。比如，扎克声称相对主义只考虑观点的效果或结果，以此决定选择哪一观点，因此相对主义可以避免绝对主义的惨烈后果，它比绝对主义更好。鲍勃则反击指出，如果相对主义更好的话，那么作为相对主义者，扎克应该选择相信巫术而不是现代科学，因为现代科学可能最终通过污染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毁灭人类，而巫术不会，但事实上扎克

---

① [英] 蒂莫西·威廉森：《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徐召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② 参见尼诺·B·库恰瑞拉：《语言哲学的形式化工作》，[加] 约翰·V·康菲尔德主编：《劳特利奇哲学史第十卷：20世纪意义、知识和价值哲学》，江怡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3-56页。

③ Cf. Robert Kane, "Int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Contemporary Free Will Debates", Robert Ka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ree Wi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6.

④ [英] 蒂莫西·威廉森：《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第12页。

并没有这么做。莎拉批评说效果的好或坏因人而异，大屠杀的后果对某些人而言是好的，因此某些“好”的观点照样会造成惨烈结果，相对主义并不像扎克所说的那样可以避免这些悲剧。进一步地，莎拉还论证了相对主义并不蕴含宽容：“它并不蕴含他没有权力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①] 除此之外，扎克的相对主义还遭遇无穷倒退、自我认识等严重责难，他拒绝真理的态度甚至被斥为缺乏真诚。在鲍勃和莎拉的轮番攻击下，扎克疲于应战，陷入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

相对主义有着悠久的哲学史渊源，早在古希腊时代普罗泰戈拉就提出过“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及至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甚而有“人为自然立法”的论题。其主要信条为真理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甚至因人而异：由于人们持有不同的理论或信念体系，同一个语句或命题完全可能因为与一个理论或信念体系内的其他“真”命题相融贯，在信奉这一理论的人眼里就是真理，而因为与另外一个理论或信念体系内的“真”命题不一致，在接受那一信念体系的人看来则是谬误，例如剧中鲍勃腿伤的巫术解释。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实在论的真理观，即没有独立于人类认知的形而上学真理，“由独立于我们的实在所确定的真值概念应该抛弃。陈述为真的观念应该替换成被证明为真：一个陈述句的内容在于需要什么来证明它是真的”。[②]

但在剧中，扎克从后果或效用的角度为相对主义所做的辩护，实际上并不成功。真理与效用分别属于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两个不同哲学范畴的概念，真理是句子或命题的语义属性，可以引申为真理的承载者（真句子或命题），效用则是一个事件或现象产生的影响。真理未必总是产生良好的效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社会的失序和恐慌等严重后果。因此，从效用视角说明真理的实用主义策略基本是不可取的。另外，这样的辩护策略事实上将相对主义置于庸俗化的危险境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怂恿投机者的风险，在投机者看来没有真理，没有真相，也没有谎言，只有利益，只有结果。于是，即使扎克所声称的相对主义宽容性也难以实现：试想，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以逐利为终极目标的投机者心怀宽容？

尽管扎克的相对主义辩护没有得到其他两位剧中人的认同，当代哲学还是提供了一些更为专业的论理。一些分析哲学家从更为基础的逻辑语义学视角出发，不但将真假概念处理为相对于可能世界，而且将作为真值载体的句子所表达内容相对于行动者（agent）、时间、地点等语境要素，甚至在语义外在论者看来，“水”“柠檬”等最基本自然种类词的意义也部分地取决于语境世界，从而试图在根本上瓦解真理的绝对主义观念。但真理相对于可能世界，实际并未表明其相对性，只是更技术化地表现了真假的确定除了部分地取决于语句所表达内容，也部分地取决于外部世界中的事实，而这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也接受的基本语义规则。至于索引性语句所提出的相对主义挑战（例如“我被围墙砸伤腿”对于鲍勃为真，而对于莎拉和扎克则为假），似乎也可以通过明确真值承载者加以说明。[③] 若将仅表达字面意义的索引性语句本身看成真值承载者，的确真理是因行动者、时间或地点等语境因素而有所差异，因为不同语境下句子所表达内容各不相同。但若将特定语境下索引性语句所表达命题内容当作真值承载者，则语境因素将不再影响命题内容，也就不存在真值承载者的真假相对于语境的担忧：索引性语句“我被围墙砸伤腿”的表述者是鲍勃时，它所表达的命题内容得以确定为“鲍勃被围墙砸伤腿”，后者的真在四幕话剧中是绝对的，不会因人而异。可见，即使从语义学、逻辑学等哲学基础理论腹地展开的更为专业的相对主义辩护进路，也仍然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

三、信念的相对性与知识的不确定

罗克珊娜在第二幕的加入让讨论更为深入，她是一个略显自负、不太合群的逻辑学家。她让扎克

---

① [英] 蒂莫西·威廉森：《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第 31 页。

② Michael Dummett,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Randall E. Auxier and Lewis Edwin Hahn (eds.), *The Philosophy of Michael Dummett*,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18.

③ 参见张力锋：《严格性反观之下的意义理论新路径——模态论证的一个描述论逻辑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认识到，即使不使用“真”或“假”这样的词语，在实话实说比不实话实说好的默认假设下，信念的好与坏之类的价值比较争议一样会产生。更为重要的是，罗克珊娜澄清了弥漫在扎克、鲍勃和莎拉三人对话之中真与确定性的混淆，将“真”界定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确定性”则被视为一个认知概念。她的一个例证是他们乘坐的这列火车上的硬币数，没有人能知道或确定这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但事实上两个句子（“火车上现在的硬币数是奇数”“火车上现在的硬币数是偶数”）中肯定有一个是真的，因此，一定有一个不确定的真的句子实例，真并不蕴含确定性。据此，罗克珊娜成功地促使莎拉由概率主义者转变为可错论者：“记住，真不是确定。科学坚持真假之分，但科学精神使我们自我批判，并且宽容对立的意见，因为我们都可能犯错……在这种意义上，我称自己为‘可错论者’”。[①] 但罗克珊娜并不认同泛可错论。通过讨论“5+7=12”这个简单的算术题，她迫使莎拉承认我们人类虽然是可错的物种，但也在许多认识或信念上不是错误的。“可错论的要点更抽象：人类在任何思想领域都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是有可能犯错的”。她进一步指出：“可错论只是对人类可错性的一般提醒”，[②] 由可错论，并不会得出人类不拥有任何知识的不可知论推论。莎拉也由此意识到，“为‘我知道’建立一种我们永远达不到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为‘我有可能是错的’建立一种我们总是达到的标准也同样没有意义。为什么要设立不可能通过，或不可能通不过的测试呢?”[③] 在这里，借莎拉之口，威廉森教授实际上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十分另类的认识论主张——知识是首要的，不可定义。

为了将谓词“真”和“假”的使用与效用切割开来，罗克珊娜利用实陈趋善默认假设说明：如果一个陈述的内容属实，那么这么说就是实话实说，不这么说就是不实话实说，既然已默认假定实话实说比不实话实说更好，这么陈述就比不这么陈述更好；所以，每一个陈述自身都衍推一个价值判断——这么陈述比不这么陈述更好。即使不使用谓词“真”和“假”，照样会出现价值评判上的冲突乃至不宽容。这个论证思路缺失或隐藏的前提是每个陈述者都相信他的陈述内容属实，否则就算姑且将默认假设作为大前提接受，陈述者的价值判断也会因为没有小前提的支持而无从得出，甚至无法确定价值判断的主体。“陈述者相信他的陈述内容属实”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真”这样的词语，但终归是在命题态度层面“陈述者相信命题为真”的另一种隐蔽说法。价值比较争议在字面上不再依赖“真”“假”谓词，相反，这种依赖性渗透至认知、思维层面。因此，罗克珊娜与其说切断了真谓词与效用之间的联系，不如说强化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其论理实质上是借助真理与效用之间的衍推关系而产生威力。另外，实陈趋善假设并不成立，如本文第二节提到的真理引发社会恐慌，在现实生活中它也不为人们接受，实话实说未必总是比不实话实说好，有时候不实话实说会产生更好的结果或效用，如善意的谎言有时候更能激励人们，帮助人们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罗克珊娜完全可以祛除真诚言说的实陈趋善假设，直接从实用主义视角切割真理与效用，论证任何言说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而无关陈述内容是否为真理。

区分真和确定性，反映出罗克珊娜的实在论真理观。她认为，不管认知主体是否确定，真理就在那里，它是一种实在。实在论者认为，真是一个独立于认知的形而上学概念，是由外部实在所确定的语句、陈述或命题属性。按照这种真理观，扎克的相对主义就不再是真理的相对性，而应修正为信念或认识的相对性。决定认知主体接受或拒绝一个信念的不是外部实在，而是他的经验和已有信念体系。即使外部实在是唯一的，认知者完全有可能在同样的经验面前选择不同的信念：当一只筷子插入水中时，人们看到的是筷子变得弯曲，生活常识有限的儿童会将命题“水会使筷子弯曲”直接纳入自己的信念体系，因为它跟儿童现有的常识信念体系并不冲突；相反，成人则会拒绝这个命题，将这一现象理解为幻觉，因为它与成人现有信念体系中的知识相冲突。两者权衡，人们一般会采取较保守的策略，即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修改信念系统中的既有理论知识，只会将与理论知识冲突的当下经验命题“解释”掉。不过，

① [英] 蒂莫西·威廉森：《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第 89 页。
② [英] 蒂莫西·威廉森：《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第 104 页。
③ [英] 蒂莫西·威廉森：《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第 106 页。

当理论知识千疮百孔，拆东墙补西墙，贫于应对经验反例时，人们就只能修改某些理论知识，极端情况下甚至某些确定无疑的逻辑知识也不得不修改或放弃，从而有所谓逻辑实用主义方法论。

基于真和确定性在本性上的不同，真不蕴含确定性，我们也可以推断被认识到的真理（即知识）未必都是确定的，也是可以质疑的。如果要求知识都是确定的，那么现有的经验知识都将被排除于知识之外，因为它们都不是确定的：完全有可能这些经验通通都是输入钵中大脑皮层的脉冲电流刺激，根本没有决定这些经验知识之为真的事实存在。比如，吴刚收到某杂志社的用稿通知，感到很高兴。通常，由于看到用稿通知，我们便可以断言“吴刚的作品被某杂志社接受”，从而成为我们的一条知识。但由于视觉主体实际上是钵中大脑的认知可能性，我们就不能确定命题“吴刚的作品被某杂志社接受”。于是，按照知识蕴含确定性假设，我们就没有“吴刚的作品被某杂志社接受”这样一条知识。但这个推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此假设不成立，知识不蕴含确定性。事实上，“大部分哲学家的回应或者是否认‘确定性’是一个绝对词项……或者是否认知识要求确定性”。[①]

既然知识与不确定性相容，知识是可怀疑的，就自然会出现知识论上的可错论。虽然我们一般接受可错论并不以不可知论作为后承，但威廉森为罗克珊娜设计的论证台词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作为算术命题，“5+7=12”不是一个经验命题，逻辑主义者早已为算术真命题的分析性提供了详细的证明，[②]因此，这个命题是确定的，不是认知上可错的。既然这样的命题不受怀疑论困扰，拿它作为反不可知论推论的一个例证，就有点避重就轻的感觉。在这里，通过区分认知模态词项“可能错”和“实际错”，可以提供一个概要性证明。命题 p 在某一认知状态下是错的，即可错的，并不意味着它在实际认知状态下是错的，即实际错。因此，像“吴刚的作品被某杂志社接受”这样的经验命题虽然是可错的，但这并不衍推它实际是错的，经验命题的可错性并不衍推它实际认知的错误，从而切断不可知论推论。

阻断可错论的不可知论迷途，诚然是一种拨乱反正，但由知识是不确定的、可错的，进而提出知识没有标准或不可定义的见解，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必将引发知识、证据、真理及三者之间关系的一种颠覆性理解，这种知识首要的认识论尚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四、道德相对主义

最后，在道德判断的真理问题上，科学主义者莎拉转而同扎克一样持相对主义立场，认为“打嗝”这样的现象在不同文化中会被给予不同道德评判，有些文化会认为这种行为是粗鲁无礼的，而另一些文化则视其为礼貌的。因此，在道德相对主义者看来，“打嗝很无礼”这类道德判断便没有绝对的真、假可言，而要相对具体的语境才有意义。罗克珊娜则一以贯之地坚持绝对主义真理观，认为“一个句子表达的东西依赖于说出它的语境”，[③]只要将语境因素补充进句子中，道德判断一样获得绝对的真、假值：比如，“打嗝在莎拉的文化中很无礼”，以及“打嗝在罗克珊娜哥哥的文化中有礼貌”都是真的价值判断。

在笔者看来，罗克珊娜的这种道德绝对主义捍卫方式显然过于简约，难以令人满意。人们说“好”“礼貌”“粗鲁”“自私”这样的道德评判词汇是相对性的，是指它们没有绝对、统一的评价标准，不同文化可能赋予它们截然不同的涵义，同一个行为举止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可能会被贴上完全相反的道德评价标签。罗克珊娜式论理只是施了一个语言表达上的障眼法，将词汇涵义的语义外在论问题偷换为语句真值的相对性，于是，道德评判语句“打嗝很无礼”为真的相对性就可以转变为经语境限定后语句“在莎拉的文化中打嗝很无礼”为真的绝对性，似乎这样就可以轻易地化解道德相对主义。然而，决定一个评判绝对性的不仅是它绝对（相对于相对的意义）为真，还要看它所表达的命题内容。比如，“扎克体温 38°C 表明他在发烧”之所以是一个关于“发烧”的绝对性判定，不仅因为这个语句在任何情形

（**下转第 27 页**）

① Robert Audi (ed.),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9.

② 参见 [德] 弗雷格：《算术基础》，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

③ [英] 蒂莫西·威廉森：《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第 160 页。

学术为业何以可能

——论韦伯对现代学术体系的反思 *

郑　飞

[摘　要] 百年前，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专业化、官僚制、价值中立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我们反思现代学术体系提供了重要线索。随着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学术分工不断加剧，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追求为目标的碎片化、实证化和量化研究取代了宏大叙事，成为现代学术体系的主流。算法成为现代学术体系的核心概念，但算法等工具理性的进步，并不能带来价值理性的安顿。具有浓厚新康德主义色彩的韦伯，所提出的划定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坚持价值中立等现代学术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留下了一笔重要的学术遗产。

[关键词] 韦伯　学术体系　工具理性　官僚制　价值中立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22-06

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自韦伯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对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奉献了这么多的理智、耐心以及几近狂热的献身精神”。① 1917 年 11 月 7 日，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了题为“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提出工具理性、专业化、官僚制、价值中立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我们反思现代学术体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对我们今天探讨学术为业何以可能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奠定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现代学术体系

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给出对现代社会的时代诊断：“我们的时代的命运，这个伴随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首先就是世界的除魔”，“恰恰是那些最崇高的终极价值，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要么进入神秘生活的彼岸王国，要么返回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同胞关系中”。② 在韦伯看来，“除魔”本质上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一切笼罩在传统、价值和习惯上的迷雾都烟消云散了，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性的萎缩成为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

伴随着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变迁，现代学术体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古代治学讲求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圣人乃出世与入世之统一，做到王阳明式的立德、立功、立言才堪称完人。冯友兰所言，“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③ 道出了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

*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文明比较视野中的儒学研究”（19GZGX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100732）。

① [美]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38 页。

② [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第 44、45 页。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1 页。

学术体系之目标。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分析了儒家“君子不器”的观念，认为“有教养的人所应致力的是通才的养成，这在儒教的眼里只有教育能够做到，并且也是官职所特别要求的。此一观点刻画出家产制国家里，官职功能缺乏合理专门化的特性”。[①] 李猛指出，“韦伯梳理历史发现，无论是古希腊、中古封建制或英国的望族行政，还是古代中国的家产官僚制，其教育的目标都不是‘专家’，而是‘文化人’”。[②] 从古代的圣人、完人、文化人和“哲学王”，到现代的专家，折射出学术体系的古今之变。

现代学术体系建立在专业化的学术分工基础之上。现代学术体系源于古希腊，智者学派把雄辩术、修辞学和文法作为兜售的技艺；柏拉图的学园则有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等学科，构成了“七艺”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在古代成为诸多学科的开山鼻祖，但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永远不会再出现。随着学术分工的加剧，专业化的程度愈演愈烈，不仅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即便是在学科内部也存在着严密的划分，专家只能是在越来越小的领域中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与之相应，碎片化、实证化、数量化的研究取代了宏大叙事，黑格尔式建立哲学体系的努力亦被“除魔”。“学者们每日操劳，却越发陷入狭窄的专业化境遇中，连认清自己都难，谈何世界的未来?”[③] 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也极大地提高了现代学术体系的准入门槛，青年学子经过层层的选拔和长期的训练，方可拿到入门券。涂尔干就认为，这种专业化的学术分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竞争。

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过程伴随着韦伯所说的美国化。在德国的大学制度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生涯一般从编外讲师起步，“除了听课学生付给他听课费外，他没有分文的固定薪水。不过，他完全可以在其所获授课许可的界限内自行决定讲课的主题”。[④] 即便是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曾长期担任编外讲师，以至德国学术界经常开玩笑说，小伙子如果想在大学教书的话，最好先找个有钱的老丈人。无怪乎韦伯说学术生涯靠的更多是运气而非才华，“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⑤] 与之不同，在美国的大学中，青年学者则是从助理教授起步。“生活上美国的助教虽比德国的编外讲师过得好，心理上却时刻有着隐忧，因为倘若几年后他们无法达到要求，不符合大学的期望，就得卷铺盖走人，另寻他处。这支悬在头上的利剑，迫使这些年轻人每时每刻都要像工厂里的工人一般，通过教学研究中的计件办法尽可能证明自己的用处”。[⑥] 非升即走、量化考核、评价体系……这套为现代学术体系服务的美国化的大学制度，虽然百年前韦伯将其作为学术领域合理化、官僚制之佐证，但今天已经成为中国“青椒”们再也熟悉不过的“定在”。应星概括了美国化的含义：“其一，手工工匠式的科学研究正在转向大规模人力及资金投入、合作与产出的大工厂般的科学研究；其二，‘身份制支配’的大学自治体制正在转向官僚化的大学体制；其三，本着个人爱好的研究正在转向严格专业化的研究；其四，青年学者在教学与研究上的时间张力、在教学评价上的民主化与学术研究的贵族化之间的张力更加强化”。[⑦] 自洪堡以来浮士德式的人文理想，已让位于实用主义培养职业人的教育，这种美国化在商科领域表现得尤甚。“商学院的内在欲求，是要在全体社会经济竞争中拔得头筹，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懂得会计学、经营学这些在传统大学里没有地位的学科当然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广泛的交际圈子，小型的 seminar 研讨活动，取得官方认可的等级证书和毕业文凭”。[⑧] 须知道，韦伯时代的美国同马克思时代的英国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发展

---

① [德]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24 页。

② 李猛：《专家没有精神——韦伯论官僚时代的科学与文明》，[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262 页。

③ 渠敬东：《“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43 页。

④ [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4 页。

⑤ [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1 页。

⑥ 渠敬东：《“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46 页。

⑦ 应星：《“科学作为天职”在中国——韦伯视角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场域》，[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82 页。

⑧ 渠敬东：《“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48 页。

的样本，久负盛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便是韦伯在美国之行后寻找资本主义精神动源的产物。韦伯这里所说的美国化，也是资本主义对现代学术体系的影响。渠敬东就认为，“德国大学的‘美国化’，一开始便迎接着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所有挑战，管理、人事、课程、研究项目、经营资金乃至民主政治等方方面面，统统汇入大学体制的改革中，处于这种滚滚浪潮中的年轻人，才会惶惶中不见未来，纯靠运气等待着这场赌博的结局”。[①]

现代学术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按照韦伯的划分，社会行动的类型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行动者会把这种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如果完全理性地考虑并权衡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这样的行动就是工具理性的”；与之相应，价值理性是指，“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纯粹价值理性的取向，其范例就是不计代价地去实践由义务、荣誉、美、宗教召唤、个人忠诚或者无论什么‘事业’的重要性所要求的信念”。[②]价值理性所代表的对“最崇高的终极价值”之追求，已经从现代学术体系中遁去，借专业化之名消解宏大叙事导致了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工具理性所主张的实用主义的功利追求，成为现代学术体系的主流，通过数学建立的实证模型实现了胡塞尔所说的“以奠基于数学中的观念性的世界”替代唯一“现实的、在感知中被现实地给予的、总能被经验到并且也能够经验到的世界”之夙愿，[③]定量分析取代定性研究使得现代学术体系获得科学性之明证，然而局部碎片的精确性却不能掩盖总体性原则的阙如。深受韦伯影响的青年卢卡奇敏锐地发现，在现代社会中，“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且合乎规律的必然性”，而“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④]

二、现代学术体系面临的生存境遇

现代学术体系面临的生存境遇，可以从韦伯思想之中获得解释。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对现代学术体系的洞见，直到今天仍不失其价值。算法、技术、官僚制等一系列韦伯所描绘的图景，都改变了现代学术体系的生存境遇，成为今天现代人生活其中的日常事实。

算法正在逐步成为现代学术体系的核心概念。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已经改变人类生活，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预见到算法将是划分人类历史的标志，而最早关注到算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起支配地位的却是韦伯。韦伯发现了现代社会的支配性原则，“所有发挥作用的力量都不是神秘莫测的，相反，人们原则上可以通过计算支配所有事物”。[⑤]算法不仅是现代学术体系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改变着现代学术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传统的资料卡片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海量数据，以思维导图为代表的数据可视化让现代学术体系复杂的内在逻辑纲举目张，即便是积累大量文献也很难获得学术的核心竞争力，算法为王的时代已经向我们走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自然科学早已用数学化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社会科学也格外重视数学建模。算法早已是“今日头条系”移动应用的核心技术。在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 Tok 的海外并购中，算法第一次作为核心资产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真正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引起了大众的关注，算法才是互联网平台让骑手们越骑越快的秘密。

算法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手段。韦伯分析了“西方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持续推进除魔的进程”，认为“人们再也不需要像相信这种魔力的野蛮人那样求助于巫术的手段，支配或祈求神灵。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手段和计算”。[⑥]在分析以算法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时，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无疑是最深刻的。马克思揭露了

---

① 渠敬东：《“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48 页。

② [德]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1 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14、115 页。

③ [德] 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第 239 页。

④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169 页。

⑤ [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9-20 页。

⑥ [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20 页。

“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在三大拜物教“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中是如何“兴妖作怪”。[①] 海德格尔评价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②] 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大工业生产过程中人的生存境况，《资本论》及其手稿用大量的篇幅揭露机器技术对工人的损害，但在其生产逻辑中，技术始终作为一种超越现代性的手段。因而，马克思对技术持一种辩证的态度，认为技术批判的力量恰恰来源于自身的矛盾之中。韦伯把以算法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判定为一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活动的目的在其自身之外，因而算法、技术不是自由的活动，是不完满的。鉴于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解读技术，在韦伯的影响下，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从现代性批判的一般性视角，上升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③] 在现代学术体系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逻辑的秘密，创立剩余价值学说，抓住的是本质；韦伯则延续了马克思的工作，为我们揭示了算法的秘密，开创了技术批判的理论传统，把握的是内在的逻辑机制。韦伯讲到，古代的亚伯拉罕也好，过去世代的一个什么农民也好，辞世之时都有享尽天年之感，而现代的文明人，“却处在各种观念、知识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潮流当中，会逐渐感到‘活累’了，但不会‘活够’了。精神生活一刻不停地产生出新的东西，可他能抓取的只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点点，而抓住的这一点东西也只不过是临时，不是终极有效的”。[④] 算法等工具理性的进步，并不能带来价值理性的安顿，技术没有解放人类，却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新的桎梏。外卖骑手在算法的逼迫下越骑越快，其秘密在于技术只追求工具理性而无视价值理性。

现代学术体系面临的生存境遇集中体现为官僚制。官僚制又被称为科层制，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渠敬东的概括，“官僚制的基本理念，是经营，即现代企业组织的一套营利制度。熟悉韦伯学说的人都知道，企业的原则，首先是营利和效用的原则；塑造企业概念的核心，是形式理性下的资本算计”。[⑤] 韦伯看到了官僚制在现代社会生成过程中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并不是一味彰显官僚制之成就，他也意识到其局限性，所以呼唤卡里斯玛型政治家。在韦伯的时代，随着阿尔特霍夫体制在德国大学的建立，官僚制确立起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在韦伯看来，“这种盛行的体制，试图把新的一代学者改变成学术‘生意人’，变成没有自己思想的体制中的螺丝钉，误导他们，使他们陷入一种良心的冲突之中，步入歧途；甚至贯穿他们整个学术生涯，都要承担由此而来的痛苦”。[⑥] 官僚制一旦成为现代学术体系的主导性理念，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学术生态，导致一系列困境：“学术活动中的经营性，不仅有利于将大学快速体制化，而且特别容易制作出一套作为客观指标的量化装置，铺天盖地，不仅使全世界的学术管理制度均一化，甚至会渗透进年轻学者最细微的生活计算之中”。[⑦] 在当代的中国大学里，青年学子面临绩点为王的“囚徒困境”，“高绩点不仅要求埋头苦学，更要求理性经营，在得失之间谨小慎微地做出选择”；[⑧] 青年教师围绕着课题和论文“内卷”，二者在课堂短暂交汇，很难有教学相长和潜心治学；学园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书院的“孔颜乐处”灰飞烟灭；更有甚者，评价指标沦为一种工具理性，学术造假、论文抄袭、金钱交易、权色交易使得斯文扫地，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的良心。诚如韦伯指出的那样，合理化的吊诡终将使“轻纱斗篷”变成“铁笼”，“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⑨]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46 页。

② [德]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 383 页。

③ 参见郑飞：《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批判理论》，《哲学研究》2017 年第 5 期。

④ [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21 页。

⑤ 渠敬东：《“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53 页。

⑥ [德] 韦伯：《马克斯·韦伯论阿尔特霍夫体制》，《韦伯论大学》，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1 页。

⑦ 渠敬东：《“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53 页。

⑧ 徐菁菁、郭子介：《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三联生活周刊》2020 年第 37 期。

⑨ [德]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83 页。

三、现代学术体系的方法论原则

面对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现代学术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学术为业何以可能？具有浓厚新康德主义色彩的韦伯，提出现代学术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划定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坚守价值中立，只给出实然层面的分析，避免做出应然层面的判断，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

韦伯主张学术与政治二分。学术和政治分属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素养。学术“需要的远不只是激情和勇敢，更需要持久的耐心，需要坚守日常实践的理性辛劳来证明自身”，[①] 政治则需要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韦伯批评那些鼓吹政治运动的“政治教授”，反对学者在课堂上向学生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教师的任务是用自己的知识和科学经验使学生获益，而不是把自己个人的政治见解强加给学生”。[②] 他强调，“政治尤其不是课堂的分内之事，如果老师是以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的，那就更不该，尤其不应该，在课堂上谈政治”，因为“一旦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掺入了自己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事实的充分理解就到头了”。[③] 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和“政治作为天职”中关于学术与政治二分的观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作为“韦伯圈”重要人物的李凯尔特认为：“韦伯坚信，理论的研究绝不能判断价值是否有效”，“专业研究者必须避免任何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评价，尤其要彻底避免政治的评价”，“韦伯其人和他的双重天赋向追求统一的哲学提出了最有意思的问题。韦伯未曾解答它，但每个人都能从他身上学到那个发人深省、很古老同时最现代的问题——沉思生活与行动生活的关系问题”。[④] 李凯尔特不仅回答了在韦伯意义上学术为业何以可能，也为我们揭示了韦伯心目中“科学作为天职”所遵循的重要传统。沉思代表着自古希腊以来学术生活的理想主义之维，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在人类活动的各种样态中，只有沉思具有自足性，不依赖于外物，因而是最完满的。

价值中立是现代学术体系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不同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进行的“病理学诊断”，韦伯对现代社会进行的是“生理学诊断”，只进行实然的分析，不做应然的判断，价值中立原则贯穿始终。韦伯继承康德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围绕现代学术体系的方法论问题，先后撰写了《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和《社会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他坚守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提出：“经验科学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而只是说明他能做什么——和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⑤] 韦伯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力求在学术研究中排除价值判断，虽然合理化理论蕴藏着工具理性批判的维度，但他对合理化的结果只给予事实层面的揭示，并未在价值层面提出规范性的要求。韦伯对现代人时代命运“铁笼”的比喻，由于帕森斯“Iron Cage”的传神英译而家喻户晓，价值中立的立场却使得韦伯止于悲观主义的态度，而未提出时代命运的救赎之道。在 20 世纪韦伯思想传播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之笔的帕森斯，不仅写出英语世界第一部以韦伯学说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而且翻译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的第一部分，更是在综合经典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结构功能主义的大厦，成为二战后美国化学术体系的典范。韦伯思想中蕴含着价值中立和悲观主义的内在矛盾，帕森斯却在社会科学客观性的名义下，对韦伯学说进行选择性的诠释，“把韦伯说成他的思想先驱之一和未完成的系统论思想家”，“把传统到现代的‘进步’视为几乎是直线发展成结构分殊和价值转换的过程”，“明显地不同于韦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暧昧性与吊诡性的敏锐觉察”，[⑥] 只凸显价值中立原则，而隐藏了韦伯对现代性后果的悲观主义态度，契合二战后美国“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输出策略。

---

① 应星：《“科学作为天职”在中国——韦伯视角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场域》，[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98 页。

② [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31 页。

③ [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29、31 页。

④ [德] 李凯尔特：《韦伯及其科学观》，[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89、90、98 页。

⑤ [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6 页。

⑥ [美] 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 页。

韦伯对现代学术体系的反思，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韦伯作为思想家为学术、为政治鼓与呼。当代中国学术界面临着与百年前韦伯相似的时代境遇。如同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中国的学人今天正在自觉地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学术市场的蹩脚的尾随者。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①] 工具理性、专业化、官僚制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贴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上。遗憾的是，韦伯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我们今天不是要照着韦伯讲，而是要接着韦伯讲。在当代中国探讨学术为业何以可能，必须聚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面临的重大问题，主动设置议题，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论、主张和方案，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接轨而接轨。我们反思现代学术体系之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只有增强我们的学术力、思想力、影响力，才能实现陈康先生所说的“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②]

责任编辑：罗 苹

① 应星：《“科学作为天职”在中国——韦伯视角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场域》，[德] 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 197 页。

② [古希腊] 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0 页。

（上接第 21 页）

下都为真，还因为我们在科学上为词项“发烧”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标准，从而该语句表达了一个独立于评价或赋值情形的完整涵义，体温 38°C 早已达到这一标准，按照“发烧”一词的语义约定，这个语句甚至可以被称为是分析性的，从而派生出相应判定的绝对性。反之，“打嗝很无礼”之所以是相对性的判定，一方面因为它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会获得不同真值；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因为“无礼”这个词不具有字面意义上足以确定外延的内容，不同民族或地域文化会赋予它不同涵义，包含它的语句也就不能独立地表达一个命题，只有诉诸评价语境，“打嗝很无礼”才能表达一个命题内容，进而获得真值，从而出现这一“无礼”判定的相对性。罗克珊娜式语句“在莎拉的文化中打嗝很无礼”虽然在任何情形下都为真，但这是因为短语“在莎拉的文化中无礼”有明确的完整语义，该语义内容足以将打嗝现象纳入其外延，才出现这一语句分析为真。因此，这不是一个“无礼”道德判断绝对性的例证，而是表明了“在莎拉的文化中无礼”道德判断的绝对性。道德相对主义在罗克珊娜的台词中顽强地存活下来。

五、结语

至此，我们得以窥探当代相对主义论争的一个较全面概貌。自然主义与其他先验论或神秘主义方法论的长期对峙共存表明，也许没有一种排他的统一实在论可以合理解释一切，从而为相对主义的登场敞开一扇窗。但诉诸效用的相对主义真理辩护并不成功，将真理相对于可能世界、命题内容相对于语境的语义学进路是一条更有前景的计策。绝对主义者切割真理与价值评判联系的实陈趋善论证，实际上暗中运用了真理概念，其大前提也不成立。知识论上的可错论并不衍推不可知论，但威廉森提供的算术论证并不成立，我们可以通过区分认知模态词项“可能错”与“实际错”加以简要证明，知识首要认识论仍有待时间检验。威廉森批评道德相对主义，是建立于消解语义外在论，但价值评判词汇的文化语境敏感特征并未改变，相对主义依然如是。当然，绝对主义者如威廉森可以提出更系统的应对策略，相对主义论争也将在更深层面为人类理解实在、真理、意义、知识和价值搭建一架可以依靠的梯子。

责任编辑：罗 苹

礼文、人情与天道："称情立文"析义

邝其立

[摘 要]"称情立文"是《礼记·三年问》的主旨。通过与《丧服》经传的比较,《三年问》重亲亲之情的思想倾向得以凸显。但单凭殊别之情，无法证成礼文的普遍性与规范性。故立文之"情"不能仅止于因人而异的情感，还须升进为"普遍性情感"，才足以为规范奠基。通过援引天道，自然情感获得了统一的时间尺度，成为应然标准。因此，"称情立文"虽在字面上未言及天道，其实内含超越的天道之维。礼文也得以在因循人情本然之余，获致无远弗届的规范效力。

[关键词]称情立文 《礼记》 丧服 宰我问丧 《荀子》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28-06

《礼记·三年问》开篇设问云："三年之丧，何也?"答曰："称情而立文"。尔后将丧期分为"期年"(一年)、"三年""九月以下"三类，并指出情之厚薄决定了服丧期限的长短：缅怀逝者之情愈重，则居丧致哀愈久，反之亦然。丧服设计所体现的"称情立文"之原则，正是《三年问》一文的主旨。发掘这一命题的深意，是解读此文的关钥。

"称情立文"(亦称为"缘情制礼")的思路，于后世尤有余波。每当经制与现实扞格，就会引发是否依循古礼的争辩。于其时，便会涌现一派识时务的儒者，重提"称情立文"之理，开权变之宜，倡修礼之议。比如，后世不断以父母恩爱等同为由，挑战尊父抑母的丧服制度，遂使父母服制的差异逐渐消泯。[①] 无独有偶，基于缘情制礼的考量，叔嫂无服的规定最终在唐太宗时期被推翻。[②]

不过，后学往往在未充分澄清这一命题的情况下，便顾名思义地引之以为据。孰知，这一原则远非清晰自明，其中仍有诸多尚待厘清的疑点。比如，因人而异的情感何以为规范奠基？立文之"情"是何种意义上的情？"情"是"立文"的唯一根据吗？为精准把握"称情立文"之义，不妨回到《礼记·三年问》的原语境中一探究竟。

一、亲亲与尊尊：《三年问》与《丧服》立法原则之对比

对丧期的讨论是《三年问》的核心话题，《仪礼·丧服》则最系统地记述了丧服制度。对比二者，将更能凸显《三年问》的主旨所在。

《丧服》重尊者之尊，甚于亲者之亲，其设计遵循"以尊尊统亲亲"的原则。所以，在亲亲与尊尊两种原则产生矛盾之际，往往是亲者让位于尊者。比如，《丧服》规定"父在为母"服"齐衰杖期"。亦

作者简介 邝其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

① 黄铭:《从丧服制度看儒家的亲情——以母子之情为中心》,《哲学门》第2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 唐太宗改叔嫂无服为小功五月。参见丁凌华：《五服制度与传统法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8-169页。

即，若父亲健在，子仅能为母服丧一年。以亲亲计，父母情等，所服应同。但在一家之中，父之尊压过母之亲。为避免耽误对父亲的侍奉，于是减缓人子的悲伤。再如，若宗子足下无子，为了避免嫡祖绝后，需过继一子。过继者即是“为人后者”。《丧服》规定，为人后者为大宗服丧三年，为亲生父母则降至于期。这是因为，大宗之尊重于本生父母之亲，于是缩短后者的丧期，以示区别。

家庭之内，父尊于母；宗族之中，本生之亲不及大宗之尊。在家庭与宗族两种原生人伦境域中，《丧服》设计都贯彻了“以尊尊统亲亲”的原则。[①] 与此相比，《三年问》一文的旨趣就非常不同，其“称情立文”之“情”，更接近于亲亲之情。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首先，文中开篇对“称情立文”进行说明时，四处提及“痛”字。

>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②]

越亲爱之人离去，其痛愈深，绵延愈久。“痛”，即丧亲之痛，文中“痛甚者其愈迟”“至痛极也”“哀痛未尽”的表达，正说明了哀痛的流露是无所矫饰、难以自遏的。故题中之“情”，指向自然生发的亲亲之情。

其次，《三年问》分丧期为三年、期年与九月以下三种，是为了照顾“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的现实情形。并认为，三年之丧是为回报父母之恩，在期丧基础上的加隆；九月以下，则是哀情转淡的相应减杀。丧期的长短，对应着血缘远近与情感厚薄，故郑玄云：“称情而立文，称人之情轻重而制其礼也。”[③] 因此，服制所体现出的差等原则，本质上是亲亲有术的呈现。

再次，为了证明此亲亲之情乃人禽所共有，《三年问》以燕雀和大鸟兽为例展开说明。

>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踰时焉，则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焉，鸣号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乃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者，莫知于人，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④]

人、禽有知，莫不能爱其类。离群落单的鸟兽会哀伤数月，“反巡”“翔回”而不愿离去。至于燕雀，也要悲鸣徘徊。鸟兽燕雀且如此，遑论人类，遂有终身不已的悲恸。值得注意的是，《丧服》也援引了“禽兽”的意象，但要说明的内容却全然不同。

>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適子不得后大宗。[⑤]

“知母不知父”，意味着有亲亲而无尊尊。敬宗祭祖的尊尊现象，是进入文明的标志，为禽兽与野人所无。依据祭礼的规定，从都邑之士、大夫学士到诸侯天子，德位相匹，身份愈尊则德性越高，故能遥祭先人，抒发更深厚的尊敬之情。可见，在《丧服》传文中，禽兽与野人是作为反面的参照意象出现的，目的是凸显“尊尊”之文明。但在《三年问》的叙述中，禽兽的出场却是为了说明人禽“爱其类”的共同点。所以，从对相同意象的不同用法中，亦可知《三年问》之旨归。

---

① 常达：《论〈丧服〉制法主于尊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
②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2185 页。
③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 2185 页。
④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 2186-2187 页。
⑤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916 页。

最后，《三年问》以三年之丧为例，阐发“称情立文”之理。但三年丧含摄甚广，大致可分为斩衰与齐衰三年两类，每一类别中又有若干子目。《三年问》却特意捻出三年丧中“为父母服”的情况加以探讨，并有意将父母合而论之。这在两个方面凸显了亲亲之情：其一，父母恩重，昊天罔极，是丧亲之至痛。相较于其他，其抒发的自然感情尤为浓烈真切。其二，若将父母分而论之，才会有父尊与母亲的区别，由此出现父在为母降服的情况。但《三年问》将父母合而论之，略其差异，意在强调在亲亲的维度上，父母可以等量齐观。因此，《三年问》从父母之丧的话题伊始，就已然奠定全文偏重亲亲的基调。

《三年问》一文后出于《丧服》，出自荀子手笔。[①] 其中的思想，可视为荀子针对周文疲敝、规范失据的时弊所做出的反思。标举亲亲的“称情立文”，正是在主于尊尊的周礼难以为继之际，才被提出并重视。曾亦指出：“孔子改制的基本精神，即公羊家讲的尚质。那么，如何改制呢？此即荀子‘称情立文’之说也。”又云：“观孔子之讥宰予，及孟子之答公孙丑、劝滕文公，可见此种思路，自孔子、孟子以至荀子，可谓一贯而下，即当古礼之宗法制基础崩溃以后，如何在家庭及孝的情感基础上重建礼制。”[②] 可见，“称情立文”是孔、孟、荀为变局纾困的应对方案。在宗法体系中，宗族是社会的细胞。逮及春秋，小家庭逐渐从宗族中独立，成为基本单元。[③] 因此，从家庭中提炼出自然亲情，作为巩固礼制的新根据，就不失为顺应时势的策略。那么，探讨自然情感能否又如何为规范奠基，有助于深究“称情立文”之义。

二、礼制中的人情：“宰我问丧”章再分析

虽然《三年问》主于亲亲，但不能将“称情立文”之“情”径直等同于自然亲情或个人情感，而只能断定此立文之“情”源于或近乎自然亲情。因为，自然情感的浓烈程度因人而异，但规范人心的礼文却必须普遍而无差别。因之，殊别之情显然无法为规范奠基。故《三年问》有云。

> 将由夫患邪淫之人与？则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从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夫焉能相与群居而不乱乎？
>
> 将由夫修饰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④]

立法者固然不能以邪淫者之情为标杆，亦不应要求人人仿效君子。因为有德者感怀情深，若哀戚过甚而丧期无数，难免会耽误正常的生产生活。所以需要利用合乎中道的礼文来范导众人。问题在于，若顾“称情立文”之名而思其义，则礼制源出于人情，其规定应自然合乎真情流露。那么，“称情”所立之“文”为何会居于淫邪之人与修饰之君子之间，以齐其不齐？如果规范无法展现人情百态，又凭什么要求众人遵循一定之规？在《论语》“宰我问丧”章中，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解题线索亦藏于其中。

>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以天道周期为由，倡期年之丧。孔子不悦，质问宰我能否心安于短丧。宰我对曰“安”。这或许出

---

①《三年问》节选于《荀子·礼论》。参见吴飞：《〈礼记·三年问〉与〈荀子·礼论〉关系再讨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

② 曾亦：《孔子改制与儒家之孝道观念》，吴飞主编：《婚与丧——传统与现代的家庭礼仪》，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57、58页。

③ 凌廷堪云：“封建废，其礼本不能行于后世”，又云：“盖嫡庶及宗法，皆因封建而有，贸儒不知封建久废，又不知先王‘尊尊’之义，每于嫡庶宗法逞臆妄谈，喋喋不休，礼意遂由此日晦。”以尊尊为纲的周礼，依附于封建制的社会基础。若社会变易，则周礼失据。凌廷堪：《礼经释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④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2187页。

乎夫子意料，却仍在情理之中。因为情感的浓度，因人、对象、场合的不同而有异。更有甚者，如墨子以为三月足矣（《墨子·公孟》篇），庄子乃至鼓盆而歌。既然“情”无定准，那么诉诸情感、“称情立文”的孔子，要如何驳斥短丧之论，证成三年之丧？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的“情”才足以“立文”？

细绎夫子的斥语，颇堪玩味。“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的表面意思，是责备宰我不仁，连对有终身之恩的父母都未能回报三年之爱。言外之意，是责令宰我对父母应有三年之爱。语义落实在应当如何的应然层面，而非实际如此的实然层面。这种应然情感或道德要求，就是释疑的关键：因人而异的实际情感不足为训，而不全然反映现实的应然之情，譬若三年之爱，则是具有普遍性与应然性的伦理要求、道德标准。孔子显然认为，不安于短丧，才配称君子，所以才会对宰我的提议如此不满。这是用泛指有德的君子标准来要求宰我。若以实际情感为评断标准，难免会走向相对主义，结果就是谁也没有资格批判宰我，从而豁免一切薄情之人。这也意味着，实然的自然情感不足以“立文”。毕竟，礼文作为应然规范，是普遍的道德要求，不仅止于反映现实情态，更要发挥范导人心的效用。故《檀弓》云：“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礼运》云：“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礼器》云：“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①] 礼文“品节斯”“增美质”的规范义，在《三年问》的另一关键语——“立中制节”中同样有所展现。荀子认为，贤愚不肖，皆非中道。不肖者因德性有阙而薄情，所以需要礼文陶性冶心。贤人君子则过犹不及，哀戚过甚，为免创钜伤生，亦应予以节制。“故先王焉为之立中制节，壹使足以成文理，则释之矣。”[②] 析“立中制节”而言之，“立中”之意同于“立文”，说明礼文是合乎中道的标准。正因礼文持中，才会有齐整殊别的“制节”之效。一切贤愚不肖，皆以此为准，服膺循行，此即礼文普遍的规范效力。若诚如此，则“立文”所称之“情”，也应具备与之相匹的普遍性，成为“普遍性情感”。周飞舟论丧服制度云：“有了这种基于普遍性情感的制度，则人们具体的、个别的情感表达会被这种制度所规范，情感过厚的人被节制（这叫做‘节’），而情感淡薄的人被感发而转厚（这叫做‘文’），通过节文，使人们的情感表达归于中节。因此，丧服制度是一种以普遍性的情感表达为基础，又反过来规范人们具体的情感表达的制度。”[③]“普遍性情感”是一切服丧者的标准状态。其普遍性就体现在，奠基于此的礼制，能“节”君子、“文”小人。周氏所说的“普遍性”，并非实然意义上的人人皆如此，而是应然层面的人人应如此。概而言之，“普遍性情感”即是应然之情。此应然之情，成就了礼文的普遍性与规范义。所谓“称情立文”，即称应然之情而立文。

“制节”人情的普遍效力，乃礼文规范的应有之义。因之，立文之“情”不能仅止于殊别的自然亲情，还需升进为被夫子称为“三年之爱”的“普遍性情感”或应然之情。进一步的问题便在于，自然情感如何上升为应然标准，具备普遍效力？换言之，“称情”何以“立文”？

三、人情中的天道：“称情”何以“立文”

“称情何以立文”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情”与“文”、自然之情与应然标准之间迥然有别。其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殊别之情无法成为“标准”。其次，自然之情并无规范性，仍未及“应然”层面。这两点差异，分别对应“称情何以立文”之问的两个分问题：亲亲之情如何“量化”为服丧期限，成为标准？而作为标准的情感又因何而具备应然效力？《三年问》涉及这两个问题，其回应指向一个新的关键——天道。下文分而述之。

《三年问》论述丧期之由来云。

> 然则何以至期也？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

①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 385、932、955 页。

②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 2188 页。

③ 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 年第 1 期。

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①]

天地历变，一期一周。此即期丧之合法性由来。至于三年之丧和大功以下两类丧服，则以期年之丧为基，通过加隆或减杀而推演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经文率先引据天道，证成期年之丧。尔后才依据情之厚薄，推出“三年”和“九月以下”两种。这意味着，差等之情只是在基准之上加隆或减杀的权衡因素，所以仍需凭据天道来为丧期的推演确立基点或“初始值”——“至亲以期断”。《三年问》由期年加隆至三年，又减杀至九月以下的论述顺序，展现的正是丧期推演的逻辑次第。

进而言之，单纯依据情感，实难证成丧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很难解释清楚为何应服丧期年、三年抑或九月以下，而非其他。天道节律所蕴涵的时间尺度，正可为丧期提供理论支撑。孔疏“立中制节”云。

所以成三年文理者，以三年一闰，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服以三年，成文章义理。[②]

又疏“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曰。

天地之气，三年一闰，是三年者，取象于一闰；天地一期物终，是一期者，取象于一周；九月者，以象阳之数，又象三时而物成也；五月以象于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时而气变。言五服之节，皆取法于天地。[③]

天道周而复始，每过三巡便迎来一个闰年，故谓三年一小成。至于九月、五月、三月之丧期，则分别对应三个、两个以及一个时节的流转历程。[④] 要言之，天道的运行规律，提供了制礼所需的时间尺度，使自然之情成为统一标准。

接下来考察第二个问题：为何有了天道的支撑，礼制便能获致无远弗届的规范效力？为释此疑，不妨进入《三年问》所源出的《荀子·礼论》的脉络中一探究竟。《礼论》云。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⑤]

天地、先祖与君师，是礼之三本。礼作为规范、引导人的制度，其本质性要素的构成，暗含着立法者对于人的理解。除却作为教化主体的君师，天地与先祖是人之存在的双重来源。相应地，人拥有两重“身份”：天地生人与父母生人。自降生之初，人便扎根并生活于人伦网络之中。因此，人作为先祖或父母的后代，乃是直接自明的生存经验。至于荀子对“人为天生”的论述，则相对复杂，可析为两层：一是以天为人的存在根源，即认为天赋予人以原初形质。故《王制》云：“天地者，生之始也”，《富国》云：“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大略》篇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⑥] 二是以天为人的本质规定者，即认为天命予人本性，使人成其为人。故《正名》云：“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杨倞注：“人生善恶，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于天之性也。”又云：“性者，天之就也”。《性恶》篇曰：“凡性者，天之就也”。[⑦]

人为天生，故一切属人的名目，都被加上“天”的前缀。比如，荀子以七情为“天情”，谓耳目鼻口形为“天官”、心之主宰为“天君”。所谓天然如此或天生使然。[⑧] 在“人为天生”的视域中，人与天

---

①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 2188-2190 页。

②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 2188 页。

③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 2190 页。

④《丧服小记》云：“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九月、七月之丧，三时也。五月之丧，二时也。三月之丧，一时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 1307、1308 页。

⑤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40 页。

⑥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161、180、487 页。

⑦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399、415、421 页。

⑧《荀子·天论》：“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

地交融为一。[①] 天作为人的存在根源，意味着人无往而不在天地之间，无法摆脱自然节律而生存。天作为人的本质规定者，则意味着天道是人之性情的终极标准，所以人应通过因循天道来完善、成就“天性”。天之所以能规范人，人之所以应顺乎天，正由于此。进而言之，礼文效天法地，于是俱足神圣性与规范性，成为人人应循的仪轨。《礼论》谓礼“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意在证成礼乐之天经地义。[②]

鉴于天道之不可或缺，“称情立文”绝非断言仅凭情感就足以“立文”。而基于人为天生的前设可知，天道内在于每一个个体之中，因循天道即是顺遂本然之性情。所以，称引天道并未越出“称情”的框限，而是“称情立文”的题中应有之义。此立文之“情”，实乃内含天道之时间性与规范性的应然之情。换言之，端赖于天道，“称情”方得以“立文”。

“宰我问丧”章亦展现出相通的旨趣。这则对话，可被视为关于立法原则的讨论：宰我以天道为据，遂有短丧之论。此说与《三年问》“至亲以期断”暗合，却缺失对人情的体察，未了人子报恩之愿。于是孔子就人心之柔软处点拨，遂有“于女安乎”的反求诸己和“三年之爱”的动之以情。孔子斥宰我“不仁”，是批评他不通人情、远于亲亲。[③] 不过，孔子并未全然否定宰我。纵使无法认同短丧，但对于援引天道立论本身，夫子并无异议。孔子意在纠偏、补充宰我的片面之辞，提醒他不可忽视人情在立法中的权重而已。《三年问》“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的融通之论，并重天道与人情，与夫子之教最为相契。可见，《三年问》与“宰我问丧”章虽皆首要强调人情之重要，但亦未曾否认天道之必要。

《丧服四制》有一段话语，可为上文做结。

> 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④]

礼，取之天地、阴阳、四时，亦“取之人情”。不止于人情之“恩、理、节、权”，还要升华为人道之“仁、义、礼、智”。要言之，有了天道与人情两块基石，礼文才能挺立。唯“称情”所立之“文”，方能因循人情而发用；仅当礼制内含天道之维，才具备普遍效力。人情是礼制的现实基础，天道则彰显出秩序所应有的理想形态。

四、结语

“称情立文”一语中，隐伏着天、人两极。而两极之间的张力为天人交融的信念所消解。于是在“文”之普遍与“情”之殊别、天道理想与人情现实之间达成微妙平衡。圆通之词，义旨周备，于不同语境，将有不同应示。“称情立文”的本意，是在天道内化于现实的背景中，重提亲亲之重要。若将此原则置于当下——取天、神而代之的人本时代，会尤为凸显的反而是在礼文中与人情交融的天道之维。

责任编辑：徐博雅

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302、303 页。

① 宫志翀：“礼有三本而‘天地者，生之本’居首，《孝经》论圣人之治从‘天地之性人为贵’讲起，《礼运》论人为‘天地之德’、‘天地之心’等等。‘人为天生’的观念深嵌在儒家的文明理想中。”宫志翀：《“人为天生”：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根基》，《中国哲学史》2018 年第 2 期。

②《礼论》：“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346、347 页。

③《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云：“亲亲为仁。”亲亲，乃仁之内核。

④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 2350-2351 页。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分析

——兼谈中央文献翻译的原则和策略

史亭玉　张平功

[摘　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是中央文献国际传播较具代表性的范例，值得认真研究。由于中央文献的翻译关系到国家主流话语能力建设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因而中央文献准确通达的翻译尤为重要。在融通中外的话语构建中，评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大量翻译例句，可发现中央文献翻译策略使用的原则，即在政治准确的总原则下，关注译本的语言转换和文化对接，恰当地使用归化和异化策略。

[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国际传播　中央文献　翻译原则　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34-05

中央文献准确通达的翻译关系到国家话语能力建设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融通中外”是中央文献翻译中的难点和关键，既要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要与国外的话语体系对接。[①] 自纽马克针对文本类型和功能提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策略后，[②] 学界就这两种策略在中央文献翻译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语义翻译可保留原文的措辞色彩和更好理解语义结构；[③] 交际翻译可发挥译文语言优势，从更高层次再现原作风格。[④] 奈达的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理论也可作为中国政治文本翻译策略的理论框架借鉴。[⑤] 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为例来检视和归纳中央文献的翻译策略。

一、中央文献翻译的指导思想

（一）中央文献翻译的性质、文本特点和难点

翻译是传受双方传播的过程。译者（信息发出者）启动传播过程后，对源语（信息）进行编码。“如果普通的传播只需一次编码——将原始信息转换成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那么国际传播的编码就需要两次，第二次编码是将本国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转换成为可被他国受众或全球受众接受的信息。二次编码就是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⑥] 要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国家信息传播的话语方式需同目标受众的信息编码、释放、译码方式尽可能吻合，否则传受双方就会因错位而无法对接。如何既保持政治准确，

作者简介　史亭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讲师；张平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420）。

① 黄友义、黄长奇等：《重视党政文献对外翻译，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翻译》2014 年第 3 期。

②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Hemel Hampstead: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1988, p.47.

③ 杨士焯：《简析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福建外语》1989 年第 Z2 期。

④ 林小芹：《纽马克论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中国翻译》1987 年第 1 期。

⑤ 杨明星：《论外交语言翻译的“政治等效”——以邓小平外交理念“韬光养晦”的译法为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 年第 5 期。

⑥ 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18 页。

又成功进行语言转换和文化对接，是中央文献外译的难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为攻克这些难点提供了范例。

中央文献翻译具有敏感话题的严肃性、传播语言的准确性和语言转换的灵活性特点。[①] 有学者指出："政治文献外译需兼顾准确性和接受度"，[②] 翻译时要"注意政治含义和政治分寸"。[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属于政治文本的英译。文本分为"信息文本""表情文本"和"感染文本"，中国语境中的政治文本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论著，党和政府的文件与工作报告，报刊社论等。它直接牵涉到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政治立场和观点"。[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 92 篇，分为 19 个专题，是典型的信息型的复合文本。

（二）国际传播对中央文献翻译的要求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海外以诸多语种出版，进入国外多家图书馆，有助于海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智慧分享。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理念，提出中国主张"。[⑤] 这为中央文献翻译提供了方向。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无论是口译、笔译、机器翻译，还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抑或是科技文体的翻译，它们所要完成的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⑥] 从翻译学层面看，中央文献的翻译关注两大问题，一是准确即内容的忠实，二是流畅即语言的通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结晶。文化"制约着语言形式，它不断将自己的精髓注入语言当中，成为语言的文化内涵，成为语言表现的基本内容"。[⑦] 因此，在中央文献的英译时，在政治忠实的总原则下，还应重点解决文化层面和语言层面的问题。

归化和异化由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提出，是一组常用的翻译策略。归化是指以目的语读者或文化为旨归，采用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传递源语内容，也就是作者向读者靠拢；而异化则指以源语文化或读者为旨归，翻译中采取源语表达方式来传递源语内容，也就是读者向作者靠拢。[⑧] 在文化层面，异化策略看重文化差异，坚持文化真实性，在目的语中保留源语的文化；而归化策略则主张采用目的语受众的习惯表达。在语言层面，归化策略更看重靠近目的语表达习惯，而异化策略则主张采用源语的表达习惯。[⑨] 从中央文献的性质来看，翻译学角度主张对源语的忠实；而从传播信息和传播效果来看，国际传播角度则主张在政治忠实的前提下，创新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只有把传播效果和翻译效果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采用"融通中外"的方式，才能实现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和文明的相互交流和互鉴。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翻译策略分析

（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文化层面的翻译策略

为了准确忠实地传达源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采用了不少异化策略。该策略可以保留源语的字面和深层意思，还能原汁原味地传达中国元素。异化策略可优先考虑直译或者直译加注释。直

① 张健：《国际传播视阈下的外宣翻译特点探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 6 期。

② 周忠良：《政治文献外译须兼顾准确性和接受度——外交部外语专家陈明明访谈录》，《中国翻译》2020 年第 4 期。

③ 过家鼎：《注意外交用词的政治含义》，《中国翻译》2002 年第 6 期。

④ 王铭玉：《主持人语》，《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局编写：《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北京：学习出版社，2020 年，第 6 页。

⑥ 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

⑦ 李润新：《论第二语言教学与第二文化教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年，第 140 页。

⑧ 赵祥云：《新形势下的中央文献翻译策略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例》，《西安外国语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

⑨ 牛沈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翻译策略评析》，《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译既忠实于原文，又忠实于原文形式，意译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不拘于原文形式。考虑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作为中央文献的严肃性，应首先选择直译。

1. 直译法。例：中共十九大到下一次的二十大这 5 年，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篇。[①] 译文：The coming five years between the 19th and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es are a period in which the timeframes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will converge. We must deliver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we must also embark on the journey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两个一百年” 是中国的政治主张，属于中国特有的政治术语。中国政治术语是中国政治领域所使用的表达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既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③] 译文中采取了“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以及“Two Centenary Goals”的直译策略，保证了中央文献的严肃性。根据笔者统计，“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中出现了约 80 次，“Two Centenary Goals”出现了 28 次，很好确保政治术语的一致性。

2. 直译加注法。在提及含义丰富的简略语或含有中国文化历史的句子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采取的是直译 + 译后注的方式。例：党中央反复强调，脱贫攻坚期内，扶贫标准就是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④] 译文：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reiterated on many occasions that 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the standards are set to deliver the Two Assurances and Three Guarantees, and bring key indicators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poor areas close to the national average. [⑤] 译文对“两不愁三保障”的翻译是“Two Assurances and Three Guarantees”，既忠实于内容，又忠实于形式。为融通中外，翻译组做了文后注释：This refers to assurances of adequate food and clothing, and guarantees of access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basic medical services and safe housing for impoverished rural residents. [⑥] 同样的例子还包括对 “四个自信”的英译。在正文翻译为：“the Four-sphere Confidence”，为让国外受众更好理解中国的政治术语和政治理念，翻译组通过在文后加注的形式进行了解释：This refers to confidence in the path,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⑦]

例：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正所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⑧] 译文：We do not need lavish praise from others. But we do welcome objective reporting an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this is our motto, “Not bent on praise for its bright colors, but on leaving its fragrance to all”. [⑨]“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引自王冕的《墨梅》一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古诗或典故信手拈来的例子很多。诗词典故的使用，不仅饱含文化背景，更是大有深意。其英译在词序、风格和内容上做了最大程度的保留。同时为最大可能降低语义丢失，翻译组在同一页做了注释：Wang Mian :“Ink Plum”（Mo Mei）. Wang Mian（1310—1359）was a painter and poet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allusion in the poem is to appreciate things for their qualities rather than their looks, and President Xi was indicating that while China seeks no flattery, it expects honest and

---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66 页。
②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pp.87-88.
③ 冯雪红：《论中国政治术语英译再创建的三个维度》,《上海翻译》2014 年第 1 期。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155 页。
⑤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p.183.
⑥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p.187.
⑦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p.111.
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67 页。
⑨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p.90.

balanced reporting. 英文注释不仅阐明了中文诗句的出处，还对诗作者王冕做了简介。谚语和古诗及散文名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这些谚语和古诗词的引用，使得源语的警示性更强，更发人深省。英译既忠实于原文，又忠实于形式。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语言层面的翻译策略

由于中英读者在语言、文化、历史、风俗、信仰等方面差异，源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对信息的理解不完全一致。英语重形合，句法比较刻板，主、从句之间要使用连接词。汉语重意合，主、从句靠意义贯穿，不用或少用连接词。[①] 中文喜用四字成语或修辞，讲究文字锤炼，英文讲究逻辑和语言简洁精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多次使用反复、排比、用典、隐喻等修辞手法，在语言层面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归化，可优先考虑意译，意译是以达意为旨归，其主要策略有显化、弱化、信息重组等。

1. 显化译法。这也可理解为明晰化译法，主要包括在意义上的明晰化和在语言形式上的明晰化。例：有的热衷于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 有的地方人才队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创造活力不强，有的引才不切实际，贪大、贪高、贪洋……[②] 译文：Some have a penchant for forming cliques and factions, cultivating connections or currying favors with higher-ups for personal benefit… Some places have s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their talent, failing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for creativity. Some places neglect reality in bringing in high-caliber personnel, 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ir number, academic titles and nationality…[③] 本例展现了归化策略中的显化和弱化。首先对“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做了意义上的明晰，译为“forming cliques and factions”“cultivating connections”“currying favors with higher-ups for personal benefit”，对“贪大、贪高、贪洋”做了语言形式的明晰，译为“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ir number, academic titles and nationality”，将“创新创造”简化为“creativity”，“活力”译为“unleash their potential”。译文在形式上尽可能向源语靠拢，源语用的是“有的……有的”，句式形成排比效果，译文也用“some places”作为主语开头，在语言形式和意义上做到了最大程度的一致。

2. 弱化译法。弱化译法包括模糊策略和简化策略。在受众无法深入彻底理解源语概念时，或者如果直译会造成有损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容时，要以国家利益作为弱化的根据。[④] 通过简化或模糊处理的手段，可以有效避免翻译腔和中式英语。如果源语中使用排比或用典，除非是“不可译”，都建议保留源语中的反复出现的词语，令目标语读者能感受到原文通过排比增强语气或气势的效果。

例：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⑤] 译文：The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of history. It is to them that we owe all our achievements. As long as we keep close ties with the people and rely on them, we can and will have boundless strength to forge ahead whatever the circumstances. [⑥] 译文除了使用弱化中的简化译法，省略“风雨”，不直译“扎根”，更为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外，还使用了显化译法，在“就可以获得”的中文基础上，明晰意义的表达，增加主语“we”和明晰时态“can and will”以及用“as long as”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来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立场。在语言上，译文用了语序调整“It is to them”，不仅传达了源语中对“人民”的强调，也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

又例：良好职业道德体现在执着坚守上，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最后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⑦] 译

① 孟庆升主编：《新编英汉翻译教程》，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7 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516 页。
③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pp.597-598.
④ 张健：《国际传播视阈下的外宣翻译特点探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 6 期。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67 页。
⑥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p.89.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326 页。

文：Writers, artists and scholars with a good work ethic should demonstrate dedication and perseverance in the pursuit of their personal aspirations, and achieve their goals through assiduous and painstaking efforts.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时既提到中国的典籍如《论语》《孟子》等，也提及《哈姆雷特》和《国富论》等外国名著，表达对文艺社科界多出作品，为人民写精品的殷切希望；同时又通过引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词的“三境”的评述，勉励文艺和社科界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考虑到英译本的受众并非都有文学艺术或社会学科界的专业背景，若生搬硬套地采用异化策略来翻译婉约派词人代表晏殊和豪放派词人代表辛弃疾的名句，国外受众会不知所云。此处的简化模糊是一种话语方式的创新，更是建立在忠实于源语立场之上的。

3. 信息重组法。这是在吃透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信息重新组合，其目的是令逻辑更为清晰，语言更为地道。这种译法一般运用在源语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调整词序或句序，整合词组。例：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深入推进我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②] 译文：We must never falter in our efforts to improve Party conduct and combat corruption in the military, with the strictest discipline in all aspects and at all times. [③] 本句同时使用了归化和异化策略。“党风”译为“party conduct”，“反腐败”译为“combat corruption”，这些是典型的直译法。又通过显化译法，增加主语“we”明晰化语言内容；用信息重组法调整句序，把“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作为介词引导的伴随状语；用简化法避免语言形式上“严”字的机械重复，通过“in all aspects and at all times”来强调“严”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和执行到底。译文虽然只用了一个“严”字的对应英文“strictest”，但目的语读者会对我军党风建设坚如磐石的决心留下深刻印象。

三、中央文献翻译策略的使用原则

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中，“要学会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也要学会用中国的语言讲世界的故事；要把讲故事和讲道理结合起来，而不是靠话语的强势生硬推销。”[④] 在中央文献的外译中，要注重传播的效果才能取得翻译成功。“融通中外”的前提是译者吃透原文，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高度熟练地驾驭中英两种语言。翻译策略的选用，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讨论，更应上升到大国传播的高度。我们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的研究只是手段，其目的是更好地为新时期对外话语构建和传播好中国声音服务。在使用何种策略上，要注意突出政治忠实性。本文得出中央文献的翻译要以政治忠实为总原则。任何翻译策略的选用都应遵循此原则。一方面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可同时使用，绝不能为了追求译文的地道、通顺一味归化，也不能过于拘泥于原文而机械表述进行异化。另一方面，在不涉及政治立场和不违背政治忠实的总原则之下，按英语的语言习惯进行归化。当受众无法深入彻底理解源语概念时，要以对国家利益的捍卫和对中华文化的尊重作为归化的根据。在融通中外的话语构建中，应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树立和践行新时期中央文献正确的翻译观。本文对中央文献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中央文献翻译时，应在政治忠实的总原则下，关注译本传播过程中的语言转换和文化对接，细分不同的翻译方法，从而更好地为中央文献的国际传播服务。

责任编辑：王 冰

①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p.380.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385 页。
③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p.448.
④ 孟威：《构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光明日报》2014 年 9 月 24 日第 16 版。

政 法 社会学

·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

从“一时火”到“一直火”：消费扶贫的阶段反思与长效安排*

范和生 刘凯强

[摘 要]消费扶贫作为实现我国脱贫攻坚和助力乡村振兴两大任务的重要途径，其在扎实化推进精准扶贫、综融化递进“扶物”向“扶志”再向“扶智”转变、全面化完善“供给—消费”环节链、智慧化创新“线上—线下”营销形态等方面呈现出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当前社会各界力量在具体的消费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也相应浮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的执行偏差，如：乡村现实供给与城镇真实需求的衔接失配、定点采购与自由置买的行政冲突、网销模式与交易双方的利益争夺、短期支持与长效规划的结合悬浮等。针对这些困境的化解，应在未来多主体参与的社会行动中建构起市场安排、教育安排、技术安排和机制安排等综合性实践方案，将消费扶贫建设成一项有助于乡村振兴的系统化互惠工程。

[关键词]消费扶贫 阶段反思 长效安排 实践方案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39-10

消费扶贫是指社会各界通过购买来自贫困地区产品或聘用贫困人口群体服务，来帮助贫困主体增收脱贫的一种新型扶贫方式。它作为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补充性支持”，是打赢新时期我国脱贫攻坚“收官战”的保障。2019 年 1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正式颁发以来，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和个（集）体在消费领域中的扶贫思维、扶贫目标和扶贫路径等方面，积极拓展新设想、尝试新方案、搭造新合作。在多主体努力下，仅 2020 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累计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逾 220 亿元，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商品及服务超过 2000 亿元，为攻克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硬仗”做出卓越贡献。时下火热的消费扶贫虽积累了部分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如何遵循精准化、技术化和互惠化原则进一步加强正向引导，将其筑牢为我国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固定化的长效机制，是本文探讨的核心议题。

一、消费视角下我国贫困生成的理论探索

商品与服务的消费水平不仅映射出某一个（群）体美好生活的具象层次，更是一个国家 / 地区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广大人民群众消费能力、条件和结构的整体性升级，直接关连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提升民生福祉两大目标的成败。但是，长期以来消费与财富收入、社会地位、阶层身份高度的绑定，使得其在差异化个（群）体间存在客观上的“能力—行动”失衡，进而引起经济、政治、文化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社会学研究”（19BSH1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范和生，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凯强，安徽大学法学院—社会与政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安徽 合肥，230039）。

和社会等多领域的不公平与规模贫困。消费贫困是人们生活水平徘徊在“窘迫线”之下的一种消极状态，其成因具有明显的复合性与集成性。因此，学术界对于消费贫困的生成机理进行了多方探索，主要集中在文化介入、结构矛盾和权力配套三大视角。

其一，文化介入理论强调人们之所以落入贫穷，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系统中具有不同形式的亚文化和反文化。这些非主流的文化体系主观上表现为以懒惰、懈怠和被动为首的“反生产性（Counter-productivity）”观念；客观上则是个（群）体握有文化资本与所生活情境调适失败而引发的“落后”。前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他考察了多个中美洲地区贫困家庭和社区的消费生活后发现，贫穷人口中存在一些特性促使其与其他社群“自行隔离”，并形成专属于自己内部文化和行为的共识。这一包含“无助感”“被剥夺感”和“自我放逐感”的亚文化系统具有显著的代际色彩，孕育出一代代“拒绝生产”的贫困循环。他首提贫困文化理论模型，用来表达“既定历史和社会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无反抗的持续适应”。[①] 刘易斯相信消费贫困文化的“圈内交际”会强化人们心甘情愿陷于贫困生活的价值认定。而后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指出，贫困常是迫于阶层文化资本的“选择缺失”，即“穷人在消费市场竞争中的‘失败’是因为匮乏必需的文化资本。无论是长期内化的禀性、知识构成的生存心态；还是经合法化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又或是已经物化的文化财产，穷人没有足够量级将其转化为面对社会结构变迁时二次调整所需的生产及消费资料”。[②] 文化资本积蓄程度决定人们能否摆脱消费贫困的负外部性。

其二，结构矛盾理论将消费贫困判断为人们在现实消费结构中对各类资源占有不均继而造成的消费分化。该观点的代表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哈特·伦斯基（Gerhard Lenski）和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前者从冲突学派出发，提出“消费框架下的贫穷现象归根到底是一种结构对抗（Structure confrontation）”。它是社会群体在消费利益分配时对有限消费资源争夺的后果，“贫穷者实际上也是资源少有者，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及技术等竞争要素难以和富有者进行平等对话。贫穷者总是保存于对消费结构改造缺乏可能的各个群体内”。[③] 后者则将消费贫困理解为“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的后果。即“原本为帮助多数人而转移支付的消费资源反而被少数人（政治、经济、知识等方面具有优势）无偿或过度占据，使得所谓社会精英扩张了多于自己应得的利处”。[④] 少部分精英集团控制了大部分集体/私人资源，从而操纵着消费结构的未来走向。在消费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很难公平参与和分享优质化的消费信息、项目和条件，掉入贫困生活空间的风险系数也会攀升。

其三，消费权力配套理论将消费贫困定位成“权力竞赛”（power competition）的“自然物”。即，贫困是由消费资源分派的权力关系及其延伸力量在生活交换中涉及的主体间强弱性决定。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表示，贫困固然意味着个人或家庭收入的缺少，但绝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低收入”。它更意味着人们正常消费生活所需权力渠道的阻塞。[⑤] 贫困的产生源于与消费紧密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教育权力等功能性权力的整体不足。美国经济学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沿袭此理路，分析消费权力在贫困发生中的多维影响。他认为传统的人均收入和支出数据并不能直观概括所有贫困类型，个体真实贫困状态测算要从消费权力的三个层面度量：首先，消费权力网是否无法覆盖个人日常消费实践的大多数角落；其次，个人消费权力应与家庭成员的消费权力相结合，二者总体水平才能确定个人消费资源是否处于贫困标准之下；其三，不同意识形态、

① Oscar Lewis,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pp.215-216.

② Pierre Bourdieu,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71-72.

③ [美] 格尔哈特·伦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信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33-34 页。

④ 胡联、汪三贵：《我国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挑战吗？》，《管理世界》2017 年第 1 期。

⑤ 孙大鹏、王玉霞：《理解消费扶贫的一个理论框架》，《财经问题研究》2020 年第 8 期。

社会性质和国家属性下的人群，对于消费权力及其衍生物的争取不可避免会出现不对等，因而，贫困极难被彻底消灭。[①] 由之可见，消费权力与之配套网是揭示贫困问题多元性和复杂性的重要切入点。

笔者以为，上述三个理论视点将贫困生成研究扩展至细微的消费层面，有助于我们查找出消费领域的多重“贫根”，为准确铺展我国消费扶贫后续工作提供了可参照的先验原理，也为实现脱贫攻坚任务所要求的“靶向治疗”奠定了科学理据。

二、助力乡村振兴语境下消费扶贫的突破性价值

（一）推进精准扶贫的扎实化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事业改善了绝大多数国人的生活质量，并为社会主义建设其他方面带来正向溢出效应。消费扶贫与精准扶贫存在内在逻辑上的三重互嵌性。

首先，消费扶贫与精准扶贫在对象覆盖上的互嵌，有助于解决“帮扶谁”的问题。扶持对象精准是任何扶贫工作开展的基础性前提，而消费扶贫可以很大程度上准确识别出“被扶者”。即，通过定向购买或交易广大贫困地区及人口产出的商品（各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将社会资金准确对接到户 / 人，达到真正的增收惠贫。其次，消费扶贫和精准扶贫在政策举措上的互嵌，有助于解决“怎么帮”的问题。行动方案精准是任何扶贫工作进行的重要措施，而消费扶贫在宏 / 微观政策上有机结合了我国市场化机制和行政化调控的两大优势。既运用市场灵活高效的特点，自由发挥贫困地区及人口产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又借助各级政府行政力量，为贫困地区产品与服务出售提供数量和平台保障。最后，消费扶贫与精准扶贫在参与主体上的互嵌有助于解决“谁帮扶”的问题。社会力量介入精准是扶贫工作可持续的坚定后盾，消费扶贫自诞生之始就号召各界（机关单位、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达成共识，集体协作为贫困群众供应力所能及的支援，从而开辟出一条“政府引导—社会奉献—市场运作”的工作方针，促进多方互惠共赢。以上鉴之，消费扶贫与精准扶贫在工作对象、方法和主体等方面具有强烈耦合性，是完成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重任的最新探索。

（二）“扶物”向“扶志”再向“扶智”的综融化递进

在肯定我国脱贫攻坚整体成效时，也须冷静发现，当前扶贫工作中的顽疾并未完全消解，其中最为严峻的便是部分贫困户自觉脱贫意愿欠缺和内生脱贫能力孱弱。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扶贫先扶志”和“扶贫必扶智”两大方略。前者要求在物质帮扶达到基本“输血”标准后，尽快培养贫困者主动“造血”意向；后者要求贫困者在确立“造血”志向后，通盘提升其摆脱贫困的“强血”能力，发挥知识和教育在切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积极功能。正是精准扶贫工作由“粗线条”到“精细化”的这一转变，倒逼现阶段消费扶贫在实施步骤中加快由“扶物”向“扶志”再向“扶智”的综融化前进。

综融取向（generic approach）起初是英国社会工作实务者简·赫普沃思（Jane Hepworth）在深化儿童及妇女权益研究时创新的一种理论视角。她指出弱势者在日常生活中横跨多个不同的“行为—目标”系统，对其福利保护首先应当是赋予基础物质资源，再以增能为导向开发其生存技能，最后以自身独特性专长实现长远发展为目标。[②] 笔者以为，综融取向与消费扶贫存在两方面的内涵契合。其一，社会工作倡导的“助人自助”理念与消费扶贫实践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两者都是在惠及他人基础上，本体也收获一定回馈；其二，综融化理论强调的先物质给予、再挖掘潜能、最后以专业优势完成人生追求的逻辑轨迹，与消费扶贫中从“物”到“志”再到“智”的运行宗旨高度贴合。具体来看，消费扶贫中的“扶物”就是鼓励有条件的消费者优先挑选贫困地区及群众的商品和服务，以最简单的货币援助实现其收入增长。“扶志”是指消费扶贫进程中消费者出钱，贫困户出货，消费充当一种软性且灵活的链接手段。它相比“直接给钱”式扶贫，双方主体地位上更加平等，而实质内容上贫困者利润空间弹性也更大，激

① 孙咏梅、方庆：《消费视角下的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探索——基于我国农村地区消费型贫困的调研》，《教学与研究》2017 年第 4 期。

② 刘玉兰、彭华民：《西方儿童保护社会工作的理论转型与实践重构》，《社会工作与管理》2017 年第 3 期。

励其耕耘自己的合法、合理劳动来赚取更加丰厚的资本。“扶智”则是消费扶贫的终极要旨，它格外注重对贫困者在生产和销售两端的现代化和技术化培训。一边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稳步提质，提高各类产品及服务的附加值和含金量。另一边通过包装、物流、营销等多环节的科技降本，打造精密的产销衔接网。概言之，消费扶贫有利于搭建“经济为本、兼顾精神、科学赋能”的协同化扶贫范式。

（三）“生产—消费”环节链的全面化完善

无论是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都非常看重“生产—消费”间的互促关系。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坚持生产唯一目的是消费，“生产者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消费是一切工商业生产的最终旨义”。[①] 马克思在论述两者关系时也谈道，“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②] 由此可见，不同意识形态社会都不是二元对立地就生产论生产或就消费论消费，而是从二者内在关系上剖析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利益一致性。这为我们制定各项经济社会活动计划启发出一个全新视域，即，一项成功的经济行动规划应能够以生产带动消费升级，又以消费反促生产创造。

消费扶贫作为兼容公益属性和市场属性的事业，它有别过往的简单捐赠，致力于买卖双赢。贫困地区扮演生产者角色，发达地区扮演消费者角色，双方各司其职的合作构筑起“生产—消费”这一链条全面化的完善机制。第一，主体完善。消费扶贫丰富了通俗概念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将个人分散或小规模经营的交易主体扩充到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媒体等层面，生产与消费两端卷入主体都得到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和力量增强。第二，资源 / 服务品质完善。随着人们消费端个性化、档次化和符号化倾向的演变，粗加工的农副产品已经不能匹配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必然会从侧面推动贫困地区商品及服务从生产形式到生产内容的即刻转型，全力打造出集农、旅、文、景一体化的区域品牌化产业。第三，流通体系完善。消费扶贫的中枢主旨在于将贫困地区产品“送进千家万户”，那么，“如何送”显然是无法规避的话题。这就变相对目前流通体系的改造设定了努力方向。如，加大贫困地区交通设施投资力度，改善基础运输条件；营建消费共享平台或产销信息交流平台，及时发布生产销售和消费采购信息；加大贫困地区批发仓储吞吐量，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等。相较于福利兜底性质的帮扶方式，消费扶贫更能完善“生产—消费”中的市场化环节。

（四）“线上—线下”营销形态的智慧化创新

现代营销学者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曾提出营销的“黄金 3W+1H”法则，即了解清楚顾客是谁（Who）、顾客在哪里（Where）、顾客想买什么（What）、如何吸引顾客（How）。[③]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群众，另一头连着广阔市场，根本上同属一种“你卖我买”的商品交易行为。其最大特点是借用市场化运作将贫困地区商品及服务源源不断地售卖出去。然而，现实中贫困地区商品及服务遭遇了“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瓶颈，流动的不顺畅造成消费扶贫实际效用大打折扣。因而，探寻产品可靠销售渠道不仅是打通消费扶贫痛点、难点和堵点的任务，亦是彰显消费扶贫价值的“放大器”。

现今“互联网 +”的大趋势下消费扶贫同其他业态类似，充分汲取了“线上—线下”各种销售工具的智慧化优势，塑造出多元化的营销样态。笔者按照其依托载体，将其大致分为四类。一是依托特定实体商业场所或机构开展营销。这是最常见的一种销售形态，形式与“非贫困物”一样，在线下商超、农贸市场或批发展柜中供消费者自由选择。为了提高扶贫产品销量，实体店还会在商场进出口、室内步行街、电梯口等人流密集地设置部分促销专柜并加以标牌显示，营造消费者的“先入为主”印象。二是依

①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22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91 页。

③ 汪旭晖：《新时代的“新零售”：数字经济浪潮下的电商转型升级趋势》，《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托门店场景体验活动开展营销。它是围绕贫困地区特色资源而设计的体验式消费，是另一种线下形态升级。其于环境舒服、氛围放松的中大型门店内，借助主题视频、VR 设备、亲子游戏和手工制作等方式，鲜活再现各种日常农牧品在种植、收割、饲养、加工、成品等阶段的具体程序，让消费者以“拟真感”参与和感受劳动乐趣，激发人们购买欲望。三是依托初代电商平台开展营销。即借助淘宝、京东、苏宁等传统门户网站进行“脱贫物”的 B2C 销售。这是种类最齐全和用户使用频率最高的网销途径之一。以上电商平台大多开通了固定的“扶贫频道”，进行专门的文案包装，以便被更多消费者接纳。四是依托次代自媒体 APP 开展营销。泛指利用抖音、微博、快手等“新宠式”媒介进行 C2C 的“直播带货”。即聘请专业带货主播及其团队代言来自全国各贫困地区，品质良好，但受困于当地交通闭塞、生产者经营手段原始或品牌知名度不响而滞销的农副产品，将这些货品放在直播间出售。在“大 V”和“网红”的人气光环下，很多商品几乎瞬时“爆卖”，秒杀成交量令人咋舌。上述四类营销形态通过科技赋值极大提高了消费扶贫中产销配对的智慧化色彩。

三、现实工作中我国消费扶贫浮现的阶段性偏差

（一）乡村现实供给与城镇真实需求的衔接失配

消费扶贫作为连接农村贫困民众“钱袋子”和非贫城镇居民“菜篮子”“果盘子”的桥梁，是实现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消费地区市场外拓两大目标的强力工程。其本身的互利共赢性质决定了过程中所涉及“交换物”价质均须得到保证，否则交易流程随时会经受单方中断风险。彼得·布劳（Peter Blau）在其结构交换理论中言及，“人类一切交换行为的延续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行为最终目标只有通过和他人长期、稳定、有效地互动方能达到；二是交换价值必须被各方所认同并足以互惠”。[①] 遵循此逻辑，在经济或社会领域的交换行动中，只有当施惠方和受惠方都承担起履行高效回报的义务后，二者交换关系才能继续。消费扶贫究其本质是非贫消费者与贫困生产者围绕各类“脱贫物”买卖而达成的交换。想要固定这种交换关系，首要应做到“脱贫物”现实供给与消费者真实需求间的适度匹配。但现阶段我国消费扶贫掣肘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不得不面对三个维度的“供—消”衔接矛盾。

其一，单次供给规模较小，消费数量相对有限。我国贫困地区农业、手工业某种程度上仍维持在机械化程度较低的小农境地，劳动力生产经营分散，集中度不够。这导致各类农副产品看似“漫山遍野”，实则当发达地区企业或单位大批量采购需求涌现后，贫困地区现有生产力短期内很难完成订单交货，出现即期性的供不应求。其二，供给附加值不高与配套设施不完善，消费层次低质。这也是脱贫产品所遭受的最大挑战。其症结在于上游贫困地区生产方式转型速度没能同步于下游消费地区消费者需求升级速度。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商品生产与加工仍徘徊在标准化低、良品率低、利润率低的“三低泥淖”，但发达或相对发达地区人们消费需求逐渐形成定制化、轻奢化和夸示化格局。这一结构矛盾极大影响人们购买“脱贫物”的意愿。直白地说，在等值货币的自由化市场竞争下，人们“轻视”隐性价值不足的初始脱贫商品或服务。其三，供给特色不突出，品牌化消费原地踏步。外界的“公益性助推”只能保温一时的消费扶贫热度，要保持消费扶贫长远效益，落脚点最终要回归到走“脱贫物”特色化供给的道路。消费者对于贫困地区商品及服务的低认可，不仅在于“有品不优”，还在于“有优不响”。即“脱贫物”没能在开放式市场中打造出高知名度的品牌，甚至还将高质产品廉价交由职业经纪人或批发商用于贴套牌生产，主动放弃口碑树立。

（二）定点采购与自由置买的行政冲突

2020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扶贫办连同七部委下发《关于联合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通知》，明确消费扶贫采取的主要方式。从行政角度观察，消费扶贫既是扶贫，那就应当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政府部门应做好引导、组织、对接和服务等事宜；从经济角度观察，消费扶贫又是消费，

① 陈小英：《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与名人互动策略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7 期。

那就要和其他自由市场交易行为一样，处理好市场规律、市场理性与计划指标间的平衡关系。可见，消费扶贫比其他扶贫模式更加依赖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协同发力。为了解决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销售问题，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机关党委和企事业单位，将员工原本自觉自愿的“以购代捐”和“以买代帮”等市场化的爱心助贫行为成为一种“行政摊派”。部分官员在晋升竞标赛机制的惯习下，为了“政绩光辉”，运用行政力量强行下达指标，出现了帮扶单位高于市场价包销扶贫产品的做法，“行政摊派”也极端成“消费摊派”。

目前消费扶贫工作中非贫地区消费者在定点采购与自由置买中的行政化冲突囊括三个方面：首先，结对帮扶地区集体采购商品与帮扶单位中消费者需求不对称。很多时候，各级行政单位由工会统一采置的“脱贫物”并不是本单位人员真正需要或想要的。但碍于单位内部行政力量“按压”，不得不去完成分摊到个人身上的“采购指标”。消费扶贫中含有大量慈善成分，但这并不能抹杀市场经济中人们天生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理性。单纯依靠行政指令的“非自由购买”注定不能成为一种常态化方式。其次，采购结算条件和方式中存在行政障碍。当前，各大基层预算单位为了规避后续审计和巡视带来的隐患，在各种采购款项支出与清结上限制较为严苛。大宗货品基本使用对公转账，而零星交易也要求公务卡结算，传统意义的“一手交现钱、一手交现货”的交易情景寥寥无几。但对于贫困户而言，这种结算方式不仅资金回本周期长，燃眉之急无法立马解决，而且大多数分散经营的农户也不具备开具正规发票的资质和条件。如果交由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又无形增加采购成本，降低对贫困地区的直接帮扶力度。其三，“货—价”对等的不确定性风险较高。我国贫困地区由于生产者知识水平和地理区位等主客观要素制约，暂时未能很好地应对农副商品产出及休闲农业开发等扶贫项目中的薄弱性。但由于存在“行政摊派”的痼疾，基层单位从业人员时常又不得不将自由置买其他同门类市场化产品的资本，用来支援“价—质”潜在错位的“脱贫物”，为其付出不对等的消费资源。

（三）网销模式与交易双方的利益争夺

据商务部数据，2019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 3975 亿元，较 2018 年同比增长 27%。2020 年一季度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线上农产品网络零售额逆势上扬，其中肉禽蛋、粮油和蔬菜等生存型产品增速均高达 70% 以上。[①] 网销模式在消费领域中的日渐盛行，得益于当代科学技术和影像图画水平的提升，合力营造出一种超越全球地理界限和机械钟时间计量的“传递经验（mediated experience）”。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理论大厦中，传递性经验是“通过流动化信息和通讯工具营造的间接经验，表现为诸类知觉表象或心理体验……它真正令人刮目相看是在于可以迅速向他人传送大量具有质画感的生动信息，在他人脑海中形成印象深刻、丰富、能被迅速扩散的间接感知”。[②] 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各种传递经验通过新媒体技术大幅扩展消费时空边界，并对他人“一手实践”产生的各种身体经历和心理体验再解读，以一种“缺场性”整合“线上—线下”空间行动，成为人们消费决策时的先验式参考。在此之上，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在“实体—虚拟”社区内的消费权重，更简化了“面对面”消费中的僵化流程。然而也应洞察到，无论是 B2C 的电商平台，还是 C2C 式的“直播带货”，运用于消费扶贫工作时都会与“消费者—贫困者”存在利益争夺的隐忧。

第一种，情感型利益争夺。具象形式是抖音、快手和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中的部分用户，虚构出一类“卖惨”情景。比如，我们常看到的一幕：贫困地区果农或菜农因各种不可抗力导致商品滞销，录上一段视频，请求网友帮忙购买。其利用消费者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共鸣，进行一种同情心渲染。更夸张的是，屏幕前消费者看到的所谓“贫农”并非是真正贫困户，而是部分商家为了推销自家商品所伪造包装。这使得消费者用于支撑贫困者的经济资本被“伪贫困者”蓄意剥夺。第二种，身份型利益争夺。具象形式是各大 APP 邀请“网红”“偶像”“大 V”等博主，利用“名人身份”在其直播间内开

① 郭红东、曲江：《直播带货助农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人民论坛》2020 年第 20 期。

② 刘少杰：《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社会作用与尖锐挑战》，《江海学刊》2018 年第 5 期。

展爱心助农的带货活动。该网销形式原始动机是善意的，希望不知名的脱贫商品被赋以知名效应后可以大卖。但过程中却被不良商家和投机分子雇请专人在直播间内，通过 IP 流量数据造假、夸大宣传和以次充好等手段所扭曲。当消费者拿到的实物与展示样品差距过大时，不仅经济利益受到损失，情感利益上也深觉冒犯，甚至发出“再也不买扶贫助农产品”的消极声音。第三种，挤压型利益争夺。具象形式是最常见的商品“价格战”。由于我国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竞争，商品要想脱颖而出必须做到物优价廉。但当“物优”实现后，各大电商和直播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就开始在“价廉”上做文章。许多消费者在直播间内获得的不菲优惠和折扣券是建立在挤压生产者收益空间基础之上的，“热闹非凡”的下单量看似帮助到贫困民众，实际上却只是让网购平台和网红主播等“中间商”赚得盆满钵满，而贫困人口能得到的真实利润已被挤压殆尽。对此国务院扶贫办发言人谈到，“直播带货是个值得鼓励和欢迎的形式，但我们也发现少数贫困地区请名人大牌代言，最后经济账算下来和贫困户真实成交效益不成正比。所以这方面既是教训，也对以后工作提出新要求”。[①] 此三种网销利益的争夺不但削弱了贫困群众的切实收益，还从经济与人文情感两方面破坏非贫地区消费者的帮扶热情。

（四）短期支持与长效规划的结合悬浮

消费扶贫终极目标是有机结合市场和行政二维手段，凝聚全民之力打破贫困地区农产品及服务的“产—供—消”三层壁垒，实现贫困户增产又增收。因而，长效性将直接关系到消费扶贫各个环节的效果。就现阶段而言，我国消费扶贫供给与需求两侧都尚未探索出合理的长效机制，反而显露出短期支持与长效规划的“悬浮化”结合。按照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分化’，这种局面根源上来自现代性中总会出现不断打破总体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变革力量。造成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样化与个人生活领域的碎片化无法透彻结合，出现许多套悬停在指导日常行为规范上的非议和争论”。[②] 笔者以为，“悬浮化”具体落到消费扶贫处，就是现有各项扶贫实践无法与长远扶贫计划精准对接，使得消费扶贫处于“既有效，但难长久”的尴尬处境。

其一，贫困地区供给端稳定产出长效难。一方面，贫困区内农业组织化程度较低，农副产品“小生产—大市场”之间矛盾尖锐。贫困户不仅抵抗自然风险能力羸弱且生产经营仍维持松散状态；另一方面，贫困区农业信息化程度有限，贫困劳动力无法实时根据消费地区人们的消费偏好和需求量来制定科学生产计划。加之销售信息传播和物流缓慢使得蔬菜和水果等新鲜农产品容易腐化。在组织化和信息化双重不足的藩篱下，贫困地区向外的有效供应很难稳定维系。其二，消费地区需求端订单长效难。现行“脱贫物”的采购主体多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他们发起的消费扶贫采购常含有政治化色彩，关注点不全是“脱贫物”本身，而是其后的附加要素。这种脱离市场化导向的采购行为，大多缺少长期保障机制。很多订单产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旦达成后就会暂停对贫困地区的定点采购。其三，消费扶贫活动开展长效难。无论是线下大型扶贫产品推介会、产销会或集市，还是线上专场直播、特定节日折扣（“双 11”“618”）等，这些活动多是临时的。虽然对于减少贫困地区农产品存量有一定帮助，但缺乏稳定的后续安排。这也给消费者留下疑问：没有促销活动怎么办？特定节假日之外的时间里产品怎么定价？这些问题都牵涉到对消费扶贫活动固定化和常态化的反思。其四，消费扶贫监管机制长效难。消费扶贫具有庞大的共生性商业生态系统，它要同时处理好“线上—线下”两大交易空间中复杂的买卖关系。相比实体经济，互联网经济中的消费扶贫在交易主体、规模和渠道等方面接受人为监管难度更大、成本更高。此外，我国各级部门多采取运动式监管，这种监管机制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被动性，对于未来的消费侵权也防范乏力，无法将监管依据、处理方案和判罚结果凝聚为成熟的监管体系。

四、乡村振兴行动过程中我国消费扶贫长效性的路向安排

（一）市场安排：以乡村供给侧改革为抓手，准确对接城镇消费侧升级

① 许雯：《国务院扶贫办谈直播带货：非常鼓励，但有地方请名人带货反赔本》，《新京报》2020 年 8 月 28 日。

② 叶方兴：《从“悬浮”走向“融合”——论现代性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探索》2019 年第 6 期。

消费扶贫本质属性决定其是消费者和贫困者之间围绕商品及服务全部价值达成的交易。既然牵涉买卖环节，双方交换关系的长期维系就要求双方必须都遵守市场化规则。虽然其中消费者可能出于情感或政治因素自愿付出稍高于市场价的成本，但绝不意味着贫困地区供应的产品和服务就能罔顾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英国经济社会学家特奥多尔·沙宁（Teodor Shanin）曾言，“市场化网络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彼此关系的维续标准不是外部强制性因素，而是将自己置于对产品质量‘看得见、摸的着’的标签中，这一标签只基于各自对产品质量的共同理解和共享的价值观”。[①] 这启发我们，只有不断提高供给侧扶贫产物质量，使其与消费侧升级相贯穿，才能让更多消费者从“头回客”变为“回头客”。

第一，聚焦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提升，打造特色化、品牌化产品。一方面，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生产结构，因地制宜确定需要被重点支持的特色农业类型，避免与其他地区同质化。借助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专业科学机构力量，选取地方特有品种作为深度产业培育对象；另一方面，树立长远的品牌化发展思维。贫困地区应扎根本地资源优势之上，瞄准市场需求，在当地政府和龙头企业帮助下，以特色农产品为介质，采取统一化、标准化和眼球化的包装设计或 logo 图案，扩大商品对消费者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渗透力。第二，贫困地区所提供服务应与乡村振兴战略吻合。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是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它恰能与非贫地区消费者目前呈现的生态化、休闲化和娱乐化等消费憧憬相对应。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牵头有实力的投资者，充分发掘贫困地区山清水秀的良好生态环境，在自然地貌和资源可承载范围内，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项目，如森林草原观赏、湖畔湿地观光、冰雪风情体验等，使民风民俗与外界时尚相互交融，形成有前景的新服务业态来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业。

（二）教育安排：以乡村本地人才培养为基础，提升“产—销”两端内生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贫先治愚”和“扶贫必扶智”的两大论断突出了教育在扶贫工作中的核心作用。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分析美国二战后的成功经验时，就指出高水平教育指导下的人力资本是保持美国经济始终稳定增长的关键，“如果把教育也作为纯粹的投资活动来看，那么就能很好的解释人力资本总量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或许在今天，教育成本已经也可以算进我们国民收入增量的动力”。[②] 以此延伸，当下消费扶贫过程中各项细化环节的实施与展开，都离不开高质量教育下培养出的专业性人才。只有贫困人口具备相当的知识储量后，才能在内生能力上纾解消费扶贫的暂时性盲点，真正做到“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其一，培养当地现代化生产人才。一方面，要以提升贫困地区人员劳动技能为主线，注重提高农业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挖掘当地技术“带头人”的知识与管理能力，通过其向更多本地劳动力提供兼具通俗化和科学化的生产指导；另一方面，以定制化方式按需输出劳动知识，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和社会需求开展各类技能帮扶。强化科技力量引入，由当地政府牵线，组织各大涉农高校专家学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休闲农业或特色种植和养殖等方面的知识宣讲，组织农民进行认真学习。其二，培养当地专业化电商人才。许多贫困地区产品并非质量不佳，而是没有高效的销售途径将本地产品“送出大山”。因此，在完善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等硬件条件的同时，更要加强对农村电商技能化人才的储备。在有一定专业性知识的人员辅导下，为农村电商经营者提供产品开发、包装设计、网店运营等专业服务，赋予贫困人口使用网络和用户终端的先进能力。其三，培养当地前沿化宣传人才。明星和县长等“直播带货”虽然能短暂吸纳消费者，解决眼前农产品滞销问题，但非长久之计。只有具备真正了解当地商品“卖点”优势的本土化新型职业宣传农民，才能最大程度将非贫地区流行的消费时尚与“脱贫物”的品牌推广结合。

---

① 叶敬忠、贺聪志：《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2 期。

② 袁利平、丁雅施：《教育扶贫：中国方案及世界意义》，《教育科学》2020 年第 7 期。

（三）技术安排：以可持续运行为目标，形塑“实体—网络”互助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指导时，曾论述“未来二十年，农村贫困地区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等技术工具发展与脱贫致富结合的最大盈利点和最广阔市场”。[①]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历来既奉行差序原则的价值型关系理性，也遵从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中和两者所采取的技术化工具将公共与私人生活各方面，通过“可计算性”和“人情植入”达成较为理想的行动策略。在供给侧，现代化科学技术将分散于不同地域内的贫困农户信息和商品种类信息汇集，通过整合优化凝聚成规模化的市场供给；而在需求侧，信息技术又将庞大的消费需求集中反馈给生产者，为贫困地区产品或服务提供相对平稳的市场参考依据，减少市场波动对贫困户的生产影响。因此，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穿插利用好现代化技术工具，使二者形成互助格局是消费扶贫可持续运行的保障。

首先，增强产销对接中信息化建设。既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绘制贫困人口图谱、群体画像、分布特征，鼓励围绕市场需要制定合理生产计划，避免盲目扩大或缩小种养规模；又要支持经销地农产品在批发市场、大型超市设立扶贫专区，采取产品预售和定制等方式，实现供需对应的精准营销。其次，借助新媒体技术做好智能化推广。一方面，加大在微信公众号、微博、直播 APP 等网络空间的宣传力度，增加在地铁站、公交站、商超门店等实体环境中消费扶贫公益广告的曝光度，线上线下多渠道向外传递贫困地区商品的绿色特点和价格优势，糅合人们对消费扶贫在经济层面的理性认知和公益层面的情感共鸣，在消费者群体中建构出一种购买脱贫产品“既划算又有爱”的符号联想；另一方面，分析和使用好互联网数据，根据不同地区、偏好、消费条件的个（群）体进行精确推广。生产者和经销商尝试与专业数据收集分析团队合作，以通过小样本推测全体的方式，实现个性化和关联化推荐，为脱贫产品寻找属于自己的“忠实粉丝”。最后，着重改善物流运输条件。物流是将贫困地区商品成功送达消费者手中的关键载体，如果不尽快打通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再优质的产品也无法做到时效交接。这就亟需以有力的资金输入加快补齐以县乡区域为重点的仓储、运输、配送等物流配套设施，并推动农村物流信息化、智能化、GPS 定位等先进技术应用，提高货物分拣和送达效率。

（四）机制安排：以城乡多主体协同参与为方向，构建全方位复合发展体系

消费扶贫是一项汇聚政策性和全民性的超常规举措，它不仅依赖国家层面的政治动员，更需要个体层面公民的齐心协力。辩证地看，合理且完善的机制会创造出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人们提供加入消费扶贫事业的外部推力；反之，多主体协同互促局面又是落实和履行各项宏 / 微观扶贫机制的前提基础。这启示我们，一个凝结社会各界力量的复合发展体系是建成消费扶贫长效机制的坚强护盾。

一是联动多元宣传机制，树立正确参与观念。系统化的宣传机制可以让各大宣传主体（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媒体）有的放矢的在宣传内容、传播途径、意识形态等领域更加深入细化地对消费扶贫工作进行推广和再教育，大幅提高普通民众对消费扶贫的知晓率、参与率和帮扶率，营造出“人人可为、人人乐为”的良好扶贫氛围。二是建立健全奖惩机制，推进消费扶贫有序发展。一方面，制定明确且规范的奖励政策，对于积极生产的经营大户或脱贫“排头兵”进行荣誉表彰，提供机会和平台让其为更多地区贫困群众提供经验指导，激发其上进心和自信心，继续发挥“龙头”示范作用。此外，对消费扶贫有特殊贡献的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给予适当精神或物质奖励，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以消费扶贫为荣”的向上风气。另一方面，严厉打击破坏消费扶贫事业的行为和主体。各级政府尽快出台法律法规或通知办法，以正式条款文本，依法依规查处假借消费扶贫旗号夸大宣传、借机谋利和虚假扶贫众筹等暗地恶意敛财行为。三是搭建精准长效监管机制，增强消费扶贫综合效应。首先，重点对扶贫产品的质量、价格、市场主体诚信开展全链条式监管，确保扶贫产品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经营合规，在消费群体和贫困户间建立起常态化和规范化的交易平台和机制；其次，重视对扶贫工作过程的监督，严格遵循自愿

① 陈联俊、程京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中的互联网扶贫》，《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 年第 5 期。

原则和市场规律，杜绝层级命令下的行政摊派，严肃整治各级政府和单位“一刀切”式的“强迫扶贫”；最后，加大对互联网等新型消费扶贫方式的监管。遵循电商平台负责制，对依托门户网站进行销售的卖家实名制管理，建立起完整的溯源、售后和理赔流程。还应完善农产品“带货直播”的诚信评价机制，规范农产品网络直播销售行为，将粉丝评价、举报和监管部门的调查处罚信息等纳入评估系统，取缔违法情节和污点信息较多的主播销售资格，促进农产品网络直播经济的正本清源。

五、结论与启示

我国消费扶贫工作的提档升级，不仅成为助力脱贫攻坚重任的“加速器”，更是落实乡村振兴工程的重要手段。它相比传统的乡村振兴举措更具四方面的独特优势。第一，让乡村地区产品有了新出路。乡村地区拥有大量可以细化开发的优质产品，有些更是城市社区中罕有的。通过消费扶贫可以让之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乡村特产来到千家万户，一些农副产品甚至一跃成为“网红消费品”。第二，城镇居民消费有了新期待。随着人们消费休闲化、娱乐化和品质化趋势加深，追求自然生态的消费倾向愈发明显。乡村地区拥有天然的风土人情，乡村旅游、老房土菜、原始民宿都是未来值得深挖的潜力点。第三，城乡融合有了新进展。消费扶贫摆脱过往单一“给钱给物”式捐助，而是走向深度资源的循环开发。既提升了乡村地区及人口主动发展意愿和内生发展能力，又让城镇消费者高性价比地体验到特色农副产品及服务。体现援助道义的同时，也避免单方面一味给予所催生的“等、靠、要”依赖思想，从内部源头上促进了城乡居民互融、互助、互生发展格局的形成。第四，城乡帮扶对接有了新载体。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和社交网络的广泛普及，打通了线上线下双渠道的消费扶贫路径。它不但增添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活力，也很大程度上扫除了“供给—需求”两侧信息不畅、衔接不准、选择不多等积弊。各类新式网络载体的运用，为探索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培育新型化农业主体、推动乡村地区产品服务走向市场化做出了贡献。笔者相信，在“十四五”时期，消费扶贫在立足乡村振兴目标导向的基础上，可以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动力。

责任编辑：王 冰

实现政府、市场与农户的有机连接：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新机制*

陈天祥　魏国华

[摘　要]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定义为解决贫困户增收致富的一项根本性和长远性的举措。实践中，产业扶贫主要包括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混合模式三种类型，存在扶贫资源瞄准偏离、目标靶向偏差、精英俘获等问题，没有建立起政府、市场、农户之间的有机连接。欲跳出产业扶贫的困境，关键在于理顺产业扶贫背后的政府行为与市场力量的关系。现有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如何实现两种力量的平衡并相互赋能，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答案。广清农业众创空间的实践，将政治动员的优势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政府、市场与农户的常态化利益连接机制，有利于突破既有产业扶贫模式的困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关键词] 产业扶贫　政治逻辑　市场逻辑　农业众创空间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49-07

一、问题的提出

在多年的农村反贫困实践中，我国已形成由生存型、支持型和开发型三种类型构成的政策体系。[①] 20 世纪国家侧重满足最低反贫需求的前两种政策，进入 21 世纪后，产业扶贫致力于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关注贫困群体发展能力的提升和脱贫致富，其“开放式、造血式”的扶贫模式对于贫困地区突破“久扶不脱贫”的困境具有较大的优势。[②]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是“从短期效益到长期效益”“从输血到造血”的主要抓手和平台，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提出将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具有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农产品生产，要按照产业化发展方向，连片规划建设，形成有特色的区域性生产主导产业”。由此可见，产业扶贫被定义为贫困户增收致富的一项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战略举措。

从我国实施扶贫政策的效果来看，产业扶贫的确在我国脱贫减贫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有

* 本文系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2019GJ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天祥，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国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

① 王春光：《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开发扶贫问题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 年第 3 期。

② 梁晨：《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研究者发现，产业扶贫存在扶贫资源瞄准偏离、[①] 目标靶向偏差、[②] 精英俘获 [③] 等问题。有学者认为，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产业扶贫背后所蕴含的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的张力和矛盾。有学者在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考察后，认为扶贫济困与产业发展分别遵循社会道德逻辑和市场化逻辑，双方存在矛盾，使得以项目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容易重项目、扩规模而轻扶贫。[④] 现有产业扶贫模式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政策性、非市场性和程序性。而扶贫资金的资本化运作虽然可保障短期内脱贫效果的实现，却难以持续。[⑤] 欲跳出产业扶贫的困境，关键在于如何理顺其背后的政府行为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如何实现两种力量的平衡并相互赋能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答案。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即是如何将政治动员的优势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常态化利益连接机制。本文选择广东省广（州）清（远）对口帮扶中的产业扶贫实践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包括不同村的产业项目和正在实施的广清农业众创空间。广东省清远市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级扶贫改革实验区，近年来在精准扶贫工作上攻坚合力强、工作推进快、改革效果好、扶贫亮点多，贫困人口脱贫稳定性较好。2019 年 12 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叶贞琴对广清农业众创空间给予肯定，认为它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鲜活案例，也是消费扶贫和现代农业创新的鲜活案例，因此，案例具有较好的典型性。研究方法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为主，笔者之一持续 3 年多全程参与产业扶贫工作，掌握了较多一手素材，为论证过程提供经验支撑。

二、不同产业扶贫模式的困境

（一）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困境

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一般采取项目制运作形式。项目制是指在财政体制的常规分配渠道和规模之外，按照中央政府意图，自上而下以专项化资金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⑥] 实践中，较为普遍的方式是由扶贫工作队伍根据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进行相应扶贫项目规划，将产业扶贫资金以项目形式直接投放到贫困地区。

扶贫是一项高惩罚、弱激励的工作。在实地调研中，基层扶贫干部都表示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核和监督：一是来自国家、省、市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二是来自政府多个部门的督查；三是来自政府多个部门的巡查；四是驻村纪检组的日常监督；五是省、市、区、镇的微信群每天常态化的工作核查和任务布置。此外，清远市扶贫办还制定了“双联双单双促”考核机制，“双联”指广州与清远各县市镇三级联动，“双单”指的是党政领导的责任清单和行业部门的任务清单；“双促”是指促进督查落实的措施，包括周清、月结、季度查和年度考核四项措施，一旦发现问题先发函然后再发督办通知书，扶贫办干部把这一督查落实的办法称为“秘密武器”。然而，产业扶贫对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事实上是弱化的。[⑦] 出于理性的考虑，行政主导的项目优先服从于完成任务的目标，遵循的是“不出事”的逻辑。一是选择风险低的收益型项目，如光伏项目、水电项目等资产型项目。这类项目的收益是相对固定的，项目收益会因补贴变化而波动。同时，贫困户没有参与收益型项目的投入，却可从中获益，易产生“等靠要”的思想。二是将扶贫资金投资在龙头企业进行分红，或将扶贫资金贷款给企业，企业返还保底利息。投资龙头企业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收益难料。而对于保底贴息项目，企业一般将其视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由

① 李小云、唐丽霞等：《论我国的扶贫治理：基于扶贫资源瞄准和传递的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② 李博、左停：《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 Y 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③ 左停、杨雨鑫等：《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贵州社会科学》2015 年第 8 期。

④ 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⑤ 蒋永甫、龚丽华等：《产业扶贫：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贵州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

⑥ 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5 年第 2 期。

⑦ 许汉泽：《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研究——以武陵山区茶乡精准扶贫实践为例》，中国农业大学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

于企业所负担的利息成本高于银行贷款或其他正常融资渠道的成本，一旦合同年限结束，延续合同的意愿不大。三是投资短平快项目，如发放鸡苗等生产型物资，抑或直接发放补贴。精准扶贫项目具有明确的期限，一般是以 3 年为一周期。基于脱贫压力和政绩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选择能够立竿见影、亮点鲜明的产业项目，扶贫队伍一旦撤离，容易导致贫困户返贫。四是选择保守型项目，在原有地方产业基础上进行包装。

总体而言，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方面是专业能力不足的挑战。扶贫队伍由各个职能部门抽调组成，驻地时间较短，再加上对市场规律和信息的把握不足，难以通盘考虑地方经济社会情境和历史传统，无法清晰定位地方产业发展方向和格局，往往会选择不易出错、易于操作、同质性较强的项目。大多数项目停留于单一产品开发和简单的农产品种植，不同项目之间缺乏上中游关联，无法形成产业链。另一方面是短期项目制模式与产业发展周期不匹配。

（二）企业主导的产业扶贫困境

产业扶贫的第二种常见模式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龙头企业通过资本下乡的方式，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形成“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资本必然的选择，扶贫并不是其核心功能和责任，市场牟利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逻辑。[①] 有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并非通过经营农业生产性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而是通过三种方式获得利益。一是圈占土地。资本下乡大范围整合和流转土地之后，并不进行实际的生产经营，而是以较低成本长期占有土地，等待土地升值之后再转包出去，以此作为过剩资本的保值和增值方式，本质上是土地投资。二是通过成立相关实体获取国家农业项目和扶贫项目的奖补资金。[②] 三是以低工资雇佣农民获取高额的项目收益。

资本下乡直接挤压了小农户的政策利益空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隔离地带”，大部分公共资源难以直接、有效下达农业发展领域。国家的农业发展政治目标被扭曲，国家陷入其中越来越难以保持其自主性，农业现代化的战略转型难以实现。[③] 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县、乡，甚至州、市、省引来的大户和龙头企业，瞄准的是通过“执行国家的要求来获利，并分享国家项目所提供的奖补。其实质不是规模经济效益，而是与权力拉关系和挣国家的钱”。[④] 部分研究也发现，在实践中由于缺少监督，部分商人冲着扶贫和助农资金，临时成立农业公司或合作社，部分外村村民临时运作将自己包装成大户，瞄准项目寻找商机，先将项目拿下，分红之后再仓促结束项目。产业扶贫项目落地机制既脱嵌于基层党政将项目进行到底的体制安排，又脱嵌于项目地农户基于经济社会场域的主体利益而设置的知情权和监督机制。[⑤] 农户被排除在分享产品市场利润之外，反而是龙头企业获得了大部分的利益，最终不仅没有实现扶贫，还拉大了贫富差距。[⑥]

（三）混合模式下的产业扶贫困境

产业扶贫的第三种模式是由政府将扶贫资金直接投给龙头企业或“大户”，由后者负责资金的使用和运营管理，附加要求是对贫困户进行吸纳。由于广大农户小而散，组织化程度低，政府出于管理和沟通的便利性，更倾向于依赖大户牵头、能人带动，或“公司 + 大户”“基地 + 公司 + 农户”的运营方式，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规模依赖行为”。[⑦] 首先，从交易成本上看，相比于逐一对接零散的小农户，大户

---

① 蒋永甫、龚丽华等：《产业扶贫：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贵州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

② 黄宗智、龚为纲等：《“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开放时代》2014 年第 5 期。

③ 王海娟：《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

④ 黄宗智、龚为纲等：《“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开放时代》2014 年第 5 期。

⑤ 孙兆霞：《脱嵌的产业扶贫——以贵州为案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 年第 3 期。

⑥ 阮池茵：《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凉山彝族农民的贫穷——对凉山州苦荞产业发展的考察》，《开放时代》2017 年第 2 期。

⑦ 赵晓峰：《地方政府在农业转型中的规模依赖行为分析——兼论小农户的发展困境及其超越》，《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和公司的规模化大大减少了政府的沟通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其次，扶贫项目资金的下发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行政手续，中间环节如果不顺畅可能导致项目资金无法及时到位而影响项目进度，而大户和公司具有一定的资本优势，使得项目不会因资金拨付滞后等原因而无法启动。最后，大户和公司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人力资源基础和运营管理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强，作为代理方稳定性程度较高。

在这种政策框架下，形成了政府委托企业，再由企业带动小农户的模式。这种产业扶贫的市场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龙头企业通过流转土地，为贫困户提供租金收入，贫困户必须交出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换取经济收入；第二，通过龙头企业 + 基地 + 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对贫困户进行技术培训，以更好地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业工人的技术要求；第三，吸纳用工，为贫困户提供工资收入，贫困户必须通过交换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工资收入。但在实际运作中，大户难以对散户起到示范作用，难以实现带动散户致富的项目初衷。大户依靠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项目技术培训和配套支持等降低了运行成本，并拿到产业升级的财政补贴和其他优惠，向产业链高端进军，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空间。大户依靠国家的优惠政策而获得了市场资源、技术资源和产品资源优势，这些都是散户无法学习到的。因此，依靠大户的扶贫模式，从利润分配来看，农民只能获得有限的劳务收入，扶贫资源和市场流通附加值多为大户获得，存在进一步拉大项目地的贫富差距和“内殖民”风险。[①] 以本文案例所在地鱼水村西洋菜产业基地的实践为例，企业对农户的吸纳机制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聘用贫困户务工，西洋菜需要纯手工的工序，手摘 5 毛 1 斤，贫困户由电视台（对口帮扶单位）再补贴 1 毛钱，可以是短工或长工，工资可日结；二是承包的形式，由公司先期完成产业基地的各项基础工程，并提供生产物资，贫困户承包耕种，采摘之后的西洋菜也由公司再统一收购；三是扶贫资金的分红，政府为公司投入一定的扶贫资金，给贫困户利息分红。这种模式虽然可增加农民的收入，但存在几个潜在的深层次问题。第一是利益分配显著不均衡。贫困户工资很低，采摘 1 斤加上补贴只有 6 毛，但该基地的西洋菜在市场的定价为 8 元 1 斤，贫困户或农户相当于只是最末端的劳力，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第二是承包只是形式性的，掩盖了隐蔽的雇佣关系。西洋菜基地的种苗技术和收购都由公司垄断，承包户的种植收益相当于其所投入劳动的工资。有研究认为这种形式的承包农户其实只是“代管户”，企业通过控制土地等重要的生产条件，从农业生产的上游和下游获取利润，这一利润的来源实际上正是代管户所生产的农业剩余，[②] 加工和销售的利润完全流入龙头企业之手。第三是分红的形式不具有持久性。分红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扶贫基金，一旦政府撤离，分红也就没有了。第四是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不对等。企业可利用信息不对称压低协议价格，而分散农户由于缺乏对等谈判能力而处于弱势地位。政府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和对市场评估的专业能力不足，无法对雇佣双方的谈判过程施加实质性影响。[③]

在这三种模式下，贫困户事实上是失语的，政治逻辑无法从根本上帮助贫困户直接和深入参与市场、提高市场竞争力和规避市场风险，政府行为中蕴含的父爱主义和平均主义也会带来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致使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市场逻辑又使得扶贫资源进一步向大户倾斜，造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无论是政治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模式，都没有回应小农户如何对接大市场这个核心问题，难以有效实现扶贫的可持续性。欲突破产业扶贫的困境、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着眼于政府行为和市场力量的有效衔接，形成政府、市场和小农户相互增权的合作态势，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直接对接。

三、实现政府、市场与农户间的有机连接：广清农业众创空间的案例

2020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

① 梁晨：《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② 陈义媛：《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开放时代》2016 年第 5 期。

③ 企业主导模式和混合模式下农户被雇佣都只能获得有限的收入，但原因不一样，前者主要是由雇佣双方的议价能力不对等造成的。

如何充分利用政府行为和市场力量的优势，规避单一主体主导而导致的逆市场化或精英俘获，促进政府、市场和小农户的有效合作，广东省广清农业众创空间进行了探索。广清农业众创空间作为广州市和清远市合作共建的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众创空间，主要为入驻企业提供创业平台，推动多种形式的合作和创新。这种模式部分类似于郭晓鸣等所提出的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①] 不同的是，其不仅承担了部分的中介服务职责，还充当了政府、市场和贫困户有机联动的衔接器，对接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将行政动员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有别于前述三种产业扶贫模式的新途径。

（一）合作构建，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效联动机制

既有的模式中，无论是政治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其合作机制要么是“政府＋社会”或“企业＋社会”，抑或“政府＋企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始终有一方被排除在外。此外，中国农村分散化的种养殖业，使任何企业与大量小农户的联结都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同时，大多数的农业经营企业生产水平比较落后，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都比较弱，抗风险能力不强，难以支持农工商或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并实现产业链条的延长和优化。[②] 为此，广清农业众创空间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联动合作机制。一方面，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引领、企业运作、多方参与、共赢发展”的运作模式，由广清对口帮扶指挥部和清远市农业局牵头，市国资委、市供销社和清远市农业龙头企业寻乡记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清远市广清农业众创空间有限公司（清远市国资企业、供销社共占股 67%，寻乡记公司占股 33%），负责具体建设和运营工作，并作为核心服务商，整合政府、农业龙头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专业机构等资源，为进驻平台的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另一方面，构建交易、信息、金融、科技创新和农技推广等 5 个子平台，围绕生产、加工、研发、品牌建设与推广、销售流通、休闲旅游等众多环节的全产业链，通过集聚龙头企业和孵化器、农业科技、科研机构、电商、广告设计、文创、金融、物流、冷链、农业大户、农业休闲旅游等各领域的优秀企业和机构，为入驻企业提供实体空间与虚拟网络空间融合互动的创业平台，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生态，促进企业间深度合作和协同创新，为清远小规模农户赋能。此外，建立以农产品质量、农业资源要素、营销、生产和管理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数据库，各主体信息共通共享，成为广州农业企业到清远找资源、找基地和清远农业主体到广州找市场、找服务的对接地标。

平台构建、地标对接等合作机制的构建，一方面将农业服务机构整合起来，包括检验检疫等公共服务和包装、营销等市场化服务都集聚到一个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平台将小规模农户连接成一个整体，将平台打造成一个信息纽带，促进供需双方的高效匹配。它相当于建立起一个“微市场”，打破了以往单一大户或公司对村庄的垄断，农户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参与市场交易和利润分配。政府也可借助合作平台，通过政策倾斜等方式保障小农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更多的谈判机会，获得更公平的利润分配等。

（二）政治动员，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近年来，各地选派大量的扶贫干部参与产业扶贫，扶贫干部大多把主要精力投入产业项目的选择和运作，由于对村庄资源优势和农产品的市场优势把握不准，扶贫项目容易违背市场规律，陷入经营粗放、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等困境。突破困境的关键在于转换行政力量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将项目选择交由市场，而致力于在生产销售过程中整合多方力量以及拓展消费市场，为小农户进入市场提供更多通路，减少小农户对大户或公司的依附，提升小农户对产品和劳动的议价权。一是农业众创空间发挥政府主导的优势，积极整合驻村工作队伍力量，驻村干部成为落地对接员。广州市安排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黄埔区和 28 个市直单位、16 家市属国有企业对口帮扶清远市 205 个省定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解决农产品在生产供应销售过程中遇到的土地整合流转、田间管理、产品收购与流通、销售渠道等实际问题，

① 郭晓鸣、廖祖君等：《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联动型和合作社一体化三种农业产业化模式的比较——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7 年第 4 期。

② 郑风田、程郁：《从农业产业化到农业产业区——竞争型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可行性分析》，《管理世界》2005 年第 7 期。

点对点为小规模农户提供精准服务，畅通产供销链条，解决服务小规模农户的“最后 100 米”问题。二是农业众创空间积极对接广州对口帮扶清远指挥部、广州市派驻清远市精准扶贫工作队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深入开展农产品“五进”活动，即进机关、进企业、进医院、进学校、进军营。三是农业众创空间深度融入政府的重要战略部署，通过完善与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的联动协作机制，推动农产品基地和流通体系建设，打造新型都市农业。

广清农业众创空间通过整合行政力量，深度融入政府重大战略规划，为农产品的销售流通打造稳定的合作联盟，拓展农产品的市场空间。通过行政动员降低了小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和提高了市场的信用度，实现与市场的快速对接。侧重将这些农产品规模化进入单位食堂和以工会福利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找到了差异化的市场竞争定位。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因为贴上了扶贫的公益标签，并具有溯源功能，为农产品提升了情感附加值，相当于为乡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构建了一个联结与互动的特殊场域，[①] 大幅降低了进入消费市场的门槛，并且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市场赋能，提升竞争力

长远来看，要实现小农户有效和可持续对接市场，关键在于提升市场竞争力。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集聚和组织，需要开拓市场和提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②]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为了产品畅销和提高产品附加值，市场经营主体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和营销，广清农业众创空间组织品种研发、产品检测、品牌包装、冷链运输、品牌塑造等领域的农业服务机构，帮助农户规范运作和管理过程，完善相关配套服务，弥补了小规模农业存在的供应不可持续、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包装和营销等不足。主要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引入多种领域的服务商入驻众创空间，搭建服务全要素平台，为小农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到 2019 年底，先后引进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垦集团等 21 家知名服务商实体入驻，与广州银行、广州交易所等 509 家优秀农业服务商建立合作关系。二是通过多种形式的孵化和实施培训计划，积极培育和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提升其市场适应能力，促进农业提质。三是借力政府扶贫资源，合作建立市、县、镇、村四级农产品供应链体系。

广清农业众创空间以平台为依托，实现了小农户与市场的快速对接，获得了参与市场的大部分收益，化解了“内殖民”的风险。同时，通过多种举措，有效提升小农户的组织力和市场抗风险能力，增强了参与市场的可持续性。它告诉我们，从农村发展的生计理论视角来看，思考农户生计改善与收入提高的出发点应是“农户现在有什么”，以此为基础，再思考农户可以做什么。[③] 因而，要让扶贫具有可持续性和促进乡村振兴，就要根据小农户的个性化需要，有针对性地为小农户赋能补链，此乃根本之计。

四、结论和讨论

近年来，小农户的生存发展受到国家高层的高度关注，强调要采取多种措施实现它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小农户发展放到了突出位置，提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等。然而，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三种产业扶贫模式都无法惠及小农户，究其原因，关键是没有建立起常态化的市场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利益有机连接机制。

产业扶贫的背后是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这两种逻辑既有交叉也有叠加，呈现较为复杂的关系。由于国家缺少一个能够有效连接分散农户的组织体系，地方政府在运用项目制进行扶贫资源分配时无法使用一套标准化的甄别机制获得需求偏好、配给额度、瞄准目标、优先对象等信息，并且分散、零碎的项目申报、审批、验收、审计、监督等的交易成本极高。[④] 面对高惩罚弱激励的制度环境，负责扶贫的政

---

① 叶敬忠、贺聪志：《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2 期。

② 蒋永甫、龚丽华等：《产业扶贫：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贵州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

③ Ian Scoones, “Livelihoods Persp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36, no.1, 2009.

④ 王海娟：《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

府工作人员会将资源投入短平快的项目之中，缺乏长远和系统的规划，最终易导致项目不了了之。理论上早有定论，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具有天然局限性，在扶贫领域也不例外。政府转而采取间接治理的方式，将扶贫资金直接投放于龙头企业，试图让市场逻辑起主导作用，以实现扶贫资源的更高效配置。但这种模式仍无法摆脱政治逻辑的影子，参与扶贫的龙头企业实际上是被行政力量推上市场第一线的，资本的寻利本质会消解扶贫工作的初衷，企业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变通”地追逐利益，或利用信息不对称性而寻找套利捷径，导致扶贫目标的偏移。这两种模式事实上都将贫困户排除在市场之外而难以真正获得应有的收益和能力的提升。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三种混合的产业扶贫模式，政府在给予龙头企业或大户扶贫资源时，规定了相应的前置条件，目的是让贫困户直接受益并进而获得相应的市场能力，以期实现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叠加效应。然而，一来政府只是一厢情愿地依赖龙头企业自身的市场势能，无法对其施加实质性的影响；二来靠行政力量要求企业强制吸纳贫困户，在信息不对称和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贫困户最终只能沦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被动和浅层次的市场参与终究无法获得实质意义的市场竞争能力，也无法产生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从本质上看，此前的三种产业扶贫的模式体现的是政治逻辑对市场逻辑的整合，即政治逻辑主导了市场逻辑。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导之下所倡导的完全自由、自发的市场原则，中国政府对于市场整合的核心是一种行政工具化的表达。[①] 在产业扶贫的实践中，政府主导着典型产业项目的选择和打造，扶贫责任通过“行政发包”的方式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自上而下传递，出于对规模效应、效率和便利管理等的考虑，地方政府进一步以“打包”形式将扶贫项目转移给企业，试图通过建立“利益捆绑、责任连带”的机制带动贫困户。在实际运作中，这种连带机制通过强制性的行政干预推进，企业与农户之间没有建立共进退的协作机制和实现共赢，合作关系难以持续。政治逻辑对市场逻辑的主导会导致两者相互冲突，扶贫的效果取决于对资本的规制程度，而非合作收益。由于企业和贫困户基于市场关系的利益关联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二者之间是机械性的行政规制关系，企业和贫困户之间容易陷入一种零和博弈，政府的规制强度大，贫困户名义上获得的利益就多，但这会打击企业的积极性，导致贫困治理不可持续。反之，当政府的规制强度小，贫困户容易被边缘化，资本收益为少数群体所有。

因此，要从根本上突破产业扶贫的困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在政府、市场和贫困户之间建立新的连接机制和合作模式。温铁军曾指出，在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变迁中，政府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任务与分散农民有效对接，政府成功与否在于是否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②] 其核心是找到一个能让企业和农户两者之间的利益相容机制和激励机制，产生扶贫、脱贫和致富的内生动力而获得可持续性。广清农业众创空间为此提供了一个实践样本。对企业而言，通过众创空间这一平台，可以减少寻找市场交易对象的成本，集成化的客商入驻和产销全链条的配套服务也降低了中间成本，产生了规模效应和关联效应，摆脱了“拉郎配”式的尴尬处境而获得激励。对农户而言，由于直接参与市场之中获得了较多的收益而产生了内生动力，同时，借助于行政赋能和市场赋能提高了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具有融入市场的可持续性。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根本之道是平衡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产生叠加效应。政治逻辑的优势在于强大的动员功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整合多方面的资源，而降低市场交易费用。龙头企业的优势是对市场规律的把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抗风险能力。在具体的作用机制方面，可探讨更多诸如“政府＋农户”“政府＋公司＋农户”“公司＋农户”“农户＋农户”等模式，关键在于探索个中更为细节的逻辑作用机制，寻找有效的利益有机连接点和相容机制。

（感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副教授郑佳斯对本文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 冰

① 许汉泽：《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研究——以武陵山区茶乡精准扶贫实践为例》，中国农业大学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读书》2001 年第 3 期。

乡村可持续发展：四个民营企业的共享价值案例分析

房莉杰　刘　学

[摘　要]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大量非农产业的民营企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参与产业扶贫。企业经营行为和公益行为结合得越紧密，就越容易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和可持续性。一方面，企业利用自身经营优势，更有利于提高公益项目的效率；另一方面，经营行为与公益行为的结合可以降低企业的公益成本。尤其是，如果能用经营行为自发带动公益行为，就更能增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在通过市场实现福利目标的实践中，需要通过完善企业制度环境，切实引导企业找到其经营行为与公益行为的结合点，实现趋市场“社会融合”之利，避市场“社会排斥”之害。

[关键词]共享价值　发展型社会政策　精准扶贫　民营企业　市场可及性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56-07

我国的扶贫开发可以被视为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市场可及性的过程。前 20 年的扶贫主要采用政府主导、公益组织补位的方式，企业较少参与具体的运作。政府的优势在于拥有当地自然、社会、人口情况的第一手数据和资料，社会动员能力强。2001 年之后，随着产业扶贫的提出，从事农产品经营的民营企业开始参与扶贫；而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民营企业除了参与数量增加外，其行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非农业企业进入扶贫领域，这些企业的参与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被动的慈善救济、捐款捐物，而是将其日常经营行为与公益行为结合在一起，“商业向善”正在逐渐成为新的思潮，“左手买卖右手爱”的说法重新定义了市场与公益之间的关系。本文结合发展型社会政策和企业共享价值理论，以四个非农业民营企业在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中的新项目为例，尝试解读民营企业在新时期参与扶贫开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目前我国处于从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的战略转型之初，也希望本文的分析为理解乡村振兴中的市场和企业角色提供思考。

一、分析思路：发展型社会政策与企业共享价值

反贫困是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之一，但不同于传统的被动社会保障，更适合反贫困政策的理论范式是积极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其含义是通过对政策对象赋权增能，提高他们对市场的参与，从而达到提高福利的目的。这一范式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反贫困领域尤其具有解释力。①

在传统视阈下，社会政策曾被一度认为是国家责任，而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家看来，市场和企业也在社会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展型社会政策认为国家的角色不仅在于进行收入再分配，还在于有

作者简介　房莉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研究员（北京，100872）；刘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① [美] 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苗正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年，第 58 页。

目的地主导发展过程，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结合，使社会组织与企业都被包括在促进发展目标实现的过程中；[①] 而企业的角色在于增加贫困者对市场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机会，增加其“市场可及性”，通过参与市场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和福祉。[②]

但是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于市场的乐观理解也在反贫困领域受到诸多批评。就中国而言，有学者认为，企业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两种逻辑，第一种是产业本身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第二种就是必须要帮助贫困户脱贫的社会道德逻辑。现实中，在市场化逻辑指导下通过优势企业发展产业虽然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但并不一定能够使所有贫困户受惠；而完全倾向于照顾和吸纳贫困户的政策往往不利于产业本身的发展。[③] 也就是说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张力仍不可避免。如果说在宏观层面，市场与社会融合的主要视角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融合，那么企业作为最主要的市场参与主体，在微观层面市场与社会融合的表现就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的融合，即“共享价值”。有学者认为企业可以找到社会责任与其经营业务之间的交汇点，通过它来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互相促进，即“共享价值”。[④]

企业的共享价值由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而来。联合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初定义是，“企业不仅与客户、提供商以及雇员有关，而且也同其他团体及其运营其中的社会的需求、价值观和目标紧密相连”。[⑤] 也正是通过这一定义，联合国将企业的角色纳入发展规划中。然而传统主流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偏被动的，从企业社会责任到企业共享价值，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演变的过程。肖红军曾系统梳理过这一发展演变过程，认为作为“CSR3.5”的企业共享价值，其进步性在于“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以破解商业发展面临的社会悖论为着眼点，力求寻找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更优解决方案，以实现商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⑥] 从最初的企业自愿捐赠类的 CSR1.0 到企业共享价值的 CSR3.5，企业越来越强调寻找适应其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的“共同利益”。但企业共享价值的质疑者认为，它仍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将利润最大化默认为企业的核心目标。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目标仍是分立甚至是二元对立的；前者处于企业经营的核心位置，后者只是配合前者，仍处于从属的边缘位置。[⑦]

综上所述，宏观层面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微观层面企业的共享价值强调的是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从宏观到微观，两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而根据传统的主流观点，这两者也都遭到质疑，其根源在于市场自带的社会排斥的“原罪”。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一致性程度。尤其是具体到扶贫开发而言，市场起到的作用究竟是自发地将弱势人群“排斥”出去，还是有引导地将贫困人口“包容”进来？企业的角色是什么？利用提高市场可及性来实现脱贫目标，这是否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伪命题？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实证研究来回答。

本文选择了精准扶贫中的四个民营企业项目作为案例，分析其实践共享价值的逻辑以及发展型社会政策范式的适用性。之所以选择京东电商扶贫、腾讯为村、恒大产业链扶贫及碧桂园绿色产业扶贫这四个案例，一是因为它们分属于互联网产业和房地产业，前者是新兴、非农行业，后者是传统行业，这两者都是介入精准扶贫较多的行业，因此案例在行业上有较强代表性；二是因为它们的扶贫行为并非传

---

① Anthony Hall and James Midgley, *Soci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 CA: SAGE Publication, 2004, pp.125-138.

② David Stoesz, *Poverty of Imagination: Bootstraps of Capitalism*, *Sequel to Welfare Reform*,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0, p.246.

③ 许汉泽、李小云：《资源逆转、政策风险与反哺型治理——基于 Y 乡精准扶贫实践的田野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 年第 4 期。

④ Michael E. Porter and Mark R. Kramer, “Creating Shared Valu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1, pp.1-42.

⑤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of Guidelines on the Rol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ivate Sector: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0, p.33.

⑥ 肖红军：《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的反思与超越》，《管理世界》2020 年第 5 期。

⑦ Josef Wieland（eds）, *Creating Shared Value: Concepts, Experience, Criticism*,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p.12.

统的扶贫开发，而是“瞄准”了原有的扶贫开发的薄弱环节，因此案例在创新内容上也具有代表性；三是四个企业案例都是在精准扶贫战略启动之后开始，因此在时段上也能体现精准扶贫时期的企业创新行为。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四个民营企业 2018 年和 2019 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及笔者在 2018 年下半年对四个企业的田野调查。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是：从社会效益角度看，这些企业扶贫项目的效率如何？即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市场可及性，从而实现就业和收入增长？从经济效益看，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一致性与张力如何？其效果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持续性？即图 1 中的右半部分。

图 1　从发展型社会政策到企业共享价值的分析框架

二、项目案例：民营企业如何参与扶贫开发，推动乡村振兴

（一）京东电商（产业）扶贫：物流和消费市场的支持。很多乡村自然环境条件优异，具有发展特色农产品或产业的潜力。但由于物流、交通、市场条件限制，产品的销售市场局限于本地。这些地方的企业如果通过电子商务的模式进行销售，有可能扩大产品的市场。贫困县在网站搭建、物流运输等方面存在障碍。京东的优势恰是其作为生产链的中间环节，一端连接贫困地区的龙头企业，另一端连接电商平台背后广阔的消费市场。这一链条的通畅与牢固紧紧依靠京东电商平台的影响力：在消费端，京东集团 2017 年的交易总额（GMV）累计近 1.3 万亿元人民币，巨大的流量入口，可成倍扩大贫困地企业潜在用户市场；在生产端，截至本文 2018 年调查的时候，京东已跟贫困地区的上千家龙头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京东为使贫困地区当地特色优质产品能销往外地，一方面建立“扶贫特产馆”，通过京东平台向全国市场介绍和销售；另一方面，京东自营直接从贫困地区采购农副产品，在京东平台销售，由于京东自营销量远大于其入驻商户个体，因此它是毫无疑问的“大客户”。此外，物流与仓储也是京东的一大优势，可以较快将贫困地区的产品销往各地，从而缓解贫困地区的交通不便问题。另外，京东的冷链物流技术可以解决农产品保存问题，京东已经在全国 10 个城市建设了 20 个先进的多温层冷库，配送服务覆盖全国超过 300 个城市，为农产品“上行”提供基础设施保障。正在研发和建设的的无人机物流体系可延伸到交通困难地区。

（二）腾讯“为村”项目：云上村庄治理。绝大部分贫困村的特点是，地处偏远、人才流失、信息闭塞，农村“空心化”严重。腾讯“为村”项目的负责人将其归结为“失连”——财富失连、信息失连、情感失连。而“为村”的“连接一切”就是通过连接人与设备，实现连接人与服务，最终连接起人与人。借助微信，腾讯开发出适合乡村管理者和村民低门槛入门互联网的村庄微信公众号——“为村”，并将之打造成面向乡村的互联网社交与党政为民服务平台，重点关注中西部贫困地区乡村的移动互联网应用需求，用互联网 + 的方式为乡村的社会治理助力。截至 2018 年 9 月，全国已有 24 个省市自治区的 6787 个村庄加入“为村”平台，其中山东菏泽市、四川成都邛崃市、四川德阳广汉市等地区实现全域“为村”。超过 223 万村民、2.5 万党员实名认证加入本村公众号，村民互动超过 2.5 亿次。

“为村”目前探索的主要功能包括三个方面，其中又以村庄社会治理为重点。第一，通过指导村庄开通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指引村民实名加入自己村庄的微信公众号，督促激励村民交流工作生活、关心村庄事务，为外出打工与村庄留守村民提供情感连接纽带。实现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和村民的组织化。第二，围绕“党务、政务、村务、商务、服务”的基层乡村治理刚需，用互联网搭建信息连接桥梁：通过指引两委、基层党员及乡镇、区县各级干部实名为村民提供政策宣传和服务，提升村两委及党员、政府干部服务群众的效率，展现其在基层党建、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果，密切干群关系，创建乡村和

谐社会。第三，通过扶贫干部记录扶贫脱贫轨迹、干群协作挖掘村庄一村一品，以社交电商的方式整合本地力量，推广本地产品，破解信息鸿沟难题。

与传统的企业公益项目不同，“为村”既是一个提供社会服务的公益项目，也是一个收费项目。这是因为以往企业扶贫往往导致等、靠、要的行为。为了激发当地政府、精英、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为村”项目开启了收费模式。政府出资，需要配套经费和人力，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政绩工程，也避免项目流于形式。收取的费用除了进入“加油为村基金”，做乡村互联网的培养之外，也解决了“为村”团队的日常运营费用。目前“为村”项目可自负盈亏，不需要腾讯额外的公益资金，独立运行，提高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三）恒大产业链扶贫：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恒大集团的产业链扶贫最初集中在贵州省毕节市的大方县。毕节市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资源匮乏、土地贫瘠。尽管之前的扶贫开发使得其基础设施有很大改观，但是受先天条件不足的影响，难以发展产业。针对这种情况，恒大在大方县的扶贫首先从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引进上下游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贫困户 + 基地”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供、产、销”一体化经营，使该地区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本文 2018 年调查的时候，恒大已帮助大方县搭建成功两个产业链，包括蔬菜瓜果基地和肉牛养殖基地。

在蔬菜瓜果基地方面，受限于贵州喀斯特地貌导致的结构性缺水等因素，恒大首先从以色列引进滴灌技术、无土栽培技术等，解决了缺水缺土的基础性问题；恒大建立起杂交育种中心、蔬菜种植研究基地以及多个蔬菜大棚；然后吸引农业企业入驻、经营这些中心和基地。截至 2018 年，恒大已经在毕节建立起 22 个蔬菜育苗中心、1 万余栋蔬菜大棚、10.6 万亩蔬菜大田基地、10 万亩中药材和经果林地。引进了 19 家中药材、经果林上下游龙头企业，建立种子供应、技能培训、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的一条龙产业化体系。

在肉牛养殖基地方面，养殖业附加值高，产业带动效果好。但当地土牛品种差、养殖规模小，利润低，提升产业规模面临资金、口粮、牛种、销售多方面困难。且养殖业的风险比较高，远超过贫困户可以承受的程度。面对这些问题，恒大引进了西门塔尔牛和安哥拉牛两个优良品种，并且在大方建立起肉牛养殖的产业链。首先是引进上游企业建立口粮支持体系，支持村民“粮改饲”，并向他们收购肉牛口粮；同时，建立基因控制中心，引进科技企业进行适合当地环境的优良牛种的人工配种；接下来通过贷款和保险等金融帮扶措施支持贫困户购牛；再接下来引进肉牛养殖企业集中饲养牛，降低养牛的成本和风险，将收益按一定比例分给购牛的贫困户；最后引进下游企业，进行统一的屠宰、加工、生产、销售，从而建立了完整的肉牛养殖产业链。2018 年在大方县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335 个肉牛养殖基地、6 个扶贫牛超市、1 个基因控制中心、1 个疫病防控中心。

（四）碧桂园产业扶贫：“一村一品”和“一县一业”。针对贫困地区缺乏产业的问题，2010 年，碧桂园捐资 2 亿元驻村帮扶广东清远英德树山村，因地制宜发展绿色苗木产业，带动村民脱贫致富。2018 年起，碧桂园的产业扶贫扩展到甘肃东乡县、江西兴国县、河北平山县等 8 省 13 县。碧桂园要求进行因地制宜的产业扶贫，9 省 14 县不同区域的扶贫模式和对接扶贫机制都有差异。探索出绿色苗木扶贫、现代农业扶贫、消费扶贫、绿色建筑产业扶贫等特色模式，发掘乡村的特色产品，培养地区的特色产业，争取做到“一村一品” 和“一县一业 ”。具体来说，根据地方特色，共有 5 种方式。

一是以扶项目、采订购、建车间的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发展。例如在江西兴国县扶持竹鼠项目，在北胜村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扶持 31 户贫困户开展竹鼠养殖。在陕西耀州，集团下属文化公司与当地专业合作社签订手工艺品采购协议，带动深度贫困地区手工艺产业发展。在甘肃东乡县成立食品加工扶贫车间，吸纳 120 名员工就业。二是建立利益捆绑与共享机制。与村集体、农户民主协商，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建立长期稳定合作。比如在多个县推广苗木种植产业，按照“借本你种，卖了还本，赚了归你，再借再还，勤劳致富”的资金运转模式，采用“公司 + 合作社 + 贫困户”的合作模式，发展集

约化、规模化的苗木农场或发动农民以分散式、房前屋后等不同形式种植苗木，有效辐射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目前已在 11 个县实施，种植面积 1600 余亩。三是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机制。利用集团全国分布的区位优势、多业态经营优势，推动各市场主体与贫困村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将需求转换为订单。同时，对缺乏品牌的优质农产品通过集团自有品牌“碧乡”进行推广，提升产品附加值。四是落地集团自身产业项目。发挥集团庞大的产业优势，结合集团发展战略，优先在贫困县落地自身产业项目。除传统苗木产业外，2020 年 8 月，碧桂园首个绿色建筑产业基地落地江西兴国县，引入上下游企业，打造绿建产业高地；下属现代农业公司在乡村地区规划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引导和扶持乡村创办合作社，已在广东英德、江西兴国、陕西耀州和蓝田落地了无土蔬菜栽培、富硒水稻、贝贝南瓜等项目。五是培养一批返乡扎根创业带头人。在结对帮扶县选择“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返乡扎根创业带头人，由集团提供“设基金、建工厂、造品牌、送技术、拓市场、设平台”等全方位的服务，提高创富带贫能力。

三、案例分析：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的理解

（一）社会效益：对“市场可及性”的促进。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在“万企帮万村”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非农企业参与扶贫，而本文选择的四个案例都是根据自身的经营优势，分别“精准”着力于产业扶贫的不同环节。

首先是腾讯“为村”项目的“云治理”着力于村庄的组织化和共同体建设，对应的是产业扶贫缺乏社会基础的问题。村庄脱贫的途径多种多样，但致贫的核心机制有共性，其中之一就是村庄共同体的碎片化，以及村庄被快速发展的主流社会边缘化。腾讯的主营业务是社交媒体，而社交媒体的作用就是联系。因此依托于微信这个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从促进社区团结、调动村民积极性入手，主要解决的是村民的社区参与问题。通过“云治理”打破空间限制，实现村庄居民之间、村庄内部与外部之间以及村庄和政府之间的联系。通过“联系”，对贫困村庄的村民赋权增能。

其次是恒大的产业链扶贫着力于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应的是极端贫困地区缺乏产业基础的问题。从恒大在大方县打造的两个产业链的介绍来看，恒大主要做的是产业扶贫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一是从无到有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基础设施；二是动用企业资源引进龙头企业，解决经营主体问题；三是对贫困户开展培训和动员，解决生产主体问题。恒大的扶贫模式对于“资金雄厚的企业帮扶产业极端薄弱地区”有一定代表性和借鉴意义。因为就产业扶贫而言，产业基础是必要条件，但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普遍没有优势，而一般企业也不具备大规模投资产业基础设施的能力，这往往成为这类极端贫困地区的脱贫瓶颈。只有如恒大这样的资金雄厚、市场关系丰富的企业，才有能力和优势搭建全产业链，为这些极端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打好基础。

再次是碧桂园的产业扶贫着力于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扶持，对应的是单纯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无法解决产业的上下游问题。尽管碧桂园集团的主业是房地产开发，但是它同时也是一家综合性企业，业务涵盖建筑、绿化、智能制造、绿色农业、物业公司、零售超市等。碧桂园在集团内部已经打造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因此，碧桂园是在已经具备产业基础的贫困地区，将其产业纳入碧桂园自有的产业链中，通过其子公司解决该产业的上下游问题。通过扶贫产业跟其已有产业链的无缝衔接，碧桂园就不需要依赖大量额外的扶贫资金，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最后是京东的电商扶贫着力于产品运输与销售，对应的是产业扶贫无法解决的交通和销售问题。京东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电商平台，在扶贫方面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物流仓储和消费市场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流量优势，京东作为国内主要的电商平台，大大扩展了产业扶贫的消费市场；二是物流仓储优势，京东自有的物流仓储系统解决了贫困地区交通不便的问题，打通了从生产到销售的“最后一公里”；三是营销优势，京东具备先进的营销手段，其中，大数据营销是京东的核心优势之一，京东依据自有的大数据平台和个性推荐算法，以用户画像为基础，对有兴趣的消费者进行精准营销，提高了扶

贫产品的转化率和重复购买率；四是市场预测优势，建立在销售额的大数据基础上，京东可以对商品需求作出预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贫困地区的生产风险。

综上，本文的案例呈现出的是在精准扶贫时期，除了“六个精准”之外，民营企业发挥作用的“精准”。企业正是将自身经营优势“精准”着力于产业扶贫的某个环节，从而提高了各自领域中，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市场可及性。四个企业都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相比较传统被动的公益慈善、以及单一农产品加工企业扶贫而言，进步性尤其明显。

（二）经济效益：经济上的可持续性。从经济效益的角度，主要看它跟社会效益的融合程度，尤其是社会效益的实现是否要以经济效益为代价，以及需付出多少代价。综合理解上述微观层面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的二元对立统一，本文认为：一方面，市场与社会的融合是一个进步趋势，越来越多的社会公益目标正在通过市场实现；另一方面，二者的对立仍没有根除，可以预见在某些情况下仍然会表现为冲突，而且由于市场的强势地位，在冲突中更有可能是社会发展屈从于经济发展、企业的社会公益目标屈从于其经济效益目标。因此，具体到某一个实践共享价值的企业，或某一个企业的共享价值项目，并不是处于二者或对立或统一的某一个极端，而是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某一个点；而且企业处在对这两方面的动态调整中，因此其位置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理解企业的共享价值逻辑，就是寻找它在谱系中的位置。见图 2。

图 2　企业项目在共享价值谱系中的位置

在图 2 中，一端是社会效益，一端是经济效益，越接近中间的平衡轴线，说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平衡得越好；越接近左右的任何一端，说明其平衡程度越差，需付出另外一端的更多成本。这样可将常规企业经营、传统企业公益、传统产业扶贫及本文的四个企业案例项目进行对比。平衡效果最好的是位于中轴线上的项目，即腾讯“为村”项目。“为村”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应对社会问题，它又采取收费的方式市场化运作该项目，因此在项目中平衡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它更像是在腾讯集团内部生长出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企业，因此更符合社会企业而非一般商业企业的特征。

再看位于平衡线右端、接近经济效益的企业和案例项目。这些项目的共同点都是由市场规则主导，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其中最典型的是常规的企业经营活动。传统的产业扶贫和碧桂园产业扶贫也落于这一区间，只是在程度上，相比常规的企业经营活动，这两者更接近中间的轴线，尤其碧桂园的产业扶贫。碧桂园将“一县一品”的产品融入其既有的集团产业链中，通过扶持贫困地区的产业，既达到了扶贫的目标，企业又从产业发展中获得了经济利益；而且由于集团内部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其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都更低，因此也就有可能让渡更多空间给社会公益。尽管碧桂园的产业扶贫仍以市场规则为主导，但是其内部产业链的模式使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相对容易调和。

最后看位于平衡线左端、接近社会效益的企业项目，这类项目的共同点是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而相对淡化经济效益，或者说以一定的经济效益为代价追求社会效益。其中最典型的是传统企业公益项目。本文的恒大产业链扶贫和京东电商扶贫也位于这一区间。恒大产业链扶贫在项目逻辑上与传统企业公益项目无异。而京东电商扶贫更接近中间的轴线，这是因为尽管京东电商扶贫是将扶贫行为纳入企业常规经营工作中，表面看来并没有资金投入，甚至也会获得一定的营业收入，但却是以牺牲流量为代价，因此从企业成本收益核算上讲，扶贫馆的商品比一般商品销售的利润率低，因此可认为其经济效益也是相对为负。在这类项目中，由于需要付出经济效益的代价，因此其持续性往往面临问题。比如传统的企业公益项目往往是一次或几次投入，而非长期持续投入；恒大产业链扶贫的目标是为毕节建立产业基础设施，扶植其产业链。尽管对被扶助的贫困地区而言，该项目给其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项目本身是一次性投入，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做完，也就意味着这个项目的结束，而转化成其他企业参与的

一般性产业扶贫项目，因此该项目本身并未以持续性为目标。京东电商扶贫尽管最初是持续性设计，于2017年7月1日在首页上线试运营京东扶贫频道，成为第一家响应国家号召，在首页设立扶贫频道的电商企业，但是在我们2018年底调研的时候，这个扶贫频道就已经在首页消失了，现在只有通过搜索“扶贫馆”才能检索到贫困地区的产品，而无明显的扶贫馆通道。尽管如此，京东对贫困地区的“直采”扶贫方式依然存在，电商扶贫仍在发挥作用。这是因为“直采”不需要企业以牺牲流量为代价实现社会效益，因此是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

综上，本文的四个案例项目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共享价值的追求，同时在此过程中也面临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二元对立。但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既不是单纯的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也不是互相促进的正反馈关系：一方面，如果单纯强调经济效益，那么企业利润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参与扶贫要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那会导致该行为的不可持续。因此，理想的平衡状态是，在允许和支持企业盈利的前提下，引导其将公益行为融入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以企业的经济活动带动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

四、总结与进一步讨论：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乡村的繁荣首先是市场的繁荣；然而乡村振兴的目标却是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乡村居民平等享受乡村发展的成功。因此基于本文的分析，企业“精准”助力于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在于将其经济与社会效益充分融合，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从政策的角度引导企业实践共享价值至关重要。

本文的案例分析说明，从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公益行为来看，两者结合得越紧密，就越容易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一方面，从社会效益来看，企业利用自身经营优势，更有利于提高公益项目的效率；另一方面，从经济效益来看，经营行为与公益行为的结合可以降低企业的公益成本，尤其是如果能将公益行为融入经营行为、用经营行为自发带动公益行为，那么就更容易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出发，也正是通过经营行为与公益行为的融合，民营企业反而通过市场自发发挥了“社会融合”的功能。上述分析只是逻辑上的理想状态。正如前文所言，大量非农产业的民营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背景是“精准扶贫”战略被提高到了治国理政的政治高度。在本文的四个案例中，高政治优先性是这几个扶贫项目的政策背景；四个企业各自着力于产业扶贫中的其擅长领域的模式，蕴含着可持续的客观逻辑。但企业一直是处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动态平衡中的，而且企业的自然选择以市场规则为主导。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企业会自然倒向经济效益一端，这时的“社会融合”很可能会转变为“社会排斥”。除了企业自发的公益行为，还需要政策随时予以引导和支持。

既然企业共享价值行为都是一个个位于连续谱系中的点，那么未来的干预重点则不是打破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创造友好而稳定的制度环境，使得企业可以将公益行为融入其日常经营活动中，从而调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本文仍是在“市场—社会”的二元维度框架下分析了四个企业案例项目，但更加深入的研究需突破这一维度，扩展到“政府—市场—社会”的框架下分析政策和政府行为对企业共享价值的影响，尤其是如何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业提高公益项目的社会效益以及使企业更持续地保持在靠近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点上。本文认为，企业在市场中的角色可以是“包容”的，可通过企业“趋市场之利、避市场之害”，也可通过企业和市场践行发展型社会政策。这些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政策的设计和引导，这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责任编辑：王 冰

乡镇政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策略与逻辑

——基于对泉州市 H 乡运作过程的观察*

侯志阳

[摘　要]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既有研究普遍从经济学思维出发，探讨产业振兴的经济规律与实现途径。乡镇政府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型包括资产清单制作、资产动员、资产关系管理、资产冲突管理、外部资源链接与拓展和绩效评估六个步骤。与需要为本相比较，资产为本从乡村社区优势切入，注重村民参与，与村民建立学习伙伴关系。探讨乡镇政府实施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方法，有助于拓展产业振兴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资产为本　产业振兴　乡镇政府　社会投资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63-05

一、资产为本的乡村产业振兴研究与问题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前提。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沿袭经济学式的思维，停留于农业供给侧改革、产业组织管理、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体系整合等议题。[①] 但忽视了乡村产业振兴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社区组织、地方文化、村民参与等社会因素以及乡镇政府治理理念、方式等公共管理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乡村产业振兴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资产为本社区发展（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下文简称“ABCD”）的重要内容。本文调研表明，某些乡镇正在践行 ABCD，探索如何立足于本地的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以村民为主体，调动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共同推进产业振兴。[②] 这种资产为本的乡村产业振兴的绩效怎样？具体策略有哪些？如何形成？本文基于泉州市 H 乡的运作实践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

经济要素配置理论认为，粮食安全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和底线。因此，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耕地质量，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③] 为了优化各类经济要素的配置，必须坚持低成本、高效益的原则，兼顾效率与公平。对于较高质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要在政府引导、支持和市场机制作用下运行；对于土地这种生产要素，要采用自主治理结构。当高质量的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乡村产业后，要采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形式来有效组合和配置这些生产要素，以提高乡村产业经营效益、促进乡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社区资产建设研究”（18BSH0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侯志阳，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福建 泉州，362021）。

① 张晓山：《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② 社区可分为学术意义上的社区和行政意义上的社区。前者指在一定地域内、有共同文化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后者指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单元，像中国行政管理体系中的街道（镇）、社区。本文的社区指学术意义上的乡村社区。

③ 于建嵘：《乡村产业振兴要因地制宜》，《人民论坛》2018 年第 17 期。

村产业振兴。[①] 有研究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的挖掘与投入，要注重其内生性。强调内生为主、外援为辅已形成一种共识。[②] 但对于这些要素在乡村内部如何被识别、挖掘，如何有效管理等问题，经济要素配置理论并没有给予很好的解答。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能够为探索这些问题给予有益的启示。ABCD 作为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方法，其主要观点是，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时，先要聚焦于社区的优势（有什么），而不是将注意力放于社区的缺点与不足，然后以社区的“组织”和“关系”等社会资本作为驱动力，激活社区内在的动力，调动居民参与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③]ABCD 的关键要素是“优势”“关系”“内在”。其资产概念与经济学中的资产不同，它一方面指社区各种有形资产（自然资源、组织机构）和无形资产（社区成员的知识、技能、社会关系网络、社区文化等）；另一方面指社区的优势和能力。ABCD 对传统以需要为本的社区发展（Need-Based Approach，简称 NBA）理论与方法提出了挑战。有别于经济要素配置，资产为本的乡村产业振兴是一种社会投资。这种投资注重培育乡村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关系）、人力资本（参与）。但现有成果在运用 ABCD 理论时主要局限于行政村，忽视了对乡镇政府运用 ABCD 促进乡村振兴的研究。此外，西方语境中的“资产”与中国乡村的“资产”也略有不同，如西方国家不存在类似土地、林地等农村集体资产。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乡村的社会事实，研究中国乡镇政府运用 ABCD 推进产业振兴的策略与逻辑。

二、泉州市 H 乡的运作实践

H 乡位于泉州市区的最北端和最高处，距离市区 55 公里。其自然条件优越，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本文以 H 乡为案例的缘由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完整性。H 乡人口外流严重，全乡 1.3 万人口，呆在乡里仅约 4000 人，占比 30%。留守人口多数是老人、儿童和妇女。H 乡没有企业，多数村民靠种地瓜、种菜谋生。2014 年以前，H 乡代表落后、贫困，男性村民找对象都难。但 2014 年以来，H 乡逐步走向振兴，以全域旅游为主线，充分发掘各样资产，以旅游产业带动乡村振兴，取得了成绩，获得全国生态镇的称号，成为泉州市生态旅游的名片。这种前后发展变化有利于观察乡镇政府动员村民参与、实施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策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全景。二是典型性。H 乡建立了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显著特征的乡村治理体制，乡镇政府是整个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策略的规划者、实施者、引导者、参与者，这是与国内外其他村庄（社区）运用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策略的根本不同之处。

（一）资产清单制作

按照 Kretzmann & McKnight 关于资产的界定与分类方法，H 乡首先运用实地观察、访谈、文献查阅等方法搜寻辖区内资产，做出社区资产清单。第一，实地观察法主要用于识别环境与物质资产。党委书记 ZJS 履新 H 乡后，就认真研究 H 乡地图，并多次带领乡村干部、村民代表实地考察 H 乡的土地、山、水、林、田、谷等自然生态资源。他们先按资源的优劣势，分出优先重点开发、稍后开发、潜在开发三个等级。再根据资产所属的村庄归类，判断动员这些资产的可行性。第二，访谈法主要用于识别个人资产与组织资产。H 乡多次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召开座谈会，列出各村的人力资本存量、组织建设情况、地方文化。例如，村民个人资产方面，H 乡发现可从普通村民和乡贤两类人身上寻找资产。普通村民很多是留守老人和妇女，这些人手工本领和动手能力较强，而且在农闲时有时间，可利用他们的技能与时间发展鞋业加工。还有些老人懂乐器表演，可做成文化项目融入油菜花文化节中。乡贤 PLQ 在外经商多年，从事户外运动休闲项目，有较丰富的市场经验，有强烈的返乡创业意愿，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可动员他开发石龙谷。第三，文献查阅法主要用于识别文化资产。H 乡有上千年的彭祖养生文化

---

① 郭珍、郭继台：《乡村产业振兴的生产要素配置与治理结构选择》，《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② 黄启发、庄晋财等：《基于农民创业者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内生机制研究——温州市永嘉县桥下镇龙头村的案例》，《农业经济问题》2017 年第 3 期。

③ John Kretzmann and John McKnight,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Chicago, IL: ACTA Publications, 1993, p.26.

和古建筑、书院，这些都可融入旅游产业，让游客体验地方文化。H 乡将各种资产的存量、类型、属性标注在地图上，并按颜色分清开发的先后次序；制作社区资产的实时走势图，以折线图形式形象描述相关资产的联系程度和关系变化情况。

（二）资产动员

社区资产动员指盘活现有资产开展社区文化服务。H 乡主要盘活了油菜花资源，举办油菜花文化节。考虑到土壤、气候、植被等独特条件适合种植油菜花，H 乡鼓励村民种植油菜花。每年 3 月，200 多亩的油菜花田喜迎各方宾客。2014 年举办首届油菜花文化节时，村民、上级政府都不怎么看好，约 1 万经费全部源自 H 乡政府自筹。乡政府动员村民做当地特色小吃卖给游客，村民觉得来的人很少，基本不配合。但当天游客就达 2 万人，于是村民看到了希望。2015 年举办第二届油菜花文化节时，很多村民就按乡政府的建议，制作特色小吃。绝大多数村民配合乡政府工作。自 2017 年起，区委、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参与，并作为主办单位，投入适当经费支持，相关领导出席油菜花文化节开幕式。这提升了 H 乡继续办好油菜花文化节的信心。2014—2019 年，油菜花文化节的服务内容逐年增多，类型多样，使得游客数量逐年增加。

（三）资产关系管理

资产关系管理包括互动、合作、反馈和危机介入四个机制。互动机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让新旧资产保持可持续互动。前文交待油菜化文化节让 H 乡有一定知名度，许多人开始了解、熟悉、参访 H 乡，H 乡的人气也逐渐增旺。但仅凭借油菜化文化节，要实现旅游产业振兴是不可能的。就像 H 乡党委 Z 书记说的，“油菜化文化节只是全域旅游的一个引子，让大家知道 H 乡，后续还需要争取许多项目落地。于是，我们 2016 年就开发石龙谷。”[①] Z 书记说的石龙谷，本是一个荒废多年的山谷，占地 3000 多亩。谷下原有不少农田，村民步行到农田需要 5—6 公里的路程。由于耕种成本太高，许多村民逐步放弃农田，抛荒现象严重。新一届 H 乡领导班子在带领村民制作资产地图时发现，石龙谷有丰富的生态植被、形态各异的山石、秀美曲折的溪涧、跌宕多变的瀑布等景观，要是被开发起来，将是 H 乡产业振兴的亮点工程，还可弥补油菜化文化节的时间限制缺陷。于是，经村民推荐和一段时间的观察，H 乡就动员返乡乡贤 PLQ 牵头开发石龙谷。

合作机制关注的焦点是协调相关主体的利益均衡。开发石龙谷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村民、村集体、开发商、H 乡政府、区级政府。对于村民、村集体来讲，主要是保障其土地权益和旅游产业的附加效益。调查发现，村民可获得每亩 3.5 万元的土地补偿金，也可以入股参与投资。村集体给开发商 3 年的项目建设期，3 年过后开发商每年给村集体 3 万元的土地补偿金，逐年增长，10 万元封顶。开发商还要付给村集体土地租金，每年每亩 100 元，租期 30 年。这样保证村集体有固定经济来源。开发商的获利源于门票。乡政府为开发商营造优质营商环境。H 乡政府也获得了产业振兴的一个标志性项目。对于区级政府来讲，开发石龙谷是扶持 H 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抓手，可提升其治理绩效。

反馈机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建立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反馈渠道。石龙谷开发过程中涉及村民、村小组、村集体利益的协调沟通，H 乡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让村民自己讨论、决定。石龙谷用地涉及 S 村 8 个村民小组。S 村两委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村两委扩大会议，并入户与村民商量土地征用模式、分红办法。H 乡在开发商与区政府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 H 乡政府的申请下，区政府将开发石龙谷纳入区重点建设项目，给予政策、资金、工作指导各方面支持。

危机介入机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有效识别、预防、应对资产建设管理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在油菜花项目的基础上，增加石龙谷项目存在不少风险。一是政策问题。二是安全问题。三是资金问题。H 乡党委 Z 书记说，在应对政策风险方面，他们必须向上级党委政府汇报，至少获得上级的口头同意后才能

① 2018 年 7 月 12 日访谈记录。

做。在安全方面，只能努力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在资金方面，重点要向村民、村集体讲清楚投资的潜在风险，以免项目真的失败了，相互埋怨，推卸责任。①

（四）资产冲突管理

社区资产的冲突管理指，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当资产的维护管理出现中断或失败时，社区应积极寻找其中缘由并做好防范工作。这主要体现在组织资产的冲突管理上。H 乡在推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过程中，为了给游客创造干净整洁的环境，积极培育环保志愿者协会。会员以成年人为主，主要由留守老人、妇女构成。承担任务包含环保知识宣传、垃圾分类、路面清洁、村民房前屋后卫生检查。起初，很多村民都积极报名，但活动开展半个月左右后，不少志愿者就退出了。为了让更多村民参与志愿者队伍，H 乡发起“小手拉大手”倡议。具体由 H 乡小学组织小学生做环保志愿者，小学生回家后再带动其家长做环保志愿者，效果较好。

（五）社区外部关系资源的链接与拓展

第一，拓展与上级政府的资源链接网络。H 乡所属的 L 区下辖 2 个街道、3 个镇、1 个乡。不管哪个层级政府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影响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持力度因素，除了国家政策、政治体制、领导偏好等外部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下级政府及其群众的表现。H 乡基于自身自然资源优势，以旅游产业振兴为突破口，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思路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区党委政府才给予 H 乡各种支持。一是区委书记、区长、区委常委多次到 H 乡调研，解决难题。二是相关职能部门资源下沉到 H 乡。三是选派干部到 H 乡挂职，给予人才支持。第二，与外部企业共建。受限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引进等因素，2013 年以前，H 乡招商引资的阻力很大，辖区内基本没有企业。自 2014 年发展全域旅游以来，H 乡美丽的油菜花、喜庆的文化节、令人流连忘返的石龙谷等项目逐渐有了知名度。此时，H 乡的招商引资工作就顺畅许多了。近年来，H 乡积极主动出击，为内部企业与外部企业共建搭台。第三，与高校合作共建。H 乡积极吸引高校相关院系在其辖区内建立教学研究基地。一是邀请 ZJ 大学帮忙规划设计全域旅游的总体框架。二是邀请 YE 大学学生在油菜花文化节期间友情赞助，表演文娱节目。三是邀请 HQ 大学学生到 H 乡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写出调研报告或制作视频宣传 H 乡。

（六）产业振兴：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绩效

H 乡运用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策略，充分挖掘各样资产，发挥优势，注重村民参与，积极拓展外部关系网络，发展全域旅游，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许多外出打工经商的村民看到家乡喜人的变化，积极返乡创业就业。H 乡也主动联系乡贤，宣讲返乡创业的好处和政府的服务、优惠政策等。经过多年培育鼓励，截至 2020 年 12 月，H 乡已有 10 余家规模不小的编织鞋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填补了 H 乡的工业空白，也促进了脱贫攻坚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衔接。

H 乡产业振兴已开始进入良性循环。自从有了以油菜花、石龙谷为载体的旅游产业和制鞋工业的带动，H 乡的其他产业项目也就更容易落地生根了。H 乡在吸收油菜花、石龙谷项目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以红心地瓜为抓手，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综上所述，H 乡运用 ABCD 推进产业振兴的实践过程可概括为图 1。这个过程蕴含着三种社会投资策略。一是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增进。在制作资产清单过程中，乡村干部和村民都要学会使用多种社会调查方法，这个过程既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一些人力资本存量（本就拥有的知识、技能），也让他们学会识别、挖掘别人身上的优点，打开发展思路。而后续的资产动员、关系管理、冲突管理更是提升了 H 乡干群组织协调、沟通合作、危机处理等能力。二是社会资本的培育与

图 1　资产为本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

① 2018 年 7 月 13 日访谈记录。

增进。在内部社会资本方面，盘活现有资产增加了村民收入，也提升了村民对乡政府的信任。资产关系管理促进了村民、村民小组、村集体的沟通协调，加强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合作。资产冲突管理促进了H乡新的组织网络（如小学生环保组织）形成。在外部社会资本方面，通过资产的推介、资源链接，H乡与政府、企业、高校的合作关系网络得到了扩展。三是心理资本的累积。有效盘活现有资产（油菜花文化节的成功举办）扩大了H乡的知名度、增加了村民收入，这提升了H乡干群的自信心。

三、对需要为本与资产为本的进一步比较

（一）主人翁还是旁观者——社区发展的主体差异

在应用ABCD的社区里，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强，自觉承担社区建设的责任。社区领袖与社区居民共同讨论、决定如何充分利用社区已有的资产推动社区发展。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被赋权、被激励，相互学习，共同合作。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对成功充满渴望，促使他们扩大资产建设的范围。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发展，努力让自己和邻居的生活更美好。而在应用NBA的社区里，社区领袖主要由领薪酬的干部组成，社区居民觉得社区发展事务属于公事，寄希望于外来的社会组织、地方政府直接投资项目或发放资金，满足他们的需要，解决各种问题。他们也不想参与项目规划、建设的讨论，形成对外援机构或政府的等、靠、要心态。

（二）平等还是专制——社区发展的组织过程、话语差异

在应用ABCD的社区里，各类组织（地方政府、非政府机构等）将社区居民视为学习伙伴、掌握本土知识的专家，两者属于平等合作关系。这些组织将与社区一起工作视为一种学习过程。组织结构是以团队为基础的，而不是等级森严的，组织与社区相互信任，共同构建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居民被鼓励参与组织或社区项目建设。各类组织及时将自己所做的事情反馈给社区居民。就像H乡某养老组织负责人说的，“我们与社区是一个团队；以前社区居民与我们工作人员是疏远的，各干各的，现在是手联手，一起做事，每周都要开会共同商讨社区事务。”[①] 各类组织对社区居民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称社区居民为“客户”“案主”“受惠者”，而是称其为“学习伙伴”“合作者”“团队成员”。

地方政府对社区居民不再停留于管治，而是与社区居民建立学习伙伴关系。H乡开展了“夜访夜谈”活动。H乡要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派出所公安干警、村“两委”、治安协勤人员和网格员在夜晚值班时间进村入户，与村民聊家常，倾听村民对乡村振兴的想法，问计于民。入户访谈的工作人员听取村民意见或建议后，能当场回答或能解决的须当场处理，否则也须带回商讨，并及时回复村民。“夜访夜谈”活动改变了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不再高高在上，呆在办公室等村民来反映问题。这也重塑了H乡的干群关系，增进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激发了群众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H乡W副乡长说，“夜访时，有些村民会建议我们，哪段路需要增加反视镜，哪段路的亮化设施要更换，哪段路要增加防护设施等。这些建议对我们改善环境，促进乡村产业振兴都有帮助。”[②]

在应用NBA的社区里，组织程序方面，公共事务的决策通常以专制方式进行。外援机构的管理者是社区发展项目的主要决策者。据H乡某干部介绍，以前有家鱼类养殖公司，来H乡投资。村民建议该公司，H乡不适合发展渔业。该公司负责人偏不听，这个项目前后折腾了三年，以失败告终。话语方面，各类组织的管理者都称社区居民为“受恩者”“受施者”等。

四、结论与讨论

H乡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表明，村民既是经济福利提升的享受者，也是参与者。村民在参与产业振兴中，其人力资本也获得了累积。H乡与政府、企业、高校等组织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发展了外部社会资本；乡村内部形成了各种组织网络，培育了内部社会资本。这些都体现了社会投资的思想。社会投

（下转第143页）

① 2018年8月22日访谈记录。

② 2018年8月26日访谈记录。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乡村“微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

卜万红

[摘 要] 乡村“微腐败”主要是指发生在农村乡镇政府和社区组织层面的腐败。它是乡村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宽松软的产物。“微腐败”的发生与基层管党治党制度体系不完善、管党治党能力不足有关。管党治党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干部任期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等核心制度不完善。管党治党能力不足主要体现为基层党组织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能力、领导乡村治理能力和加强党内监督能力不足等方面。有效防治“微腐败”，需要改革完善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制度体系，着力解决干部任期制、信息公开制度和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制度效能。需要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能力，全面落实各级党委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加强党内监督能力。

[关键词] 全面从严治党 微腐败 成因 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68-04

“微腐败”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障碍。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旗帜鲜明反对“微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做出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战略决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①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再次强调“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② 有效治理“微腐败”，需认清其本质，探究其形成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乡村“微腐败”

乡村“微腐败”主要是指发生在农村乡镇政府和社区组织层面的腐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党的文件中，更多地称之为“群众身边的腐败”。什么是“微腐败”，目前学术界尚无权威的界定。准确把握其内涵，需要把握腐败的主体、客体、对象和后果。从总体上看，涉及“微腐败”的主要有两类人员。一类是乡镇政府的公职人员。他们是基层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体力量，在政府行政序列中职级和职务都相对较低。另一类是社区“两委”成员（群众习惯称之为“村干部”）。他们是村级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主体力量。一般来说，腐败就是权力滥用或弃用的结果。“微腐败”是“微权力”被滥用或弃用的结果。在国家政治体系中，乡政政府公职人员和村干部掌握的权力是名副其实的“微权力”，只在本辖区内产生较大影响。“微腐败”的对象具有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特点。所谓确定性，是指“微

*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构建农村‘微腐败’治理长效机制研究”（2018BDJ002）及 2019 年度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育计划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2019CXTD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卜万红，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南 开封，475001）。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52 页。

②《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确保“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23 日第 1 版。

腐败”直接伤害到某个特定对象。所谓非确定性，是指腐败虽然发生，但其影响对象难以明确。“微腐败”具有长期性、轻微性、破坏性。所谓长期性，就是这类腐败大多在一个长时段内发生，多以“蚕食”方式进行，比较难以发现。所谓轻微性，就是从量上看，这种腐败所得或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类似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类的行为甚至无法使用量化方法衡量其造成的损失。所谓破坏性，就是这类腐败虽然“微”，但从政治上看，它违背党的核心价值，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啃食群众的获得感，侵蚀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如不及时处置就会引发“大祸害”。

二、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乡村“微腐败”的成因分析

（一）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制度不完善引发“微腐败”

1. 干部任期制度不完善引发“微腐败”。任期制是规范干部任期时间和任期届数的基本制度。任期制的廉政意义主要体现为通过对任期时间和任职届数的规定，实现干部岗位的定期流动，防止长期掌握一个岗位权力形成“权力沉淀”，带来廉政风险。对任职年龄做出合理规定，建立健全退休制度，这在防止干部任职终身制弊端的同时，有助于加快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增强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经过长期探索，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层干部任期制度，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套制度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基层干部层级覆盖不全。二是任期制执行不规范。三是城乡社区组织班子成员任期制度执行不规范，对社区干部有岗位任期规定，但没有任期数量限制。

2. 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引发“微腐败”。信息公开制度是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的保证。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防止腐败的关键。这种政治过程的有效性以知情权的完整性为前提。信息公开制度是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完整性的重要制度，其核心功能是解决人民群众政治监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经过长期努力，以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居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基层信息公开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但仍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信息公开不主动。二是信息公开不全面。三是信息公开不完整。四是信息公开不系统。这种制度缺陷导致公开信息的碎片化，造成了大量的信息盲区，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群众监督的有效性，也降低了有效防止“微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制度功能。

3.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不完善引发“微腐败”。人类政治文明实践证明，利益冲突是腐败之源。防止利益冲突就是防止公务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当甚至非法利益。防止利益冲突就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制度安排。经过长期努力，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从基层治理实践看，这套制度体系仍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建立了回避制度，依据法规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任职条件和特定情形条件下的权力行使做出明确规定，但在基层干部中执行不彻底，在乡镇党政班子成员层面执行较好，在乡镇一般干部中执行不到位，乡镇一般干部本地化现象较为普遍。二是对个人重要事项报告制度做出规定，但这种制度覆盖面较窄，对乡镇党政干部约束力较小，对乡镇一般干部和社区组织干部几乎没有约束力。此外，虽然对基层领导干部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对领导干部在企业或社会组织中兼职取酬都做出了相应的制度规定，但仍不够完善，执行不到位。这种制度缺陷使得基层治理中利益冲突现象仍广泛存在，为“微腐败”发生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

（二）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能力不足引发“微腐败”

1. 基层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能力不足引发“微腐败”。政治功能是基层党组织的首要功能。我们党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政治能力建设，“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①] 基层党组织切实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这既是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本要求，也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功能的关键。一些党组织对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组织认同弱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淡化、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等现象不加干预引导，对少数党员干部虚报冒领、优亲

①《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92 页。

厚友、吃拿卡要、执法不公等行为不敢坚决斗争，对少数党员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不及时制止纠正，对部分“关键少数”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遮遮掩掩。这形成了“破窗效应”，“微腐败”难以避免。

2. 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不足引发“微腐败”。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不足突出表现为运用乡村治理体系解决乡村公共问题的能力不足。人民群众是乡村治理的实践主体，民主原则是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群众路线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由之路。乡村治理就是基层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解决乡村公共问题的民主实践。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我们党确保人民群众乡村治理主体地位的制度设计。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说到底是推进乡村集体协同治理能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走向多主体化，基层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都成为基层治理主体，他们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以集体行动原则解决基层公共问题。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保证基层治理的正确发展方向。保持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合理制衡关系是基层治理健康发展的关键。

3. 基层党组织党内监督能力不足引发“微腐败”。基层监督体系由县乡两级党政机构监督体系和村民自治监督制度构成。县乡两级党政监督属于国家监督的范畴，村民自治监督体系则属于社会监督的范畴，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党内监督是基层监督体系中最重要的监督方式，群众路线将其与政府内部监督、群众监督等监督方式紧密联系起来。党内监督在规范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规范用权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基层社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宗法关系、乡缘关系、业缘关系、学缘关系等关系网络纵横交织，结成一个更加复杂的关系网络，成为消解基层党内监督效果的重要因素。管党治党宽松软更弱化了党内监督制度的执行力。不敢监督、不愿监督、回避监督、抵制监督等情形在基层治理中更加突出。民主集中制得不到有效贯彻，对各级基层党组织“一把手”的监督难以到位。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虚化进一步弱化了党内监督的效果。这成为“微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

三、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治“微腐败”

（一）持续完善基层管党治党制度体系防治“微腐败”

1. 改革完善乡村干部任期制度防治“微腐败”。完善任期制既要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又要防范不合理任期带来的廉政风险，需要做如下努力。一是探索在乡镇一般干部和城乡社区自治组织领导班子中实行严格任期制的途径，将任期制原则贯彻到乡村治理的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实现对各级各类党员干部和工作岗位的全覆盖。二是探索乡村干部能上能下的实现途径，将能上能下、定期轮岗等干部选任的一般原则落实到乡村干部日常管理之中，增强干部队伍活力。三是加快推进干部选任竞争机制建设。坚持“五湖四海”选拔干部，强化干部对权力、对群众的敬畏意识，从制度上消除少数党员干部“非我莫属”“唯我独尊”的错误观念，增强竞争观念和担当精神。四是将任期制与干部选任、管理、考核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保持干部队伍生机与活力的长效机制，用科学的制度体系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防止权力“带病运行”。此外，还应探索建立权力“熔断机制”，及时处置那些群众意见集中、反映强烈的干部，增强干部管理制度对人民群众意愿和要求的回应性。

2. 改革完善基层信息公开制度防治“微腐败”。依法公开信息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信息公开本质上是权力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公开。有效防治“微腐败”，必须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基层群众的知情权，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压缩党员领导干部利用信息优势谋取不当利益的制度空间。完善基层信息公开制度，一是要强化信息公开制度的顶层设计。二是要探索符合不同治理主体自身特点的信息公开方式。三是要推进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创建以行政单元或行业系统为基础的统一的信息公开平台，确保信息公开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系统性，消除信息盲区。

3.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防治“微腐败”。应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教育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

公私观，牢记“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①] 为杜绝滥用职权、假公济私、以权谋私行为奠定坚实思想基础。扩大领导干部重要事项报告制度覆盖层级。严格落实任职回避制度，尤其是要对乡镇政府党政班子成员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任职回避做出必要限制，从制度上防范干部任职本地化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加大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力度。从长远看，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引入乡村关系网络之外的党员干部，打破原有地方关系网络自然演化的路径依赖，逐渐消解传统乡村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这是从源头上防止利益冲突的重要举措。

（二）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能力防治“微腐败”

1. 全面落实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防治“微腐败”。“微腐败”的滋生蔓延是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宽松软的产物。治理“微腐败”，必须落实党委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履行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提升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能力。必须坚持将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效解决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组织力，全面巩固和加强基层战斗堡垒。必须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帮助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管理，坚持以为民务实清廉要求规范广大党员干部行为。必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党内法规，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和战斗性，坚决同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自我净化能力。必须以零容忍态度对待腐败，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惩，坚决整治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2.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防治“微腐败”。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就是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基层社会实际，探索完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提升新时代乡村治理能力的具体路径。必须坚守党的初心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必须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群众的乡村治理主体地位，让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真正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必须按照集体协同原则，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根据“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②] 的协商民主要求，坚持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凝聚推动基层治理的力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从源头上防治“微腐败”的治本之策。

3.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党内监督能力防治“微腐败”。加强党内监督是防止“微腐败”的关键。这需要综合运用全面从严治党新经验和新成果，完善基层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增强基层党内监督能力，提升党内监督效能。必须加大执纪力度，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③] 强化惩治震慑，坚决遏制“微腐败”蔓延势头。围绕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切实加强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监督，尤其是加强上级党委“一把手”对下级党委“一把手”的监督，增强对基层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监督的针对性。用好派驻监督实践探索成果，加强对乡镇党委班子成员的监督，推动其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干部管理。创新巡视巡查工作方式，实现巡视巡查联动，强化发现问题，形成震慑能力。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综合运用约谈函询、诫勉谈话等监督手段，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和纠偏，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坚持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监察法》，探索提升对农村社区组织班子成员监督效能的具体途径，确保他们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和廉洁用权。

责任编辑：王 冰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394 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29 页。
③《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205 页。

经济学　管理学

·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劳动力市场·

互联网就业搜寻对流动人口就业与工资的影响*

罗楚亮　梁晓慧

[摘 要]互联网的普及扩大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对就业和工资产生重要影响。采用 2016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实证研究发现，通过互联网找工作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其主要是通过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这一机制来提高工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作为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探讨发现，互联网的工资外溢效应在受教育水平高、累计流动时间长的人群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因此，有必要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的普及率，以提升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

[关键词]互联网　信息不对称　教育　工资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72-0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 2.44 亿人，[①] 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力量。然而，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却仍不能令人满意，表现为就业质量差、工资水平低。这一现象可能与流动人口就业渠道缺乏以及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有关。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使劳动力难以发现与自身相匹配的职业，降低人力资本回报。而互联网普及不仅有助于扩大劳动力的谋职途径，也便于招聘单位在网上公开对员工的待遇信息，信息透明化的网络招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善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迅猛普及。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9.04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64.5%，其中农村网民达到 2.55 亿，占总网民的 28.2%。[②] 互联网的普及创造了大量新型就业形式，也方便人们从网上获取相关的就业信息和资源，改变了人们的就业方式。一方面，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于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有些人群获益更高，信息技术进步往往是技能偏向型，即会增加高技能、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的就业机会；[③] 但另一方面，网络所提供的大量快捷就业信息和相关资源，增加了整体劳动力的就业渠道，缓解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基于失业者角度，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我国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及其经济效应”（71973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罗楚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北京，100872）；梁晓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①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2018 年。

②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 年。

③ 杨蕙馨、李春梅：《中国信息产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及工资差距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13 年第 1 期。

Stevenson（2008）[①] 发现城市中互联网的渗透率和失业者寻找工作的密集度正相关，即互联网的发展提升了失业者寻找工作的概率。类似地，Kuhn and Mansour（2014）[②] 将研究细化到不同寻找工作方式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发现互联网可以增加找工作者与就业单位直接接触的机会，并降低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

使用互联网找工作对劳动者的工资还会产生影响，但当前这方面研究文献相对较少（赵建国和周德水，2019），[③] 大多数文献仍集中在互联网的使用对工资的影响上。在国外，Lee and Kim（2004）[④] 采用美国 CPS 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存在正的工资溢价效应，1997 年为 11%，2001 年降到 10%。Navarro（2010）[⑤] 研究拉丁国家数据则发现，互联网使用的工资溢价高达 20%—35%。在国内，陈玉宇和吴玉立（2008）[⑥] 采用 2005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实证发现，使用计算机平均可以提高 20% 的工资水平。刘志龙和靳文杰（2015）[⑦] 基于 CFPS2010 年数据实证发现，使用网络对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溢价效应分别为 25.7% 和 29.3%。庄家炽等（2016）[⑧] 研究也发现，使用互联网人群比未使用人群的平均工资高 1.38 倍。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不同群体从互联网使用中受益的差异，如李雅楠和谢倩芸（2017）、[⑨] 邱泽奇等（2016）。[⑩]

个人找工作方式的不同不仅影响其自身对于就业信息的获取，也会影响其与就业岗位的匹配率，这往往对于个人长期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根据微观调查数据以及统计报告来看，当前人们使用互联网获得就业资源的占比仍相对较低，2016 年我国流动人口使用互联网找到工作的比例大约只为 5%。[⑪]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流动人口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高自身工资和就业能力？特别是对于低技能或者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流动人口而言，网络信息的发展是否可以提高其就业匹配以产生工资外溢效应？本文试图基于这些问题展开研究，探究互联网找工作的工资外溢效应及其内在影响机制，为改善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提供实证支持。

二、数据来源、模型设定及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2016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该数据调查对象是在流入地居住超过 1 个月，年龄大于 15 周岁且非本地户口的人群。按照随机性原则在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开展抽样调查，样本范围覆盖了中国内地 31 个省市自治区，在研究流动人口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研究的主题是使用互联网找工作对于流动人口的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因此将样本范围限制在 16—65 周岁之间的人群，同时将工资数据为缺失值的剔除掉，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 139031 个。

（二）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

---

① Stevenson B., “The Internet and Job Search”, NBER Working Pape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8.

② Kuhn P., H. Mansour, “Is Internet Job Search Still Ineffective?”, *Economic Journal*, vol.124, no.5, 2014, pp.1213-1233.

③ 赵建国、周德水：《互联网使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19 年第 1 期。

④ Lee S., J. Kim, “Has the Internet Changed the Wage Structure Too?”, Labour Economics, vol.11, no.1, 2004, pp.119-127.

⑤ Navarro L.,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Individual Earnings in Latin Americ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Development Studies, Development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1, 2010.

⑥ 陈玉宇、吴玉立：《信息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个人电脑使用回报率的估计》，《经济学（季刊）》2008 年第 4 期。

⑦ 刘志龙、靳文杰：《计算机网络的工资收入溢价效应分析——基于 CFPS2010 基线调查数据》，《产业经济评论》2015 年第 1 期。

⑧ 庄家炽、刘爱玉、孙超：《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的性别差异以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为例》，《社会》2016 年第 5 期。

⑨ 李雅楠、谢倩芸：《互联网使用与工资收入差距——基于 CHNS 数据的经验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 年第 7 期。

⑩ 邱泽奇、张樹沁、刘世定：《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0 期。

⑪ 根据 CMDS 数据库中数据计算得到。5% 为通过网络途径找到工作的人数占总工作人数（16 岁至 65 岁）的比例。

为分析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是否对工资有溢价作用，本文借鉴 Kuhn and Mansour（2014）[①] 的模型设定，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控制变量。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Y = \alpha_0 + \alpha_1 net + \alpha_2 gender + \alpha_3 age + \alpha_4 Sage + \alpha_5 edup + \alpha_6 eduh + \alpha_7 skill + \alpha_8 manage + \alpha_9 soe + \beta_1 size + \gamma_d + \delta_p + \varepsilon \quad (1)$$

上式中，Y 代表劳动力年工资的对数水平；net 代表个体是否通过互联网找到目前工作，是定义为 1，否则为 0；gender 代表性别，男性定义为 1，否则为 0；age 表示个体年龄，Sage 表示个体年龄平方除以 100；edup 表示初中，eduh 表示高中及以上，如果分别对应相应的教育水平则定义为 1，否则为 0，两变量均以小学及以下作为基准组；skill 和 manage 分别代表是否技术类和非管理技术类，是定义为 1，否则为 0，以管理类作为基准组；soe 表示是否国企，是定义为 1，否则为 0；size 表示同住家庭成员数。γ_d 和 δ_p 分别代表行业和省份的固定效应，ε 表示其他不可观测因素。

2. 倾向得分匹配。

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工资外溢效应如果仅通过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差异计算得到，可能会因个体异质性导致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偏误。准确的效应估计应该来自同一个体基于不同找工作方式所得到的效果差异，即：

$$E(Y_i) = E\left(Y_i^y | G = 1\right) - E\left(Y_i^n | G = 1\right) \quad (2)$$

其中，Y_i^y 是可以观测到的实际结果变量，Y_i^n 是假定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个体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工作的结果变量（实际是不能观测到的）。G 为处理组或对照组，G=1 表示处理组。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为处理组（即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样本）找到合适的反事实对照组（即未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样本）。首先，根据可观测的个人和家庭等方面特征为每个人计算出通过互联网途径找到工作的概率，得到一个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其次，根据处理组得到的倾向得分值，从对照组中找到与之最为接近的未通过互联网方式找工作的样本作为其反事实组；最后，将每个处理组和反事实控制组作差后取均值，得到通过互联网方式找到工作的工资外溢效应，即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E(Y_i) = E_{P(X)G=1}\left(E(Y_i^y - Y_i^n | G = 1, P(X))\right) = E_{P(X)G=1}\left[E\left(Y_i^y | G = 1, P(X)\right) - E\left(Y_i^n | G = 1, P(X)\right)\right] \quad (3)$$

根据 Rosenbaum 和 Rubin（1983），可以测算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倾向得分。在满足一些前提条件后，可使用与处理组得分最为接近的对照组 $E\left(Y_i^n | G = 0, P(X)\right)$ 替代（3）式中的 $E\left(Y_i^n | G = 1, P(X)\right)$。即：

$$E(Y_i) = E\left(Y_i^y | G = 1, P_i^y(X)\right) - E\left(Y_i^n | G = 0, PM_i^y(X)\right) \quad (4)$$

其中，$P_i^y(X)$ 表示基于处理组的倾向得分值，$PM_i^y(X)$ 代表控制组与处理组最接近的倾向得分值，基于上式可以计算出使用互联网找工作工资外溢的净效应值 ATT。

PSM 方法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条件独立假定，即控制 P(X) 后个人工资水平独立于是否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二是密度函数共同支撑假定，即 0 < P(X)=Pr(G=1|X) < 1。结合已有文献和可用数据，我们采用以下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职业、行业、所有制类型以及家户同住人数。此外，考虑到不同省份之间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我们还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3. 机制检验回归。

下文中关于机制检验部分借鉴 Chen 等（2018）[②] 的方法，由于中间变量均为二元变量，因此采用 Probit 模型回归，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P = \alpha_0 + \alpha_1 net + \alpha_2 gender + \alpha_3 age + \alpha_4 Sage + \alpha_5 edup + \alpha_6 eduh + \alpha_7 skill +$$

① Kuhn P., H. Mansour, "Is Internet Job Search Still Ineffective?", *Economic Journal*, vol.124, no.581, 2014, pp.1213-1233.

② Chen Y., Wang L., Zhang M., "Informal Search, Bad Search? The Effects of Job Search Method on Wages among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31, no.1, 2018, pp.837-876.

$$\alpha_8 manage + \alpha_9 soe + \beta_1 size + \gamma_d + \delta_p + \varepsilon \quad (5)$$

其中，P 表示各中间变量。具体分别代表是否为管理类、是否为技术类、是否为非管理技术类、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否有固定合同。其他各解释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中相同。

（三）描述统计

流动人口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比例一般相对比较低，且不同特征的人群在使用互联网上会有所差异。表 1 给出了分不同特征的结果。从不同受教育水平来看，小学及以下的流动人口使用互联网找到工作的占比仅仅为 0.35%，① 平均工资也处于最低水平，为 3250.82 元。初中水平的劳动力使用互联网找到工作的比例和平均工资均略高于小学及以下，分别为 1.38% 和 3813.89 元。高中及以上人群使用互联网找到工作的比例要远高于其他受教育水平人群，为 10.94%，平均工资也更高。这表明，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群可能难以利用信息化工具。但这一结果仅仅为简单描述性统计，可能也是由样本选择导致的结果。分性别来看，女性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 5.8%，略高于男性 1.42 个百分点，但女性的平均工资为 3486.33 元，比男性低 1007.27 元。从不同职业类型看，管理类人群使用互联网的比例最低（0.87%），但工资却最高（5061.99 元），技术类和非管理技术类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14.09% 和 4.82%），但工资水平却较低（分别为 4542.87 元和 3748.35 元）。从不同所有制类型看，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使用互联网找到工作的人群比例分别为 6.69% 和 4.9%，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为 4074.54 元和 4064.02 元。

区分不同类别人群可以发现，随着教育水平提高，有固定合同的人群比例也在增加，高中及以上人群的占比为 61.71%，小学及以下的占比则只有 29.97%。不同性别人群中有固定合同的比例差别不大，均为 48% 左右。在不同职业中，技术类人群中有固定合同的比例往往更高，为 66.3%，管理类和非管理技术类人群均为 45% 左右。国有企业人群中有固定合同的比例（71.65%）远高于非国有企业人群（46.57%）。综上可看出，受过高等教育、技术类和国有企业员工的工作性质相对较稳定。

表 1　不同类型人群的描述性统计

		互联网（%）	固定合同（%）	月平均工资（元）
教育	小学及以下	0.35	29.97	3250.82
	初中	1.38	38.69	3813.89
	高中及以上	10.94	61.71	4644.55
性别	女性	5.8	48.91	3486.33
	男性	4.38	48.19	4493.60
职业	管理类	0.87	45.56	5061.99
	技术类	14.09	66.3	4542.87
	非管理技术类	4.82	45.72	3748.35
所有制	国有企业	6.69	71.65	4074.54
	非国有企业	4.9	46.57	4064.02

注：互联网是指有效样本中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人群占比；固定合同是指有固定合同的人群占比；平均工资指的是月工资水平。

表 2 呈现了不同找工作方式是否在平均工资和有固定合同上有结果的差异，并且进一步区分了不同劳动力特征。可以看到，除了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人群外，其他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整体上均表现出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非互联网。在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和高中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中，使用互联网的平均工资分别要比未使用互联网的高 53.94 元和 633.35 元。这可能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使用互联网的工资外溢效应越大。分性别来看，男性使用互联网找到工作的工资溢价要高于女性，分别为 1289.06 元和 848.53 元，这可能也预示着男性互联网溢价作用要高于女性。在职业分类中，技术类人群尽管比管理类人群的工资水平低，但互联网工资溢价却更高。在所有制分类中，相对于非国有企业，

① 这里对应表 1 中的互联网方式，指使用互联网找到工作，下文中表格中涉及互联网的表述均表示使用互联网找到工作。

表 2　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差异

		平均工资水平			是否有固定合同		
		非互联网	互联网	t 检验	非互联网	互联网	t 检验
教育	小学及以下	3251.26	3121.88	0.4	29.87	47.92	-2.72***
	初中	3813.15	3867.09	-0.52	38.35	52.49	-8.14***
	高中及以上	4575.26	5208.61	-10.92***	59.09	75.94	-24.24***
性别	女性	3437.09	4285.62	-16.56***	46.47	72.31	-28.47***
	男性	4437.12	5726.18	-19.03***	46.15	73.4	-30.35***
职业	管理类	5047.59	6700.21	-4.79***	43.84	68	-4.71***
	技术类	4269.03	6212.71	-22.08***	63.3	80.78	-14.89***
	非管理技术类	3714.84	4410.69	-16.21***	44.05	68.96	-31.58***
所有制	国有企业	3953.64	5761.59	-12.45***	70.55	85.55	-6.77***
	非国有企业	4017.82	4960.49	-20.63***	44.23	71.93	-42.04***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国有企业人群的互联网工资溢价更高。T 检验结果发现，使用互联网和未使用互联网的平均工资，除了在小学及以下、初中分组中没有显著差异外，在其他分组中均呈现显著差异。

根据是否有固定合同的结果来看，在使用互联网找到工作的人群中有固定合同的占比明显高于使用其他途径找工作的人群，在统计上这一差异也是显著的。区分教育、性别和职业类型看，两种找工作途径下的固定合同比例差异都较小，分别为 18%、26% 和 24% 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所有制的非国有企业中，通过互联网方式有固定合同的人群占比为 71.93%，远高于使用其他方式有固定合同的人群比例。

三、回归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上面设定的回归模型，这部分首先进行了基准回归。如表 3 所示，整体上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平均工资往往更高。具体来看，当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时，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平均工资要高 23.9%。当控制了个体和家户层面的变量时，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结果。进一步考虑地区差异性，第 3 列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后发现，系数进一步降低，即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平均工资比未使用互联网的高 6%。这一结果与既有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通过互联网往往可以在更多信息中筛选出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最优就业信息，而这种最优可能更多是以工资作为衡量。

表 3　基准回归

	（1）工资对数	（2）工资对数	（3）工资对数
是否互联网	0.239***(0.008)	0.124***(0.007)	0.060***(0.007)
男性		0.212***(0.003)	0.220***(0.003)
年龄		0.066***(0.001)	0.063***(0.001)
年龄平方 /100		-0.001***(0.000)	-0.001***(0.000)
初中		0.122***(0.005)	0.127***(0.005)
高中及以上		0.266***(0.005)	0.268***(0.005)
家庭同住人口		0.008***(0.001)	0.014***(0.001)
国有企业		-0.025**(0.008)	-0.017*(0.008)
技术类		-0.053***(0.007)	-0.064***(0.007)
非管理技术类		-0.152***(0.004)	-0.167***(0.004)
常数项	10.582***(0.002)	9.193***(0.029)	9.517***(0.030)
省份	否	否	是
行业	否	是	是
观测值	139031	137170	13717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解释变量与工资间的关系均显著且较符合预期。从第 3 列结果来看，相对于女性，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具有优势，平均工资要高 22%。年龄与工资的关系表现出倒 U 型，即在年轻时，随着年龄增加工资水平也呈上升趋势，随后随着年龄增加，工资也开始下降，这一转折点大概在 32 岁。教育相关变量表现出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工资水平也相对升高的结果。具体来看，相对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初中人群的工资水平平均要高 12.7%，高中及以上人群的工资平均要高 26.8%。家庭同住人口越多，平均工资水平也相对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人口外出流动往往是出于打工挣钱的目的，一般只有在户主有相应能力挣足够的工资以维持更多家庭同行人口生活时，外出同行人口才会越多。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要低 1.7%。由于市场化环境的进一步推进，非国有企业往往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工资回报。不同职业类别对工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相对于管理类职业而言，技术类人群和非管理技术类人群的工资水平分别要低 6.4% 和 16.7%。

（二）PSM 结果

在做 PSM 回归前，需要对各匹配变量做均衡性检验以确定匹配前后的偏差是否有所减小，样本选择偏差是否有所消除。均衡性检验结果如表 4，可以看出各变量匹配前偏差相对比较大，并且 T 值检验结果也显示处理组和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但匹配后标准偏差大幅度下降，且 T 值也明显降低以致两组之间不再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匹配结果的均衡性较好，有效降低了样本选择偏误问题。除了检验各变量均衡性，这部分还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绘制了倾向得分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图。如图 1 所示，在匹配前，处理组较为集中且整体向右偏，但控制组核密度图分布比较分散。两组分布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不对其进行匹配则会导致回归结果存在严重偏误。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可以发现，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核密度分布已经高度一致，两组样本的整体变量特征基本趋于一致，匹配后的结果符合可比性要求。鉴于此，倾向得分匹配后的结果已经基本消除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

表 4　变量均衡性检验

	匹配前				匹配后			
	处理组	控制组	偏差	t 统计量	处理组	控制组	偏差	t 统计量
男性	0.5043	0.5776	-14.7	-12.02	0.5043	0.5071	-0.6	-0.33
年龄	29.8260	35.6230	-72.3	-49.98	29.8260	29.7990	0.3	0.26
年龄平方	926.70	1360.30	-74	-49.64	926.70	925.57	0.2	0.16
初中	0.1321	0.4942	-84.8	-59.58	0.1321	0.1294	0.6	0.47
高中及以上	0.8587	0.3681	116.6	83.56	0.8587	0.8610	-0.5	-0.39
家庭同住人口	2.4967	3.0915	-52.1	-42.3	2.4967	2.4797	1.5	0.89
国有企业	0.0645	0.0479	7.2	6.24	0.0645	0.0590	2.4	1.35
技术类	0.5043	0.5776	-14.7	-12.02	0.5043	0.5071	-0.6	-0.33
非管理技术类	29.8260	35.6230	-72.3	-49.98	29.8260	29.7990	0.3	0.26

图 1a　倾向得分匹配前的核密度图

图 1b　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核密度图

基于上面的检验，根据式（4）做倾向得分匹配得到平均处理效应（ATT）。如表 5 所示，匹配前的 ATT 值为 0.326，采用最近邻匹配后的结果大幅降低至 0.0941。假设倾向得分本身是由实际值来推导标准误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得到的标准误是基于同方差的假定，这往往在实际研究中难以实现。因此，为得到更准确的结果，这里又进一步采用自助法以获得标准误。通过自助法得到的 ATT 值为 0.05，其更小但仍然显著。以上结果也表明，减小选择性偏误问题后仍可发现，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的人群的确存在工资溢价。

表 5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结果—对数工资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t 统计量
匹配前	10.4560	10.1300	0.3260	0.0143	22.77***
匹配后					
最近邻匹配	10.4548	10.3607	0.0941	0.0191	4.92***
核匹配	10.8214	10.7518	0.0696	0.0079	8.86***
调整标准误			0.050	0.009	5.56***

注：调整标准误指的是采用 bootstrap 计算的标准误，这里进行了 100 次抽样。

（三）机制检验

这部分进一步识别互联网对工资的溢价效应是否通过缓解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这一机制发挥作用。首先，不同职业类型对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反应和敏感度有所差异，本文根据互联网途径下进入不同职业类型的概率差异来识别这一机制。管理类人群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实践技能难以通过应聘全面表现出来，增加了劳雇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他们转换工作时往往是以在行业内的口碑获得高待遇。技术类人群则有技能证书、职称级别等材料来证明自身能力，减少了劳雇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他们能在互联网拓宽就业途径的条件下有效提高就业概率。因此，如果技术类工人在互联网环境中提高了就业概率，那么就可以认为互联网有缓解信息不对称作用。其次，使用互联网找工作有助于流动人口深入了解政策，获取更多信息，提升对福利待遇的议价能力。因此，如果使用互联网找到的工作质量和待遇更高，则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由更透明的互联网信息带来的。

我们分别采用是否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否有固定合同来衡量工作质量。通常来说，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的企业相对规模比较大、给予的岗位较稳定；劳动力有固定合同代表工作更稳定、质量更高。采用方程（5）回归，表 6 给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这一机制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会使流动人口进入管理类工作的概率降低 10.9%，但会使进入技术类工作的概率显著增加 3.9%，对非管理技术类工作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上文分析是一致的，技术类面对信息相对更透明的就业市场，找到与自身匹配且高工资工作的概率更高。根据后两列结果可发现，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分别会使购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签订固定合同的概率提高 6.8% 和 13.6%。这表明，互联网的盛行和使用改善了就

表 6　机制检验

	（1）	（2）	（3）	（4）	（5）
	管理类	技术类	非管理技术类	是否有医疗保险	是否有固定合同
是否互联网	-0.109***(0.003)	0.039***(0.003)	-0.002(0.006)	0.068***(0.004)	0.136***(0.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32314	132314	132314	137170	78330

注：表中结果为相应变量的边际效应；模型回归中放入了相应控制变量，限于篇幅未报告（下同）；前三列是基于职业类型回归，未放入与职业相关的控制变量。

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流动人口更容易找到优质工作。

（四）异质性探讨

这里进一步探讨互联网的工资溢价效应是否会因为教育水平、年龄和流动时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表 7 所示)。区分受教育程度来看，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可以使高中以上及高中以下人群的工资水平分别提高 4.5% 和 3.9%。这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从互联网中获得的收益更高。区分年龄来看，45 岁以上年长人群从互联网中获得的收益更大，工资溢价效应更高。分流动时间来看，互联网的工资外溢效应在流动时间超过 5 年的人群中更高，大约可以使工资水平提高 7.1%。此外，我们也验证了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对于当期和长期工资均有显著影响，且对后者的影响更大，这一结果与表 7 中最后两列的结果一致。这意味着，互联网的工资外溢效应不仅在短期发挥作用，而且在长期对工资也有溢价作用。这一结果并未在表 7 中报告。

表 7　异质性结果

	高中以下	高中以上	16—45 岁	45 岁以上	5 年以内	5 年以上
是否互联网	0.039* (0.018)	0.045*** (0.008)	0.052*** (0.007)	0.173*** (0.043)	0.054*** (0.009)	0.071*** (0.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3281	53889	110995	26175	64298	72872

四、总结

本文以找工作是否使用互联网作为出发点，采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2016 年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在互联网中的受益情况，实证研究通过互联网找工作是否对工资具有溢价作用，结果发现：（1）受教育程度高、技术类人群使用互联网找工作的比例较高，且使用和未使用互联网所获得的工资有显著差异。（2）通过互联网找工作可以使工资水平显著提高 6%，采用 PSM 方法后结果虽然有所减小，但结论依旧成立。（3）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找工作是通过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这一机制来提高工资的。（4）异质性回归发现，在高中以上、45 岁以上、累计流动时间更长的人群中，使用互联网找工作的工资外溢效应更高。

由此可得到以下启示：首先，互联网的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目前，我国使用互联网找工作的人群比例仍较低，且集中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技术类的劳动力中，有必要引导更多人群将互联网作为找工作的一种有效媒介。其次，流动人口的高质量就业将受惠于互联网的高效使用。就业不匹配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存在，企业和劳动力都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后，通过互联网找到合适工作会长期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状况。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是否善于使用互联网对于个人发展将会有长期影响，这可能也会加剧收入差距。

责任编辑：张 超

技术变革、流动人口就业结构与收入极化趋势*

汤 璨 孙文凯 赵 忠

[摘 要]基于 2011—2017 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计算中国流动人口就业结构变动，并进一步考察就业结构调整对收入极化趋势的影响发现，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经商者占比在 7 年中上升幅度均超过 1%，而负责人及管理者、公务员和建筑人员的比例下降均大于 1%；常规操作性工作的就业占比显著下降，常规知识性工作的就业比例显著上升。就业结构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动人口收入极化水平上升，而职业间收入差异可以解释收入极化水平的 90%，说明就业结构对收入极化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不可忽视。

[关键词]流动人口 人工智能 就业结构 收入极化

〔中图分类号〕F014.2；F0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80-06

“第四代技术革命”使机器人、语音面部识别、智能客服、无人驾驶等产品逐步走入大众视野，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可能首当其冲，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能替代大量常规性劳动，[①] 并能与高技能劳动形成互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人工智能等发展迅速的欧美国家，常规性就业出现了减少，[②] 劳动力市场产生“极化”现象，[③] 即就业逐步向高端和低端就业岗位集中。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同样使我国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改变，高技能劳动力越来越多，[④] 一些常规性就业岗位被新技术所替代。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也表现出明显分化，高技能者的经济地位与当地居民趋向融合，而低技能者则始终处于收入劣势。[⑤] 显然，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调整与流动人口结构的演变相结合会引起流动人口就业结构改变，从而进一步影响流动人口的收入分配，但鲜有研究对此进行探索。

收入极化是指人们的收入集中在高和低两个极点，中等收入人群不断减少。[⑥] Wang C. 等（2015）的分析则表明，1978 年至 2010 年间我国收入极化水平呈现明显上升趋势。[⑦] 由于收入极化可能产生社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身份认知对流动人口的经济影响及其政策应用”（7160326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汤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上海，201620）；孙文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忠（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① Goos M., Manning, A., Salomons A., “Explaining Job Polarization: Routine-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Offsh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4, no.8, 2014, pp.2509-2526.

② Cortes G. M., N. Jaimovich, H. E. Siu, “Disappearing Routine Jobs: Who, How, and Wh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91, 2017, pp.69-87.

③Goos M., Manning A., Salomons A., “Job Polarization in Europ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9, no.2, 2009, pp.58-63..

④ 齐明珠、徐芳：《更好把握流动人口新趋势》，《经济日报》2018 年 5 月 3 日。

⑤ 谢桂华：《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 期。

⑥ Esteban J. M., D. Ray,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larization”, *Econometrica*, vol.62, no.4, 1994, pp.819-851.

⑦ Wang C., G. Wan, “Income Polarization in China: Trends and Chang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36, 2007, pp.58-72.

会阶层分化与固化、激化社会冲突、削弱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负面影响，关注我国劳动力收入极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流入城镇的流动人口一定程度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对流动人口内部收入极化的趋势分析将为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分配的研究提供有益补充视角。因此，本文拟采用多种职业分类标准对流动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动情况进行描述，再基于职业“五分类法”对就业结构变动进行分解，并从供给和需求角度解释变动的原因，最后使用多种指标描述流动人口收入极化趋势，借以说明就业结构变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流动人口的规模、结构、流向和各种特征的变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一个缩影，分析“第四代技术革命”新背景下流动人口就业结构变动及其对收入极化的影响，为已有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第二，已有研究对于收入极化现象关注不足，仍停留在描述典型事实的阶段，本文对极化原因进行了更深入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技术变革下我国整个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理解。

一、流动人口就业结构变动

本文采用的是 2011—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简称 CMDS）。该数据是国家卫健委自 2009 年起针对中国流动人口进行的一年一度大规模全国流动性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覆盖了内地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每年样本量有近 20 万户，涵盖了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和趋势、就业情况、收入水平等信息。[①]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样本限定为 18—59 周岁、非本区（县、市）户口的城镇居民。限定样本后，2011—2017 年的样本量分别为 70861、86724、108991、111586、105772、95568 和 97335。我们首先计算 2011—2017 年流动人口职业分布的变动轨迹，再将职业按五分类法分类，在此基础上计算流动人口在各分类中占比的变动趋势，从而更好地刻画这一群体应对技术冲击时能力。

（一）流动人口职业分布变动

本文将调查数据中的职业类型统一合并为 15 个类别，再计算流动人口职业分布变化趋势。如表 1 所示，超过 20% 的流动人口为商贩或经商，该比例在 7 年内始终明显高于其他职业；其次为餐饮业；再次是负责人 / 管理者。从事快递和家政的流动人口比例相对较低。值得关注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经商者占比增长幅度均超过 1 个百分点，而负责人和管理者、其他政府工作人员和建筑业从业者占比下降

表 1　分年份的流动人口职业分布状况（%）

职业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管理者	9.66	13.49	12.08	11.99	9.84	11.3	7.7
专业技术人员	8.3	7.39	6.41	7.82	7.88	8.85	10.12
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53	1.81	1.42	2.01	2.38	2.64	2.09
商贩、经商	23	20.31	24.62	23.45	22.81	21.75	25.88
餐饮	10.94	11.02	12.11	12.09	10.58	10.83	9.99
家政	0.5	0.59	0.57	0.55	0.42	0.51	0.55
保洁	1.4	1.62	1.51	1.44	1.58	1.46	1.74
保安	0.94	1.11	1.25	1.41	1.29	0.98	1.39
装修	2.97	3.22	3.75	4.1	3.16	3.27	3.29
快递	0	0	0	0	0	0.73	0.84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0.98	0.88	1.34	1.77	1.12	1.3	0.99
生产	6.77	8.72	8.8	8.06	8.4	6.5	6.66
运输	3.04	2.92	2.72	2.97	2.44	2.55	2.37
建筑	5	4.85	4.99	4.66	3.85	4.09	3.75
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4.53	3.12	3.71	3.62	4.15	3.11	3.56
不工作	18.44	18.94	14.72	14.08	20.11	20.14	19.07
样本量（人）	70861	86724	108991	111586	105772	95568	97335

① 2009 年和 2010 年数据的个人职业分类不够详细，所以本研究没有使用这两年的数据。

幅度超过 1 个百分点。此外，不工作人群占比相对比较稳定。

（二）按照五分类法的就业岗位变动

为了更精炼地描述流动人口就业结构并反映他们就业的技术特点，我们按照 Cortes 等（2020）的分类方式将就业状态分为五个类型：常规操作性工作、常规知识性工作、非常规操作性工作、非常规知识性工作和非就业状态。[①] 前四类工作的分类原则是岗位可被自动化替代的程度以及体力 / 脑力投入程度，常规性工作比较容易被替代，具体分类如表 2 所示。表 3 展示了流动人口在各职业分类中的分布变动情况。总体而言，在 2011—2017 年，按照五分类法归类的流动人口就业结构比较平稳，各就业状态占比均没有大幅波动。常规性就业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选择，占比维持在 49% 左右，非常规性就业占比在 33% 上下，不工作的大约平均占比 18% 左右。在常规工作中，操作性工作就业占比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2011 年从事相关职业的流动人口占比超过 23%，2017 年该比例已经降至 21.47%；知识性工作就业占比在波动中有所上升，从 2011 年的 26.53% 增长到了 2017 年的 27.97%。并且，除 2012 年外，常规知识性工作一直是流动人口中就业占比最高的就业类型。在非常规工作中，从事操作性工作的流动人口占比近 3 年来稳定在 13.8% 左右，处于四类就业占比中的最低水平；知识性就业占比高于操作性就业，但波动较为明显。此外，整体而言，流动人口从事知识性工作的占比更高，平均为 44%，且近 3 年有上升趋势；从事操作性工作的占比较前者更低，为 37%，且有下降趋势。这符合技术替代操作性工作的劳动力市场整体趋势。[②]

表 2　职业分类

职业分类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职业类别
非常规知识性工作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
非常规操作性工作	服务业从业者（餐饮、家政、保洁、保安）
常规知识性工作	经商、商贩；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常规操作性工作	装修；快递；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注：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在监测数据中被划为同一类别，故将其连同无固定职业者和其他定义为缺失。

表 3　流动人口就业结构变动（%）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常规性	49.82	45.84	51.35	50.62	48.3	45.93	49.44
常规操作性	23.29	23.72	25.31	25.16	23.11	21.54	21.47
常规知识性	26.53	22.12	26.04	25.46	25.19	24.39	27.97
非常规性	31.74	35.22	33.93	35.3	31.59	33.93	31.49
非常规操作性	13.78	14.34	15.44	15.49	13.87	13.78	13.67
非常规知识性	17.96	20.88	18.49	19.81	17.72	20.15	17.82
不工作	18.44	18.94	14.72	14.08	20.11	20.14	19.07

二、流动人口就业结构变动原因

（一）流动人口就业结构变动的分解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职业变动的内部特征和原因，我们参考了 Cortes 等（2017）的分解方法，将不同职业占比按照不同特征的人口组别进行分解。人口结构变动和岗位需求变动是就业结构变动的两个主要原因。人口结构变动反映劳动力供给变动，伴随着流动人口增加，近年来我国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动特征就是教育扩张、老龄化和性别比例失衡等，因此我们主要关注教育、年龄和性别三个指标。岗位需求变动能够反映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等因素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具体的计算思路是：首先，将人群按照三个主要人口维度分类：教育（四个等级：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专科、大学及以上）、性别（男、女）、

① Cortes G. M., Jaimovich N., Nekarda C. J., Siu H. E., “The Dynamics of Disappearing Routine Jobs: A Flows Approach”, *Labour Economics*, vol.65, 2020.

② 孙文凯、郭杰、赵忠、汤璨：《我国就业结构变动与技术升级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 年第 6 期。

年龄段（三个等级：18—29、30—49、50—59），这样将劳动年龄总人口分为了 24 个群体。然后，按照上述五种工作状态类别，我们计算每类人口在每类工作状态中的比重。最后，计算每类工作状态人群比重的变动状况及分解变动来源。用公式表达，就业状态 j 的劳动人口份额为：

$$\bar{\pi}_t^{\,j} = \sum_g w_{gt}\pi_{gt}^{\,j} \tag{1}$$

其中，$\bar{\pi}_t^{\,j}$ 代表时间 t 就业状态 j 的劳动人口份额，w_{gt} 是 g 组人口在时间 t 占总劳动人口比重，$\pi_{gt}^{\,j}$ 是 g 组人口在时间 t 在就业状态 j 的份额。这样，两个时期就业状态 j 的劳动人口份额变化可以表示为：

$$\begin{aligned}\bar{\pi}_1^{\,j} - \bar{\pi}_0^{\,j} &= \sum_g w_{g1}\pi_{g1}^{\,j} - \sum_g w_{g1}\pi_{g0}^{\,j} \\ &= \sum_g \Delta w_{g1}\pi_{g0}^{\,j} - \sum_g w_{g0}\Delta\pi_{g1}^{\,j} + \sum_g \Delta w_{g1}\Delta\pi_{g1}^{\,j}\end{aligned} \tag{2}$$

其中，$\sum_g \Delta w_{g1}\pi_{g0}^{\,j}$ 反映了由于人口份额变动导致的就业状态 j 占总劳动份额变动，称为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sum_g w_{g0}\Delta\pi_{g1}^{\,j}$ 反映了由于每类人口在就业状态 j 的就业比重变动造成的总就业状态 j 比重变动，称为倾向效应（Propensity Effect）；剩余的部分 $\sum_g \Delta w_{g1}\Delta\pi_{g1}^{\,j}$ 称为交叉效应（Interaction Effect）。结构效应和倾向效应是对劳动人口份额变动的两个主要解释，倾向效应可以看作劳动需求结构变动，而结构效应是供给结构变动。通过上述过程的估计，我们可看到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不同类型就业状态份额变化及原因。这些数据有利于认识过去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替代、转移或退出。

表 4 为按照公式（2）分解的结果。流动人口中常规操作性工作就业人员占比下降在长期（2011—2017 年）内主要由结构效应决定，就算在倾向效应较强的短期内（2014—2017 年），结构效应依然占主导地位。这说明，常规操作性就业占比下降在长期和短期都是由人口结构变动主导的，而产业需求变动只在短期内对其有一定影响。长期内倾向效应为正、结构效应为负意味着人口结构变动降低了对非常规操作性就业的供给，而短期内倾向效应为负主导了非常规操作性就业占比下降。对于知识性就业占比的变动，无论常规还是非常规工作，长期还是短期，结构效应都为正。这说明，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导致更多人进入知识性工作。同时，倾向效应主导了两类知识性工作就业比例变动，其中对非常规知识性就业有下降效应，对常规知识性工作有拉动效应。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年中产业需求变动增加了常规知识性就业。

表 4　流动人口岗位变动成因分解

	之前	之后	变化	分解结果		
				结构效应	倾向效应	交叉效应
	(1)	(2)	(3)	(4)	(5)	(6)
2011—2017 年						
样本量（人）	70861	97335				
非常规知识性 (%)	17.96	17.82	-0.14	2.58	-3.56	0.85
常规知识性 (%)	26.53	27.97	1.44	0.23	2.30	-1.09
非常规操作性 (%)	13.78	13.67	-0.11	-1.42	1.08	0.23
常规操作性 (%)	23.29	21.47	-1.82	-2.22	-0.21	0.60
不工作 (%)	18.44	19.07	0.63	0.75	0.43	-0.52
2014—2017 年						
样本量（人）	111586	97335				
非常规知识性 (%)	19.81	17.82	-1.99	0.83	-3.24	0.41
常规知识性 (%)	25.46	27.97	2.51	0.02	2.90	-0.41
非常规操作性 (%)	15.49	13.67	-1.82	-0.50	-1.24	-0.06
常规操作性 (%)	25.16	21.47	-3.69	-2.00	-1.55	-0.17
不工作 (%)	14.08	19.07	4.99	1.64	3.12	0.22

（二）流动人口就业结构变动的原因

1. 供给层面的原因。流动人口群体人口学特征变动对应着上文的结构效应。如表 5 所示，从年龄上

看，18—29 岁的流动人口占比降低了 4%，30—49 岁的占比降低了 0.89%，50—59 岁的占比增加了 4.89%，特别是在较低学历流动人口中较年轻年龄段人口减少较多。这说明上文提到的流动人口老龄化问题确实存在。从教育上看，流动人口群体高中及大学以上的学历人口占比上升，小学以下及小学到初中人口占比下降。这说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确大幅提高。从性别上看，女性流动人口占比有所上升。由于年长者、女性从事常规性工作较多，而受教育较高者也容易从事常规知识性工作，人口结构变动能够部分解释常规知识性工作占比的增加。

表 5　流动人口特征变化

	2011	2017	变动
性别（占比 %）			
男	52.79	52.13	-0.66
女	47.21	47.87	0.66
年龄（占比 %）			
18—29 岁	36.27	32.28	-4
30—49 岁	59.73	58.84	-0.89
50—59 岁	4	8.88	4.89
教育程度（占比 %）			
小学及以下	15.02	14.72	-0.3
初中	53.04	42.51	-10.53
高中	22.25	22.8	0.55
大学及以上	9.68	19.97	10.29

2. 需求层面的原因。流动人群人口结构的变动增加了常规知识性和非常规知识性的就业供给，但前者的倾向效应为正，后者的倾向效用为负。这说明，对常规知识性工作的需求增加了，而对非常规知识性工作的需求则下降了。造成这种需求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行业层面，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服务业产值和就业的比重一直稳步增长并超过了其他两个产业。其中，2016 年服务业贡献了超过一半的 GDP，产值占比高达 57.5%，而就业占比也达到了 43.5%。服务业的发展催生了对常规知识性岗位的需求，这类岗位尽管对于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有一定要求，但相对低于非常规知识性工作。在行业内部，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样改变了对不同类型岗位的需求。自动化技术的使用替代了部分常规操作性就业，这与国际国内大趋势一致。特别是近年反映资本成本的利率大体呈下降趋势，助推了企业的技术革新和资本投入，促进了岗位替代，使企业减少雇佣低学历人群，增加对高学历人群的需求。

三、流动人口收入极化与就业结构变动

（一）流动人口收入极化趋势

我们使用 Wolfson （1994） 提出的极化指数（简称 W 指数）和 Duclos 和 Esteban （2004）完善的极化 DER 指数这两种常用指标考察全国及各省份流动人口收入极化程度的变动趋势。① W 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P_W = 2\mu(2T-G)/m$，其中，$T = 0.5 - L(0.5)$ 指的是收入较低的 50% 人口的人口份额（即 0.5）与收入份额之差，G 为基尼系数，m 为收入的中位数，μ 为收入的算术平均数。DER 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P_{DER} = \int\int f^{1+\alpha}(x)f(y)|x-y|\,dxdy$，其中，f(x) 和 f(y) 为收入分布的密度函数，α 取值介于 0 到 0.25 之间，取 0 值则退化为基尼系数。两个指数都介于 0—1 之间，且数值越大代表极化程度越高。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W 指数适用于双峰分布，以中位数作为分组依据，DER 指数则适用于多极分化。我们分别计算了各省流动人口的 W 指数和 DER 指数。② 无论基于哪个指标，全国流动人口收入极化水平都表现出上升趋势，特别是在 2012 年有显著提高。各省份流动人口的收入极化程度也表现出相似的趋势。影响收入极化的原因可能包括技术、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职业选择等诸多方面。

---

① Duclos J. Y., J. Esteban, D. Ray, “Polarization: Concepts, Measurement, Estimation”, *Econometrica*, vol.72, no.6, 2004, pp.1737-1772.

② 由于篇幅限制，计算结果不在正文中呈现，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二）流动人口就业结构对收入极化的影响

由于流动人口就业相对灵活，就业结构的改变可能是收入极化增加的重要原因。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正式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将各职业按照平均收入进行排序，并比较每一类职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在2011年到2017年间的变化。如图1所示（快递职业出现较晚，因此只列出17类岗位就业占比变动），平均收入最高岗位的就业占比增加最明显，这主要来自经商者比例增加。中等收入岗位就业占比稍微下降，主要是生产线、运输、餐饮、建筑及小商贩就业占比下降。低收入岗位就业占比稍增，主要来自保安、保洁、家政、农林牧渔相关岗位占比的轻微增加。这些特征事实与流动人口内部收入出现极化的趋势一致。

图1　各职业在2011—2017年间就业占比变动

注：1代表保洁，2代表保安，3代表无固定职业，4代表家政业人员，5代表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6代表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7代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8代表餐饮业人员，9代表其他生产业人员，10代表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1代表商贩，12代表建筑业人员，13代表专业技术人员，14代表运输业人员，15代表装修业人员，16代表商业人员，17代表国家机关人员。

进一步地，为了更规范地考察就业结构变动对收入极化的影响，我们把流动人口按职业分组，并参考Araar（2008）的方法将DER指数分解成组间和组内部分。① DER指数分解可以表达成以下的形式：$P=\sum_g \phi_g^{1+\alpha}\varphi_g^{1-\alpha}R_gP_g+\overline{P}$，其中 $R_g=\frac{\int a_g(x)\pi_g(x)f(x)^{1+\alpha}dx}{\phi_g\int a_g(x)f_g(x)^{1+\alpha}dx}$，$\pi_g(x)$表示g组内收入为x的组内人口份额。第一项构成了DER指数的组内成分；第二项为当组内成员收入等同于平均收入时（不存在极化）的DER指数，构成了DER分解的组间成分。图2为我国流动人口DER指数按职业分组的分解结果。显然，尽管组内和组间指数的变动趋势与总体指数保持一致，但总体的变动主要由组间指数驱动。具体而言，组内指数在2012年从0.021跳跃到0.052，此后一直在0.05上下波动，与总体指数差距很大；组间指数自2012年从0.196飞跃到0.439以后维持在0.4左右，与总体指数非常接近。因此，不同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整体收入极化的主要来源，可以解释大约90%的收入极化。

图2　按职业分解的DER指数

四、总结

基于2011—2017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本文对中国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演变进行梳理和原因探讨，并进一步考察了就业结构调整对收入极化趋势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将职业细分为15类，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发生了大幅变化。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经商者占比在7年中上升幅度超过1个百分点，而负责人及管理者、公务员和建筑人员的比例下降大于1个百分点。如果将各职业按五分法归类，流动人口中常规操作性工作的就业占比显著下降，常规知识性工作的就业比例显著上升。以上现象可能是由劳动力市场供给面的人口结构变动和需求面的服务业发展共同决定的。就业结构改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动人口收入极化水平上升，因为流动人口更多地进入高收入和低收入职业而部分退出中等收入职业。通过对度量收入极化程度的DEA指数分解进一步发现，职业间收入差异可以解释收入极化水平的90%。这说明就业结构对收入极化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在程度上不可忽视。由于流动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动的必然结果，为了缓解未来收入极化趋势进一步扩大，更全面的户籍制度放开、更平衡的区域发展应是下一阶段的重要政策导向。

责任编辑：张　超

① Araar A.,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Polarization Indices: Illustrations with Chinese and Nigerian Household Surveys”, CIRPEE Working Paper, 2008.

我国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及其差距变动

——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 *

高 帆 赵祥慧

[摘 要]农地制度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和相对结构的重要因素，而农地确权则是农地制度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采用 2011—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我国农户收入及其差距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农地确权在全国范围增加了农户人均家庭收入，这种收入增长效应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与此同时，农地确权虽然在整体上扩大了农户间的收入不平等，但贡献度非常有限。通过对收入的结构分解还发现，农地确权主要提升了农户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农户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较小。总体来看，鼓励和推进农地确权是稳定提高我国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单一的农地确权效力有限，必须强调农地确权与其他经济制度改革的协同，才能加快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并切实提高农户收入。

[关键词]农地确权 农户收入 农户收入差距 要素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86-06

一、问题提出

1978 年以来，我国开启了对内市场化改革、对外融入全球经济的伟大征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此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迅猛，1978—2019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33.6 元增至 16020.7 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2.57%。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依然显著，2019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仍高达 2.64 倍，农村内部不同农户收入差距也呈现逐渐扩大趋势，着力解决农民收入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当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已有文献关注到土地要素配置对农户收入及其差距的影响。例如，高梦滔和姚洋（2006）① 认为土地如被简单地涵盖在物质资本下，则其对于农户收入的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如果将土地作为一项特殊要素，将其制度安排作为重要的非市场因素，则土地制度安排就会对农户收入及其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2011 年我国开始试点农地确权，这次变革的核心是确定农户土地权利范围和边界，进而赋予农户对土地要素更充分的配置权利，提高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大量研究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产生的广泛影响，如 De Janvry 等（2015）② 认为农地确权改革增加了农户移民概率，促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研究”（17ZDA06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祥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① 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经济研究》2006 年第 3 期。

② De Janvry A., Emerick K., “Delinking Land Rights from Land Use: Certification and Migration in Mexic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5, no.10, 2015, pp.3125-3149.

进了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程令国等（2016）[①] 发现农地确权促进了我国的土地流转，并深刻影响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和范围。林文声等（2017）[②] 的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增加了我国农户家庭的金融负债。少数文献强调农地确权会通过多个途径影响农户收入，如许恒周等（2020）[③] 分别从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机制效应。总的来说，农地确权借助多重机制影响农户收入及其收入差距还有待系统总结和梳理。

本文试图综合考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市场，从农村要素市场的互动关联机制角度切入，展开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和收入差距这一主题的系统研究。基本的研究逻辑是：农民的收入可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农户确权是通过影响微观主体在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中的决策和行为选择，进而对农户细分收入类型、家庭总收入以及收入差距变化产生影响的。具体为：第一，农地确权能够通过作用于土地流转这一中介机制，逐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农地权利界定有助于促进土地从低生产率农户流转向高生产率农户，在市场化背景下这种流转对土地流入者和流出者均会产生收入增长效应。第二，农地确权会影响农户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决策。土地产权边界不清晰和预期不稳定通常伴随着农户劳动力的错配，或者说农村劳动力错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一种“反映”。农地确权有利于纠正农户劳动力错配，切实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第三，农地确权使得土地的资本化尤其是抵押担保功能不断凸显，这有助于减少农户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增强经营性物质资本投资、实现财务跨期平衡等影响到农户的家庭收入。概括起来，在市场化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我国农村的农地确权主要通过加强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三位一体”的互动，从多个方面影响农户的决策，进而影响农户的家庭收入和农户间的收入差距。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设置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设置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从研究主旨出发，我们对该数据库的基础数据进行了处理。首先处理家庭成员数据，计算并生成实证分析中需要的诸多家庭成员特征变量。然后，以户主为标识码 ID，把家庭成员的数据与户主数据对接，并把数据处理干净，最后只保留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同时存在的农户家庭数据，进而得出适合本文研究的平衡面板数据（Balanced Panel Data）。

被解释变量是收入，其符合正态分布，由此选择建立半对数模型，基础计量方程如下：

$$\ln Y_{ijt} = \delta \cdot Certif_{ijt} + \sum^{M} \beta_m X_{ijt,m} + \alpha_i \cdot H_i + \gamma_i \cdot T_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在上式中，被解释变量 lnYijt 表示 j 省份 t 年第 i 个农户人均年收入的对数。核心解释变量 Certifijt 表示某农户的农地是否确权（是 =1；否 =0）；X 表示一系列随时间变动、可能会影响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政策”等五组变量，具体的设置、度量方法主要参考程名望等（2016）。[④] 最终处理出来的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及其统计性描述见表 2。Hi 和 Tt 分别表示农户和年份固定效应；ε_{ijt} 是随机扰动项。系数 δ 等是半弹性系数，表示解释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导致的家庭收入水平变化百分比。需要说明的是，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的结果表明，本文所建立的主要解释模型都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即以农地确权户为处理组，以非农地确权户为对照组，同时控制年份和农户固定效应，利用双差法（DID）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的效应。由于数据特别是同村数据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本文所有模型在回归分析时均采用聚类稳健

① 程令国、张晔、刘志彪：《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管理世界》2016 年第 1 期。

② 林文声、秦明、苏毅清：《新一轮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地流转？》，《中国农村经济》2017 年第 7 期。

③ 许恒周、牛坤在、王大哲：《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 年第 10 期。

④ 程名望、史清华、Jin Yanhong、盖庆恩：《市场化、政治身份与收入效应——来自中国农户的证据》，《管理世界》2016 年第 3 期。

标准差（Clustering Robust Standard Errors）。此外，本文采用的核心变量“是否确权”及部分控制变量如“物质资本”“金融资产”均滞后一期，以避免以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农地确权不仅会影响农户收入的总体水平，而且会影响不同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回归分解方法是研究收入差距问题的常见方法，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包括 FY 方法、MS 方法和 Sharpley 值方法（万广华，2004）。[①] 每种方法各有利弊和适用条件，考虑到采用的数据和研究模型，本文选择采用 FY 方法进行回归分解，以此揭示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表 1　变量设置及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均值		全部样本		未确权户		确权户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总收入	34168.37	51722.48	33085.04	50045.46	34573.13	44734.14
	工资性收入（工资与奖金）	14435.05	26352.45	14156.68	26221.17	16651.01	28570.93
	经营性收入（农业与非农）	13757.08	39141.17	14077.21	37995.70	10910.18	26744.13
	转移性收入	4757.36	9530.08	3952.38	7966.68	5618.50	10846.87
	财产性收入	187.10	832.15	173.75	804.23	197.14	818.56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规模（个）	4.19	1.87	4.33	1.90	4.25	1.87
	户主年龄	57.50	12.68	57.16	12.58	57.85	11.34
	户主年龄的平方	3467.09	1466.93	3425.77	1446.23	3475.20	1308.09
	户主性别	0.86	0.35	0.88	0.32	0.89	0.32
	户主健康水平	3.13	1.14	3.10	1.15	3.12	1.11
	家庭劳动力比例	0.58	0.32	0.58	0.31	0.58	0.31
	是否从事农业生产	0.78	0.42	0.85	0.36	0.83	0.37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	0.54	0.29	0.54	0.30	0.53	0.28
	非农户口比例	0.26	0.28	0.25	0.27	0.22	0.27
	非农就业比例	0.62	0.32	0.59	0.31	0.61	0.31
	政治身份	0.03	0.18	0.03	0.18	0.05	0.21
人力资本	劳均教育年限	9.89	4.25	9.57	3.98	10.38	4.48
	劳均教育年限平方	93.12	106.72	85.45	92.77	110.44	115.33
	劳均工作年限	23.34	12.91	23.00	13.03	24.31	13.44
	劳均工作年限平方	711.47	1073.20	698.59	1088.78	771.15	1136.12
物质资本	生产性资本	13727.34	59065.67	15315.83	65559.34	17833.85	64914.31
	非生产性资本	31975.96	1.2e+05	30854.61	1.4e+05	33097.30	90622.27
	人均耕地面积（亩）	9.29	189.84	7.99	160.14	18.06	310.47
金融资本	人均金融资产	4890.30	24188.27	3528.91	9951.79	4582.60	12141.52
	人均金融负债	9483.49	4.2e+05	3600.77	15121.72	3894.26	12579.96
政策	政策	0.83	0.38	0.85	0.36	0.83	0.38
总样本数		6411					

注：（1）“户主健康水平”分为 5 档，“5”代表非常不好，“4”代表不好，“3”代表一般，“2”代表好，“1”代表非常好。（2）“政治身份”包含“党员户”或者“干部户”，只要是其中一项，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3）“政策”指是否享受惠农政策，包括“农业税减免”“农业补贴政策”等，只要享有或参与其中一项，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4）“显著性检验”中的数值是确权户和未确权户各变量“均值”的差，***、**、*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下同），限于篇幅，“显著性检验”的 t 值不做报告。

（二）确权户的特征

经过数据整理，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土地确权户的主要特征。伴随着农地确权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全体农户中确权户占比稳步上升，从 2011 年的 15.91% 上升至 2015 年的 35.89%。就均值来看，

① 万广华：《解释中国农村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一种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经济研究》2004 年第 8 期。

2011—2015 年，确权户和未确权户的年家庭总收入分别为 34573.134 元和 33085.042 元，前者比后者高 1488.092 元或 4.5%。就变化趋势而言，2011 年未确权户的年家庭总收入比确权户高 5.09%，到了 2013 年未确权户的年家庭总收入仅比确权户高 0.27%，而到了 2015 年确权户的年家庭总收入超过未确权户 3.96%。除此之外，确权户和未确权户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方面均具有不同的特征，详见表 1 的统计性描述结果。

三、实证分析

表 2　确权收入效应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_income ln_income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ln_income		
核心变量	是否确权（滞后一期）		0.202**(2.26)	0.550***(2.75)	0.312(1.23)
交叉变量	确权与年份	2011		-0.303*(-1.93)	-0.348**(-2.22)
		2013		-0.106(-0.85)	-0.130(-1.03)
		2015		0.000(.)	0.000(.)
	确权与区域	东部		-0.432*(-1.79)	-0.448*(-1.86)
		中部		-0.190(-0.95)	-0.190(-0.96)
		西部		0.000(.)	0.000(.)
	确权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				0.522*(1.94)
家庭人口规模（个）			0.131***(3.29)	0.136***(3.42)	0.134***(3.36)
户主年龄			0.048(1.38)	0.047(1.36)	0.044(1.27)
户主年龄的平方			-0.001*(-1.73)	-0.001*(-1.73)	-0.001(-1.63)
户主性别			0.138(1.04)	0.124(0.96)	0.122(0.94)
户主健康水平			-0.107***(-3.06)	-0.111***(-3.18)	-0.112***(-3.18)
家庭劳动力比例			0.049(0.19)	0.072(0.28)	0.067(0.26)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			0.304(1.34)	0.311(1.38)	0.162(0.68)
非农户口比例			-0.405**(-2.42)	-0.420**(-2.51)	-0.428**(-2.54)
非农就业比例			0.885***(4.82)	0.889***(4.83)	0.904***(4.93)
政治身份			0.099(0.46)	0.088(0.40)	0.092(0.43)
劳均教育年限			-0.007(-0.09)	-0.005(-0.07)	-0.005(-0.07)
劳均教育年限平方			0.003(0.54)	0.003(0.52)	0.003(0.48)
劳均工作年限			0.043**(2.43)	0.044**(2.48)	0.044**(2.48)
劳均工作年限平方			-0.001*(-1.96)	-0.001*(-1.96)	-0.001**(-1.97)
生产性资本（滞后一期）			-0.000(-0.99)	-0.000(-1.09)	-0.000(-1.10)
非生产性资本（滞后一期）			0.000(0.81)	0.000(0.92)	0.000(0.97)
人均耕地面积（亩）			-0.000(-0.34)	-0.000(-0.51)	-0.000(-0.63)
人均金融资产（滞后一期）			0.000(0.13)	0.000(0.15)	0.000(0.18)
人均金融负债（滞后一期）			-0.000**(-2.13)	-0.000**(-2.14)	-0.000**(-2.12)
政策			0.232*(1.76)	0.217*(1.65)	0.218*(1.66)
年份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区域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数			3275	3275	3275
R^2			0.12	0.123	0.125
F 值			14.86	12.98	12.64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Yes 表示该变量已经得到良好控制，控制变量的设置见表 1，下同。

本文利用 STATA 软件对确权的收入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在模型 1 中，F 值和 R^2 分别为 14.86 和 0.12，表明所设立的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

在模型 1 中，通过控制农户和年份固定效应，确权户的系数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实施农地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农地确权户比未确权户的家庭总收入高 0.202%。

模型 2 以模型 1 为基础，加入了确权户和年份及地区的交叉项，以考察确权对农户收入影响的时间趋势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一旦加入交叉项，确权户的系数显著增至 0.55。就时间趋势来看，2015 年确权户的收入效应与 2013 年相比区别不大，但比 2011 年的收入效应显著增加，这说明确权的收入效应很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就区域差异看，和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收入效应显著下降。这说明，相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确权在中西部这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很有可能发挥了更大的收入提升作用。进一步地，本文针对不同区域进行了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东部地区的确权户系数虽然也为正，但并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确权系数均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中部和西部确权户比未确权户的家庭总收入分别高 0.513% 和 0.559%，确权很有可能在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带来越大的收入提升效果。

表 3　确权收入效应的区域差异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解释变量	ln_income	ln_income	ln_income
是否确权	0.128(0.44)	0.513**(2.43)	0.559**(2.0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数	734	1640	901
R^2	0.254	0.112	0.121
F 值	5.538	7.799	4.098

模型 3 以模型 2 和模型 1 为基础，加入确权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的交叉项。结果表明，确权户的系数显著性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紧密相关，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越大，确权对农户家庭的收入提升作用越明显。

总体来看，农地确权确实给中国农户带来了显著的收入提升。但农地确权究竟通过哪些机制和途径影响农户收入？本文通过对农户收入来源的结构分解尝试对该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将农户总收入分解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四大部分，并采用方程（1）的结构模型分别对四大收入建立半对数固定效应模型。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确权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回报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而对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4　确权的结构化收入效应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被解释变量	ln_wage_income	ln_business_income	ln_transfer_income	ln_property_income
是否确权	0.687**(2.21)	0.492***(2.68)	-0.048(-0.35)	-0.151(-1.1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3275	3275	3275	3275
R^2	0.276	0.251	0.111	0.020
F 值	31.34	18.67	5.921	1.695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的总体增长效应，但如要全面评价农地确权的政策实施空间，还应考察其对农户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借鉴许庆（2008）① 的做法，利用 FY 方法研究土地

① 许庆、因士超、徐志刚、邵挺：《农地制度、土地细碎化与农民收入不平等》，《经济研究》2008 年第 2 期。

确权对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测算其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表 5 的结果显示，2011—2015 年农地确权对我国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总贡献率为 0.106%。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2015 年确权对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上升到 0.182%。总体而言，农地确权扩大了农户间的收入不平等，尽管这种影响程度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确权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有所上升。

表 5　确权对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of	inequality	in	ln income
Decomp.	100*s f	S f	100*m f/m	CV f	f/CV(total)
residual	81.08	0.119	0	1.210e+15	8.280e+15
确权（滞后一期）	0.106	0.000200	-0.282	-1.394	-9.501
控制变量	——	——	——	——	——
合计	100	0.147	100	0.147	1

注：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分解系数不做报告。

四、结论和建议

作为农地产权制度的组成部分，农地确权会影响农户收入及其相对状态。本文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获得的 2011—2015 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确权户的家庭总收入显著高于未确权户 0.202%，且这种收入扩大作用随时间推移有扩大趋势。更重要的是，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不同，确权在中部和西部分别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年总收入 0.513% 和 0.559%。通过分解农户总收入可进一步发现，确权主要提高的是农户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其他收入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以上结果都表明，农地确权带来的收入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和结构特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确权对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回归分解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扩大了农户间的收入不平等，尽管这种影响程度较小（仅占 0.106%），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确权对农户差距的贡献度有所上升。

应该看到，目前确权对总收入的提升幅度仍十分有限。究其根源，单一的农地确权措施尚不足以撬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进行大规模、有序的流动。这可能是当下确权户相对于未确权户的收入提升幅度有限的根源所在。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确权是前提，流转是核心，其最终的指向是提高土地要素流动性及其与其他要素的组合效率。就农地制度改革而言，要以确权撬动土地、资本乃至劳动力市场，除了明晰产权以外，还须同步推进土地、户籍和资本等领域的其他改革，需要搭建规范的农地交易平台来实现土地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更充分对接。目前，我们还不必过分担心确权加剧农户间收入差距的问题，而更应注重放大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的增长效应。一方面，需要对更多的农户家庭实施土地确权，尤其是在大多数农户仍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西部地区，通过明晰土地产权来促进各类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从而有效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开展相关配套制度的联动改革，多管齐下深化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要素高效率配置，为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张 超

产品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影响机制*

杨宜苗　邓京京　郭佳伟

[摘　要] 采用单因素 2 水平（产品功能属性一致性：高 vs. 低；产品享乐属性一致性：高 vs. 低）的两个组间实验设计，研究产品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影响发现，两种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均有正向影响，且消费者对享乐属性一致性的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更高。在产品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影响关系中，感知自我连续性具有中介效应；怀旧倾向则有正向强化作用，即消费者的怀旧倾向越高，产品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正向影响越大。为了提高老字号品牌延伸的效果，应维持延伸产品和原产品的功能属性或享乐属性一致性，增强消费者对自我连续性的感知，以及根据怀旧倾向进行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品牌中怀旧或创新要素的开发与传播。

[关键词] 产品属性　感知自我连续性　品牌延伸　怀旧倾向

〔中图分类号〕F27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092-08

品牌延伸是指将现有的成功品牌运用到其他不同的产品上，这种品牌战略能够降低新产品的市场进入风险，提高新产品的接受度。① 老字号品牌凭借其独特的工艺和卓越的品质，在消费者心中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通过品牌延伸能够达到振兴品牌的目的。② 契合度（Fit）是品牌延伸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它是指消费者对延伸产品的认知与原品牌的一致性（Consistency）或相似性（Similarity）。③ 契合度越高，消费者对品牌延伸的评价越正面。契合度取决于延伸产品和原产品之间的联系，联系可能是具体的（如特征相关、属性匹配），也可能是抽象的（如相同的使用情境）。④ 消费者对原品牌与延伸产品之间契合度的评价不仅取决于原品牌与延伸产品之间的类别相似性，而且取决于延伸产品的特定属性。⑤ 属性是指产品或服务的特征，产品属性可以划分为功能属性和享乐属性，前者是指产品带给消费者的基本功能和用途，后者是指产品传递给消费者的某种体验、乐趣或者象征意义。本文主要探讨产品功能属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消费者感知零售商创新性：结构测量及对感知价值和消费者忠诚的三重作用路径与边界条件研究”（7187203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流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体系构建”（18ZDA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宜苗，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流通研究院副教授；邓京京，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郭佳伟，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辽宁 大连，116025）。

① Aaker D. A., Keller K. L., “Consumer Evaluations of Brand Extens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54, no.1, 1990, pp.27-41.

② Lehu J. M., “Back to Life! Why Brands Grow Old and Sometimes Die and What Managers Then Do: An Exploratory Qualitative Research Put into the French Context”,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vol.10, no.2, 2004, pp.133-152.

③ Tauber M. E., “Brand Leverage: Strategy for Growth in a Cost-Control World”,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vol.28, no.4, 1988, pp.26-30.

④ Park C. W., Milberg S., Lawson R., “Evaluation of Brand Extensions: The Role of Product Feature Similarity and Brand Concept Consistency”,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18, no.2, 1991, pp.185-193.

⑤ Broniarczyk S., Alba J. W.,“The Importance of the Brand in Br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31, no.2, 1994, pp.214-228.

性和享乐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影响机制，可能的贡献包括：第一，以往关于品牌延伸契合度的文献，虽然提及产品属性，但是没有对产品属性进行明确的界定和细分。消费者会将产品视为诸多属性的集合，并高度关心与自身需求有关的属性，仅从整体上研究产品属性可能会造成认识上的绝对化。本文将产品属性划分为功能属性和享乐属性，探讨这两种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影响，拓展和深化了关于品牌延伸契合度的研究。第二，以往文献很少考虑怀旧在品牌延伸评价中的作用。怀旧元素是老字号品牌的独特优势，老字号品牌因其历史悠久和文化传承极易诱发消费者的怀旧情感。在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研究中，有必要体现怀旧情境。消费者的品牌记忆和怀旧倾向之间有重要关系，感知自我延续性也是怀旧情境中的一个重要构念，它表明个人处于此时此地，同时与自己的过去有关。[①] 因此，本文将感知自我连续性和怀旧倾向两个变量引入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研究中，将它们分别作为产品属性一致性和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关系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这为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提供了不同的心理解释机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产品属性一致性与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

许多思考是通过类比来完成的，我们面对一种情况时，会回想一个相似的情形，寻找两者共同点，然后进行推论及学习。[②] 在类比当中，一个熟悉的领域被用来了解另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为了强调两领域之间的相似性或者预测新领域的某些特质。类比推理包括接触（Access）、映射（Mapping）和转移（Transfer）三个阶段。当学习者开始处理一个目标物时，激发并提取基础领域里的心智表征，被称为接触。基础领域与目标物间的共同属性是触接阶段的关键因素。映射的目的是对齐（Align）基础和目标领域，以使与基础领域连结的知识可以移转至目标上。该阶段通过学习者建构一对一的基础和目标领域表征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代表知识在基础和目标领域之间被传输的路径。[③] 基础和目标领域可以通过属性、关系或属性加关系的方式被映射。学习在转移阶段发生，知识从基础领域移至目标。

消费者通过先前经验和学习掌握了与母品牌相关的知识，并通过比较延伸产品与母品牌的属性是否一致，以判定延伸产品是否与母品牌同属某一类别。消费者如果感知到延伸产品与母品牌的属性一致性很高，就会迅速产生与母品牌相关的联想并将这些联想映射到新产品上，将对母品牌的情感和态度转移到延伸产品上；消费者如果感知到延伸产品与母品牌的属性一致性低，就不会产生与母品牌相关的联想，不会将对母品牌的情感迁移到延伸产品上。[④] 因此，当老字号品牌被应用于属性一致性高的新产品时，原品牌会以属性加关系的方式被映射到新产品上，使消费者对延伸产品产生积极评价。

属性是指一个独立的特性或物体的成分，特性或成分既涉及具体的，又涉及抽象的。属性既包含与功能、用途相关的功能属性，又包含与体验、乐趣相关的享乐属性，消费者通常把产品这两个方面的表现作为线索对其做出判断和选择。[⑤] 根据图式理论，消费者对母品牌属性、价值、利益的认知和评价构成一种认知图式，使用同一品牌的延伸产品会被消费者视为与母品牌同属一个类别，并启动与母品牌相关的认知图式对其进行评价。由于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认知存在功能性和享乐性两种图式，所以延伸产品与母品牌在功能属性和享乐属性方面的一致程度会强化或改变已有的认知图式，并影响消费者对品牌

---

① Ju I., Kim J., Chang M. J., et al., “Nostalgic Marketing, Perceived Self-Continuity, and Consumer Decisions”, *Management Decision*, vol.54, no.8, 2016, pp.2063-2083.

② Holyoak K. J., Thagrad P. R., “Analogical Mapping by Constraint Satisfaction”, *Cognitive Science*, vol.13, no.3, 1989, pp.295-335.

③ Gregan-Paxton J., John D. R., “Consumer Learning by Analogy: A Model of Internal Knowledge Transfe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24, no.3, 1997, pp.266-284.

④ Dacin P. A., Smith D. C., “The Effect of Brand Portfolio Characteristics on Consumer Evaluations of Brand Extens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31, no.2, 1994, pp.229-242.

⑤ Mano H., Oliver R. L., “Assessing the Dimensionality and Structure of the Consumption Experience: Evaluation, Feeling, and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20, no.3, 1993, pp.451-466.

延伸的评价。如果延伸产品与母品牌在功能属性方面的一致性比较高，消费者可能会启动与母品牌产品功能属性相关的认知图式，认为母品牌生产技术上的专业性也会延续到延伸产品上，增强对延伸产品的信任。如果延伸产品与母品牌在享乐属性方面的一致性比较高，消费者可能会启动与母品牌产品享乐属性相关的认知图式，将母品牌的积极体验映射到延伸产品上，并给予延伸产品更高的评价。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H1、H1a 和 H1b。

H1：产品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有正向影响；

H1a：功能属性一致性越高，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延伸的评价越高；

H1b：享乐属性一致性越高，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延伸的评价越高。

（二）产品属性一致性与感知自我连续性

自我连续性（Self-Continuity）是自传体记忆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人们对过去自我和未来自我所构成的连续体的认知，感知自我连续性就是人们感知到的过去自我和现在自我相连续的程度。[①] 自传体记忆具有重要的自我功能，它可以帮助人们在对自己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连续性感知中，通过叙事的方式将过往的经历连接起来，建构并发展出连续的自我。[②] 老字号品牌作为一种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具有独一无二的品牌故事，历经时间的洗礼代代传承。对于消费者来说，通常具有一种独特的记忆和情感，这种记忆与个人过去的体验和经历具有密切的联系。当老字号品牌推出产品属性一致性高的延伸产品时，同样的味道或包装会唤起消费者对于老字号品牌的记忆和回想，建立起自我与过去所经历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促进对过去自我和现在自我之间连续性的感知。相反，当老字号品牌推出产品属性一致性低的延伸产品时，不同的属性特征影响了消费者对于老字号品牌相关记忆的提取，因而消费者感知到的自我连续性也随之减弱。

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的认知图式通常包括老字号品牌最具特色的功能属性和最具象征意义的享乐属性，这两种属性一致性都会促进消费者对自我连续性的感知。相比功能属性一致性低的延伸产品，具有共同功能属性的延伸产品有助于唤起自传体记忆中使用老字号品牌产品的情节和场景，建立起自我与过去所经历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增强消费者对自我连续性的感知。类似地，相比享乐属性一致性低的延伸产品，具有共同享乐属性的延伸产品有助于唤起自传体记忆中关于老字号品牌产品带来的体验和乐趣的回想，构建过去自我和现在自我的连续性意义，增强消费者对自我连续性的感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H2、H2a 和 H2b。

H2：产品属性一致性对感知自我连续性有正向影响；

H2a：功能属性一致性对消费者感知自我连续性有正向影响；

H2b：享乐属性一致性对消费者感知自我连续性有正向影响。

（三）感知自我连续性的中介效应

根据 S-O-R 范式，外部的环境刺激通过唤醒消费者特定的情绪或认知，引起消费者的行为反应。在老字号品牌延伸情境下，延伸产品属性的外在表现（如相同的味道或包装）会给消费者带来视觉、味觉、嗅觉等感官上的刺激。老字号品牌通常具有强烈的怀旧意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可以唤起消费者对过去有关老字号品牌的美好记忆，使消费者将过去的事情与现在的自我相联系。同时，老字号品牌通过怀旧营销引发的怀旧情绪体验也会促进消费者对自我连续性的感知，并影响他们的品牌态度。[③] 因此，产品属性一致性会唤起消费者自我连续性的感知，有助于消费者产生与老字号品牌相关的联想，并将积极的情感和态度转移到延伸产品上，对延伸产品做出更高的评价。也就是说，感知自我连续性在产品属性一

① Sedikides C., Wildschut T., Routledge C., et al., “Nostalgia Counteracts Self-Discontinuity and Restores Self-Continu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45, no.2, 2015, pp.52-61.

② Mc Adams D. P., *The Stories We Live By: Personal Myths and the Making of the Self*,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3.

③ Völckner F., Sattler H., “Drivers of Brand Extension Success”,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70, no.2, 2006, pp.18-34.

致性和品牌延伸评价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因此本文提出 H3、H3a 和 H3b。

H3：感知自我连续性在产品属性一致性和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之间起中介作用；

H3a：感知自我连续性在产品功能属性一致性和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b：感知自我连续性在产品享乐属性一致性和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四）消费者怀旧倾向的调节作用

品牌延伸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延伸产品与原品牌一致性的程度。消费者会对一致性高的延伸产品产生正面评价，对一致性低的延伸产品产生负面评价，但也不是绝对的。根据中等不一致效应，事物在头脑中存在固定的认知图式，相比与原有图式一致或极端不一致的信息，人们对中等程度的不一致信息的评价可能更高。① 这表明产品属性一致性对消费者品牌延伸评价的作用可能是有条件的。不同的消费者对品牌延伸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具有不同怀旧倾向的消费者对待品牌“变与不变”的态度也是不同的。② 怀旧倾向较强的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具有更为强烈的怀旧情感，在接触到产品属性一致的延伸产品时，会唤起更为强烈的感知自我连续性，对延伸产品产生更为积极的评价；在接触到属性不一致的延伸产品时，则会感知到更多的品牌改变，降低自我连续性的感知，对延伸产品的评价更为负面。因此，消费者的怀旧倾向越高，对延伸产品属性的“变与不变”就越敏感，产品属性一致性对品牌延伸评价的影响也越大。由此本文提出 H4、H4a 和 H4b。

H4：怀旧倾向对产品属性一致性和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H4a：怀旧倾向对产品功能属性一致性和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H4b：怀旧倾向对产品享乐属性一致性和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假设，本文构建出如图 1 所示的研究模型。

图 1　研究模型

二、实验 1：产品功能属性一致性与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

（一）实验设计

实验 1 采用单因素 2 水平（产品功能属性一致性：高 vs. 低）实验设计。

1. 品牌和产品选择。邀请消费者对 4 个老字号品牌（稻香村、冠生园、百雀羚、谢馥春）的熟悉度进行打分。T 检验结果表明，稻香村的品牌熟悉度（$M_{稻香村}$=5.07）高于冠生园（$M_{冠生园}$=1.90）（t=7.203，p=0.000），百雀羚的品牌熟悉度（$M_{百雀羚}$=4.73）高于谢馥春（$M_{谢馥春}$=1.40）（t=7.906，p=0.000）。因此，选择稻香村和百雀羚作为母品牌。

2. 产品属性选择。邀请 30 名学生进行预测试。通过初步访谈列出稻香村月饼和百雀羚护肤品的多个功能属性，然后要求被试从中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功能属性。结果表明，稻香村月饼最重要的功能属性是“口感软糯”（n=30，f=16），百雀羚护肤品最重要的功能属性是“草本精华”（n=30，f=16）。因此，选取“口感软糯”为稻香村产品的功能属性，选取“草本精华”为百雀羚护肤品的功能属性。

---

① Mandler G., Goodman G. O., Wilkes-Gibbs D. L., “The Word-Frequency Paradox in Recognition”, *Memory & Cognition*, vol.10, no.1, 1982, pp.33-42.

② 何佳讯、秦翁嫣、杨清云等：《创新还是怀旧？长期品牌管理“悖论”与老品牌市场细分取向——一项来自中国三城市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7 年第 11 期。

3. 情境设计。首先，邀请 3 位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生为每个母品牌设计 2 种虚拟延伸产品，分别是：P1 稻香村蛋糕（代表功能属性一致性高）、P2 稻香村茶叶（代表功能属性一致性低）；P3 百雀羚沐浴露（代表功能属性一致性高）、P4 百雀羚水杯（代表功能属性一致性低）。然后，选择 30 名对老字号品牌较熟悉的消费者，通过预测试对产品功能属性一致性进行操纵检验。T 检验结果表明：P1 稻香村蛋糕的功能属性一致性（$M_{蛋糕}$=5.40）高于 P2 稻香村茶叶（$M_{茶叶}$=3.27）（t=9.172，p=0.000），P3 百雀羚沐浴露的功能属性一致性（$M_{沐浴露}$=5.23）高于 P4 百雀羚水杯（$M_{水杯}$=3.07）（t=8.304，p=0.000）。可见，4 种虚拟延伸产品的功能属性一致性程度有显著差异，延伸情境设计合理。

（二）被试

通过设计“您是否曾经购买或使用过稻香村、百雀羚等老字号品牌的产品”问项来筛选被试者，选取了 160 位消费者作为被试参与实验，得到有效实验问卷 152 份。

（三）变量测量和操纵检验

1. 变量测量。感知自我连续性（psc）量表来自 Sedikides 等（2015），共 4 个题项；品牌延伸评价（bee）量表来自 Aaker 和 Keller（1990），共 7 个题项；怀旧倾向（nt）量表来自何佳讯（2010），[①] 共 14 个题项。采用 Likert7 级量表进行评分，从“1”到“7”分别表示从“极不同意”到“极同意”。

2. 操纵检验。在情境描述后设计问项“您认为这款新推出的稻香村蛋糕 / 茶叶具有口感软糯的功能属性吗”，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稻香村蛋糕的功能属性一致性（$M_{高}$=5.41）高于稻香村茶叶（$M_{低}$=3.27）（t=10.467，p=0.000）。同样，设计问项“您认为这款新推出的百雀羚沐浴露 / 水杯具有草本精华的功能属性吗”，结果表明，百雀羚沐浴露的功能属性一致性（$M_{高}$=5.19）高于百雀羚水杯（$M_{低}$=3.15）（t=8.944，p=0.000）。因此，实验 1 对稻香村、百雀羚两种产品的功能属性一致性的操控是成功的。

（四）实验结果分析

1. 功能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影响。以品牌延伸评价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功能属性一致性：高 vs. 低）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与功能属性一致性低相比较（$M_{低}$=3.48），功能属性一致性高时品牌延伸评价高（$M_{高}$=4.96，F=96.598，p=0.000），H1a 得到验证。

2. 功能属性一致性对感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以感知自我连续性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功能属性一致性：高 vs. 低）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功能属性一致性高时感知自我连续性（$M_{高}$=4.85）高于功能

表 1 感知自我连续性的中介效应和怀旧倾向的调节效应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bee	bee	psc	bee	bee	bee
fac		1.492***	1.656***	1.001***	1.485***	1.482***
psc				0.296***		
nt					-0.056	-0.086*
fac × nt						0.977***
R^2	0.019	0.404	0.425	0.465	0.408	0.726
F	0.566	16.399***	17.884***	17.889***	14.203***	47.431***
△ R^2	-	0.385	-	0.061	0.389	0.318
△ F	-	93.763***	-	16.388***	47.395***	166.061***

表 2 感知自我连续性的中介效应和怀旧倾向的调节效应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bee	bee	psc	bee	bee	bee
hed		1.710***	1.529***	1.200***	1.711***	1.696***
psc				0.334***		
nt					-0.085	-0.085*
hed × nt						0.988***
R^2	0.017	0.459	0.395	0.523	0.467	0.727
F	0.510	20.823***	16.023***	22.889***	18.287***	48.247***
△ R^2	-	0.442	-	0.064	0.450	0.260
△ F	-	120.328***	-	19.535***	61.683***	137.921***

注：fac 表示功能属性一致性；hed 表示享乐属性一致性；性别等人口统计变量不显著，在表格中均删除；*** 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5$；模型中数据为非标准化数据。

① 何佳讯：《我们如何怀念过去？中国文化背景下消费者怀旧倾向量表的开发与比较验证》，《营销科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

属性一致性低时（$M_{低}$=3.21，F=98.766，p=0.000）。因此，H2a 得到验证。

3. 感知自我连续性的中介作用。采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模型 1 为基准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等变量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没有影响。模型 2 的解释程度比模型 1 有显著改善（△ R^2=0.385，p=0.000），结果表明功能属性一致性对品牌延伸评价有正向影响（t=9.683，p=0.001）。模型 3 结果表明，功能属性一致性对感知自我连续性有正向影响（t=9.971，p=0.000）。模型 4 的解释力比模型 2 有一定改善（△ R^2=0.061，p=0.000），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且减小（t=5.262，p=0.000），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296（p=0.000）。因此，感知自我连续性对功能属性一致性与品牌延伸评价的关系有部分中介作用，H3a 得到验证。

4. 消费者怀旧倾向的调节作用。模型 6 在模型 5 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心化处理后的自变量（功能属性一致性）和调节变量（怀旧倾向）的交互项。模型 6 的解释力比模型 5 有明显改善（△ R^2 =0.318，p=0.000），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977（p=0.000），表明怀旧倾向和功能属性一致性存在交互效应。

从图 2 可见，在功能属性一致性低的情况下，怀旧倾向高的消费者（$M_{高}$=2.63）对老字号品牌延伸的评价低于怀旧倾向低的消费者（$M_{低}$=4.24）；在功能属性一致性高的情况下，怀旧倾向高的消费者（$M_{高}$= 5.54）对老字号品牌延伸的评价高于怀旧倾向低的消费者（$M_{低}$= 4.34）。因此，怀旧倾向在产品功能属性一致性和品牌延伸评价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H4a 得到验证。

图 2　功能属性一致性与怀旧倾向的交互作用

图 3　享乐属性一致性与怀旧倾向的交互作用

三、实验 2：产品享乐属性一致性与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

（一）实验设计

实验 2 采用单因素 2 水平（产品享乐属性一致性：高 vs. 低）实验设计。

1. 品牌和产品选择。邀请学生对 4 个老字号品牌（同仁堂、云南白药、回力、梅花）的熟悉度进行评价。T 检验结果表明，同仁堂的品牌熟悉度（$M_{同仁堂}$=6.07）高于云南白药（$M_{云南白药}$=5.30）（t=3.218，p=0.003），回力的品牌熟悉度（$M_{回力}$=5.23）高于梅花（$M_{梅花}$=1.30）（t=10.597，p=0.000）。因此，选择同仁堂和回力作为母品牌。

2. 产品属性选择。邀请 30 名学生作为被试进行预测试。通过初步访谈列出了同仁堂中药和回力球鞋的多个享乐属性，要求被试从中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享乐属性。结果表明，同仁堂中药最重要的享乐属性是“养生健康”（n=30，f=13），回力球鞋最重要的享乐属性是“运动休闲”（n=30，f=17）。因此，选择“养生健康”作为同仁堂产品的享乐属性，选择“运动休闲”作为回力产品的享乐属性。

3. 情境设计。首先，邀请 3 位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生为每个母品牌设计 2 种虚拟延伸产品，分别是：P1 同仁堂保健品（代表享乐属性一致性高）、P2 同仁堂咖啡（代表产品享乐属性一致性低）；P3 回力运动服（代表产品享乐属性一致性高）、P4 回力面巾纸（代表产品享乐属性一致性低）。然后，选择 30 名对老字号品牌较为熟悉的消费者，通过预测试对产品享乐属性一致性进行操纵检验。T 检验结果表明：P1 同仁堂保健品的享乐属性一致性（$M_{保健品}$=5.57）高于 P2 同仁堂咖啡（$M_{咖啡}$=3.37）（t=9.746，p=0.000），P3 回力运动服的享乐属性一致性（$M_{运动服}$=5.33）高于 P4 回力面巾纸（$M_{面巾纸}$=3.07）（t=11.377，p=0.000）。因此，4 种虚拟延伸产品的享乐属性一致性程度有显著差异，延伸情境设计是合理的。

（二）被试

通过设计“您是否曾经购买或使用过同仁堂、回力等老字号品牌的产品”题项来筛选被试，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 160 位消费者参与实验，得到有效问卷 154 份。

（三）变量测量和操纵检验

1. 变量测量。变量测量的操作方法同实验 1。

2. 操纵检验。设计问项“您认为这款新推出的同仁堂保健品 / 咖啡也具有养生健康的享乐属性吗”，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同仁堂保健品的享乐属性一致性（$M_{高}$=5.50）高于同仁堂咖啡（$M_{低}$=3.33）（t=10.984，p=0.000）。同样地，设计问项“您认为这款新推出的回力运动服 / 面巾纸也具有运动休闲的享乐属性吗”，结果表明回力运动服的享乐属性一致性（$M_{高}$=5.36）高于回力面巾纸（$M_{低}$=3.08）（t=12.283，p=0.000）。因此，实验 2 中对于同仁堂、回力两种产品的享乐属性一致性的操纵是成功的。

（四）实验结果分析

1. 享乐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影响。以品牌延伸评价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享乐属性一致性：高 VS. 低）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享乐属性一致性高时品牌延伸评价（$M_{高}$=5.06）高于享乐属性一致性低时品牌延伸评价（$M_{低}$=3.36）（F=124.224，p=0.006）。因此，证实 H1b。

2. 享乐属性一致性对感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以感知自我连续性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享乐属性一致性：高 VS. 低）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享乐属性一致性高时感知自我连续性（$M_{高}$=4.90）高于享乐属性一致性低时（$M_{低}$=3.37）（F=93.579，p=0.004）。因此，证实 H2b。

3. 感知自我连续性的中介作用。采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 1 为基准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等变量对延伸评价没有影响。模型 2 表明享乐属性一致性对品牌延伸评价有正向影响（t=10.969，p=0.000），且模型 2 的解释程度比模型 1 有显著改善（△ R^2=0.442，p=0.000）。模型 3 结果表明，享乐属性一致性对感知自我连续性有正向影响（t=9.526，p=0.000）。模型 4 的解释程度比模型 2 有了一定改善（△ R^2=0.064，p=0.000），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且回归系数有所下降（t=6.422，p=0.000），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也显著（t=4.420，p=0.001）。因此，感知自我连续性对享乐属性一致性与品牌延伸评价的关系有部分中介作用，H3b 得到验证。

4. 消费者怀旧倾向的调节作用。模型 6 在模型 5 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心化处理后的自变量（享乐属性一致性）和调节变量（怀旧倾向）的交互项。模型 6 的解释程度比模型 5 有明显改善（△ R^2=0.260，p=0.000），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988（p=0.000），因此验证了怀旧倾向的调节效应。从图 3 可见，当享乐属性一致性低时，怀旧倾向高时品牌延伸评价（$M_{高}$=2.59）低于怀旧倾向低时（$M_{低}$=4.19）；当享乐属性一致性高时，怀旧倾向高时品牌延伸评价（$M_{高}$= 5.71）高于怀旧倾向低时（$M_{低}$= 4.36）。因此，怀旧倾向在产品享乐属性一致性和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证实 H4b。

四、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结论和讨论

1. 产品属性一致性对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有正向影响。老字号品牌延伸产品与原产品的功能 / 享乐属性一致性越高，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延伸产品的评价越高，这印证了品牌延伸中的契合度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享乐属性一致性高的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高于功能属性一致性高的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表明享乐属性的契合可能比功能属性的契合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第二，消费者对产品属性一致性低的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得分总体接近中间值，而对产品属性一致性高的总体品牌延伸评价得分却接近 5 分。这说明产品属性一致性高带来的品牌延伸评价的正面效应，比产品属性一致性低造成的品牌延伸评价的负面效应更为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不一致信息导致消费者对于功能属性和享乐属性的认知图式匹配失败，大多数消费者对于一致性高的延伸产品更为敏感，并且能够成功唤起其对老字号品牌的正面情感。

2. 产品属性一致性对感知自我连续性有正向影响。相比功能或享乐属性一致性低时，老字号延伸产品属性一致性高时消费者感知自我连续性更高。正如广告语“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所传递的诉求，当消费者接触到一种新的延伸产品时，同样的配方和味道能够唤起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的怀旧情感，并回忆过去使用老字号品牌产品的经历和体验，从而促进消费者对过去自我和现在自我的连续性感知。这一结论也丰富了自传体记忆的相关理论，即产品属性一致性高的延伸产品会唤起消费者对于老字号品牌的回忆，促进个体通过提取自传体记忆建立起事件和自我的联系，构建自己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连续性意义。跨行业样本分析还发现，消费者对食品品牌（稻香村）、鞋类品牌（回力）延伸产品的感知自我连续性较高，而对日化品牌（百雀羚）、医药品牌（同仁堂）延伸产品的感知自我连续性较低。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消费者对于食品的记忆通常与味道、香气等功能属性相关，这种源于感官的刺激更能唤起消费者对过去自我的回忆；消费者对于服装的记忆则通常与过去的体验和乐趣等享乐属性相关，这种与过去经历相联系的回忆更能唤起消费者对自我的感知。

3. 感知自我连续性在产品属性一致性和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在老字号品牌延伸过程中，产品功能属性或享乐属性的一致性会唤起消费者对于老字号品牌的怀旧回忆，进而促进自我连续性的感知，并影响消费者对延伸产品的评价。这一研究扩展了 Kessous 和 Roux（2010）关于自我—品牌联结（Self-brand Connection）的研究，他们认为消费者与老品牌之间具有一种独特的联系即自我—品牌联结，人们会通过消费具有怀旧意义的老品牌来达到构建自我的目的。[①]

4. 怀旧倾向在产品属性一致性和老字号品牌延伸评价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Shields 和 Johnson（2016）发现怀旧在品牌改变和消费者反应之间有调节效应，本文与其研究结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高怀旧倾向者对老字号品牌具有更强烈的怀旧情感，在接触到产品属性一致的延伸产品时会更为强烈感知自我连续性，对延伸产品做出更积极评价；在接触到产品属性不一致的延伸产品时，则会感知到更多的品牌改变，降低自我连续性的感知，对延伸产品做出较低评价。

（二）管理启示

1. 延续老字号品牌的属性一致性。任何品牌都处于由功能属性和享乐属性构成的二维坐标系中，在制定老字号品牌的延伸策略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开发具有相同功能属性的延伸产品，如稻香村等老字号食品品牌，可以延续原有的口味或成分推出相似的新产品，以唤起消费者的记忆和情感；第二，开发具有相同享乐属性的延伸产品，如百雀羚等老字号日化品牌，可以延续原有的包装或形象推出相似的新产品，在营销传播中赋予同样的象征意义，以维护消费者在品牌联想上的一致性。

2. 强化消费者对自我连续性的感知。老字号品牌可以通过实施怀旧营销策略强化消费者对自我连续性的感知。首先，在延伸产品的包装策略上，选用复古的外观设计，或者融入怀旧元素，以塑造独特的品牌文化记忆点。其次，在延伸产品的广告传播策略上，通过图片、音乐、视频等形式传递怀旧的情感诉求，唤起受众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并产生情感共鸣。最后，在延伸产品的活动宣传策略上，围绕老字号品牌开展怀旧主题活动，通过体验营销强化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的怀旧情感。

3. 细分怀旧倾向不同的消费者群体。老字号品牌可以根据消费者的怀旧倾向进行市场细分，以达到最佳的营销传播效果。针对怀旧倾向较高的消费群体（比如年长者），把怀旧元素作为传播要点，以唤起其对老字号品牌的怀旧情感；针对怀旧倾向较低的消费群体（比如年轻人），在产品宣传中强调创新，以满足其对产品的多元化需求。

责任编辑：张 超

① Kessous A., Roux E., “Brands Considered as ‘Nostalgic’: Consequences on Attitudes and Consumer-Brand Relationships”, *Rec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 vol.25, no.3, 2010, pp.29-55.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融合发展的效率分析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

罗良文　孙小宁

[摘　要] 集聚化、融合化发展是制造业突破重围、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依次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融合以及二者的联结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发现，集聚化发展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呈倒“U”型，该特征集中体现在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上，而集聚化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则呈正向线性；融合化发展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呈“U”型，但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度不高，未能越过“U”型曲线的拐点，融合化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推进。扩展性的研究表明，同非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更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提升 TFP。

[关键词] 协同集聚　产业融合　全要素生产率　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100-08

生产性服务业内生于制造业部门，与制造业产业紧密关联。随着我国由制造业一元化发展转变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并进发展，传统的制造业专业化集聚模式也逐步演变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集聚化、融合化是现阶段产业发展的普遍趋势，但集聚和融合并不总能带来积极影响，集聚会引起拥挤效应，融合也会带来试错风险，集聚和融合的过程还会产生摩擦成本、协调成本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那么，“制造 + 服务”如何实现深度融合？其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将产生何种影响？本文拟对此做一些实证探讨。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专业化分工深化，产业协作需求加强，技术进步加快，使得产业的集聚化、融合化成为发展潮流，与此有关的问题也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Marshall（1920）最早开始产业集聚的研究，并指出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池效应、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等引发了集聚行为。有关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结论不尽相同。如 Gopinath 等（2004）对美国、Broersma 等（2009）对荷兰、Martin 等（2010）对法国、Antonietti 等（2011）对意大利的集聚经济与效率问题进行考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解释与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7150327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科研培育项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研究”（2722020PY0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罗良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小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430073）。

察，[①②③④] 分别得出集聚与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正向、负向、不显著的影响关系。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多是关于单一产业集聚的效率问题。[⑤] 随着集聚模式的演变，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产业的协同集聚，如伍先福（2019）利用门槛模型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 TFP 的非线性影响，[⑥] 但此类文献还相对较少。

产业融合是不同行业在技术、产品、市场等领域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使得传统产业固有的条块分割被打破，产业边界趋向模糊，从而构建出一种新型协同和竞争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Lanaspa 等（2016）的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应与服务业产业政策协调一致。[⑦] 邓洲（2019）认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应对要素禀赋优势的衰减和贸易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⑧]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对生产率的影响，学者多从制造业服务化这一切面展开研究。[⑨] 例如，肖挺等（2016）证明了只有当制造行业 TFP 处于增长期时，服务化才能够发挥正向作用；[⑩] 吕越等（2017）的研究表明，制造业服务化有利于提升企业 TFP，特别是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程度较高的企业，其促进作用尤为明显；[⑪] 夏秋等（2018）利用 36 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得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 TFP 存在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⑫]

总结已有研究关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 TFP 的影响机理，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成本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投入产出关联，两者的协同集聚有利于建立“面对面”的供需网络，催生出两者互动协作的长效机制，减少企业搜寻、签约、监督、违约等成本，进而起到提升企业 TFP 的作用。第二，知识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知识和技术上的关联，两者的协同集聚便利了彼此间的沟通和学习，实现了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传播，并带来企业 TFP 的提升。第三，竞争效应。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过程中，前者的加入会触发“鲶鱼效应”，加剧制造业行业内部竞争，促使企业为了获得高端优质的生产性服务而极力提升竞争力和 TFP。第四，拥挤效应。集聚会带来土地和劳动等要素价格上涨、交通拥挤、居住和生活成本上升等，也会伴随产生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紧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不利于企业 TFP 提升。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对 TFP 的影响机理，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效应。产业融合有助于打破传统产业固有的格局，便于将内置的劣势环节外包，进而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在边际产出高、经济效益好、竞争实力强的关键环节，通过产业间资源的转移优化，获得资源配

---

① Munisamy Gopinath, Daniel Pick, Yonghai Li,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Taylor & Francis Group*, vol.36, no.1, 2004, pp.1-7.

② Broersma L., Oosterhaven J., “Region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Netherlands: Evidence of Agglomeration and Congestion Effect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49, no.3, 2009, pp.483-511.

③ Martin P., Mayer T., Mayneris F., “Public Support to Clusters: A Firm Level Study of French ‘Local Productive Systems’”,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vol.41, no.2, 2010, pp.108-123.

④ Antonietti R., Cainelli G., “The Rol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 a Structural Model of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A Firm-Level Analysis”,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vol.46, no.3, 2011, pp.577-600.

⑤ 杨浩昌、李廉水、刘军：《产业聚集与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科研管理》2018 年第 1 期。

⑥ 伍先福：《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中国 246 个城市的实证检验》，《经济经纬》2019 年第 2 期。

⑦ Lanaspa L., Sanz-Gracia F., Vera-Cabello M., “The (Strong)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Intermediate Producer Services’ Attributes and Manufacturing Location”, *Economic Modelling*, vol.57, no.3, 2016, pp.1-12.

⑧ 邓洲：《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意义与路径探索》，《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⑨ 王可侠：《5G 背景下的地区服务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以安徽产业为例》，《江淮论坛》2019 年第 6 期。

⑩ 肖挺、蒋金法：《全球制造业服务化对行业绩效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16 年第 6 期。

⑪ 吕越、李小萌、吕云龙：《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南开经济研究》2017 年第 3 期。

⑫ 夏秋、胡昭玲：《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成本和风险的视角》，《当代财经》2018 年第 7 期。

置效应下的 TFP 提升。二是涟漪效应。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通常具有高知识性、高技术性、高创新性等特点，这些生产性服务业较易通过同类项合并产生规模效应，经过不断的积累和壮大，能更好地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提升制造业企业的 TFP。三是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的融合化发展，便于制造业企业撷取生产性服务业的前沿知识和高新技术，再经过内化、整合、推广，极大地提高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的进步和效率的提升。四是挤占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会触及多方的经济利益及利害关系，产生“摩擦成本”。融合过程还需要政府、金融机构、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等多部门的协调和配合，必然也会产生“协调成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触及并引发既有业态的调整和变革，对融合路径的探索、模式的选择及机制的调整，都难以避免地将产生“试错成本”。对融合所产生的系列成本的支付，会挤占研发与创新的资本投入，抑制对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创造成果的转化。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尚存在较多拓展与深入的空间。第一，针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 TFP 的研究，尚止步于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企业领域的研究。第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的实证文献不多，且主要是以制造业服务化为视角。第三，集聚化和融合化是当代产业发展的两种密不可分的趋势，现有研究大多将两者割裂开来，仅有的将两者结合的文献也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涉及对微观企业 TFP 影响的文献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切入微观领域，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融合及二者的联结对制造业上市公司 TFP 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融合发展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本文分别构建了线性回归模型（1）和非线性回归模型（2）。

$$\ln TFP_{ipt} = \lambda_i + \alpha_1 X_{pt} + \beta Mac_{pt} + \gamma Mic_{it} + \varepsilon_{ipt} \quad (1)$$

$$\ln TFP_{ipt} = \lambda_i + \alpha_1 X_{pt} + \alpha_2 X_{pt}^{\ 2} + \beta Mac_{pt} + \gamma Mic_{it} + \varepsilon_{ipt} \quad (2)$$

其中，TFP_{ipt} 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标 i、p、t 分别表示企业、地区和年份。X_{pt} 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为协同集聚度 $Coag_{pt}$、产业融合度 Mix_{pt}。Mac_{pt} 和 Mic_{it} 分别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控制变量的集合。考虑到企业个体所属行业、所处区域以及考察年份等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将计量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即加入 λ_i 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个体差异，ε_{ipt} 为随机扰动项。①

集聚与融合的发展状态不同，会形成非集聚非融合、集聚又融合、集聚非融合、融合非集聚等不同的组合，而不同组合对企业 TFP 的影响也会产生差异。考虑到这一现实问题，本文借助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在不同融合程度下集聚化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以及在不同集聚水平下融合化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构建的门槛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ln TFP_{ipt} &= \lambda_i + \alpha_1 Coag_{pt} \times I(Mix_{pt} \le \tau_1) + \alpha_2 Coag_{pt} \times I(\tau_1 < Mix_{pt} \le \tau_2) \\ &+ \ldots + \alpha_{n+1} Coag_{pt} \times I(Mix_{pt} > \tau_n) + \beta Mac_{pt} + \gamma Mic_{it} + \varepsilon_{ipt}\end{aligned} \quad (3)$$

$$\begin{aligned}\ln TFP_{ipt} &= \lambda_i + \alpha_1 Mix_{pt} \times I(Coag_{pt} \le \tau_1) + \alpha_2 Mix_{pt} \times I(\tau_1 < Coag_{pt} \le \tau_2) \\ &+ \ldots + \alpha_{n+1} Mix_{pt} \times I(Coag_{pt} > \tau_n) + \beta Mac_{pt} + \gamma Mic_{it} + \varepsilon_{ipt}\end{aligned} \quad (4)$$

其中，τ 为门槛值，n 为门槛的个数，I(·) 为示性函数，若括号中的表达式成立，则函数值取 1，反之，函数值取 0。模型（3）的门槛变量为 Mix_{pt}，门槛依赖变量为 $Coag_{pt}$，模型（4）的门槛变量为 $Coag_{pt}$，门槛依赖变量为 Mix_{pt}，其他变量的含义如上。

---

① 进行统计运算时，为确保模型设定的准确性及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依据 Wald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分别对混合 OLS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筛选，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具有普遍有效性。

（二）变量及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微观企业 TFP 的测算目前多采用 OP 法和 LP 法，这两种方法分别是以当期投资和中间投入作为可观测生产率信息的代理变量。由于当期投资数据的缺失远大于中间投入，使用 OP 法会流失更多的样本量，故本文采用 LP 法估计企业的 TFP。

2. 核心解释变量。

（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度。陈国亮等（2012）使用区位熵指数创造性地发展了协同集聚指标，[①] 其计算公式如下：

$$Lq_{pi} = (e_{pi} / E_i) / (e_p / E) \tag{5}$$

$$Coag_{pij} = 1 - \frac{\left| Lq_{pi} - Lq_{pj} \right|}{Lq_{pi} + Lq_{pj}} \tag{6}$$

其中，Lq_{pi} 表示 p 地区 i 产业的区位熵指数，e_{pi} 表示 p 地区 i 产业的就业人数，e_p 表示 p 地区的总就业人数，E_i 表示全国 i 产业的总就业人数，E 表示全国的总就业人数。[②]$Coag_{pij}$ 表示 p 地区 i 产业和 j 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数。由方程（6）可以看出，该指数是通过比较相关产业区位熵的相对差异来度量的，其摒弃了关联产业集聚程度的信息。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采用张虎等（2017）的做法，[③] 在（6）式中加入两个产业区位熵指数之和，使其既能反映“协同”又能反映“集聚”，具体见公式（7）。

$$Coag_{pij} = 1 - \frac{\left| Lq_{pi} - Lq_{pj} \right|}{Lq_{pi} + Lq_{pj}} + \left| Lq_{pi} + Lq_{pj} \right| \tag{7}$$

（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度。本文参考谢康等（2012），[④] 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分解为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化、制造业服务化两条路径，通过比较两条路径上现实最好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偏离，计算单路径融合系数，再结合协同集聚的思想，计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融合度。具体的测算可分为三步。第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产业规模、产业结构、技术研发、经营效益、成长力五个方面构建指标评价体系，以全面准确地测算各省市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数 INS 和制造业发展指数 INM。[⑤] 第二步，借助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估算并比较现实最好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偏离，计算单路径融合系数。制造业服务化刻画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数 INS_{it} 为投入，构造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8）。利用 matlab 软件，采用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法估计模型，可估算出 i 地区 t 时期制造业的现实最好产出 f（INS_{it}）。再将之与同时期样本省区中用同等投入能带来的最好产出的最大值（理想产出）相比较，差距越小表明越接近于理想融合状态，融合度越高；反之则融合度越低。IC1 是制造业服务化融合系数，其测算方法见模型（9）。

$$INM_{it} = INM_{it}^{*} + \varepsilon_{it} = f(INS_{it}) + \varepsilon_{it} \tag{8}$$

$$IC1_{it} = \exp\left(\hat{f}(INS_{it}) - \max_{j=1\ldots n} \hat{f}(INS_{it}) \right) \tag{9}$$

同理，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化刻画的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可通过估计模型（10）和（11），测算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化融合系数 IC2。

---

① 陈国亮、陈建军：《产业关联、空间地理与二三产业共同集聚——来自中国 212 个城市的经验考察》，《管理世界》2012 年第 4 期。

② 受限于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可得性，计算集聚指标所使用的就业人数均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③ 张虎、韩爱华、杨青龙：《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 年第 2 期。

④ 谢康、肖静华、周先波、乌家培：《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⑤ 限于文章篇幅，主成分分析法的测算过程及结果不再列示。

$$INS_{it} = INS_{it}^{'} + \varepsilon_{it} = f(INM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0)$$

$$IC2_{it} = \exp\left(\hat{f}(INM_{it}) - \max_{j=1\ldots n} \hat{f}(INM_{it})\right) \quad (11)$$

第三步，计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融合度。不同于谢康等（2012）利用协调发展系数计算协同融合度的方法，为了既反映“协同”程度，又反映“融合”程度，本文利用前文协同集聚指标的构建思想，重新构建了产业融合度指标，即公式（12）所示。

$$Mix_{it} = 1 - \frac{|IC1_{it} - IC2_{it}|}{IC1_{it} + IC2_{it}} + |IC1_{it} + IC2_{it}| \quad (12)$$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分别从企业层面和省级层面，选取了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 TFP 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选取的指标及度量方法如表 1 所示。

表 1　控制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
企业级控制变量	资本密集度	Kint	企业总资产除以营业收入
	总资产利润率	Roa	企业净利润除以期末总资产余额
	股权集中度	Equity	企业前 10 位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劳动生产率	Labor	用员工人数除企业营业收入的商的万分之一表示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固定资产净额的自然对数
省级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Eco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产业结构	Struc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环境治理投入	Env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工业增加值之比
	研发能力	Rd	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的自然对数
	市场化程度	Market	采用王小鲁等编制的分省份市场化指数表示
	对外开放度	Open	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三）数据和相关处理

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界定为“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五大行业。生产性服务业行业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制造业行业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其余宏观数据基本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样本企业为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有关股权集中度的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将搜集的上市公司数据与省级宏观数据进行匹配，同时剔除非正常的 *ST 和 ST 公司样本，以及员工人数、营业收入、总资产等关键指标值缺失的公司样本，最后得到 2011 年到 2017 年间来自中国内地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2191 家样本企业，共计 11185 个观测值。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依照前文研究设计，本部分依次考察集聚化、融合化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在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时，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自相关和截面相关的问题，本文采用 Driscoll & Kraay (1998) 的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表 2 报告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制造业企业 TFP 的估计结果。对制造业企业整体而言，列（2）中协同集聚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集聚化对企业 TFP 产生倒“U”型影响。列（3）和列（4）结果显示，集聚化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是倒“U”型的，这可能是共享劳动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列（5）和列（6）结果显示，协同集聚

的各项系数都不显著，集聚化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不大。列（7）结果显示，协同集聚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集聚化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TFP 具有正向线性促进作用，这主要得益于集聚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

表 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

变量	整体制造业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1）	（2）	（3）	（4）	（5）	（6）	（7）	（8）
Coag	0.083 (1.90)	0.755** (3.47)	-0.011 (-0.14)	1.212** (3.32)	0.057 (1.08)	0.946 (1.29)	0.128** (2.49)	0.351 (0.78)
Coag^2		-0.114** (-2.92)		-0.212** (-3.31)		-0.152 (-1.21)		-0.038 (-0.5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269	0.269	0.500	0.502	0.315	0.316	0.299	0.299
N	11185		2346		3223		5616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差，*、**、***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3 报告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影响制造业企业 TFP 的估计结果。由列（2）中产业融合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可知，融合化对整体制造业企业 TFP 产生了“U”型的非线性影响。列（1）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大部分企业尚未越过“U”型曲线拐点，处在融合化发展不利于企业 TFP 提升的阶段。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产业融合抑制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TFP 的提升。列（5）和列（6）的结果表明，融合发展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呈“U”型变换。列（7）和列（8）的结果表明，融合化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同样呈现为“U”型。不同的是，随着产业融合的进一步深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比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更早地迎来拐点，进入“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

表 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

变量	整体制造业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1）	（2）	（3）	（4）	（5）	（6）	（7）	（8）
Mix	-0.120** (-2.80)	-0.383*** (-7.87)	-0.099** (-3.24)	-0.078 (-1.72)	-0.126* (-2.21)	-0.333*** (-6.50)	-0.098** (-2.90)	-0.437*** (-5.24)
Mix^2		0.092*** （-4.66）		-0.007 (-0.41)		0.070** （-2.96）		0.123*** （-3.9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27	0.27	0.502	0.502	0.318	0.319	0.299	0.301
N	11185		2346		3223		5616	

表 4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数	F 值	P 值	临界值			门槛值	置信区间
				10%	5%	1%		
协同集聚	单一门槛	17.60*	0.0660	15.8702	19.9999	28.5661	2.7318	[2.7228, 2.7331]
	双重门槛	6.30	0.4020	12.3466	15.8056	22.6525	2.7318	[2.7190, 2.7331]
							2.6333	[2.6216, 2.6343]
产业融合	单一门槛	39.74***	0.0020	19.8602	24.2434	31.3891	0.5502	[0.4884, 0.5672]
	双重门槛	12.26	0.3000	18.5917	25.1700	40.7515	0.5994	[0.5672, 0.6366]
							0.8742	[0.8648, 0.8749]

（二）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本部分借助门槛回归模型，解析在不同融合度下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以及在不同集聚水平下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表 4 报告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 TFP 存在协同集聚的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2.7318；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 TFP 存在产业融合的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0.5502。

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可分组讨论产业融合、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以协同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时，根据门槛值的大小，可将产业融合对企业 TFP 的影响分为两类。当集聚度未跨越 2.7318 时，产业融合对 TFP 的影响系数为 -0.084；当跨越门槛值后，影响系数变为 -0.127（见表 5）。这表明，在过度集聚的情况下，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抑制作用更强。以产业融合为门槛变量时，单一的门槛值可将协同集聚对 TFP 的影响划分为两类。当融合度低于门槛值 0.5502 时，协同集聚对企业 TFP 的影响系数为 0.084；当融合度高于门槛值时，影响系数变为 0.042。这表明，在融合度较高的情况下，由产业集聚带来的 TFP 的增长效应被削弱。

表 5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门槛变量为 Coag	门槛变量为 Mix
Mix	-0.084***(-3.12)	
Mix*dum1（Coag〉=2.7318）	-0.043***(-3.56)	
Coag		0.084*（-1.88）
Coag*dum2（Mix〉=0.5502）		-0.042***(-5.71)
控制变量	是	是
R^2	0.287	0.288
N	8239	8239

四、扩展性研究

进一步地，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为知识密集型和非知识密集型，[①] 以比较与异质性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差异化影响。[②] 表 6 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从产业融合

表 6　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

变量	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非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1）	（2）	（3）	（4）	（5）	（6）	（7）	（8）
Mix	-0.063 (-0.92)	-0.237** (-3.29)			-0.148*** (-5.09)	-0.223*** (-5.71)		
Mix^2		0.063*** （-4.28）				0.043** -3.11		
Coag			0.048 （-1.42）	1.307*** （-4.88）			0.082* （-2.04）	0.076 （-0.3）
Coag^2				-0.211*** (-4.37)				0.001 （-0.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269	0.27	0.269	0.27	0.277	0.277	0.269	0.269
N	11185				11185			

① 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非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及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② 本文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度、产业融合度的测算方法，同样运用到与知识密集型、非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和融合的测度上。

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知识密集型或是非知识密集型，与制造业的深化融合都对企业 TFP 产生“U”型影响。但由回归系数的值可知，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能使制造业企业更早越过“U”型曲线拐点，步入有效促进企业 TFP 增长的阶段，且增长速度也会更快。从协同集聚的角度来看，与非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对制造业企业 TFP 产生了线性正向影响，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对制造业企业 TFP 产生了倒“U”型影响，这说明，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会产生较大的拥挤效应。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中国内地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融合以及二者的联结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发现：（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 TFP 产生了倒“U”型影响，这尤其体现在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上，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TFP 则产生正向线性影响。（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呈“U”型变化，目前产业融合的质量和深度还远远不够，未能到达“U”型曲线的拐点，融合化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推进。（3）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 TFP 存在协同集聚的单门槛效应，若集聚度跨越门槛值，则会加深融合化对企业 TFP 的负向影响；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 TFP 存在产业融合的单门槛效应，若融合度跨越门槛值，则会部分挤占集聚化对企业 TFP 的积极作用。（4）对异质性生产性服务业的考察发现，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能更早地步入“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且更快速地作用于企业 TFP 的提升；在产业集聚方面，与非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协同集聚正向促进了制造业企业 TFP 的提升，而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会产生较多的拥挤成本，进而对企业 TFP 呈现倒“U”型影响。

由此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1）应围绕制造业部门发展需要，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协同集聚模式，自主吸引关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时辅以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重点引导与非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以充分挖掘集聚潜能。（2）倡导制造业部门将非核心的生产性服务环节逐渐剥离，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并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拓展，同时剥离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又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进而形成“两翼齐飞”的共赢局面。（3）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重点培育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并为之与制造业的融合提供更多机会，着力推进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的发展。（4）政府部门应通过建立信息服务平台等方式，搭建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沟通的桥梁，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交汇和共享，实现中间投入品的供需双方有效衔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供需关系网络。此外，政府部门还应通过改革体制机制、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信用管理体系等方式，促进形成分工有序、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分布格局，使得集聚效能和融合效能充分释放。

责任编辑：张 超

历史学

1947 年上海市政府对离奇火灾案的处置与消防事业的改善

朱 英

[摘 要]抗战胜利后上海遭遇严重房荒，且火灾频仍，尤其 1947 年 1 月发生的一场大火给灾民造成的损失极为惨重，并广为传闻消防员有渎职甚至是趁火打劫行为，舆论称之为离奇火灾案。上海市政府及所属相关部门对这次火灾极为重视，经市长吴国桢亲自督办迅速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详实调查并提交调查报告书，认定消防员确有失职行为，但勒索盗取金条查无实据。离奇火灾案发生后，上海全体消防员因不堪舆论指责而提出总辞职，引发了完善消防设施、改善消防员待遇的讨论。

[关键词]战后 上海 火灾 消防

〔中图分类号〕K2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108-12

抗战胜利后普天同庆，万众欢腾，但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多年侵略炮火摧残的中国损失惨重，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由于战争期间大量房屋被毁，战后军政商众多人员复员返沪，原本住房短缺的上海不仅房租奇贵，而且出现了严重的房荒。时人称："抗战以还，都市房屋，供求不能相应，于是解决房荒，亦为社会严重问题。"① 处于房荒中的上海，在居民区又接连发生火灾，更属雪上加霜。1947 年 1 月在武定路和陕西北路相连地方发生了一场火灾，媒体报道称之为"大火奇案"。这场大火持续燃烧长达 10 余小时，许多居民的住宅连同财物化为灰烬，随后还引发了追究消防员渎职与趁火打劫向受灾居民强索金条案，并促进了对上海消防事业存在不足的反思与改进。鉴于史学界对这次离奇火灾案尚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探讨，本文拟主要依据抗战后的上海各报史料做进一步论述。②

一、离奇火灾发生后的媒体报道

这场大火灾发生于 1947 年 1 月 22 日晚 9 时 40 分左右，直至第二天中午才最后熄灭。起火当天对中国人而言本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恰逢农历正月初一，即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喜庆中忙着"过年"。然而一场无情的大火却使许多家庭的房屋和财物尽失，许多人在寒冷的冬夜里无家可归，瞬间陷入无比悲惨的困境。

因值春节期间，上海各报从初一至初三均未发行，直到 25 日恢复出报才对这场大火进行了大篇幅报道。《申报》的报道称："本月二十二日晚九时四十八分，陕西北路（即西摩路）武定路发生大火，共计焚毁房屋十三幢，损失达二十余亿元。前后焚烧十三小时，为本市胜利以来所未有之大火，幸未伤

作者简介 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430079）。

①《潘（公展）序》，祝匡正：《房屋租赁条例详解》，上海：大东书局，1948 年，第 1 页。

② 对这次火灾有简略介绍的研究成果可参见胡静：《1947 年上海西摩路、武定路口大火案初探——以〈申报〉报道为中心》，《广角镜》2012 年第 4 期；《上海武定路西摩路大火奇案》，《中国档案报》2013 年 2 月 28 日第 3 版；等等。

人。”这场大火最初起于武定路425号所在的一家铜匠作坊，失火原因有报道说是由于收音机走电，当时在家的仅为女主人，惊慌失措中“竟未加施救济，即匆匆逃避，至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大火旋即蔓延至西邻的陕西北路660弄10余幢房屋，内有武定路市立国民中心小学一所，均为三层楼屋，屋顶全用铅皮及木板构筑，屋顶与平顶间留有空隙甚大，且彼此穿贯，并无防火墙，“当火顺风向延及后，火势即迅作如原子弹爆发时之香菌式蔓延”。起火之后，各区消防队先后共派出11辆消防车，百余名消防队员赶赴现场。“虽经消防队莅场灌救，因火势酝酿于夹层内，原拟以利斧将屋顶铅皮劈开，任火穿顶，但铅皮坚硬，且重叠装钉，结果徒劳无功。至廿三日晨三时许，全部房屋均已为烈火包围，狂风助虐，火星四射，红火烛天，竟使到场之消防人员一〇九名束手无策。至十时后火势始渐消减，乃集中灌救，于十一时熄灭。”[①] 不难看出，这场大火的现场相当惨烈。最初的报道均称大火燃烧了13个小时，实际上长达15个小时。

《申报》记者在大火熄灭后即曾到火场进行实地考察，发现除起火之武定路425号全部焚毁外，东邻永勤胶厂及顺康木行亦稍被殃及，但损失轻微，西邻660弄内29号、27号、25号、23号、21号、17号、15号大部焚毁，13号、9号、7号、5号、3号、1号损害较轻，23号、21号为市立国民中心小学，“仅门房两侧尚完好，内部校具尽付一炬。当火烧时，住宿于校中之教员职工十余人，除抢出少数衣褥外，余均化为乌有，不得不暂宿附近新闻路市立小学内。”[②] 据事后调查委员会报告，消防车到达火场后立即进行了灌救，约20分钟后最初起火的425号与西邻29号两木屋与东邻永勤胶厂之火势渐熄，但大约半小时后，西邻660弄29号三楼又重新燃烧，且火势十分迅猛，快速向西蔓延，“共计洋房八幢，均被烧毁，余烬至二十三日下午一时始全熄灭，总计燃烧十五小时，舆论哗然，流言四起。”[③]

失火的当晚，风势颇大，雨也不小。大火之所以燃烧了10多个小时，与失火的房屋建筑特点有一定关联。“武定路之建筑，屋顶为铅皮，其下为木头，房内更有壁炉，壁炉有一股风，能煽动火势，木头上火烧，因铅皮故，未穿过屋顶，外观不知其已燃烧，铅皮未经燃烧，一至屋顶塌矣。铅皮四周有冒钉，冒钉难拔，故消防人员不能自屋顶施水救火。火烧十三小时，良有因也。”[④] 另还有报道转引消防处人员的说法，认为“该屋因系于民国前五年所建，已达四十年之久，其建筑亦颇陈旧，致使消防员束手无策”。[⑤]

然而，舆论多指消防车虽然及时到达现场，但消防员却灌救不力，甚至有不同寻常的懈怠甚至是趁火打劫行为，故将这场火灾称为“奇火案”。《大晚报》的一篇报道称：消防员“到场不救火，先来叽哩咕，打开保险箱，抢救大黄金”。其消息来源主要是接受采访的受灾住户，内容较为详细，节录如下：

> 据云：该处靠右为极易着火之短平房，且有橡胶厂一家，救火车赶到后，即与该厂主人咬耳朵讲话，叽哩咕噜，窃窃私语。结果救火人员面含笑容，竟倾全力，拦断火势，该处矮平房即全数保全，殊属古怪。而蒙难着火之红砖洋房，因无人出来咬耳朵讲话，致耽搁殊久，火势遂不可收拾。惟救火人员亦颇努力灌救，神态自若，举止不乱，且有口含香烟，睡态朦胧者，故皮带中射出之水，究射向何方，且是否有效，则概不顾问也。最足夸耀者，即为美军救火人员及救火车开到后，准备全力加入施救，惟各救火人员恐火场危险，或竟危及美军人员生命，有碍中美邦交，故将美军三辆救火车团团围住，不准彼等冒赴汤蹈火之险……美军人员莫明其妙，亦败兴而回。后二十九号三友实业社经理王云甫家火势大炽，众救火员奋勇冲入，惟想诸人员因赶来忽促，致晚膳亦未入肚，乃恭生桌畔，将该宅用以过年之鸡鸭鱼酒饱餐一顿，方整顿精神，动手救火。又据云：该宅楼上有保

①《西摩路大火达十三小时，居民议论纷纭大堪注意》,《申报》1947年1月25日第5版。

②《西摩路大火达十三小时，居民议论纷纭大堪注意》,《申报》1947年1月25日第5版。

③《调查武定路火灾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书》，上海市参议会秘书处编印:《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会刊》，1947年3月，第293页。

④《武定路乘火打劫迷》,《联合日报晚刊》1947年1月29日第4版。

⑤《西摩路大火案警局正在彻查中》,《中华时报》1947年1月26日第4版。

险箱一只，救火人员恐内中或藏有仓卒避火者，乃奋不顾身，刀劈斧砍，将保险箱中储存之物，全数救出，即大黄鱼小黄鱼之流，亦全部获救。抢救之勇，确可惊天地而泣鬼神。[①]

这段文字报道所描述的消防员救火情节十分离奇，但只是被采访者的一面之词。如果由消防员讲述救火经过，当然会有另一番说词，但当时却很少看到有消防员接受记者采访。事后面对火灾调查委员会的质询，消防人员即竭力说明其不顾危险奋力救火，绝无报道所称之不当行为。

除此之外，还有的报道透露消防员在施救这场大火的过程中，偷取富裕人家保险箱中的金条。火灾后据王云甫女儿告诉记者，家中保险箱被撬开，“内储黄金一二百条，及大批现钞、钻石、五百元关金券，全不翼而飞，估计损失约值五十亿元。”[②] 王云甫之子及内弟稍后也表示：“有衣箱六十只，打字机七架，首饰黄金一百五十两以上，全部丧失，而衣橱三只，均遭利斧砍破。”[③] 这些指控均指向了在现场灭火的消防员，而如此行为自然令人愤慨。故“日来喧腾全沪，舆论沸然”。有人指出：“据报载，救火车来了，消防员却想乘火打劫，假痴假呆，结果房子烧光，灾户损失奇重，人言纷纷。我们因不敢相信以为真，却也不免有点感触。俗语有隔岸观火，现在救火会却有这种嫌疑，未免令人伤透了心。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体，希望有关当局，召集灾户，严密侦查。此风绝不可长，假使所传属实，在新年中杀一两颗头，来整顿此种恶风，也是值得作的。”[④]

不过，也有报道对此种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外界传闻称消防人员窃取金条一二百根，“此事颇有疑问，盖普通人家绝买不起一二百根金条，或为富人所有者，则必藏于银箱中。设若消防员窃取，则必需先劈掉银箱，如今消防处当首先找寻银箱之残迹何在。又，失火中每个人一定有这种智识，即先将最值钱者拿走，那末，该失火主哪有将金条剩留之理?”[⑤] 需要指出的是，在大火发生后，报纸的报道有些也只是坊间的传闻消息，因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并不奇怪。

但这场惨烈火灾的讯息伴随诸多流言不胫而走，导致市民议论纷纷，怨声四起，不仅对消防警察而且对政府的形象也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市政当局必须审慎调查核实，并予以追究，以便给受灾家庭以及广大市民一个交代。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今后再有类似情形发生。如同《申报》的报道所说：“一般居民，议论纷纭，盛传此次于救火之前，曾有索取金条，大讲‘斤头’之情事，对此咸极表愤慨。在事实未获证明之前，吾人当不能妄加判断。然空穴来风，既有此说，市政当局似应有彻底查究之必要。论情理，上海既有自来水及救火车之优良消防设备，而竟不能迅予扑灭，任其延烧达十三小时之久，原因实难索解。此次之事，真相如何，姑且不谈，但就人民立场言，深望当局今后应切实注意，更望对消防行政力加改善，毋使全市五百万市民，对市政措施有失望之憾。”[⑥] 这番言论较为平实，可谓道出了广大市民的心声。

二、市政府及所属各部门的应对举措

由于这场大火导致受灾市民损失惨重，加之种种流言随之广为传播，很快即引起上海市各相关部门的关注。市长吴国桢强调事关市民公益，要求警察局彻底查明真相，消防员如确有渎职和违法行为，严惩不贷。他还表示将要亲自主持对这场火灾真相的调查与处理。“市党部主委方治表示：此案若不予以严惩，实不足以正社会风纪，保障人民安全。”[⑦] 警察局、监察使署地检处、地方法院检察处也高度重视，一致表示要严查真相，据实核办。江苏监察使程中行“对于武定路大火十三小时而未能设法扑灭一事，极表愤怒。昨晨十时，程氏特电召警局俞副局长前往监察使署，当面垂询至详，而消防处黄科长

---

①《西摩路救火奇闻》,《大晚报》1947 年 1 月 27 日第 4 版。
② 尹雪曼:《趁火打劫》,《益世报》1947 年 1 月 27 日第 6 版。
③《王云甫家属报告损失数》,《大晚报》1947 年 1 月 30 日第 4 版。
④ 傅红蓼:《上海风》,《大晚报》1947 年 1 月 25 日第 4 版。
⑤《武定路乘火打劫迷》,《联合日报晚刊》1947 年 1 月 29 日第 4 版。
⑥《西摩路大火达十三小时，居民议论纷纭大堪注意》,《申报》1947 年 1 月 25 日第 5 版。
⑦《奇火案负责人员方主委力主严惩》,《大晚报》1947 年 1 月 30 日第 4 版。

面陈施救情况。询毕，即相偕前往武定路大火场实地勘察”。此外，市参议会也“重视此案之滋生，为明真相起见”，马上派钱乃文等4位参议员“会同视察，并分访该受灾居民暨附近住户”。[①] 参议会议长潘公展还“召集各报记者，对此次西摩路武定路大火案发表谈话，希望市民协助政府发扬社会新风气，勿使不法事件继续存在”。[②] 另据报道，“警察局方面，并亦开始注意侦查，同时令饬消防处长切实查复，并盼市民大胆检举”。不仅如此，该报道还透露这场奇火案似乎惊动了南京的中央政府，“兹据记者探悉，此案发生之后，消息瞬息即传抵首都，中央方面对此惨无人道之事，已引起莫大注意，将于数日内派专员来沪，彻查本案真相。”[③] 但这则报道是否属实尚待查证，因在后来各方参与的历次调查本案会议中，始终未曾看到有中央政府所派专员参与。

不管是否有中央政府督促，上海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对这次涉及消防员不当行为的奇火案确实非常重视，并且立即从各方面展开了较详细的调查。揆诸相关史料，可以发现政府相关部门并非仅仅只是口头上表示重视，实际上也立即采取了行动。

首先是对火灾现场的踏勘，以了解具体情况。警察局率先行动，“昨虽为星期，警察局仍派某大员亲赴火场附近实地调查，俾获取正确情报”。[④] 上海地方法案检察处也派人赴火场进行了实地踏勘。检察官杨守成、沈祖寿、黄达平以及书记官徐启武4人，一起“前往火场实地查勘，并向各灾户及有关方面询问”。在火场瓦砾堆中检获劈斧，发现“被灾住户屋内之衣橱木板痕迹累累”。“复往该管区公所及保甲方面，详查当时参加救火之车辆记号，与在火场全体救火员人数姓名，均作最重要之侦查，以凭核办”。[⑤] 与此同时，其他相关部门也都相继派人到火灾现场进行了勘察。

其次是立即组织了“武定路火灾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有关此次火灾的各方面情况。该委员会系由上海市政府出面，召集各主要相关部门的代表组成。“现市府为公开调查当时失火施救情形，及有无弊端起见，特组织武定路火灾调查委员会，由市政府、参议会、警察局各派代表一人，会同江宁区区长及受灾业主代表一人，共五人组织之。市政府已派定参事葛克信为代表，担任该会主任委员。该会将接受灾户之陈诉及各界之检举，并着手调查此次火灾真相及施救实情。如有趁火打劫，或失职情事，一经查实，定予严办。”[⑥] 调查委员会委员除葛克信之外，另有参议会参议员张迺作、警察局督察长张达、江宁区区长侯隽人、受灾业主代表潘文珍，共计5人。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及时成立非常重要，因为所有调查工作都是由该委员会完成的，而尽力查明真相乃是处理这次火灾奇案的基本前提。

调查委员会于1月27日成立后，当日下午即在市政府举行了第一次至关重要的扩大会议，市长吴国桢亲自主持第一阶段会议并致词。除全体调查委员之外，江苏监察使署科长张立三、保长蔡国梁、甲长张志文、受灾住户代表郑敝坚等也出席了会议，并有报社记者列席旁听。吴国桢首先在致词中表示：“对此不幸事件，市府及警察局极感惭愧。对于外界所传消防人员有失职处，本人与警局宣局长及消防处周处长，均认为事关全体市民公益，调查及处理必须绝对公开。市府与警局决不粉饰，应予彻查。……此次组织调查委员会之目的，即在于明了事实真相，冀杜绝今后弊端之再生。”市长亲自出面要求调查及处理必须绝对公开，体现了市政府认真对待这次火灾事件的态度与决心，值得肯定。吴国桢代表市政府表达了坚决的态度与决心后，接着具体布置了火灾调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一是“行政调查”，包括何时起火，何时报警，消防队何时到达，救火时情形如何，是否无油无水，机械有无损坏等；二是“勒索情事”，请市参议会代表、江宁区保甲长及受灾居民，充分调查与陈诉；三是“打劫情事”，消防员如

①《监察使亲临灾区，检察官出马查勘》,《正言报》1947年1月29日第4版。
②《潘议长发表与宣局长谈话经过》,《申报》1947年1月28日第5版。
③《武定路大火奇案中央将派员彻查》,《大晚报》1947年1月26日第4版。
④《西摩路大火案真相即可大白》,《申报》1947年1月27日第5版。
⑤《武定路大火奇案检察官实地踏勘》,《大晚报》1947年1月29日第4版。
⑥《彻查武定路火灾施救情形调查委员会已组成》,《正言报》1947年1月28日第4版。

有趁火打劫行径，“一经查实，定予严办”。[①] 会议第二阶段由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葛克信主持，围绕委员会如何开展具体工作的各相关事项进行了讨论，与会者纷纷发言，各抒己见。吴国桢又提出几点建议，包括详细询问受灾居民，请当时在场的新闻记者与美军作证，询问到场的消防队指挥人及队员等。

这次会议实际上已开始进行了调查，与会的受灾居民代表郑敝坚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及亲身经历之情形：“本人于火势延烧时始终在场，仅见三个消防员曾施救，且态度极为悠闲。询以二十九号已遭延烧为何不救？一消防员即怒声相对，答曰水龙无水，你懂什么。等火势已延及二十九号上下三层时，消防员竟袖手旁观，并谓：妈的，随他去吧！”郑氏还提出两点质问，一是“消防员全属毫无经验”，在打开西摩路救火龙头后，竟先接上压水机，致水势猛烈皮带无法接上，结果徒然浪费宝贵时间；二是“救火车有云梯设备，为何始终未见应用”？在郑氏讲述的过程中，“吴市长连连点头称是，并鼓励在场者尽量检举”。甲长张志文称：“南面之美国兵营曾放出皮带企图施救，但为在场之消防员所阻，后美兵只得于营房内将皮带管子横过二宅洋房再行射水。”保长蔡国梁随后也发言。调查委员会委员张迺作听取各人的发言后表示：“对于本市消防人员，素来有‘救火先讲金条’之流言。此项流言，迄今尚未打破。此次事件发生后，吴市长亲自主持调查，深信必可水落石出。今后消防员纪律若经整饬，弊端当可绝迹。”[②]

最后经过讨论，葛克信确定调查委员会此后 3 天的调查日程，29 日上午赴灾区实地调查，制定灾区图案，下午召集各受灾人发表意见，如受灾人有不愿出席者，由调查委员会委员亲往访问；30 日上午继续访问受灾人，下午赴消防队调查访问；31 日上午访问美军，调查当时情形。葛克信还特别说明“欢迎各报记者参加，以示政府一切公开之意”。会议结束前，吴国桢表示：“中国必须走向民主之路，对于这件大事，必须公开而郑重。自明日起，盼于三天以内调查清楚，以凭处理。”[③]

可以说，本次会议对于调查奇火案具体情况以及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相当重要。吴国桢作为上海市长，在当时百废待兴、事务繁忙甚至是焦头烂额的情况下，能够自始至终出席这次会议，对调查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和细致要求，并反复说明调查与处理必须绝对公开，堪称难能可贵。当时有一位采访过吴国桢的美国记者在文章中称其做的事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并描述说：“吴市长的充沛精力无人可比……他忙得活象是在演一部卡通片，并一直要干到深夜，这种做法已经有了成效。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上海的行政水平可以说是差劲的，但照东方的标准，它还算得上出色。”[④]

除了上海市政府及其下属各相关职能部门之外，上海市参议会对于推动调查与处理这次火灾奇案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所周知，参议会是民意机关，号称“代表人民行使职权”，对于与人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项都比较重视。此次火灾不仅造成了人民极为严重的财产损失，而且又传闻出现了种种有关消防员渎职甚至是趁火打劫的恶劣行为，引起社会舆论一片批评之声，民众更是议论纷纷、抱怨丛生，参议会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火灾发生之后，参议会议长潘公展即与秘书长项昌权洽议，要求“参议会警政委员会之召集人、委员或其他参议员，尤以在该区选出者，对此事特加注意，作一详尽之调查”。随后，潘议长与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会商，“并将与宣铁吾谈话经过发表”。潘在会商时表示：“此次事件乃消防处之责任，消防机构虽系另一系统，但与警局有关。过去本市有些陋习，希望现在不再发生。消防人员待遇虽菲薄，但救火系一种义勇行为，值得吾人钦佩，此种义勇精神，实不应受到不良影响而破坏之。是故要求严正调查。”宣铁吾对潘之所言深表赞同，也表示“决予严厉调查，如查有不法人员，定予严办。同时尤希望受害市民挺身而出，自动检举，切勿隐忍”，并当即“电话通知消防处长，着令联合保

---

①《火灾调查委员会首次会议》,《申报》1947 年 1 月 29 日第 6 版。

②《火灾调查委员会首次会议》,《申报》1947 年 1 月 29 日第 6 版。

③《火灾调查委员会首次会议》,《申报》1947 年 1 月 29 日第 6 版。

④ 威廉姆斯·格雷（William P. Gray）:《世界上最难的工作——记上海市长吴国桢》，田中初译,《民国档案》2001 年第 3 期，第 44 页。

甲，会同有关人员，多方面调查并访问受害居民”。与此同时，参议会议决请市政府出面组织调查委员会，并表示“对于此次消防处失职，参议会有权作公开讯问”。[①] 紧随其后，由市政府出面组织的火灾调查委员会即正式宣告成立，并紧锣密鼓地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三、离奇火灾案的调查经过与情形

平心而论，对这次火灾奇案真相的调查并非易事，市政府要求必须在 3 天之内完成，这显然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调查委员会只能竭尽全力按照预定日程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29 日，调查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工务局测量专员宋学勤、李震球与各报记者等 10 余人“前往灾区作首次详细调查，分访灾户。结果，对救火员工作懈怠情事，众口一词，咸称确有其事。惟对打劫等劣行，则尚难获得实证，但据各受害人之答词中，则又多蛛丝马迹可寻”。对调查委员会这一天的察勘与调查活动，《申报》有十分详细的报道。察勘时参议会潘议长听取了受灾户讲述灾情，“频频鼓励受害者可畅述无忌，谓事关全体市民福利，必须予以彻查。参议会为民意机关，必为市民谋福利。”经其鼓励，灾民陈朱民称“目击〇一一及〇一七消防员有抢劫行为”，葛克信“当即电告吴市长，市长令将该两消防员交张处长办理，张处长立即通知消防处予以扣押”。顺康南货海味号店主裘炳顺详细讲述了其所见火灾情形，谓起火后“第一辆救火车在廿分钟后到达”，当时离起火点较近的王云甫宅的佣人所居木棚也着火，但“为时仅十余分钟即告扑灭”，俟后续救火车赶到时火已熄。不料半小时后王宅三楼突又起火，无法扑灭。当时美军救火车也赶到，因接不到水龙无法助救，以致足足燃烧 3 小时之久，“救火员在三楼窗口出现，但是他们却不许住的人进去”，后火势越来越大延至相邻房屋。裘炳顺还说“救火员们漫不经心，曾在附近老虎灶内呷酒谈天”。调查委员会又派人将聚兴园店主任焕亭叫来询问，任称大约晨 4 时左右，有数名消防员进店命令速生炉子，“并带洋酒一瓶，态度悠闲自得”，这种陈年洋酒一般富人家才会有。消防员呷酒之后留下了空酒瓶，已送交调查委员会。[②]

调查委员会一行人连同记者在勘察火灾现场时发现了令人生疑的情景。29 号王云甫宅虽然最先被延烧，“但不论从里到外，都比别家来得完整些。灶间没有坏，楼梯没有坍，墙上绿漆犹存，窗口上簇新的圣诞老人一个亦仍在。有一根救火皮带自后门通入，被烧断压在瓦砾堆中。值得注意的是每幢洋房之间确有风火墙，张处长说‘有风火墙，消防处的责任就更大’。”按照常理，燃烧长达 3 个小时，房内应该不可能是这种情景，救火皮带被烧断压在瓦砾下也令人费解。参与勘察的“检察官认为此点亦大有研究价值，盖如消防员努力灌救，当能随时顾到水管”。火灾现场的目睹者称：“消防员根本未灌救，而将橡皮管任意放置地上，后该处房屋延烧，墙壁坍倒，故橡皮管亦遭埋置。”庆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襄理唐瑞千宅为 11 号，已被烧成断垣残壁。据该户老妈子王英娟说：“火烧到我们房子时是深夜一点钟，但是从十点钟起，进进出出的救火员已经陆续不断了。他们不许我入内搬东西，但是却把楼下房间中的衣橱和鞋箱劈了一个大洞。奶妈要到楼上去抢东西，却被救火员抱住了调戏。”[③]

当日下午，更多受害人由保长召集与调查委员和记者见面。受害人“爆炸的愤怒，使他们不再像羔羊似的软弱。他们壮直地伸诉，无私地揭发”，使调查委员会又获得许多新信息。一受害人称：“他曾向一个救火员求援，但是正在施救的皮带管子却满是破洞，水花四射，除了全身被皮管子裂缝中的水浇湿外，一无效用。于是，眼看着他的珍贵的祖传唐伯虎、祝枝三等字画，全部化为灰烬。”这反映的是消防设施破旧落后状况。还有受害人反映救火员的荒唐举动，在国民小学燃烧时，他向消防员说明这是市立小学，赶快去救火，“不料救火员却冷笑着说‘反正市长有钱’”。国民小学校长潘文珍也证实，刚起火时有救火员陆续跑进来，即告诉他们是学校，请求帮助灭火。但消防员听说是学校，“立刻掉头而去，以后直到烧光为止，就始终没有看见过一条水龙进来”。另一个新发现的情况，是在救火过程中有消防

①《潘议长发表与宣局长谈话经过》，《申报》1947 年 1 月 28 日第 5 版。
②《五人调查委员会实地勘察火区》，《申报》1947 年 1 月 30 日第 5 版。
③《五人调查委员会实地勘察火区》，《申报》1947 年 1 月 30 日第 5 版。

员互相打架。“午夜一时左右，在大康里门口他亲眼看见救火员自己打架，三人扭做一团，后来经过另外几个救火员的劝解方始罢休。当时在场者均愤怒异常，消防员隔岸观火虽属可恨，火前打架更属可恶。”永勤橡胶厂老板童克勤则对调查委员会竭力否认曾用金条向消防员行贿，声称：“厂里的火，是自己弟兄和三个小工救灭的。厂中备有灭火机十几具，都已用完，再用铅筒浇水，火始告熄灭。”[①]

仅上述一天的情况即可说明，调查委员会绝非敷衍了事，而是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十分认真负责的勘察，并尽可能地听取诸多受灾人介绍各方面情况，了解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报社记者全程跟随调查委员会参与勘察和调查，并立即在报上刊出内容非常详细的报道，不仅使广大市民能够及时了解调查活动的相关进展，而且真正做到了市政府要求的绝对公开，发挥了公共舆论机关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调查委员会根据日程安排，30 日上午继续访问灾民，下午赴消防队调查。“因自火灾发生后，外间盛传王家损失最巨。而王本人或因怕与消防员结仇，至今未见出面作证。”调查委员遂主动来到王宅，但王云甫不在家中，只由王家亲戚略做介绍，并无什么新线索。稍后，调查委员张迺作及随行记者在江宁分局见到王云甫，进行了详细询问。王称“始终没有看见救火员是努力救火的，火是三楼先烧的，而他们的皮带从来未拖到过楼上”。[②] 至于家中财物损失，王氏只能大致列出家中存放的各类物品，但是否救火员窃取则缺乏确凿证据，这给调查核实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葛克信等在消防队的调查则并未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至美军驻地访问时，消防队长戈尔门与消防队员蔡维可夫等“说明当夜救火情形，对葛主委所询各点，皆有详尽答复”，但却都是“对救火人员颇为有利”。在场的宪兵队队长拜莱还称“报载中国消防人员曾阻美军救火，稍与事实不符，颇表遗憾”。美消防队向调查委员会演示了救火表演，“举止迅速，机件优良，故自发动至水龙出水，仅四分钟又三十余秒”。[③]

调查委员会起初感觉困难重重，但实际上能够了解到的情况，通过两天的调查大体上已基本掌握。大火燃烧 10 多个小时没有扑灭，消防员救火不力，既有设备老化破损的原因，也有种种失职表现。至于广为流传的消防员有强索金条以及其他趁火打劫行为，经多方调查也很难找到无可辩驳的证据。在调查委员会开展各项调查工作的同时，警察局和地检处根据调查结果也对相关人员抓紧进行侦讯。警察局刑事处先后扣押了 7 名消防员，由第一科进行审讯，接着移送地检处。“地检处对该案亦极重视，连日积极进行侦查，搜集有关证据。”但负责该案之检察官沈祖寿向报社记者表示：“本案侦查进行颇感困难，各被害人均未能陈述延烧时之实际情形，及提供各项证据。现各方正在进行调查之际，极盼各被害人能提供确实证据，则进行侦查，较为顺利。”[④] 由于缺乏确凿证据，直接影响到最后对消防员的判决。

1 月 31 日下午 3 时至晚 10 时，调查委员会在市政府会议室对消防员进行质询，受灾户代表与各报记者也全程参与。有报道称：此举“为全案彻查工作之最高潮，情绪紧张”，“质询时惊浪叠起”，可谓“市府深夜紧张一幕”。[⑤] 吴国桢在质询前表示：

> 对于这次西摩路大火，本人与宣局长所以特别重视之原因，希望全体消防队员能够明白。本人深信多数消防人员都想把事情办好，在敌伪时期有许多坏风气，必须根绝。在今日消防员中，若仍有勒索打劫恶例存在，乃全体公务员之耻辱，为政者自当查办。我决非将全体消防员皆视为罪犯，我深信在你们中间，多数是奉公守法的，所以这次遭舆论的攻击者，乃系少数害群之马所带累。为了挽救整个消防队的信誉起见，对此次失职人员必须加以严办，深信这也必定是大家的意思。中国人往往吃了亏不敢说，待事过境迁后，即难求水落石出，此番组织调查委员会的目的亦在于此。希

①《五人调查委员会实地勘察火区》,《申报》1947 年 1 月 30 日第 5 版。
②《检察官盼灾户提确实证据，调查委员昨再度出发访问》,《申报》1947 年 1 月 31 日第 5 版。
③《美宪兵表演救火四分钟接通水源》,《大晚报》1947 年 2 月 2 日第 4 版。
④《极盼受灾人提供确证》,《正言报》1947 年 1 月 31 日第 4 版。
⑤《灾户消防员对质》,《申报》1947 年 2 月 1 日第 5 版。

望各位亦能自动加以检举，不要把调查委员会看作审问机关，而趁此机会，铲除败类。[①]

吴市长致词后即离开会场，13 名高级消防员相继出场接受了调查委员会的质询。驾驶第一辆救火车到达火场的静安寺区消防队队附朱庆澜率先接受质询，“于彼陈述完毕时，葛克信当即宣布该区队附朱庆澜立即撤职查办。彼谓：刻奉市长之命，该朱队附有总调度之职，责任重大，应即查办。”在质询杨树浦区消防队分队长周廷丙时，有受害人当场指控周在火场曾从云梯爬进 27 号 3 楼，后“未见爬出，恐或由隔壁走下，潘校长亦称于火场见过周队长。致一时会场空气极为紧张。结果因未获得搜劫之具体证据，故未予扣押”。质询会结束前，调查委员会决定“在火场设置意见箱，希望市民尽速提供证据及意见”，[②]但这一方式后来仍未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消防员除救火不力之外，趁火打劫是引起舆论和市民愤怒的最主要原因。尤其是王云甫家大量金条、首饰与贵重衣物丢失，迄无下落。如果始终找不到确切证据，既不能给消防员定罪，也无以平息舆论，这是调查委员会和警察局面临的一大难题。勘察时曾发现王家被劈开衣橱上留有很多指纹宛然可辨，警员拍照后“与消防员之指纹互相对证”，但未获预期结果。担任调查委员的警察局督察长张达为寻找王云甫家中财物损失的证据，提出：“王家损失既然如斯之重，虽经火焚，然残余灰烬，当犹在瓦砾堆中，如予翻出，当可获得刀痕斧印之材料。”[③]王家称已于大火后连续挖掘 3 天，并无所获。但调查委员会仍决定再派人予以发掘，由王家派人到场监督。调查委员会经吴国桢市长批准拨发专款，雇用多名小工，在王家又接连挖掘了 3 天，虽陆续挖出不少已毁坏的银器及零碎物品，但仍然“无重要证物发现”。王云甫后也不愿再到挖掘现场观督，向记者表示：“生前所有，到死又不能带走，字画古董等，犹如小孩之玩具，烧了也就算了。”[④]

尽管调查委员会认真负责地展开了调查，警察局也进行了侦讯，但所获消防员趁火打劫的确切证据始终不足。针对调查委员会对此次离奇火案的初步调查结果，有记者走访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某知名律师，“讯以是否该场大火案，势将依照中国习惯，将由大事化小事，并待各报舆论徐由绚烂而转趋平淡，即可小事化无事？该人微笑不答。”后经记者反复殷勤请问，该律师始指出“若依照目前所得之证据，如某茶店中发现之酒瓶，劈开之保险箱盖，即可引为确证，而判其救火不力、乘火打劫之罪”，恐难以成立。因“消防人员决不嗜饮此类奇特之薄荷酒，且于当日清晨四五时许，各店俱已封门过年，消防人员亦无处购买，则此酒来源，颇成疑问”。其他如“衣架尚存，衣服俱失，亦未免希奇。至美军救火事，外传某律师曾领导美军救火，为消防处某俄人大声喝止一事，美军亦已声明并无此事”。如此种种，均难以令人信服地对消防员定罪。访谈结束时，“该人坚嘱记者发誓不得泄露其姓名”。记者感慨：“中国人因袭不愿多事之习惯，已根深蒂固无法收拾矣。”[⑤]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最终将无法以趁火打劫给消防人员定罪。

四、调查结论与火灾引发的消防问题讨论

火灾调查委员会随后公布的调查报告更进一步证实了人们的猜测。2 月 7 日，报章登载了调查委员会向市政府提交的《武定路大火案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刑事部分的全部内容。葛克信向记者表示：“调查会各委员经数日努力之结果，获得物证数件，笔录暨图表六十余份，又已送法院审讯之消防员警计五人，受停职查办之指挥官二人，一切公开，绝无隐袒。今后当局静俟法院继续侦讯办理，则外界所疑虑之‘雷声大雨点小’一节，自可消释。其余行政部份仍调查进行中，果有弱点，决不讳疾忌医，逆料市政府必能与全体市民共谋火政之健全。”[⑥]报告书前面说明了起火及救火车到达时间、烧毁房屋情况，

①《铲除败类，市长致词表示决心》,《申报》1947 年 2 月 1 日第 5 版。
②《灾户消防员对质》,《申报》1947 年 2 月 1 日第 5 版。
③《乘人之危实施抢劫可能处予枪决极刑》,《申报》1947 年 1 月 31 日第 5 版。
④《王云甫旷达，烧了也就算》,《申报》1947 年 2 月 6 日第 5 版。
⑤《美宪兵表演救火四分钟接通水源》,《大晚报》1947 年 2 月 2 日第 4 版。
⑥《大火案刑事部份报告书移送法院》,《申报》1947 年 2 月 7 日第 5 版。

接着主要介绍了以下经委员会调查认定的事实：[①] 一是“二次起火情殊可疑”。第一次起火延至 29 号王云甫家东侧木屋后，即经救熄。约半小时后，“该廿九号三楼重又燃烧，经实地履勘，察得该廿九号所搭出之木屋仅至二楼为止，与廿九号原屋相毗连处之数窗口，均仅燃烧至窗之木框为止，窗口内部附近，均无燃烧痕迹；是廿九号三楼第二次重又燃烧之火源，似难臆测。复查王云甫家（即廿九号）车夫黄阿福（即黄宝贵）暨四邻所见，参之火场遗迹，是其第二次之燃烧，显系三楼先烧，而后往下蔓延……是其三楼之起火原因，究系外面烧入，抑系内部起火，殊滋疑问。”二是“勒索金条查无实据”。对于“外传永勤橡胶厂主曾给付金条，因而消防员尽力灌救，得免焚如一节”，经多方面调查和质询，“自难遽以认定该厂曾贿以金条也”；王云甫家“外传消防员因勒索金条未遂，而致听令燃烧，此点除被害人自愿指认外，殊难论断。经逐一讯问王家主仆多人，均予否认”。三是“劫取财物无可否认”。通过对受灾户和消防员的调查证实，消防员在 29 号王云甫家“确有窃取财物之行为，自属无可否认”；在 27 号受灾户也有类似行为，“业由各该消防警士自认不讳”。该户“在天井中发现原盛银盒面之木盒二格暨二楼悬挂衣服之木衣架六只，是其于当晚火势未延烧及 27 号前，确有盗取财物之行为”；在 11、15 号受灾户“消防员等不事灌救，而竟在橱内搬取食物”，自行享用。四是“缘何斗殴颇堪注意”。经多名受灾人证实，当晚约 1 时左右，有消防员三四人，“初自陕西北路六六〇弄三十一号车门屋顶互殴，嗣续在武定路大康里内互打，约一刻钟。……此时理应协力灌救之不暇，更何应相互斗殴，设非利害相冲，断不致此，颇堪注意。”五是“一致指责救火不力”。经多方调查核实，此次火灾“延烧达十五小时，损毁洋房八幢之多，姑无论其器械设备粗陋至若何程度，技术训练之怎样幼稚，然其所有在场之消防警士暨各级官长，未能努力扑救，实乃无法掩盖之事实”。

根据以上调查核实结果，火灾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提出如下处理意见：二次起火原因之调查资料移送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参考，专案侦查；勒索金条部分仅作为一种报告资料，以供参考；劫取财物部分，除已被扣押者，其他被指证诸人，经“消防处查明后送由地检处侦讯”；在救火过程中打架者，由消防处查实后“一并移送地检处侦讯”；救火不力部分，“拟请交由警察局彻底详查不力官长暨警士，予以行政上最严厉之处分”。

至此，火灾调查委员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其所提交的报告书虽与舆论和民众的期望值存在不小差距，但调查委员会已经尽力，特别是对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消防员索取或盗窃金条这种趁火打劫行为，调查委员会着力进行了调查，甚至对火灾现场还进行了挖掘，但在始终无法找到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也只能实事求是地在报告书中写明“查无实据”。另外，调查委员会对救火过程中有失职和违法行为的消防员并无行政与刑事处断权，尚需警察局进一步侦讯和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做出判决，这又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直至 2 月下旬，“对于失职消防员之刑事部分报告，迄未送交地检处，故尚未侦查，惟该处对此次大火之火首沈秋麟（即引发火灾的 425 号业主——引者），业于昨日以公共危险罪提起公诉。”[②]

3 月 13 日，地检处对宜昌路警长尚志魁、消防警士戴光荣、李成钧、蔡治英等 4 人以盗匪罪提起公诉。起诉书说明上述被告人员于起火次日上午奉命到火场警戒，在余火未熄之际，“入该弄二七号李秀珍家，乘机窃取财物”。户主发现后予以阻止，但被告仍强迫户主“起开箱上之锁，劫去毛巾及手帕百件”，对此被告已予承认。户主还指控有一箱子未烧，但不见箱中物品，放有银台面的抽屉和挂有衣服的衣架被扔在天井，银台面和衣服均不见踪影。被告虽否认窃取，但“再查全卷，可见该被告等乘人之危，而假借职务上之机会，窃取财物”之行为，事实俱在。另外，地检处还对静安寺分队长黄宝琦、新闸区队长李壎、区队附朱庆澜等 19 名消防人员，“以公共危险及窃盗嫌疑起诉”。[③] 这一事实表明，政府部门对此次离奇火灾案的审理并没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舆论与民众对此案的

① 以下出自于报告书的引文不再一一作注，均见《申报》1947 年 2 月 7 日第 5 版。

②《陕西北路大火案消防员失职报告迄无下闻》,《正言报》1947 年 2 月 25 日第 4 版。

③《陕西北路大火消防员渎职案戴光荣等四人以盗匪罪起诉》,《正言报》1947 年 3 月 14 日第 4 版。

关注度已明显降低，甚至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大火发生过后的一段时间，包括社会舆论、政府相关部门、参议会对改善消防设施、提高消防员待遇等问题较为关注，这可以说是此次离奇火灾案的一个连带影响。“抗战八年來，消防设施只有消耗，没有增添，其破坏之程度，由此可见。”[①] 这次大火造成民众财物的损失极为惨重，充分暴露了当时上海消防这一公共事业存在的诸多缺陷和弊端，如果不加以改善，将难免此后再次发生类似的惨案。

其实，在火灾调查委员会提交给市政府的完整报告中，对此已十分重视，有较多篇幅论及这方面的问题，但报纸刊登的调查报告只有刑事部分的全部内容。当时的人们大多并不知道在刑事方面的内容之外，调查报告中所说的“行政事务之检讨”有哪些具体内容。笔者从《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会刊》中查到报告书全文，发现其“行政事务之检讨”主要包括如下内容：[②]

一是“员警待遇”。“查工部局时代服务于火政处者，其待遇较警务同人为高”。现在则服务时间较长，服务环境恶劣，升级机会较少，身心影响较大，家庭幸福较差，“于是不满现状，纷谋转业，强迫留职，如坐针毡，管理困难可知。加以各项器材及设备根本缺乏，即遇小火警，尚可应付，不幸蔓延，即难控制”。工部局时代无论员警疾病、婚丧嫁娶、健身娱乐，以及储蓄养老保险等福利设置及规章一应俱全，“今则以财政困难，供应全无。员警救火归来，无暖可取，无热水可溢，无内外衣可更换，影响工作甚大”。因此，急需斟酌缓急，量予设置，“如有热心人士捐助财物，则公开分配，非同贿赂，受者感激于里，工作必倍勤奋，斯所欲吁告社会，并乐为倡导者”。

二是“器材补充”。消防队现用之器材，尽属一二十年前的旧物，百孔千疮，有已根本无可用者，有的勉为修补应用，效率极低。“本案虽非因延迟而发生巨灾，但以水管破漏，减少出水效率，曾为美军消防人员所目睹，使大火之控制更难，而民财之损失愈重。言念及此，曷胜扼腕！”

三是“增加经费，减少手续”。1937 至 1942 年工部局时代，“火政处经费占工部局全部预算平均百分之三·二三（临时费除外），现消防处仅市预算约百分之 0·0 五（临时费在外），今昔比较，悬殊过远。”现虽值财政困难之际，难有大的改善，“惟至少限度，如房屋器材之修缮保养，员警衣服及必需品之供应，不当使其缺乏”。另外，现行审计会计制度手续綦繁，“消防经费之支用，应请特准履行事后审计，或请审计人员常驻，就地立时审核，以免羁时，而适事功，以与国家法令尚无违背。”

除以上几点，报告书还提出应该“加强管理与联系”“强化消防行政”“肃正不良风气”“招致义勇消防人员”等举措。现消防处隶于警局之制存在诸多弊端，以致“难免不偏于警察观点，即不免于消防行政有所妨碍”。即使目前政制难改，“但消防处殊有要求更受尊重之理由”，否则无法提高消防人员积极性和消防灭火的效率。调查委员会的以上阐述，应该说较全面地阐明了当时消防事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也切中了时弊。

这场大火发生之后，面对舆论此起彼伏的谴责和坊间种种流言，许多消防员都颇感委屈。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道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心声，但似乎仍不足以充分反映其内心的全部想法。消防处科长谢智庸抱怨说：“消防员待遇之过于菲薄，实为工作效率低落之最大原因。现时彼等之待遇，自十四五万元起，至二三十万元不等，个人生活已难维持，遑论养家。故现时留在虹口区消防处工场中工作者，非老即少，年轻力壮者早已改就他业矣。”消防处处长周兆祥也向记者表示：“西摩路大火发生之后，流言四起，误会日多，致平素洁身自好者，皆感灰心，工作情绪极为低落，且多数皆已准备‘卷铺盖’。本人经此番事件之打击后，对历年来工作之信心全失，待本案调查结束，案情大白后，即将引咎辞职。”[③] 其郁闷委屈之情溢于言表。

---

①《消防处长诉苦》,《申报》1947 年 2 月 6 日第 5 版。

② 以下出自于报告书的引文不再一一作注，见上海市参议会秘书处编印：《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会刊》，1947 年 3 月，第 294-295 页。

③《流言四起误会多，洁身自好之消除员皆感灰心》,《申报》1947 年 2 月 7 日第 5 版。

上海市新闸区全体消防员曾联名致函市参议院，指出："武定路火灾已成为市民饭后谈笑之资料，消防员已个个成为勒索抢劫之强盗，致全体遭蒙不白之冤，殊不公道。对于本案，吾等愿意接受真相及检举不法人员，至于武定路大火之延烧原因，绝非由于消防人员之勒索。"该函还列举了此次大火难以扑灭的八大原因，呼吁"参议会诸位代表主持公道"。[①] 不久，上海全体消防员500余人一起提出总辞职，消防处处长竭力挽留，但"本市全体消防人员，因武定路大火案而受社会舆论指责，日前曾总动员辞职，虽经消防处周处长慰留至再，然消防人员辞职之意，并未打消。昨日本市全体消防人员复签具辞职理由十二条，呈请警察局转呈市府请求准予辞职"。[②]

全体消防员总辞职给市政府造成极大压力。继武定路大火之后的一个月内，上海四处仍不断发生火灾，如果没有消防员灌救，其结果可想而知。例如1947年2月18日沪东"大名路大火，延烧二小时，死伤十一人，经消防员灌救始扑灭"；22日"沪西南市大火烧毁棚户五十余幢"，而且是"一日间火警达六起"；27日又有成都路一家"皮鞋作失慎，大火烧毁房屋六幢，损失约在三万万以上"。[③] 面临这一巨大压力，身为市长的吴国桢只得亲自出面慰留提出辞职的全体消防员，并承诺改善消防设施，提高消防员待遇。采访过吴国桢的美国记者说："去年冬天，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在吴市长面前，上海514名消防队员宣布将集体辞职。……他们向吴市长抱怨说，今后无论是否扑灭火灾，他们都将面临偷窃和受贿的指控。很明显这是有道理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辞职。吴市长点头表示理解，耐心地解释说：政府不会轻信没有证据的指控和谣言，消防和市长一样，都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这样，消防队员得以坦然处之，继续留在岗位上。"[④]

上海市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也曾专门讨论通过了"为改善警察待遇，提高警察素质，并革除恶习案"。该案说明："警察维持地方治安，警政为市府要政之一，然以生活困难，不肖者难免有敲诈勒索情事。如欲警察安于职守，警察之待遇，自应加以合理调适，并应提高素质，力除恶习，为民造福。"其具体办法包括：在提高警察素质方面，对旧有员警予以甄别，汰弱留强；新收员警，加强学识教育与技能训练。在提高待遇方面，员警房租、房捐、水电、煤气等，概予免除。大会预决算委员会对该案进行了审核，最后通过了该提案，并在决议中说明警察薪金应"依照公务人员待遇通案办理"。上海市政府也尽力更换消防器材，指拨5亿元从国外订购消防器材。另外，市府所拟1947年度中心工作计划，也包括了增加警力与提高警员素质、强化消防与改善设施、提高消防人员待遇等具体内容。[⑤] 如此一来，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警察，在各方面的待遇将会有较大改善。

参议会第二次大会还通过了"为增强消防效率拟组织上海市消防委员会案"。该案理由云："本市中心区消防，日见退化，其原因不外事权不一，经费不充，器材衰败，人才缺乏之诸大端，则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不过此次武定路大火，其弊害益形暴露，始为社会人士所注意，急宜加以改进。沪市消防行政系统，历史悠久，改组非易，兹为增进效率起见，拟组织上海市消防委员会，以管理监督本市之消防事宜，藉收事权统一、经济独立之效。"该委员会由市政府、市党部、参议会、警察局、消防处、民间救火会、地方协会、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等团体，"各推派代表若干人组织之"。其主要职责为管理消防经费，编造消防预算，务使经济独立；甄别现有消防员警，留优去劣，缺额另征义勇救火员补充；考核消防员警之成绩及奖惩。[⑥] 随后，上海市政府根据参议会的决议案成立了上海市消防委

---

①《提出大火因素八点，全体消防员函参会呼吁》,《申报》1947年2月8日第5版。

②《不堪舆论指责消防员再度总辞》,《正言报》1947年2月22日第4版。

③《春寒料峭火警频仍》,《正言报》1947年2月19日第4版;《沪西南市大火烧毁棚户五十余幢》,《正言报》1947年2月23日第4版;《皮鞋作失慎大火烧毁房屋六幢》,《正言报》1947年2月28日第4版。

④ 威廉姆斯·格雷（William P. Gray）:《世界上最难的工作——记上海市长吴国桢》，田中初译,《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第43页。

⑤ 上海市参议会秘书处编印:《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会刊》，1947年3月，第175-176、13、60-61页。

⑥ 上海市参议会秘书处编印:《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会刊》，1947年3月，第273页。

员会。另外，上海公用局“为配合本市消防上之需要，将执行三项措施，即检查电线、管理汽油分配、提高水压”。[①]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上海的消防事业较前略微有所改善。1948 年 2 月上海市政府在提交参议会审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1947 年 10 月至 1948 年 2 月，上海虽“迭次发生火灾，因消防人员工作努力，控制迅速，故损失并不甚大”。[②]

另外，这场大火还曾引起火政是否应归为民办的讨论。上海早在清末即有按区域设立的商办民间消防组织，时称救火会，1908 年左右还成立了上海救火联合会。但进入民国以后，民办消防组织逐渐减少，官办消防占据了主导地位。武定路大火案暴露了官办消防存在的弊端，有参议员向参议会正副议长“建议中区火政是否应归民办”。参议会警政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在即将举行的参议会第二次大会提出议案，请提案人“提供民办救火会具体方案，并由本委员会同仁搜集资料，以供大会参考”。[③]

其时，抗战后在上海南市仍有民办救火会。该会历史悠久，创办于清末的 1904 年，其“经费全赖商民捐助，惟非强迫”。由于抗战期间损失严重，战后经费严重不足，民办救火会向商户收取经费又极为不易，因而难以为继。战后留存的南市民办救火会“人员不多，计队员十四人，职员十人，而义务会员占八十人之多。队员待遇并不优厚……大多系半义务性质，故毫无怨言。遇警钟敲动，消防员出发时，义务会员闻声立即准备”。[④] 武定路火灾调查委员会曾赴南市消防处调查，葛克信向主事者“询以官办与民办之利害得失若何”？得到的答复是：“有钱官办亦好，民办亦好。无钱官亦办不好，民亦办不好。”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官办消防处，“彼等皆不愿意作任何批评，仅建议必须添聘义务会员，可作为一般之模范，而提高工作效率”。而在场的消防处长周兆祥则抱怨：“对于目前公事手续之麻烦，亦甚感头痛。”[⑤] 可见官办与民办均有利弊，关键是经费必须充足。

参议员们在讨论官办与民办时其实也持有不同意见。有的议员鉴于民办救火会已为数甚少，且经费奇缺难以维持，摊捐又增加市民负担，提出将民办救火会全部统归“市办”。但也有议员认为应保留民办救火会，而且政府应予以支持。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专门讨论了这一议案，最后通过的决议是：保留现有民办救火会，在民办官督原则下由警察局拟订奖惩考核办法及指挥系统；取消警察局所列接管民办救火会预算，划拨给民办救火会；民办救火会如有募捐情事，须由市民自愿施捐，不得强行摊派，并应遵从政府订颁之人民团体统一募捐办法办理。[⑥]

上述事实表明，参议会对消防问题始终比较重视，几乎历次大会都讨论通过了若干有关改善消防的决议案。经参议会以及社会舆论的不断敦促，上海市政府在这方面也付出了一些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要看到，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均陷于极度困境的情况下，无论是参议会还是上海市政府都不可能根本解除消防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责任编辑：杨向艳

①《配合消防需要执行三项措施》,《正言报》1947 年 3 月 24 日第 4 版。
② 上海市参议会秘书处编印：《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五次大会会刊》，1948 年 3 月，第 19 页。
③《参会警政委会全力协助调查》,《申报》1947 年 1 月 30 日第 5 版。
④《南市救火会会员尽义务》,《申报》1947 年 2 月 9 日第 5 版。
⑤《官办民办主要在钱》,《申报》1947 年 2 月 9 日第 5 版。
⑥ 上海市参议会秘书处编印：《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会刊》，1947 年 3 月，第 175 页。

云南报销案与光绪朝前期的军需奏销困局 *

陈　勇

[摘　要] 光绪八年，云南省贿办军需报销案发。该案暴露出现行军需奏销制度已陷入两难困局而难以为继。奏销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吏治腐败和各省外销财政扩张。清廷在组织干员彻查追责的同时，相继推出自定省章、事前立案等举措，力图重新发挥奏销稽核全国财政收支的功能。但奏销制度的内在矛盾并未根除，则例与财政实践的脱节问题仍然存在。户部力图在奏销制度框架下所做的一些技术上的改进，对国家财政制度的完善难期成效，这表明以例治财这种传统的财政治理路径已趋于末路。

[关键词] 云南报销案　军需奏销　制度困局

〔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120-13

光绪八年（1882），云南省贿办军需报销事发，涉及该案而最终获谴者包括枢府大员、地方督抚、司道御史乃至户工等部下层书吏凡 30 余人，一时谓为大狱。① 细察云南报销案的来龙去脉，梳理案件背后错综交织的人事、利益关系，不难窥见光绪朝前期清廷内部派系倾轧的复杂面相。因此，治史者多选择从政治史的角度对该案进行解读。②

云南报销案因军需报销而起。这起贿办报销案件，同样也暴露出晚清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诸如财政主管部门吏治腐败，各省外销财政③ 凸显，奏销制度陷入窘境而难以发挥稽核财政收支的正常功能等。该案发生后，清廷在组织干员彻查追责的同时，也迅速采取举措，力图弥补财政管理制度上的一些罅隙。云南报销案事实上成为光绪朝前期清廷整饬财政秩序的一根引线。从这些措施的实施及政策的着力点来看，清廷显然已认识到云南报销案所必然产生的内在根源，也开始注意到外销收支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外销财政的生成、演化及治理研究”（14BZS0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 (1644—1911)”（16ZDA1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勇，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暨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教授（安徽 合肥，230601）。

① 张之洞：《请明定报销饭银折》（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 1 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97 页。时人继昌亦将云南报销案与浙江葛品莲、河南王树汶、江宁三牌楼各案并称为光绪朝前期的“四大狱”。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下，上海：上海书店，1984 年，第 4 页。

② 既有研究的基本叙事框架和思考脉络，大多限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和派系斗争。贾熟村《震动晚清政局的云南报销案》（《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1 期）一文，对云南报销案的前后过程及晚清官场的贿赂公行叙述较详；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中心的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孔勇《云南报销案与晚清同光之际的南北纷争》（《西南学刊》2012 年第 2 期）两文从政治史的视角，对同光中兴时期清廷中枢南、北派系纷争之面相揭示尤力。

③ 外销是对应于内销（正项）的一个财政概念。《清六部成语》“外销之款”条目这样解释：凡公款用过必须报销于户部，为内销。其不必报部，由外官自行销用者，则谓之外销。（[日] 内藤乾吉：《六部成语注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65 页）由此引申出的“外销财政”概念，系指晚清时期游离于奏销制度之外，由地方政府掌握、不受户部核销的那部分财政收支。另，各省提交账目清册到户部请予审核，曰报销；以奏折或题本形式进呈给皇帝，曰奏销。本文在行文中对这两个概念不做严格区分。

这一奏销制度之外隐性财政的存在，只不过在治理方策上，仍是遵循规复奏销旧制的传统路径。清廷这些规复旧制的努力，终究力度有限而收效甚微。撇开政治史的认知脉络，而从财政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晚清时期这一重要的报销腐败案件，对于认识清季财政秩序崩坏的制度性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云南报销案的案发及审结过程可以大概勾勒如下：[①] 光绪七年正月，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委诸云南善后局总办崔尊彝办理该省军需报销业务。云南省的这笔军需报销业务，从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六年，涉及时间长达 7 年，所费银 1200 余万两，期长款巨。崔尊彝长期处理各项钱粮报销事宜，深谙其中曲折，料定部中书吏必定刁难勒索。此时正好有同僚潘英章升补永昌知府，须进京引见。崔尊彝便委托他先到京城探听门路，打通报销关节，并将一笔十余万两的巨款预先汇至京城山西票号，作为其在京活动费用。潘英章到京后，四处活动，先后找到太常寺卿周瑞清、户部候补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以及负责核办此次云南报销的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等。经众人说合，孙家穆承诺，云南方面拿出一笔 8 万两银子作为兵、工等部的津贴，报销可保通过。光绪八年五月，崔尊彝到京与潘英章办理钱款交接时，云南报销进展尚属顺利。涉及户部的款项约为 947 万余两，[②] 已经户部核准复奏；涉及工部的款项约为 93 万两，[③] 已经工部议准，只是尚未会奏；剩下 160 余万两，归兵部核销，兵部以未经造册议驳。全案虽未全部完结，但大局已定。潘、崔二人随即放心离京。

但潘、崔两人离京不久，事态发生逆转。先有御史陈启泰上奏弹劾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户部司员书吏含混办结；后有掌云南道御史洪良品，奏陈云南报销环节中户部有索贿情节，矛头直指户部堂官景廉、王文韶等。言官的纠弹，引起朝廷的重视，清廷立即派刑部尚书潘祖荫（后为张之万）、理藩院尚书麟书等人调查此案，继又派新任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侍郎薛允升会同查办，醇亲王奕譞、工部尚书翁同龢参与会审。涉事官员周瑞清、龙继栋、李郁华等先后被停职候审，当事人崔尊彝、潘英章解部质讯，涉案书吏除事先外逃外，余皆被控制查办。讯出涉案总金额 21.3 万两，除崔、潘等人的私款 7.74 万两，崔尊彝借用天顺祥票号银 2.8 万两外，涉及报销津贴银实共 10.76 两。其中在孙家穆家过付的 8 万两，或作为办公经费，或作为津贴，被户、工等部司员书吏瓜分，余银 2.76 万两被查明为崔尊彝挪为私用。但还有崔尊彝借用票号的 2.8 万两究竟作何使用，是私自开销，还是送了碳敬，抑或作为贿赂送给了景、王二人？因当事人崔尊彝途次病故，无从查考，即质询潘英章等，也不能指出确据，只能作为私款模糊处之。光绪九年五月廿七日，翁同龢等将案情上呈，云案奏结。

涉案各司员、书吏均遭严惩。虽未发现原枢臣景廉、王文韶有明显的受贿情节，但作为户部堂官，于下属司员得受不枉法赃毫无觉察，难辞其咎，分别交部议处，降二级。前任云贵总督刘长佑、巡抚杜瑞联对属下贿办报销，事先未能觉察，交部分别议处，降三级。案发后，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未及时将该省挪用银两查明实数具奏，也得到降一级的处分。

光绪八年发生的云南军需报销案，牵涉面广，影响大，震动了当时的晚清政坛。该案的审理历时两年多，最终虽得以完结，但至少有如下三点使不谙内情者颇感疑惑：

其一，云南报销案中涉案金额是否都为应销款项？既然应销，为何还需贿赂部员？从云南报销案的审理结果来看，涉案人员多以“不枉法受赃”作为定罪的根据。何为“不枉法”？光绪九年五月廿五日翁同龢等在东暖阁向慈禧汇报案情、解释完赃减罪律例时云：所谓枉法、不枉法，指应销、不应销而言。[④] 枉法即指不应销而销。云南报销册籍的核销涉及到户、兵、工三部，除兵部以造册不全为由没有同意

① 翁同龢：《复议云南报销案折》（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30-38 页。

②《覆核云南省军需报销行查各款折》（光绪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户部奏稿》第 2 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 年，第 630 页。

③ 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3 册，光绪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677 页。

④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4 册，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第 1748 页。

准销外，户、工两部均声明，云南省报销的均是“非不应销之款”。但张佩纶在《云南报销案可疑三端片》中即指出，云南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并风闻银数出入总散不甚相符。[①] 鉴于此，光绪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的上谕，曾要求户、工两部再选派廉干司员 8 人，将云南报销案中所有报销册籍查照例章，秉公详细复核一遍。工部主事曾銶即是 8 人中的其中一员。九月二十六日他前往工部尚书翁同龢处回事，意欲“照复”二字将此事支吾过去。[②] 可见在曾銶看来，工部的准销程式应没有问题。但翁同龢极其慎重，饬令其细查再定。十一月二十一日，《翁同龢日记》载：“夜福至来，问以云南报销事究竟能自信否？则对曰能信，气颇激昂也。”[③] 福至为工部司员，曾参与过云南报销册籍的审核工作。十一月二十四日翁同龢入署，再次碰见已放御史的曾銶，“该司以为无可查核，余命就准军等报销册比较。遇瑞公，瑞公亦有应准之语也”。[④] 翁同龢仍令将云南报销册比照淮军报销册进行复查，结果发现，云南的报销比淮军的报销还有所节省，正如十一月二十七日《翁同龢日记》所云：“入署，复查云南报销事，大致虽较各营为减。”[⑤] 十二月初十日，工部核复云南报销“应准”情形，奉旨依议。[⑥] 但工部的核销是否真的就无懈可击，尚是疑问，因为前引翁同龢十一月二十七日日记末了还有一句话：“究未行查兵部，终属疏漏。”

最大的问题出在户部。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户部将重新审核的结果上奏。确认云南此次军需报销由户部审核者共银 9465291 两零，查明有例案可循、奏咨可考请销银仅为 6929962 两零。此外，尚有册开之驻防缉捕经费、催饷委员局用、补解操赏、剑川丽江运脚、粮道缮书册费役食、新降蛮目口粮、解粮卷盘费等款，请销银 435146 两零，均无本案可查；该省军需赏号支销请销银 2100182 两零，查照滇省章程未能吻合。户部要求云南省就这些款项分别进行核实，复查结果声覆到日再进行核销。随后，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唐炯逐款声覆，并造具清册一本、同治十三年以后勇营章程一本咨送到户部。经过查实，户部称：查得同治十三年以后至光绪六年止历时七年，云南省办理大小军需 25 次，此项军需赏号仅开支银 210 万余两，虽与上届云南军需章程未能吻合，但“核其时势，尚属实情”，而且比较他省，尚属有减无增。行查支发粮道缮书册费役食等款，仅发现粮道缮书、解卷粮盘费两项内有溢发银 1280 两，应责令在经办局员头上如数扣还；其余开支各款，或查与部例相符，或据称照滇章支发，尚应销银 433866 两。[⑦]

8 人专案组复查的结果是，没有发现云南报销册中存在大的违章款项，按照户、工两部的话来说，报销的款项均为“非不应销之款”。何为“非不应销之款”？户部的解释是有的款项与例章未甚相符。而未甚相符的原因是“卷牍不齐，事同创始”，即以前没有先例可循，不便遽予否决。户部不明言准销，而以“非不应销之款”为模糊断言，这一模棱两可的表述里其实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云南报销案中还存在 250 万两可销可不销的巨款，其准销与否，则完全取决于户部司员及书吏的态度。而这正是该案中大量部费存在的合理逻辑所在。

其二，部费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款项，是赃款抑或津贴？清代京官素称清苦，五品实缺官，岁俸不足百两，另加十余石俸米。正途候补者，减半支给。如是捐纳得官，还不及半俸。京官生活之需，多仰给于饭银、部费乃至外官之冰炭敬与别敬。而处理具体核销事务的各部书吏，连正、半官俸也没有，只有少量的工食银以及心红、纸张之费，他们更仰赖于饭银、部费或其他陋规过活。

---

① 张佩纶：《云南报销案可疑三端片》（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涧于集》奏议卷 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92 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338 页。

②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3 册，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第 1689 页。

③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3 册，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 1701 页。

④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3 册，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 1702 页。瑞公应指瑞睦庵，时为工部满尚书（清各部尚书满、汉各一人）。

⑤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3 册，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 1703 页。

⑥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3 册，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十日，第 1706 页。

⑦《查核云南省军需报销行查各款折》（光绪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户部奏稿》第 2 册，第 630-634 页。

饭银，向来由外省随正项钱粮解送到户部，贮存银库，又称随正饭食。户部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饭银处，来调剂使用这笔资金，除支给户部堂司各官养廉并各司处纸张笔墨饭食及书役人等应差饭食之用外，还负责支给内阁、理藩院等处的养廉银。饭银来源于各省湘平升平等平余项下，以及各项节省赢余向不报部之款，性质类同溢收耗羡。每年解部饭食，并无定额，地丁项下饭银以广东为最，约为4300两，关税以浒墅关为最，约为2200两；盐课以两淮为最，约为5500两。[①] 由于清前期不常用兵，饭银只存在于常例钱粮奏销，军需奏销则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有的只是部费。

部费，在康熙年间即已存在，但为数较少，惟部吏有之，司官以上则未闻收受。道咸以降，年年兴兵，军需供应浩繁，军需报销事务日繁，户部仅稿工贴写书吏增至600人以上，[②] 仍显人手紧张，办公费用也就随之增加，加上军事期间各省协款增加，解部款项减少，饭银处所收饭银也就随之减少，饭银不敷使用，增收部费视为理所当然，而且不仅部吏收受，部中司员也开始居间分润。部费用于部中笔墨纸张等办公之用者，为公用；用于帮贴司员、书吏生活落入个人腰包者，为津贴。云南报销案中，过付银8万两即是这种性质的部费，多数作为津贴，只有极少部分作为公用。

清代官场还广泛存在官员间的私人馈赠，一般是下官进献给上官，外官馈送给京官，夏天以消夏的名义曰冰敬，冬天以取暖的名义曰碳敬，临别馈送曰别敬。每到年尾，外省官员“以京官职分之大小，分炭敬之厚薄”。[③] 京员亦以此作为过活的补贴。《翁同龢日记》中有多处关于碳敬的记载，翁同龢本人于此有收有拒。[④] 军机大臣李鸿藻“亦直认炭敬”。[⑤]

尽管饭银、部费、碳敬等款同属陋规，但就其公私程度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饭银在某种程度上是清代俸禄制度的一个补充，体现了清廷以耗羡补贴外官、以饭银调剂京官的意图，“公”的程度较高；其次为部费。部费有饭银的某些特点，但不为制度所认可，其收支也带有随意性，就其使用去向而言，公用比津贴的“公”的程度要高；再次为碳敬等款。碳敬表面上虽纯为个人行为，但由此获得的官员间情谊的增进，很难说不会影响到以后相互间的公务活动中。

正是由于饭银、部费、碳敬等款形式相近，但性质不同，有的涉案人在供词中故意将部费与饭银混为一谈，希图减轻罪责，如云案中户部主事孙家穆供称：“今年二月间，有同司主事龙继栋言及云南销册将到，向来均有奏销饭银，自军兴后改为公费，贴补司中办公。”[⑥] 光绪十年，因涉案被革户部主事周颂捐复主事原官，户部称其在云案中挪用司中饭银不知系报销之款，赃非入己，因此情有可原。[⑦] 在对赃款的认定范围上，清廷内部形成了两派意见。满洲亲贵惇王一派主“收”的原则，不论部费、碳敬，只要收了，就属赃款，一律追查；翁同龢等汉官僚一派则主“支”的原则，不论部费、碳敬，从公项支出的应予追查，从个人私项支出的即免予追究。朝野人士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王闿运认为：“报销部费，相沿已久，直省通例，与饭照同科。”[⑧] 左宗棠则认为陋规应区别对待：“相沿之陋规，或借以

①《会议山西巡抚张之洞奏善后报销解部饭银折》(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户部奏稿》第3册，第1203页。

②《户部片》(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户部奏稿》第5册，第2397页。

③ 伍承乔编:《清代吏治丛谈》卷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2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767页。

④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4册，光绪九年一月十四日，第1716页。亦见该书第1680、1691、1701、1952、1972、1980、2061、2091等页。

⑤ 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翁同龢日记》:“将云南报销事一一上陈，高阳亦直认炭敬。”(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747页)“直认炭敬”何解？有人解释为李鸿藻承认自己也收过碳敬。李本人似无需如此。本文理解为李鸿藻也认可碳敬为正常，无需追查。

⑥《光绪八年十一月己亥麟书、潘祖荫奏》，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444页。

⑦《已革主事周颂呈请捐复拔贡原资折》(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户部奏稿》第7册，第3070-3071页。光绪十六年，另一位涉案被革户部候补主事崔澄寰亦被李鸿章起用，李称：“崔澄寰前在户部向同司人员借用饭银，旋即归款。核其情节，本异赃私。”李鸿章:《崔澄寰送部引见片》(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1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42页。

⑧ 王闿运:《与刘荫渠尚书论报销书》(光绪八年十二月七日)，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2卷，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1167-1169页。

办公，或取以充交际之用，尚可谓为应得之款；至因巧取而创立名色，因营私而潜通请托，则赃款也。”[①] 清廷内部对部费性质之所以难以取得一致的认识，是因为部费虽于法不允，但于情于理却又难舍。

其三，云南报销案中的巨额贿款来自何处？来自公款还是私项？案情显示，除借款外，涉案人崔尊彝由云南兑京银共 18.5 万两，内中有崔尊彝等人所汇私项 7.74 万两，剩下 10.76 万两均是作为打通报销关节贿赂京员的活动经费。光绪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谕就此追问：崔尊彝、潘英章来京办理报销所赍银两，究系支用何款？是否库款，抑系军饷盈余？要求云南地方官员刘长佑、岑毓英、杜瑞联等查明具奏。经过 20 多天的“调查”，十月十五日云南方面回奏称：云南藩库本属空虚，按月动放，均经册报有案，并无发交潘英章赍京之款。善后局用项亦极支绌，遇有紧要饷需，尚须向商号挪借垫用，从无盈余。惟闻从前办捐时，各省平砝大小不一，此中稍有长余，均归各局作为外销公用。该员所赍银两是否来自此项，现在捐局久经裁撤，无从清查。[②] 此款既非司库所出，亦非善后局所有，连云南省督抚也不敢承认从何而来。直至涉案人潘英章到案后，由他的供词才得知：此项巨款来自捐局平余。所谓平余，意即平色之余，是银两在收放过程中由于平砝标准不同所产生的溢额。[③] 清初规定，平余银由中央与地方分用。各省解缴户部钱粮时，每 1000 两附解平余银 25 两，平余实质上成为一种地丁附加。关税、盐课同样处理。但捐局平余不同，因为厘捐是一种正项外的后出税源，其平余的分配，中央并无像钱粮一样的规定，基本上留在了地方，是一种外销款项。

清廷表示不可理解：捐局平余虽与正款钱粮不同，但仍属官项，不应如此漫无稽考。且以各局公用外销之款，经崔尊彝挪移动用至十余万两之多，该局主守官吏岂得诿为不知？如果确切查询，何至多寡并无实数？乃该前任总督刘长佑、巡抚杜瑞联，平日于官项出入一无查考，任听属员挪用。[④]

其实，如此巨款，云南省督抚焉能不知？只是内情复杂，不便如实相告罢了。当时，清廷就贿款来源一事追问云南巡抚杜瑞联时，云南方面有两种选择，一是和盘托出，向朝廷如实相告；一是佯作不知，继续遮掩。杜瑞联选择了后者，结果云南省督抚同受处分。王闿运认为云南当局此举失当，造成“为法受过”的后果，他的主张是，与其遮遮掩掩，不如“直陈所由，尽发其覆”。但无奈“鹤公文吏”，无此壮识。他甚为刘长佑抱不平，认为“此则明公所宜引咎，而实公罪之有可原也”。[⑤]

但即便如王闿运所期，杜瑞联略有壮识，光明正大向朝廷坦诚相告，恐也未必能够换得清中枢机构的谅解。相反此举不仅将开罪于户部，同时也向中央袒露了私藏，暴露出各省外销财政的虚实。而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违众矫时”的行为。

二

云南报销案因军需报销而起。这起贿办报销案件之所以疑惑重重，难以根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奏销制度与财政实践已发生严重脱节。

清代，国用出纳统之于中央，清廷通过奏销制度来掌控天下之经费。原则上来说，地方所有收入必须上报到中央，所有支出必须得到中央的核准方可动用。奏销分常例和专案。常例奏销强调“额”，[⑥] 专

---

① 左宗棠：《答阎丹初大司农》(光绪九年三月初七日)，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 12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4 年，第 722 页。

② 岑毓英：《遵旨据实复陈云南报销折》(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岑毓英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 年，第 260 页。

③ 如西征粮台在放饷时，以库平收，以湘平发，每百两就会获得 3 两多的平余。

④ 翁同龢：《复议云南报销案折》(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上，第 37-38 页。

⑤ 王闿运：《与刘荫渠尚书论报销书》(光绪八年十二月七日)，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 2 卷，第 1167-1169 页。杜瑞联，别号鹤田。

⑥ 常例奏销针对地丁、盐课、常税等正项收入和兵饷、官俸等常例支出，每年地方将收支情况层层上报中央，由户部核销。“凡钱粮，入有额征，动有额支，解有额拨，存有额储，无额则有案。及奏销，则稽其额与其案而议之”。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 13《户部》。

案奏销则强调“例”。军需报销属于专案奏销。每拨一款，则列一案，逐案层递滚算。案结，由户、工、兵等相关部院“按照则例，逐款详核。凡动用银、米，核与则例相符者，必查对底案，始准报销，以归核实。或例准开销而未经动用，及实用之数比则例较少者，即照实用之数具报，不得因有例可援，稍任浮冒。此外有军行紧急事在必需，量为变通，而核与成例不符者，照例核减，另行分别着落认赔”。[①] 因此，是否如例是确定该款军费支出能否报销的准绳。

户、工各部均颁有各种则例，每隔几年修订一次。《户部则例》自乾隆年间纂修，经嘉庆、道光、咸丰到同治四年、十三年已多次修订，但各部《军需则例》却一直沿用乾隆朝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以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饬将各省军需核定条规，俾有遵守。四十九年三月，军机大臣会同户、兵、工部奏明，军需各例纂拟完竣。五十年二月，又在前此基础上陆续更改，遂成 120 条，分 16 卷，其中《户部军需则例》9 卷、续修 1 卷，《兵部军需则例》5 卷，工部 1 卷。[②] 此后的军需报销，皆以是书为根据，再未修订。

咸同年间，户部所依凭的军需则例，仍然是乾隆年间颁布施行的。战争状态下形成的带有权宜性的新案，都没有纂入则例中。取 200 余年以前之办法，绳 200 余年以后之情形，报销内容自然与则例发生脱节。再加上战争旷日持久，一案军需之起，至办理报销之时，往往数年、十数年之久，物价既殊，人地亦易，遂有所用非所销、所销非所用之病。

首先是价值悬殊。户部所规定的可报销款目价值还是乾隆时期的标准，与咸同年间的时价已差别甚大。在广东，按则例规定，调赴到军营及派办到军务、局务的文职各官例支盐粮、跟役、驮折各项，具有道员身份的可月支 34 两，知府身份的可月支 31 两 8 钱，州县月支 24 两 8 钱，佐杂月支 16 两。但到咸丰年间，物价已较乾隆年间昂贵，按原定标准，在事人员月食已远远不敷使用。同治二年，时署理两广总督晏端书不得不要求该省军需局制定新的标准，道员月支银 100 两，知府月支银 70 两，州县月支银 32 两，六品以下佐杂各员月支银 18 两。另外，军需造价也是今非昔比。制造火药，每百斤例价止准销银 3 两 9 钱，而咸丰年间的时价非 16 两不能成造，较之例价计增 4 倍有余。其制办枪炮、军械、账房、号衣等件成本，亦较例价加增。[③]

其次是物资迥异。咸同年间一些新出现的军需支出，在乾隆朝的奏销则例中是没有的，如淮军淞沪军需中支放的常胜军粮饷、购买外洋军火枪炮价格，以及英法兵官教练洋枪炮队辛工口粮等款，系与洋人交涉，为向来军务所无，无例可循。[④]

以上这些例外、不敷价款，不能被户部报销所认可，此之为“所用非所销”之谓。外省在报销时，如按实际情况如实造册，则必遭部驳，只能挑选合例准奏的大宗款项，造册具报。“其余则不能不捏造虚言，期符成格”，[⑤] 形成一篇假账。此之又可为“所销非所用”之谓。

另外，乾隆年间制定的报销则例，均是针对经制之兵、部拨之饷。咸丰军兴年间，参与军事的“召募之勇，十居七八；经制之兵，十才一二”。[⑥] 这些勇营的饷需多为自筹，其饷章也由各省、各军自行厘定。湘勇饷制是仿照江忠源营饷章略加修改厘定的。绿营定制，马兵饷酬月给 2 两，战兵月给 1 两 5 钱，

---

① 福康安：《奏为酌核军需报销章程事》（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全宗》，档号：04-01-03-0133-006。

② 傅璇琮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459 页。

③ 郭嵩焘：《妥议变通报销章程疏》（同治五年四月十二日），梁小进编：《郭嵩焘全集》第 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年，第 726-729 页。

④ 李鸿章：《常胜军等三项用款奏销片》（同治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2 册，第 224 页。

⑤《会议政务处覆奏度支部清理财政办法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025 页。

⑥ 吴庆坻：《同治三年变通军需报销》，《蕉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39 页。

步兵月给 1 两，当时的湘军陆勇则为每月 4 两 2 钱，水勇为每月 3 两 6 钱。[①] 勇营饷酬要高于绿营，这与例章迥不相侔。

各地勇营的饷制，有的是事先奏明皇帝立过案的，户部尚有案可稽，报销时可以案援例；有的是没有立案的，户部拿什么作为标准来核销这些统兵大员报上来的报销材料，都成了问题。例案山积，繁文缛节，户部在核销时往往也会失去准的，进退失据。山东历办军需报销勇粮，每月或给银 3 两至 4 两 5 钱不等，系由统兵大臣先行奏明，户部业已核准。咸丰十年，僧格林沁移营山东，户部发现，僧军勇粮一项每月给银 2 两 6 钱，比绿营兵略高，但比山东省报销的标准要低。户部感到受到蒙蔽，要求山东省将来所有勇粮报销，均照僧格林沁所定勇粮一律核减。当时的山东巡抚阎敬铭辩称：山东省自军兴以来，历年雇募练勇应支口粮，先经奏准每名月支银 4 两 5 钱；复经前巡抚谭廷襄奏准，核减至每月 3 两，均经过户部复准在案。他进一步解释僧格林沁勇营例支口粮比山东省减少的原因是，僧军系客军，军临之地，绅民人等每多捐输米面及草料等物到营，各州县亦兼运送粮料。有此例外接济，故领饷虽少，亦见饱腾。而山东本省之勇，则惟赖额支口粮，难以与僧格林沁大营之勇画一比较。[②] 勇饷与经制兵饷有别，勇营饷章又各省不一，各军不一，这些也是导致军需报销混乱的乱源之一。

军需报销混乱，为参与其事的胥吏人等钻营取巧提供了可乘之机。办理报销的地方官为求报销顺利通过，不得不给负责办理核销的部中司员或胥吏一笔部费以便通融。正如后人评述的那样："军务匆迫，存亡危急之际，而筑一台有例，购一械有例，增一马置一帐莫不有例，临事不能拘泥，后事又不许通融，不得已惟有于报销之时，弥缝迁就，以求免于驳诘。故军务报销之案，尤为胥吏利薮，督抚统帅非甘行贿，疾首侧目而无如何。"[③] 一些刚正之士不愿伙同作伪，于报销环节曲为弥缝，坚持实用实销。在报销时情愿与部例不符，不愿与实数不合，这往往就会与户部发生龃龉。曾国藩就曾向皇帝解释："咸丰九、十年间，户部屡次催造花名册，臣迄未造送。其有违部例者在此，其不欺朝廷者亦在此。此心可质鬼神，初无丝毫意见，敢与部臣相抗也。"[④] 为少免于户部的驳诘，曾国藩甚至建议部下，"银项应奏应题者，须倍加慎重，以少奏为是"。[⑤] 曾国藩的"少奏为是"，只是当时地方官员应对军需奏销定制的诸多办法之一种。事实上，地方在办理报销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应对之策，或以甲移乙凑合总数，名曰融销；[⑥] 或并不据实开报，以少报多，名曰冒销；[⑦] 而更多的则是延不造报，乃至"每积数年而一销，或数十年而一销，其银数动至数百万、数千万不等"。[⑧] 军需奏销在咸同之际即已遭遇困厄而难以为继。

同治三年，在户部尚书倭仁的建议下，清廷同意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需未经报销各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⑨] 军兴时期所有军需用饷的造册报销（除已报销的款项外），变成了开单报销。造册报销时，既有单，又有册，清单向皇帝汇报，细册则由户部审核。而开单报销就只有一个环节，即向皇帝汇报一份清单，而无须再由户部细加审核通

---

① 曾国藩：《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折》（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李瀚章编：《曾文正公全集》第 3 册，北京：线装书局，2016 年，第 142 页。

② 阎敬铭：《雇勇口粮请仍照本省奏减成案办理折》（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 128 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5-36 页。

③ 汪大钧：《论变法当务为其难》，《时务报》1898 年 7 月 9 日，第 2-3 页。

④ 曾国藩：《湘军第五案报销折》（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三日），《曾文正公全集》第 3 册，第 290 页。

⑤ 曾国藩：《复毓右坪中丞》（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日），《曾文正公全集》第 12 册，第 33 页。

⑥ 熊希龄：《为酌议清理财政办法与栾守纲呈度支部文》（1909 年 10 月 29 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 1 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61 页。

⑦《咸丰朝实录》卷 222，咸丰七年三月戊辰。

⑧《光绪八年九月乙未梁俊奏》，《光绪朝东华录》第 2 册，第 1417 页；梁俊：《奏为军需报销致招物议请饬开具清单免造细册事》（光绪八年九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档号：03-6017-035。

⑨《奏免军需造册报销疏》（同治三年），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 78"饷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843 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2009 页。

过，即“开单者，由外核断；造册者，由部核准”。因此，时人理解，所谓开单报销，实质上就是“不经奏请于前，仅于既用后一报了事”。[①] 这种奏销的做法，与旧制有明显的不同，户部在军需报销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查究、审核、批准的责任。吴庆坻称此种情况为“开国二百二十年所未有也”。[②] 曾国藩则视朝廷此举为“中兴之特恩”。[③]

但同治三年的奏销豁免，只针对同治三年六月之前的军需报销。同治三年六月之后的军需报销仍当遵照旧例造册，自不待言。奏销制度的矛盾实质上并没有因此次特恩而消除，而是继续拖延下来。此后，清廷军需活动仍没有停歇。太平天国起义虽被扑灭，捻军起义、回民起义又相继爆发；内乱稍平，海疆再起波澜。迨至光绪朝前期，纷纷攘攘，兴师十余省，历时十余载，仍无了日。而戡平诸乱，仍然靠的是非经制兵力勇营。其时，口岸洞开，白银外流，百货翔贵，旧日之薪粮不能用人，旧日之物价不能采办。再加上洋务渐兴，各省设厂制械，多创新规；筹防购舰，均殊于昔。一切用款非他项军需可比，难以常例相绳。《军需则例》除兵部外，户部已不适宜，工部则多化为无用。用非所销、销非所用的情况非但没有减少，相反较咸同年间更为突出。各省的应对之法，也与咸同年间如出一辙，挪东掩西，弥缝迁就，甚至将库亏或其他不能报销的非军事支出夹带进军需一并报销，[④] 以致营勇无不空之额，出入款项无不隐匿之数，报销亦无不浮之案。[⑤] 各省大吏非不知事后报销无凭核算，难有了局，之所以仍然肆意专擅，是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报销之前托人向户部书吏讲明部费，然后将实支款目改成户部要求的式样，令局员照样核算，造册具奏即可通过。报销惟部费是赖，部费之风遂愈演愈烈，以致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报销中介，他们在报销者与审核者之间撮合串通，帮忙讨价还价，从中抽取厘头。光绪初年，就有个叫李钟铭的山西商人，自称是工部尚书贺寿慈的亲属，与内外官吏交结往来，包揽报销业务。[⑥] 上述云南报销案中，涉案人太常寺卿周瑞清、户部候补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等人，事实上也都在兼理此种营生。

各省报销以部费为护符,那么部费又从何处筹措？在正项财政支出中是没有部费一项的。也就是说，部费支出不能列入销册到户部报销，需要地方政府自筹或挪垫。各省的做法不尽相同，或“先事于公项提存，即事后于各属摊派”；或从正项钱粮外加征、附征。但无一例外，都是从各省向不报部的外销项下来解决。咸丰年间，张集馨采买军粮，担心“将来造销部费无出，曾去首府商量，每石另加五十制文，以为部费”。[⑦] 湘军第一次军费报销 300 万两，需用部费不下数万，拟在华阳镇抽厘项下设法筹出。曾国藩称：“此款有着，则余心又少一牵挂。”[⑧] 报销未办，部费先筹，这种情况在光绪朝时仍一如既往，上述云南报销案中，崔尊彝在赴京办理报销之前，即已从该省的外销款捐局平余项下筹出巨额部费汇兑到京，用于打点户、工各部员吏。应该说，他走的是一条在当时再正常不过的门路。

不予部费巨款难销，给部费则例外之款尚可报销，导致的结果是“实数不准销，准销非实数”，[⑨] 军需奏销虚文相袭，成为官样文章。在中央视为“例不可支”，在地方却被视为“事非得已”；在中央视为“赃”，在官员却视为当然。伴随着奏销制度窳坏的是吏治的腐败和地方政府自为经理的外销财政的扩张。财政规则被视同敝履，款不虚靡的愿景只能靠办事人员赤诚无私的道德约束。光绪八年，薛福成上书户部尚书阎敬铭，建议“综核之法，只可视督抚为何如人而可否之。督抚有如曾文正、胡文忠诸

---

①《光绪七年二月戊戌张观准奏》,《光绪朝东华录》第 1 册，第 1050 页。

② 吴庆坻:《同治三年变通军需报销》,《蕉廊脞录》，第 39 页。

③ 曾国藩:《致李筱泉》(同治三年八月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第 13 册，第 55 页。

④ 云南报销案中即存在将岁支杂款全部纳入军需的情况。张佩纶:《云南报销案可疑三端片》(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涧于集》奏议卷 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92 种，第 338 页。

⑤ 汪大钧:《论变法当务为其难》,《时务报》1898 年 7 月 9 日，第 2-3 页。

⑥《光绪五年二月庚子谕》,《光绪朝东华录》第 1 册，第 705-706 页。

⑦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86 页。

⑧ 曾国藩:《致沅甫弟》(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李翰章编:《曾国藩家书》，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 年，第 257 页。

⑨ 王之春:《论军需报销》，喻岳衡点校:《椒生随笔》，长沙：岳麓书社，1983 年，第 23-24 页。

公者，所请虽一概照行可也。督抚有如英西林、文质夫诸公者，所请虽一概痛驳可也”。[①] 这不啻又回到“任人不任法”的人治状态。清末陶模也有“天下合例之案卷日多，天下守法之廉吏日少”[②] 的沉痛之语。奏销制度沦为如此不堪的地步，实为为政者所始料不及。

奏销制度的窳坏，并非始自光绪朝，也并非在光绪朝时达到极致，而是奏销则例与财政实践相脱节的制度性矛盾一直被拖延掩饰，只是到了光绪朝前期，随着云南报销案发，才被充分展现出来而已。前文所揭示的云南报销案中存在的三个疑惑，足以表明奏销制度在晚清时期已陷入这样一个困局：如严格按照奏销程式，外省有好多款项即无法报销。而这些款项又是真实花出，地方政府为弥补这一财政亏空，只能通过外销的形式来筹措这笔费用。而外销的存在，却又反过来极大削弱奏销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稽核财政收支的功能；如果不严格按照则例搞变通处理，无形中增加了部吏上下其手的自由裁量权，他们会任意加大对外省的额外索求，由此必将加剧奏销环节的弄虚作假和吏治腐败。而地方政府同样不会自掏腰包，必须从外销途径来筹措这笔资金应对各部院的需索，这又将会促发奏销制度的进一步窳坏。

三

光绪六年中俄伊犁条约起争议，户部未雨绸缪，上疏筹饷办法十条，其中就有严核各地奏销的条款，[③] 但一直没能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云南报销案爆出后，奏销制度的窳坏一时成为清廷上下备受关切的问题，人们开始将此案视为弊极而返的一个契机。户部尚书阎敬铭治事刻核，善于理财，新任伊始即积极整饬部务，力图重整财政规制，杜绝奏销弊端。在他的主持下，户部秉公核议，拟定《内外军需善后报销章程》20 条，其中户部报销章程 6 条，外省报销章程 14 条，奏准通行。户部 6 条是规范核销行为的，以内除户部招摇需索之由；外省 14 条是规范报销行为的，以外绝各省含混冒销之弊。因为军需奏销的审核还涉及到工、兵两部，新章程厘清了户部与工、兵两部在军需核销方面的管理界限，如机器局制造军火采买外洋器具等费归工部核销，海防购买外洋枪炮用款等由兵部核销。同时，为响应户部的行动，兵部于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奏订外省军需善后报销章程 4 条，工部于光绪九年三月十七日奏准各省军需善后报销章程 6 条。[④] 户、兵、工各部所定新章各条，其最要者有：

一是截清旧案、新案，分别开单与造册。光绪八年九月，御史梁俊上奏：各省军需用款，前经奉旨，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免其造册报销，自七月起仍一体造报。原以重库储而杜浮冒。惟历年既久，用款甚繁，军需正项及善后事宜名目尤多，若必造具细册，与例吻合，往往再三驳查，稽延时日，甚至迁就挪移，串通嘱托，百弊丛生。并有应行造报之案，积欠未办，转不足以昭核实。所有光绪八年八月以前各省办理军需善后未经报销之案，着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⑤] 清廷接受了梁俊的建议，将同光以来的军需报销分成两个时段，以光绪八年十二月为界，前者为军需，作为旧案处理；后者为善后，作为新案处理。旧案旧办法，新案新办法。所有光绪八年十二月以前各省军需善后未经报销各案，向开单者仍开单，向造册者仍造册。九年正月以后，概令一律造册报销。

光绪八年允准的开单报销与同治三年的奏销豁免情形略有不同，那就是此次开单必须遵守户部制定的格式，先开兵勇、员弁名数与口粮实数及增勇、裁勇四柱清册，再开收支银数目四柱清册，定限速结。户部强调，酌定开单格式之意，不过易册籍之繁重归于简明，略弁勇之花名惟考实数，只要逐款

---

① 薛福成：《上阎尚书书》（1883 年），《庸庵文编》第 1 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943 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 257 页。英西林即英翰，文质夫可能指的是文煜，二人皆以贪蠹闻于时。

② 陶模：《覆陈自强大计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编：《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 24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 年，第 320 页。

③《光绪六年正月甲午户部奏》，《光绪朝东华录》第 1 册，第 866 页。

④ 各部新定章程各条内容，可参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抄本（该抄件无题名，无页码）。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Library/[Tao lun jun xu shan hou bao xiao zhang cheng wang lai han], China:s. n,Qing mo, between 1883 and 1911.

⑤《光绪八年九月乙未梁俊奏》，《光绪朝东华录》第 2 册，第 1417-1418 页；梁俊：《奏为军需报销致招物议请饬开具清单免造细册事》（光绪八年九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档号：03-6017-035。

明晰，即与造册无殊。在疆吏不致苦造报繁难，在部臣可详考军饷出入，不再像从前那样毫无轮廓，笼统奏销。[①] 工部 6 条中也有各处留防营房炮台等项及各省城壕报销须分款详开，不得仅开总数的规定；兵部章程也强调，轮船报销及购买外洋枪炮、电线等件所需运送水脚等项，亦必逐细开明报部，方准核销，不得笼统开报，以杜弊混。

一是厘定各省报销新章。户部已认识到，军需则例今昔不同，已不能尽行援引；各省章程不一，也难令强同。因此要求有条件的省份一省撰一省例，存部备查："有奏咨各案可稽者，即可编纂；尚有未经奏咨立案，限令各省拟定章程奏明，俟各省到齐后，臣部将各省后奏案参酌定例，分前准驳刊即报销简明章程，一省各纂一例，颁发遵照办理。以后变通，随时编入，使各省支报销款目，仍系该省奏咨定案。"[②] 各省纷纷拟定本省军需章程。户部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材料，比照该省以前的相关奏案，或他省同类例案，逐一核对，详加核减，能定数者立为定数，不能定数者设法稽核。浙江巡抚刘秉璋将光绪四年正月起至八年十二月底止，册造军需用款送部立案。户部当即督饬司员详细稽核，删除烦乱，定为浙省新章，具奏允准。光绪六、七、八等三年之款，均照新章办理。户部将该省送到销册按照所报章程及销过各案，逐款校对，与新的例章相符者，准其开销，不符者，概令删除。[③] 光绪十年，清廷特派户部满尚书额勒和布亲赴陕西，调查陕省外销事宜，就规复额饷、停发未支欠饷、未支廉俸饷乾分别改奖等事与该省进行了沟通，最终促成陕省厘定《军需用款章程》8 条。[④] 贵州巡抚李用清也积极响应户部，参酌该省历届成案，因地因时，拟定报销省章 16 条。[⑤] 后来又发现，改编练军章程在省章内没有详细开载，致碍核销，又于光绪十一年七月申请补充。户部遂督饬司员按照原单，查照军需则例及该省历次奏咨并办过的各成案，逐款稽核，同意该省另缮清单，奏请立案，以便遵守。[⑥]

一是事先立案。对于各省军兴以来新出现的洋务项目支出，需事先立案才能报销。兵部章程规定，采买外洋军火，应先将委员某人、赴何处采买、数目若干，先期报部备案；工部章程规定，各省制造洋式物件工程，应令详细奏明立案。工部称："臣部办理各省奏销，应准、应驳原有例章可循。自中外交涉以来，各省制造军火器械暨各项兵房、炮台工程，动以物料购自外洋无例可循为辞，臣部亦以其奏明立案在先，照章准销。……凡各省局报销案件，应于创办之始，即筹定每年需款若干，奏明立案。部中核销，即以初立之案为凭。其每年立案银数，随时增减原无一定，但不得于初立之案相悬殊。"[⑦] 这就等于是以各省自立之案，来核各省所报之款。若所销之数与立案不符者，议驳；相符者，无不照准。需要事先立案的军需支出，除各省制造军火器械等物料外，还包括所有订购机器、雇募员工等内容；各省防营练军兵数、勇数及应支饷数；各省防军凡从前没有奏明营制、兵勇数目、口粮、军火杂用等项（以后如有增裁勇数、饷数可随时奏报）；各省设立机器局以及购买外洋枪炮、电线等件。[⑧] 总计常年经费若干，添购机器经费若干，事前奏明报部立案，事后方准报销。这些均为洋务新事物，部中无凭稽核，虽不能限以定数，亦当立有范围。

光绪十年，山西巡抚张之洞遵照部章，将晋省已撤暨现存各军勇数、饷数并各项薪水、杂费开单奏咨立案。户部发现该省军需报销上一案，收支各款均为开单报销，无法援照核算，只能督饬司员，检查

①《陕甘总督谭奏甘肃关内外收支饷项应令遵照格式另行开单报销折》(光绪十年二月),《户部奏稿》第 3 册，第 1177-1178 页。

②《李用清片》(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户部奏稿》第 7 册，第 3386 页。

③《核覆浙江省善后军需第十案用款折》(光绪十年十二月),《户部奏稿》第 8 册，第 3797-3798 页。

④《议覆陕西省用款章程分别办理折》(光绪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户部奏稿》第 9 册，第 4350 页。

⑤ 李用清:《奏为声明拟定报销章程以后遇有变通随时呈请事》(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案全宗》，档号：04-01-01-0951-086;《核议黔省善后各条折》(光绪十一年七月八日),《户部奏稿》第 9 册，第 4315-4320 页。

⑥《核议黔省善后各条折》(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八日),《户部奏稿》第 9 册，第 4315-4316 页。

⑦《各省报销逐年加增拟请明定章程折》(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1 册，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 年，第 318 页。

⑧《海防销案拟请三部分办并将原册发还另行分造折》(光绪九年八月初五日),《户部奏稿》第 1 册，第 162 页。

该省历年相关奏案例章，逐款校对，其名数、饷数与例章奏案合者，悉于单内分款注明，准其立案；其有不合者，也于单内按款详注，令其删除。[①] 等到晋省下次办理此项报销时，户部即可以此次所立之案作为核销的标准。同年，浙抚将浙省留防各营实存员弁兵勇数目造具清册，送部立案。户部同样督饬司员按照原册逐款稽核，应删应减，定案后原册抄齐存部，嗣后该省销案永照此办理，随案同送，以凭核对。[②]

户部有时也会督催各省军政大员遇事要及时立案，以便事后报销。光绪十年帮办福建军务的杨岳斌准备赴台作战，先赴安徽等地招募新军，练习洋枪、洋炮，月需饷项照楚军章程稍为变通散放，为旧例所无，中途接到户部的咨文，“该前督所募十一营，究竟官弁勇夫若干，月需饷项若干，系照何项章程开支，应请旨饬下该前督遵照臣部奏定新章，赶紧造具清册，奏咨报部立案。”[③] 杨岳斌遂迅速将详细情况报告给皇帝，请饬部立案，以便日后由福建省汇案报销。

光绪朝前期诸多整饬奏销举措的出台，应是户、兵、工等部在云南报销案发后迫于压力而做出的应对之策。这些举措力图对现行奏销制度做些修补，其主导思想是杜绝浮冒，达到内不索费而外不浮销的目的。但清廷的这些解困之方是否能振衰起敝，对日趋松弛的军需奏销制度有所改进，使其重新焕发制度威力？我们可逐项分析。

光绪八年奏准的开单报销，是继同治三年清廷又一次豁免军需奏销行为。前已述及，开单与造册，在奏销程式上存在差异。开单呈报，很少有不准之情形。因此允准开单，就等于实报实销，前此糊涂账一笔勾销。造册不仅手续繁杂，且需经过户、工等部的严密稽核，方能销账。因此，外省自然是乐于开单，而苦于造册。与同治三年一样，此次奏销豁免也奉行旧案、新案区别对待的原则，意在宽其既往，严其将来。这样，各省从同治三年到光绪八年之间的军需支出再次获得开单报销的变通处理。按理说，光绪八年以后的奏销应当走上正轨，不复再有开单。但此后各省意犹未尽，不时仍有开单之请。光绪十年七月左宗棠入闽，抽调江南各营添募援台亲军土勇，称有杂支各款不能预行开报，要求届时查照陕甘报销成案开单请销，户部认为陕甘开单报销是针对光绪八年之前的事，现在既有新章，不准再行开单，不得援引前案。[④]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在办理广东军需善后报销时，因涉及款项复杂，难于造册奏销，遂申请再次开单。[⑤] 此次申请遭到朝廷严厉申斥。

开单之危害，正如右庶子张佩纶所指摘的那样：“夫造具细册，其弊在部中之需索，然京员朋比贪婪，形迹易彰，指摘亦易，及此云南报销所经御史劾奏也。若开单举报，则其弊在外省之浮冒，诪张为幻，发覆亦难，外重内轻，弊将杂出，因噎废食，此之谓矣。”[⑥] 即开单可以使部吏索取部费行为有所收敛，但却为外省浮冒打开了另一扇方便之门。不过造册是否就能杜绝外省浮冒呢？岑春煊就对此不以为然：“所报而实，则清单已足为考核之资；所报而虚，则册籍适以供舞文之具。……若必令造具清册，不过将显明易晓之总数，析为纷纭纠葛之散数，例文繁密，册籍纷陈，徒苦书吏之传抄，而于考核本案收支，仍无出入。”[⑦] 在他看来，无论是开单，还是造册，都很难保证外省报销绝无弊端。

---

①《核议晋抚奏晋省军需用款开单奏明立案折》(光绪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英琦、世杰编:《户部山西司陕西司奏稿》第 1 册，台北：学生书局，1976 年，第 325 页。

②《核议浙江省善后军需用款酌定章程据咨改奏折》(光绪十年五月初九日),《户部奏稿》第 4 册，第 1765-1773 页。

③ 杨岳斌:《军饷照楚军章程稍为变通折》(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肖永明等校点:《杨岳斌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 年，第 460 页。

④《核覆福建军务左所部各营开支募勇经费等款拟令仍照新章造册报销折》(光绪十一年六月),《户部奏稿》第 9 册，第 4241-4242 页。

⑤《光绪十五年十月甲午谕》,《光绪朝东华录》第 3 册，第 2667-2668 页。

⑥ 张佩纶:《报销免造细册易滋流弊折》(光绪八年九月十八日),《涧于集》奏议 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92 种，第 318-319 页。

⑦ 岑春煊:《奏为复核部驳西征报销收支各款委无浮冒请准照销事》(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全宗》，档号：04-01-01-1079-044。

让外省自立报销章程，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各省饷章纷歧、报销难以一律的难题。户部在讨论御史丁振铎奏请《军需报销各款核定简明章程增入则例》一折中即已解释了原因："自军兴以来，各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员，练兵募勇，所在立营。肃清以后，各就原定营制创立章程。原定营制各处不同，章程因以互异。"报销时部中无例、无案可依，为吏胥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制定省例，"实以外省奏报之章程，为部中核销之章程"。[①] 这样，明白划一，中外共知。

允准各省自立章程，体现了朝廷对各省在军饷报销上的一种妥协。传统的军需则例，与现实太过脱节，凭此作为核销各省军需的标准，自然会弊端百出，这其实是咸同年间就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跟之前的解决办法不一样，这次户部鼓励各省根据本省实际，制定出符合本省情况的省例，并以此作为该省以后报销的依据。说明户部已充分认识到各省则例难以强同，试图改变以前则例过死的情况，也使部中有案可稽，不至漫无限制。这确实比之前户部核销时毫无准的略高一筹，此举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户部既同意各省自立章程，又允许其根据情况随时增减，这不啻又落入"实报实销"的旧套路。

同样，事先立案也是为了解决各省洋务日兴、军需支出耗费尤多、名目日新月异、既无定例可循、部中无凭稽核的窘况。朝廷的出发点是各省在动用军需之前，须先向有关各部提交一份备案。这份备案是事后各部核销该省军需的依据，所销之数与立案之数相符即准，不符者不准。这样，部、省两造，一报一销，均有案可凭。户部特予解释："此非臣部好为琐碎，诚以出纳所司，不得不认真核实。且恐含糊迁就，更兹隐射招摇之弊。"[②] 事前立案，立意固无不美，但立案浮增情况仍无法杜绝。正如工部所揭示的："当定章之始，各省立案尚能核实。无如近年以来，此等销案以成故套，其逐年自立之案，与自销之案安有不符之理？于是每年立案银数任意加增，部中即据为核销准的，是名为报部核销，不啻自用自销也。"[③]

自用自销，又何必要立案？何必要多此奏销一举？所以事先立案对报销内容审核的约束作用是有限的。清廷试图通过报部立案，以此来杜绝各省的侵欺，这一目的很难达到。而且，各省自行立案，也同样出现已立之案与新出之案的矛盾。甲午战争期间，北洋将士出征，筹添勇营、增购船械，李鸿章事前即历数此次军需不能拘泥平常军需章程的各种情形，甚至声称既难以成例相绳，尤难于事先立案，惟在随时随事督饬经办各员核实撙节，斟酌变通，期于款不虚糜，功归实际。[④] 对于李鸿章的要求，户部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查北洋历次报部销案，多与例章未符，一经奏请，均系照案核销，臣部并未拘以常格。今该督陈奏防剿倭寇费用之巨，办理之难，将来报销到部时，臣等自应体察情形，奏明核办。惟支销既巨，弊窦易滋，相应请旨饬下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经办各员，核实撙节，总期功归实际，款不虚糜，是为至要。"[⑤]

清朝素称以"例"治天下，[⑥] 在财政制度上也奉行以例治财。新的报销章程寄托了清廷规复奏销旧制的良好愿景，但自定省章、事前立案只是对现行奏销制度进行了一番修补，仍不脱以例治财的窠臼。奏销制度的内在矛盾并未彻底解决，则例与财政实践的脱节问题仍然无处不在。因此，光绪朝前期重整奏销规制，形式远胜于实质。

四

光绪朝前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被扑灭，但危机仍然四伏，用当时人的话说，危机主要来自

①《议覆御史丁振铎奏请将军需报销各款核定简明章程折》(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户部奏稿》第 2 册，第 653-654 页。

②《各省机器局请立定章程折》(光绪十年三月十二日),《户部奏稿》第 3 册，第 1462-1463 页。

③《各省报销逐年加增拟请明定章程折》(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1 册，第 318 页。

④ 李鸿章:《筹办采运难拘成例片》(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 15 册，第 466 页。

⑤《遵议李鸿章奏东征倭寇筹费为难各情请饬核实办理折》(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12 册第 23 卷，1932 年，第 10 页。

⑥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 5，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531 页。

四个方面，即边方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①] 其中财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奏销制度废弛而流于形式，司农之官不思进取，惟以例案束缚外省。清人曾称："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②] 这种"吏"操纵"例"以取"利"的情形，在军需报销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外省为求不被驳查，但求合例造报，真账隐匿，反以假账示人，中央全然不知各省财政之虚实。

光绪八年，云南报销案发，军需奏销过程中的黑暗内幕被充分暴露。阎敬铭出任户部尚书后，开始厉行整饬，重整奏销规制，相继推出自定省章、事前立案、编订黄册等举措，力图重新发挥奏销稽核全国财政收支的功能。兵、工两部也随之响应。但各部力图在奏销制度框架下所做的一系列技术上的改进，对国家财政制度的完善难期成效。表现在：部费陋习仍难以根绝，这种潜规则甚至在国罹大难之时竟未稍减；[③] 外销收支仍继续膨胀，虽经多次整饬，各省终未将外销和盘托出。其不肯径情直达的原因是怕中央夺去了其自专之费，由此失去自由裁量之权。户部手里所掌握的，仍然是"一片糊涂账目"。[④] 这说明，仅仅靠奏销制度的规复或修补，已不足以彻底改变清季财权分散、财政秩序混乱不堪的局面。

云南报销案昭示于时人的是，现行军需奏销制度已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而难以为继。奏销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吏治腐败和各省外销财政的扩张，而吏治腐败和外销扩张又进一步促发了奏销制度的败坏。如此恶性循环，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且难以得到有效的化解。严峻的财政现实产生了对财政制度变革的内在需求，但其时制度供给却出现了短板，为政者所赖以决策的制度资源仍取之于祖宗之法。[⑤] 制度变迁陷入锁定状态，难以有效实现。清廷当时所面临的这种窘境，如其说是一个制度困局，毋宁说是一场治理危机，这表明以例治财这种传统的财政治理路径已趋于末路。解决危机的出口在于引入现代财政预算制度，而这到清末宪政时期才有所尝试。在光绪朝前期，无论是疆臣还是计臣，都还不具有这样的先见之明。

责任编辑：杨向艳

---

①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4 册，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第 1817 页。

②《例吏利》，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 1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5250 页。

③"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同光度支琐闻》，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 2 册，第 516 页。

④ 吴保初曾在致汪康年札中云："今户部号为司农，农自为农，而所司者非农也。勾稽簿领，量较锱铢，画诺盈廷，积牍山立，直一片糊涂账目而已。"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1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年，第 304 页。

⑤ 同光年间历任户部尚书，或因循苟且如董恂，或颟顸无为如景廉。惟有阎敬铭尚能综核名实，但也因诸事掣肘，不安于位，屡以病乞退。且阎氏也是一位恪守传统的理财家，守成尚可，创新亦非其所长。其他兵、工各部尚书更不足论，理财既非其专责，于财政更显隔膜。

血洗出一个“新纪元”

——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与“文明”*

段　炼

[摘　要] 作为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重要思想人物之一，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对于“世界”与“文明”的议题有着新的思考，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文明、世界与革命之间互动共生的内在关联。面对民初共和政治的挫败与世界格局的巨变，在五四前期，李大钊不断调整其认知世界与评价文明的价值尺度，形成了从“风俗保群”到“第三文明”的思想转变。到了五四后期，出于对俄国革命的认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李大钊一方面反思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表征的西方共和制度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对互助、合作、博爱的思考与实践，试图以此催生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的文明主体——平民（大众）。在文明觉悟与世界认知不断转变的背景下，李大钊心目中的平民革命，既为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提供了现实动力，也从历史时空（“世界”）与内在品质（“文明”）上深化了启蒙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 文明　国家　世界　平民革命　李大钊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133-11

作为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重要思想人物之一，李大钊通过一系列著述、言论以及社会政治运动，在五四前后的学、政两界以及相关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因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过往国内学术界关于李大钊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大体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研究较多将李大钊视为“党史核心人物”，聚焦其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必然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从史实层面逐步厘清李大钊思想及其社会活动的诸多历史细节，另一方面也因时代氛围与研究者“后见之明”的影响，对于民国初年李大钊思想中多元与复杂的面向有所忽略。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对于李大钊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在史料开掘、议题选择还是论述方式上，均有较大拓展与创新。近藤邦康、后藤延子、村田雄二郎、石川祯浩以及汪荣祖、童世骏、高力克、王远义、杨芳燕、顾红亮等国内外学者，逐渐超越了传统研究的“党史范式”，通过探寻李大钊思想的多重脉络，凸显其如何通过日本和欧洲的渠道，接纳“宪政”“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观念，进而形成自身对于中西思想的汇通与理解。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对李大钊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观念演变的探讨，尚缺乏从五四时期普遍关注的“文明”与“世界”的宏观视野，探究 20 世纪初期李大钊思想中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天理世界观的瓦解与公理世界观的形塑研究”（15BZS08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段炼，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湖南 长沙，410086）。

极为重要的、关于“文明主体”与世界观之间的密切互动。[①]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李大钊思想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置于晚清以降的关于“世界”认知的思想谱系中，回溯其心路历程的历史语境和演变脉络。本文以其思想演变与20世纪初期的世情、国情的互动作为讨论重点，着重分析李大钊如何阐述文明、世界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形塑其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复杂构想与价值抉择。本文试图追问的是，五四时期知识界所关切的“再造文明”的议题，与此时他们对于“世界”的关怀有何关联？在此背景下，李大钊又是如何不断调整其思考世界与文明的尺度，反思西方共和制度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进而言之，李大钊为何最终选择革命的方式，积极介入现实政治，并试图以此催生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的文明主体——平民(大众)？“有血的革命”的主张、个人改造必须以人类命运改变为前提的认知，以及全世界被压迫者荣辱与共的互助情怀，又是如何构成李大钊心目中实现新文明、创造新世界的核心内容？

一、从“国家”到“世界”的语境转换

晚明的耶稣会士给中国带来了早期的环球地理知识，但作为意指“全球各国”的世界观念，直到晚清时期，才在士大夫群体中形成较为强烈的思想冲击。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列强“商战”“兵战”和“学战”带来的时代危机刺激下，中国逐步卷入一个列国林立的世界。对外战争的一系列屈辱性溃败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深了晚清中国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对于组成世界的“泰西诸国”的认知。从此，仿效西方发达国家以寻求中国的自强之路，成为晚清朝野因应时代危机的共识，也成为士大夫谋求变革的思想动力之一。

不过，“世界”自始就并非一个恒定的概念，而是时人认知中因时因势而变的一则变量。1907年，杨度在发表于《中国新报》的《金铁主义说》中，即以《今中国所处之世界》为题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盖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杨度论述中的“世界”一语的意涵，其实和传统儒家的“天下”观念大体一致。而随后“国际之名词”的出现，则正是因为“数十百年以来，经西洋科学之发明”，西方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探险、扩张乃至殖民的结果。从此，“以世界自命”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向之所谓世界者非世界也，不过在世界之中为一部分而已。此世界之中，除吾中国以外，固有大国在也。”[②] 另一方面，率先意识到“世界”的存在，然后逐渐接受中国之外“固有大国”的观念，导致源自传统的“天下”观开始解体，进而使得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其实是世界（国际）中的一国，并自觉地将自身纳入这一世界体系中。

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下，对于“世界”的接纳虽然促进了对于现代国家的理解，读书人却也多少保留传统“天下”观支配下对于二者的价值判断。晚清之际的梁启超不止一次批评中国人“知天下而不知有国家”，[③] 但他那时其实也不忘强调：“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④] 梁启超曾援引乃师康有为的看法，认为“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

---

① 与本文研究旨趣及问题意识接近者，主要有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日] 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远义：《李大钊到马克思主义之路》，《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13卷第4期；杨芳燕：《再造新文明：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普遍与特殊》，《知识分子论丛》第14辑；汪荣祖：《从文化与政治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王锐：《锻造“政治民族”——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五四知识分子的转变”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6月。笔者对于李大钊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也有初步研究，段炼：《从“心力”到“民彝”：民国初年李大钊关于政治正当性的思考》，《史林》2017年第2期。

②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③ 梁启超：《新民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65页。

④ 梁启超：《自由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57页。

界主义’”。[①] 可见，在彼时康、梁诸人的心目中，“国家”与“世界”（及其延伸的“主义”）的差别，乃是基于理想与现实、现在与未来的历史判断，但在其潜意识中，多少仍秉持着“世界”高于“国家”的价值判断。[②]

不过，对于晚清读书人而言，随着对于世界诸国认知的深入，一个更大的思想变化则是，“文明”开始成为衡量国家与世界进化水平的新尺度。其实，作为 civilization 的对应翻译，“文明”一词初并非价值中立地形容西方社会的状况，或表现类似“华夷之别”的教化之有无，而是以“历史进步”为前提，确认一种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一元性顺序”和“普遍公理”的价值。因此，当晚清读书人使用“文明”这一词汇的时候，不管其意图如何，都只能是在认识一种“非中国”价值的存在。[③] 另一方面，正如杨度观察到的那样，“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因此，在“文明”尺度的支配下，“所谓世界的国家主义者，……特欲以中国与各文明国并立于此野蛮世界中，而无不适于生存，有优胜而无劣败之国也”。[④]

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境与文明认知，也反向催生了晚清读书人的思想困惑：既然西方列强代表了“普遍公理”的文明价值，为何由其主导的世界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世界”？进而言之，在一个由“文明国家”主宰的“野蛮世界”中，中国又将如何立国？大体来看，晚清中国率先接受“世界”的观念，继而通过涉及现代国家的诸多范畴（主权、利权、国民、民主、宪政等），将外部“世界”具体化，进而考察西方列强的崛起之路。因此，对于当日读书人而言，中国的因应之道集中表现为接受西方现代性方案，通过建立新型现代国家体制以捍卫国权与民权。

晚清读书人逐步了解“世界”，进而努力深化对于现代国家的认知，随着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初步告一段落。然而，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与军阀政争的此起彼伏，标志着新生的共和理念遭遇挑战，也让知识界对于民国政治深感失望。从清朝的君主制到民国的共和制，1911 年的辛亥革命改变了国体，当日杜亚泉“革命之伟业虽成，而立宪之前途尚远”的言说，[⑤] 却传递出部分读书人对于国家政治的忧虑。另一方面，随后爆发的欧战及其悲惨结局，也引发民初读书人对于世界格局的观察与对于英、法、德、俄等“文明国”的深刻反省。1916 年，陈独秀注意到：“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他认为，在欧洲战争的影响下，军事、政治、学术、思想“必有剧变，大异于前”。[⑥] 因此，在战争的刺激下，对于西方现代国家发展模式与西方文明的反思，构成这一时期部分读书人思想的新基调。一年以后，俄国二月革命爆发。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以战争以前历史之观念，推测战后之世界大势，无有是处。”[⑦]1917 年 11 月，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以及苏俄社会制度的确立，进一步为中国读书人批判性地理解西方文明，提供了新的契机与现实参照。

如果说，晚清读书人主要通过感知有异于己的外部世界，进而了解现代国家及其治理体系，那么到了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视角却逐渐转化为以超越国家的方式，重新思考“世界”与“文明”的意义。这意味着，一度被中国人奉为圭臬的西方现代国家的建构方案，在这一时期遇到了尖锐挑战。知识界逐渐

---

①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我史》附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19 页。

② 其实，这一时期梁启超同时也承认自己“专驰心于国家主义”。因此，他对于康有为过分重视“个人的精神”与“世界的理想”也有不满。他认为康氏思想最缺“国家主义”，以致于“未能操练国民以战胜于竞争界也”。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我史》附录，第 117 页。

③ [日] 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98 页。

④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 217-219 页。

⑤ 杜亚泉等：《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3 页。

⑥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916 年第 1 卷第 5 号。

⑦ 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1917 年第 3 卷第 2 号。

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这一方案必须纳入更为开阔的世界与文明的背景下予以重新审视。[①] 针对晚清读书人关于“野蛮世界”与“文明国”的思想焦虑及其因应之策，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读书人的反思主题逐渐转化为国家虽然“野蛮”，但世界应该“文明”。因此，如何创造一个具有新文明形态的“新世界”，并以此“超克”西方现代性方案下的“野蛮国”，进而实现较之晚清时期“寻求富强”的国家目标更为高远的价值诉求，成为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四时期部分知识分子思考的中心议题之一。

二、内外视角下的“第三”文明

民国初年李大钊的思想历程较为复杂。大体而言，晚清以来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运动与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1907—1913）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1913—1916）的求学经历，让李大钊对于通过完善宪政秩序以建构强大的共和国家有着强烈期待。因此，他才“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②] 但这一时期的李大钊并非一个纯粹的共和国家的制度论者。他倾注了相当多的心力，思考和论述何为真正的共和精神。而这一系列的思考和论述，建立在他对于文明问题的复杂多变的理解之上。

在发表于 1914 年 8 月 10 日《甲寅》杂志第 1 卷第 3 号的《风俗》一文中，留学日本的李大钊表达出对于“群”的高度重视。同年 9 月 3—6 日，天津《大公报》转发此文。[③] 在文章中，李大钊指出，“亡群甚于亡国”。这是因为“群”的意义不仅仅意味着“人体集合”的数量意义，而是拥有“具同一思想者之总称”的内在品质。在李大钊看来，对于“群”而言，其实质乃是“风俗”：“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其力也。”因此“离人心则无风俗，离风俗则无群”。《风俗》一文抨击的是民初的政治窳败和道德沦丧，呼吁“好学知耻之士”作为“群枢”，“积为群力，蔚成国风”。这一看法显然来自传统儒家的道德吁求，即倡导通过“国之君子”的率先垂范，以“风行草偃”的方式改变世风。所以，李大钊援引顾炎武、曾国藩的言论，指出“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④] 进而言之，李大钊已经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群”的凝聚不仅仅依托于良善的政治制度，更多的是源自自身独特的文化（“风俗”）及其陶冶的世道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李大钊的笔下，一种建立在内外视角之上的“第三文明”论述开始出现，并逐渐超越“风俗保群”的论述。这一文明论述的形成，与李大钊在这一期对于“自然之真理”——进化论的深刻服膺密切相关。晚清以来，随着“天理”世界观的瓦解与“公理”世界观的兴起，使得进化论被提升到新宇宙论的层次，逐渐成为解释万物之生成与运作的基本原理，也成为支配朝野各界探讨政治秩序合理性的重要依据。[⑤] 因此，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公理世界观，深化了李大钊对于政治更迭背后历史规律的理解，也在进一步形塑其历史观念与文明尺度。李大钊开始自觉地以一种二元论的视角理解文明，进而以此观察中国与世界。

从文明内部来看，在“世运嬗进”的时代潮流中，需要以除旧立新的态度破除一切旧的政治制度。李大钊已经注意到，“老成者每病新进者之思想动作，不能同于己，则深斥而痛绝之，此大谬也。宙合万化，逐境而进，一经周折而或滞或退者，逆乎宇宙之大化者也。居今日而求治，断无毁新复古之理。虽人惟其旧，倚重老成，而世运嬗进，即有大力，亦莫能抗。旧者日益衰落，不可淹留，新者遏其萌芽，

---

① 许纪霖的研究表明，因受到德国和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想影响，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建立起了一种“国家国民一体化”的理解。但到了五四时期，国民和国家发生分化与对抗，启蒙者开始破除“家国天下连续体”，将个人与新的“天下”（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建立新的关联，因而发生了“文明的自觉”。许纪霖：《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第 50 页；《从世界文明的趋势寻找中国的未来》，《史学月刊》2015 年第 11 期，第 11 页。

② 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 年 4 月），《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713-714 页。

③ 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63 页。

④ 李大钊：《风俗》，1914 年《甲寅》第 1 卷第 3 号。

⑤ 陈独秀在刊于《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两篇文章《敬告青年》以及《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 年《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中就谈及：“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不在演进之途。”又称：“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其中达尔文本诸拉马克的“生物进化论”，是缔造“近世文明”的三大基石之一（其余二者为“人权说”和“社会主义”）。

勿使畅发，此自绝之道也。”[①] 他进而通过“老年”与“青年”的对立，建立起对于“青春中华（中国）”的论述：“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②]

1916 年 5 月，李大钊因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自日本辍学返沪。6 月，袁世凯病卒，民初政坛各派势力再起纷扰。7 月，受汤化龙之邀，李大钊赴京任《晨钟报》编辑主任之职。8 月 15 日，《晨钟报》在北京发刊，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主之。[③] 发表于创刊号上的《〈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清晰地彰显李大钊心目中“白发中华”与“青春中华”的对立。在他看来，这一对立不仅仅是时序上的后来居上，更在于两者分享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形态：“老辈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与境遇和解，与时代和解，与经验和解。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因此，“一切新创造，新机遇，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④] 李大钊笔下的“青春中国（中华）”，显然是晚清时期梁启超呼吁的“少年中国”的历史性延续。因此，李大钊所谓“青春中国”“投胎复活”之说，从晚清民初的思想脉络言之，其实渊源有自。不过，针对新旧两类文明的嬗递，李大钊主张采取调适渐进的态度。在他看来，“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现代之社会，调和之社会也”，是以“群演之道，乃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无秩序则进步难期，无进步则秩序莫保”。[⑤]

从文明外部来看，李大钊的思想尝试则是以“灵与肉”“动与静”等二分方式，来理解东西方文明及其差异。在发表于 1917 年 4 月《甲寅》日刊的《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中，他指出：“东西文明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而动静之别则源于“生活之依据”不同。[⑥] 然而，李大钊也注意到，近百年以来，“西方之动的生活，挟其风驰云卷之势力，以侵入东方静的生活之范围”，导致了一个“动的世界”的不期而至。从价值立场上看，李大钊显然更倾向于西方文明之“动”。他认为“动的国家，动的民族，动的文明，动的生活”乃是“世变”带来的“潮流”。不仅如此，他还力倡以“动的文明”来挽救东方文明之“静”，从而更好地让东方文明融入西方文明。

以“动静”二分的方式对待东西方文明的思路，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代表性，对于李大钊的思想也产生了相当持续的影响。直到一年后的 1918 年，已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反省“一战”得失时，都还在论述“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即在于“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那时，他依然相当现实地承认，“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境”。[⑦] 然而，1917 至 1918 前后的李大钊思想深处，这一“动”的文明并非理想文明的终极形态。因此，他提出一种调和两种文明的“第三文明”的论说。李大钊认为，“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显然，对于东西方文明之优劣偏至，李大钊的即时反应虽重在“扬西抑中”，其实对二者皆有反省。因此，他明确指出，“‘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显然有着调和东西而又更上一层的意味。不过，李大钊也坦承，这一理想的“第三文明”，乃是“有其理想而无其实境”的文明，[⑧] 故而在具体言说中，李大钊更侧重其超越东西文明的理想特质。而以“后见之明”来看，这一“第三文明”的论述，多少也成为他后来孕育“新文明”的思想起点。

三、“解放的文明”与新文明主体的创制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大致同步，对于 1914 年爆发的欧战的反思，则带给李大钊反思欧洲文明与

---

① 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形成》，《中华》1914 年第 1 卷第 11 号。
②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1916 年第 2 卷第 1 号。
③ 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第 176-187 页。
④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1916 年创刊号。
⑤ 李大钊：《青年与老人》，《新青年》1917 年第 3 卷第 2 号。
⑥ 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甲寅》日刊 1917 年 4 月 12 日。
⑦ 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同点》，《言治》季刊 1918 年第 3 册。
⑧ 李大钊：《“第三”》，《晨钟》1916 年 8 月 17 日。

世界格局的新契机。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全球资本扩张与劳工扩张，原有民族国家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资本的扩张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劳工的扩张则带来劳工阶级的扩张。两者对于既有的现代国家形态及制度均提出挑战，超越国家的“世界”命题逐渐成为李大钊思考的重心。

1917年至1918年期间，是李大钊理解世界文明的重要时段。他开始将“近世的文明”视为“解放的文明”。所谓“解放”，即指挣脱“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根据“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所以，“解放”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它所带来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合力作用，更是世界文明进步的推动力。李大钊据此分析，世界政治的趋势将是“向心主义之势力日见缩减，离心主义之势力日见伸张”。因此，“对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①] 可见，在世界大战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李大钊的文明视野开始超越既有民族国家框架，从一开始就将“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主体明确为“世界各国之平民”。在这一时期的论述中，一方面，李大钊率先洞察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了资本家与劳动阶级之间巨大的贫富分化。而因贫富分化导致的帝国战争，更使得“资本家……获丰厚之利益，其下级劳动社会，则为国家驱入凄惨之战场”。[②]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悲剧性的后果，不单单影响到某一特定国家下的特定国民，而是全世界民众的共同灾难。

另一方面，世界大战的爆发，除经济上因资本主义国家财富过分集中与疯狂逐利之外，政治上的原因则在于各国的独裁政治与侵略野心。因此，李大钊指出：“此次战争不全为国家间争胜利之战争，乃有几分为世界上争自由之战争。……此次战争告终，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皆将与之俱终，而世界之自由政治、民主主义必将翻新蜕化，以别开一新面目，别创一新形式，蓬蓬勃勃以照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然则吾侪今日，不愿为某一特定之国民希望胜利，而为世界各国之平民希望胜利，不愿为某一特定之国民祝祷自由，而为世界各国之平民祝祷自由。”[③] 在这一超越纯粹国家政治的立场下，李大钊反复思考的“第三文明”的目标指向与理论视野，显然较之此前的调和论述更为明确开阔。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推进，1917年的俄国相继爆发“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结束帝制，建立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是，临时政府并未退出战争，而是试图通过战争来获得更多的殖民地和国家利益。然而，不到一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暴动，推翻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随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列，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战局。1917年俄国政权更迭及其带来的世界政局的演变，成为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思考世界、文明与革命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文明的毁灭性打击下，“文化”的概念也开始在中国思想界日益兴盛，并与晚清以来的“文明”观念形成区隔。“文化论述”极力摆脱晚清以来的“西方中心论”，转而将思考焦点与价值关怀，重新投射到中国文化自身的精神价值与个性特质之上。[④] 这是一种以（东方）文化之“特殊性”抗衡（西方）文明之“普遍性”的努力。然而，李大钊的思路显然与此不同。1918年7月1日，在发表于《言治》季刊第3期的两篇文章中，李大钊依然在思考如何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再造”，以“第三新文明”化解世界危机。显然，这是尝试以新的文明“普遍性”取代旧的文明“普遍性”。[⑤] 而在俄国革命的宏大历史背景与社会影响下，此刻李大钊心目中“第三新文明”的

---

① 李大钊：《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甲寅》日刊1917年4月29日。

② 李大钊：《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甲寅》日刊1917年4月24日—5月5日。

③ 李大钊：《自由与胜利》，《甲寅》日刊1917年5月21日。

④ 黄克武：《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转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⑤ 杨芳燕指出，李氏自始即将创造“第三文明”视为“具有宇宙论基础的普遍性发展原理；因此即便明确具备了社会主义内涵的第三文明，仍被他视为一种世界性的新文明类种，而非独属于中国的新文明”。杨芳燕：《再造新文明：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普遍与特殊》，《知识分子论丛》第14辑，第238页。

指向已经相当清晰，即“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俄国革命的历史情境清晰表明，如果俄罗斯文明的确代表了一种“新文明”的话，那么它的产生过程并非如同此前诸多人类文明那样，经由一系列漫长的自然演化而成。相反，作为“新文明”的典范，它的诞生源自接连不断的暴力革命，特别是日益扩张的民众革命，最后才得以在超越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革故鼎新。

这一思考强化了李大钊此前对于世界“离心主义之势力日见伸张”的历史判断，也让他对此前试图通过“调适”方式融汇东西文明的构想予以深刻反省。从此，作为创造新文明重要手段的“革命”以及对于革命正当性的论证，成为李大钊思考世界与文明的焦点。在发表于 1918 年 7 月 1 日的另一篇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将法兰西革命与俄罗斯革命进行了充分比较。在李大钊看来，“法兰西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这意味着同为革命，20 世纪初的俄罗斯革命在其价值取向与精神境界上，已经大大超越了 18 世纪的法兰西革命——“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

见证了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对于文明产生了新的认知。如果说法兰西革命缔造的共和国，代表着 18 世纪到 19 世纪现代国家构建的新模式，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结局，标志着这一西方现代方案已成沉舟病树，亟待在新的世界潮流洗礼下枯木逢春。因此，李大钊对于俄罗斯革命开创的新文明形态予以高度评价：“世界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②] 显然，当“爱人”取代“爱国”、“世界主义”取代“国家主义”、“和平”取代“战争”，“革命”就不再单纯等同于在 18 世纪国家主义模式下，资产阶级推翻专制王权建立共和国的过程。19 世纪的世界历史已经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与实践虽然瓦解了专制，但它带来的仍然不是充分的民主和平等，反而因资本以及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文明局限，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新的压迫、宰制与战争。因此，只有对“法兰西革命”及其代表的西方现代方案予以充分反省，才能为新文明主体的创制拓展空间，进而证明新的革命的正当性。

在 1918 年 10 月 15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上，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在文章中，李大钊已经相当明确地将 1789 年的法国革命视为“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而将 1917 年的俄国革命视为“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标志着李大钊的历史观的一次重大改变。在他看来，“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③] 换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非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而是“全世界的庶民”打败了“军国主义”。从文明的视角来看，强权之上有公理，国家利益和政治民族主义的立场之上，有着更为深远的民主主义。因此，当革命的主体从资产阶级转向广大庶民，革命的对象从专制皇权转向“军国主义”，革命的空间从一国内部转向整个世界，意味着革命正当性的基础必然转变为革命能否带来最广大的“人民民主”的实现。因此，在李大钊眼中，“廿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全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以形成“世界的社会力”。[④]

故而李大钊认定，“Democracy 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 Democracy 的时代”。[⑤] 在他接受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主张之后，他显然亦对人民民主和革命新模式予以认可。自此，有了新的

①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 1918 年第 3 册。
②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 1918 年第 3 册。
③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1918 年第 5 卷第 5 号。
④ 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新青年》1918 年第 5 卷第 5 号。
⑤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晨报·自由论坛》1919 年 2 月 14—15 日。

典范，“Bolshevism 的胜利，就是廿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具体而言，这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①]

不仅如此，这一更广泛的人民民主的目标，超越了捍卫国家利益的政治民族主义，成为贯通国家、世界乃至大同社会的核心思想。[②] 因此，李大钊指出，“今日的 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 Democracy 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所以，“必要把世界作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 Democracy 作世界的 Democracy 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要求 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 Democracy 的真义。”[③]

四、以“有血的革命”再造“我与世界”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的消息让各界人士欢欣鼓舞。国人对于处理善后的巴黎和会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抱有极大的企盼，“公理战胜强权”一时间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列强最终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这让中国社会各界最初对和会抱有的幻想彻底破灭。李大钊在发表于 1919 年 5 月 18 日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尖锐指出：“我们且看巴黎和会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李大钊看到了“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李大钊的观察和前引晚清杨度所言“野蛮世界”几乎同义。从晚清到民初，以西方现代国家作为模板实现国富民强，成为中国社会的变革者们无限憧憬的目标。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巴黎和会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大会”，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强盗国家”对于“弱小民族”的压制，使得世界真正实现平等与正义遥遥无期。李大钊认为，“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但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④] 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读书人从“国家”到“世界”的视角位移带来的新觉悟：通过彻底改造“强盗世界”，进而从更高的层次反省西方现代国家的方案。

在俄罗斯经验的启示之下，革命相当自然地成为李大钊心目中改造世界的途径。在李大钊的思想中，改造世界进而创造新文明的“革命”，具有社会变革和文明变革的双重意涵。就前者而言，李大钊的思想逐渐从昔日力主调适的温和渐进的方式，转向对于“有血的革命”的认可。他指出，“社会革命的潮流，……不是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世界，大有 Bolsheviki 化的趋势”。他援引哈利孙（Harrison）在《隔周评论》上的话：“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引起了恐怖，引起了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那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世界就在那里面造成。Bolshevism 的下边，也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进化，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的，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中的暗中激奋。”[⑤] 就后者而言，李大钊心目中“有血的革命”带有相当强烈的人道主义互助论与基督教末世救赎的色彩。[⑥] 这使得李大钊心目中的“革命”不仅仅只是意味着政权更迭，更重要的乃是如基督教传统中“创世记”一样的文明再

① 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新青年》1918 年第 5 卷第 5 号。

② 罗志田认为，这种“由小及大”逐步实现“世界大同”，是李大钊在 1918—1920 年间反复申论的主题，且这种结合“修齐治平”发展观的世界倾向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罗志田：《涟漪重叠：“五四”前后面向世界倾向的延续》，《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95 页。

③ 李大钊：《〈国体与青年〉跋》，《国体与青年》1919 年 1 月 16 日。

④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1919 年第 22 号。

⑤ 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晨报·自由论坛》1919 年 2 月 7-9 日。

⑥ 李大钊对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的推崇及后者对于李大钊思想的影响，参见汪荣祖：《从文化与政治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五四知识分子的转变”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第 2-3 页。

造。因此，李大钊把 1910 年代以来造成世界动荡的大事件，视为《旧约》中荡涤地球的大洪水。他说："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①

李大钊将 1914 年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心目中新文明创生的重要时间节点，显然奠基于他对现代国家政治模式的扬弃，以及对于俄、德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创造新世界的向往。与依托军力平衡和财富剥削的 19 世纪现代国家共处方式不同，这样的新世界的精神基础，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那么，经过"有血的革命"荡涤后的世界又将怎样？李大钊说："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在这里，李大钊将未来由新文明构建的新世界的重心，归结为"协作与友谊"。他认为，二者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在他看来，"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② 他后来表述得更具体："博爱、自由、平等、牺牲，这是我们创造'新生活'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建立民国的基础——我们相信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我们相信我能爱人，人必爱我，故爱人即所以爱我……爱世界的人类比爱一部分人更要紧，总该知道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③ 可见，李大钊对于新文明与新世界的渴望，其实质是建立在一种对于新道德的想象与旧道德的彻底决裂之上的。这种新道德所带来的新文明，是对于人世间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制度性存在（如家庭、阶级、国家、种族等）的最终超越："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④ 对于未来新文明只有完善的"自我"与美好的"世界"，这样充满道德感的表述，在李大钊这一时期的笔下多次出现："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⑤ 为了达到这个美好的新世界，"有血的革命"的意义是双重的——对社会而言，通过"阶级竞争"以打破家庭、国家、阶级、种族的界限，是"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对个人而言，"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⑥ 按照未来新文明需要造就新人。

学界过往研究一般认为，相继完成于 1918—1919 年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述，标志着李大钊从所谓"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本文则倾向于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纳，视为他在具体历史情境的刺激下，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丰富多元的知识资源的批判与取舍。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李大钊已经相当积极地通过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了解，展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诠释。从另一角度来看，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接受、言说与想象，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实践。正是在李大钊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时代关怀的刺激下，使得他头脑中已有的知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相当丰富的互动关系。

1919 年之后，李大钊已经更为系统、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术语与理论，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后果："这次的世界大战，是从前遗留下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在新生活新社会的旧物的总崩颓。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⑦ 虽然这时他还在延

①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1919 年第 3 号。
②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1919 年第 29 号。
③ 李大钊：《双十字上的新生活》，《新生活》1919 年第 8 期。
④ 李大钊：《我与世界》，《每周评论》1919 年第 29 号。
⑤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1919 年第 1 卷第 3 期。
⑥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1919 年第 29 号。
⑦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1919 年第 2 卷第 2 号。

续一两年之前对于东西文明的“动”与“静”的区分，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理念开始产生了新的解释力：“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由此，“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破不安的现象……在世界的资本制度下被压迫而生世界的无产阶级”。[①]

经济环境的转变带来了阶级的分化，阶级的分化又深刻改变了社会的结构。这呼应了李大钊此前关于社会变化由“离心力”与“向心力”合力作用的观察。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对于这一社会变动现象的表述更加简洁明快：“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以力统属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李大钊意识到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阶级的重组与斗争，从而创生新的社会形态。所以，他指出现今世界的趋势是“纵的组织日见崩坏，横的组织日见增多扩张，就是中土各种民众的自治联合，也从此发轫了”。在他看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国五四运动的历史，贯穿其中的主线就在于，学生、教职员、商界、工人、农民、妇女乃至各行各业，以横向联合的革命方式，彻底颠覆了过往现代国家模式下以“力”上下压迫的格局。李大钊认为，“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②]

五、结语

大致而言，晚清朝野各界对于“世界”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率先碰触到与“天朝”异质的外部“世界”，然后通过对泰西诸国逐层深入地了解，将“世界”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西方现代性方案建立现代国家，进而通过竞争进化在“野蛮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这一时期“文明论”的核心内容。然而，在经历了民初内政外交的急剧动荡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深刻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成为他们对“国家”及其背后的西方现代性方案展开批判的思想资源。通过对“世界”的“理想化”塑造，他们扬弃了 19 世纪以来的竞争进化论，转而主张互助、和平、博爱等超越国家与种族的人类价值，进而展开了对于未来新文明的想象与言说。

通过不断深化世界认知以及对于文明尺度的调整与修正，五四时期李大钊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样貌，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变迁过程——从调和东西文明但仍侧重于西方文明的“第三”文明，到归属于“庶民”与“劳工”的俄罗斯文明，再到全面接纳马克思主义后，试图通过“阶级竞争”与“互助论”建构的“世界大同”。正如胡适在 1926 年所言：“中国人不能在胁迫下接受一个与其信念相左的新文明，必须有一个说服的过程。”[③] 对李大钊而言，这一“说服”的过程表现为：因文明的觉悟与世界的认知不断演变，使得他的思想演变中的“革命”，既是为五四的思想启蒙提供源源不绝的现实动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从时空上（世界）与内在品质上（文明）深化启蒙自身内涵的过程。

就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与社会实践而言，这一过程展现了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以及革命与启蒙之间，并非过往认知中相互对立或彼此“压倒”的关系，而是相互激发、相互生成，并最终共同创造新的社会主体——“人民大众”的复杂历史过程。因此，对于李大钊而言，革命不再是简单意味着以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方式再造共和，而是在于通过不断革命，进而不断扩大民众参与，让最底层、最广泛、最受侮辱与损害的庶民与大众，成为塑造新文明及其命运共同体的新主体。

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时期李大钊确曾借助“新中华民族主义”，投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

---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1920 年第 7 卷第 2 号。

② 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解放与改造》1920 年第 2 卷第 2 号。

③ 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 年 10 月 8 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1990 年。转引自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

政治实践。[1] 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对民初共和政治以及西方文明的失望，他又极力通过底层民众的不断革命与民主参与，以创造新文明的方式，实现对于代议制立宪制度的超越。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 1917 年俄罗斯的两次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从理论上与实践上，共同整合了李大钊心目中对于寻求富强的民族国家与追寻“世界大同”的新文明目标。

在新世界与新文明双重视野下，对中国命运及其世界位置的整体把握，既构成了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革命主张的内在基调，也现实地因应了近代中国转型时代危机下的诸多现实问题（如改造社会、劳工与妇女地位、苦闷青年的出路、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等），并为此提供了化解危机的新路径。因此，对于此时的李大钊而言，创造“新文明”的革命（特别是“有血的革命”）亦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一次“整体革命”。一方面，革命对于每一个体具有彻底性，“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从而使得每一个体具有精神上的内在同一性。从思想史的内在视角而言，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以“外在超越”作为核心文化传统的西方社会，然而其价值实践方式却与中国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传统极为相似。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个人通过内心良知和“内在超越”的淘洗，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进而成为一代“新人”，完成在“人间”建立“天国”的“德性统治”。[2]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乃至阶级命运紧密联系，个人改造又必须以人类整体命运的改变为前提。从此，“有血的革命”、为了整体命运而牺牲个体及全世界被侵略与压迫者荣辱与共的情怀，逐渐成为五四时期李大钊心目中实现新文明、创造新世界不可或缺的思想内容，并且深刻影响着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

责任编辑：杨向艳

①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甲寅》日刊 1917 年 2 月 29 日。

② Benjamin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Some Broad Perspectives on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enjamin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转引自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第 148-149 页。

（**上接第** 67 **页**）

资强调通过社会政策，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1] 本文将这种社会投资策略概括为资产为本。即乡镇政府从优势视角出发，发掘村民或乡村社区内外部已有的各种资产或建设新型资产，以村民为主体，促进村民参与，共同治理乡村公共事务，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社区发展策略。“资产为本”整合了欣赏式探询、社会资本、参与式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理论，[2] 以优势取向、关系取向、内在取向为显著特征。优势取向方面，它与欣赏式探询具有共同之处，都认为社区每个居民身上都有优点或长处，每个社区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这些优点、资源都可用来促进社区发展。关系取向方面，它与社会资本、社区经济发展理论具有内在契合性，认为社区应积极与内外部各种组织建立积极的关系网络，促进社区居民的团结协作。比如培育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内在取向方面，它和参与式发展理论是相通的，都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动员居民参与决策，让社区居民真正成为社区发展的掌控者。“资产为本”的运作实践包括制作社区资产清单、动员社区资产、管理社区资产关系、管理社区资产冲突、链接与拓展社区外部关系资源、评估社区发展绩效等六个步骤。

H 乡的实践表明，要实现资产为本的正功能，在个体层面，乡镇社区要让村民认为自己是推动乡村发展的主体力量，乡村社区发展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内而外模式；在组织层面，乡村各类组织与村民要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与村民平等对话。

责任编辑：王 冰

① 王磊：《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国家：发展型社会政策生成机理及其运行逻辑》，《东岳论丛》2020 年第 3 期。

② Alison Mathie and Gordon Cunningham, “From Clients to Citizens: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 a Strategy for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13, no.5, 2003.

文　学　语言学

戏曲现代戏的三个理论问题*

傅　谨

[摘　要]关于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得失，“分工论”“话剧加唱”“程式与程式化”是相关讨论中最复杂的三个理论问题。在戏曲现代戏创作领域建议京剧等古老剧种和新兴剧种有所分工的“分工论”，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戏曲的工具化而提出的，却低估了京剧等成熟剧种的题材适应性。对现代戏成为“话剧加唱”的批评，代表了要求戏曲坚守本体的理念。认为戏曲的程式不能很好地表现现实生活及英雄模范人物的观点，混淆了戏曲具体程式和程式化原则之间的区别。在现代戏创作表演中，所有传统程式都可以舍弃，但如果背离了程式化原则，就离开了戏曲本体，因此应该是“不要程式，要程式化”。

[关键词]戏曲现代戏　分工论　话剧加唱　程式　程式化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144-09

一般而言，可以把“现代戏”看成现实题材戏曲剧目的通称，尽管在现当代戏剧实际发展进程中，这两者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而所谓“现实题材”之“现实”，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所指。戏曲有广泛的题材适应性，但是晚近七十多年来，在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创作演出方面仍然出现许多争议，涉及现实题材戏曲剧目创作演出中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其中最为重要和集中的争论焦点，就是“分工论”“话剧加唱”和“程式与程式化”。“现代戏”这一范畴所包含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并不妨碍我们认识与讨论现实题材戏曲剧目创作演出的这些基本规律，本文使用“现代戏”指称现实题材戏曲剧目时，只是借其表述上的便利，它与民国年间常用的“时装戏”之间的微妙差别，已经隐含在本文论述的预设之中。

一、分工论

尽管在一般印象中，戏曲主要以表现历史题材为主，但是如果基于其实际的作品看，它从诞生之时起从未刻意排斥时事题材。最早的南戏之一《错立身》就是以当时伶人生活为题材的，从元杂剧到明清传奇，表现作者所处时代的日常生活或政治军事题材的作品不在少数。民国年间出现的大量时装戏，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解放戏”，更因为表现了时人普遍关注的时事题材而受到重视与欢迎。

然而正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戏改”时期，出现了戏曲剧种之间题材意义上的“分工论”。所谓“分工论”，其基本内涵是指京剧、昆曲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表演手法相对成熟的剧种，应该允许以表现历史题材为主，而那些新兴剧种，如评剧、越剧、吕剧等等，不妨以表现现实题材为主。不同剧种各有其优势，因而可有所分工。戏曲剧种“分工论”的提出具有特殊的针对性。“戏改”之初，“解放戏”一度颇受观众欢迎的现象，使国家文化主管部门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各剧种大量创作现实题材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表演美学体系研究”（17ZD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傅谨，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北京，102209）。

新剧目，就可以逐渐挤出演出市场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戏，自然地完成新旧剧目的转换。这一要求对那些有悠久历史和成熟表演形态的剧种构成巨大压力，京剧首当其冲。晚清以来，京剧在中国戏剧格局中的霸主地位从未受到挑战，无论是新政府所在的北京城还是其他娱乐业发达的城市剧场，它都是最受欢迎的剧种，以梅兰芳为代表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有极大的行业标志性和社会影响力。各地盛行一时的“解放戏”基本是年轻剧种的作品，京剧相比之下反倒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越知名的表演艺术家，对剧目的艺术水平要求越高，更不愿意在仓促中推出趋时新作。京剧要找到合适的理由，既要避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又不愿意沦为创作“解放戏”的跟风者，这就是“分工论”提出的背景。

有关“分工论”最早的公开讨论，初见于1950年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期间在北京的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延安并且编演过一系列“旧瓶装新酒”的京剧新剧目的阿甲，激烈批评了那种认为京剧不适宜于表演现实题材的观点。[①] 虽因文献记录不完整，无法得知当时究竟哪些人提出了“分工论”，但是阿甲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分工论”的实际诉求，就是为了要让京剧、昆曲等成熟剧种豁免编演现代戏的义务。因此，“分工论”的提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策略，表面上是对京剧是否适宜创作现实题材剧目的疑虑，背后则是为了让京剧摆脱编演现代戏的压力，尤其是因为这一压力带有浓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50年代初“解放戏”盛极一时后迅速退潮，“戏改”政策的调整，给了包括京剧在内的许多古老剧种喘息之机，“分工论”因此获得了更多响应者。

1958年，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会上周扬提出要通过现代戏创作“完成戏曲工作的第二次革新”，这次革新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使戏曲艺术不仅适合于新时代的需要，而且要使它能够表现工农兵，表现新时代”。[②] 当年曾经激烈反对“分工论”，强调京剧完全可以演现代戏的阿甲，此时完全改变了立场，显得比其他与会者更加清醒，他说“不能在看了《白毛女》之后，就得出结论说京剧完全能表现现代生活”。[③] 此前，李少春主演的京剧《白毛女》引起京剧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戏改”之后最早尝试创作京剧现代戏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他为京剧《白毛女》的创作倾注了大量心血，获得了业内人士很高评价。阿甲面对得到众多称赞的京剧《白毛女》尚且认为这一成功个案并不具普遍性，对京剧编演现代戏近乎泼冷水的态度，那是毫不掩饰的。梅兰芳同样对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持有明显的保留态度，他强调京剧“一向是以表演古代历史故事见长的，虽然在几十年前也演过时装戏，但就本身的条件来说，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今后京剧更应当在这方面特别努力，深刻钻研，同时更须要多向善于表演现代生活的兄弟剧种吸收养料，虚心的向它们学习”。[④] 在会议上，梅兰芳还特别提及他自己当年在排演时装戏时在表演手段上遇到的难题，比如音乐与身段的结合，慢板唱工的使用，武功身段的安排等等，显然并不想过于迎合当时推动现代戏创作的诉求。这些有影响的艺术家的表态，使“分工论”得到重要的支持，考虑到这次会议的主旨就是要大力推动现代戏创作，阿甲和梅兰芳的躲闪之意，是无须讳言的。

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借着“分工论”的掩饰，京剧侥幸躲过了从“戏改”到“大跃进”的历次政治运动。但1963年之后风向剧变，尤其是1964年初华东区现代戏会演为戏曲编演现代戏追加了新的政治动力，“分工论”又一次成为焦点话题。在相关的讨论中，各种不同观点仍然对立鲜明。戏曲是否应该大演现代戏的问题，从单纯的艺术题材问题变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北京日报》为此发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讨论，涉及有关戏曲现代戏的几乎所有争议。《北京日报》发起的这次大讨论，最初就发表了署名文章，指出“古老戏曲适合演历史剧，就让它在这方面尽其所长，不断探讨，不断提高。

---

① 阿甲的这次发言见“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演出座谈会记录”，未公开发表，文化部戏改局档案，档案号：永久，1950年第1号。具体内容参见拙著《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2-73页。

②《周扬同志谈戏曲表现现代生活问题》，《戏剧报》1958年第15期。

③“全国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发言摘要”（第11号，7月6日政策组小组发言），未公开发表，河南省艺术研究所档案中心存。

④ 梅兰芳：《一定要下苦功演好现代戏——在文化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2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第157页。“苦功”原文为“苦工”，按现通行用法改。

话剧、评剧、曲剧具有演现代戏的能力，就让它把主要的内容和力量放在现代剧上。……不同的剧种应该‘各尽所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①] 随着讨论的展开，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1964 年 2 月 5 日该报同时发表两篇观点尖锐对立的文章，其中沙丁从戏曲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角度，坚决反对“分工论”：“一切剧种在当前以及今后的发展中，应该以演出现代戏为主，特别是要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教育的题材为主，这是一个根本方向问题。……承认各种不同艺术类别之间的特点（特长也好、局限也好）是一回事，承认、贯彻、坚持正确的方向又是另一回事……方向问题是艺术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绝对不能动摇或让步的问题。”[②] 署名章周的文章，则从观众对不同剧种不同的欣赏要求角度出发，把不同剧种视为不同的艺术流派，认为京剧应该属于“古典艺术”的范畴，假如演现代戏就演变成了另外的艺术样式，不能再称其为“京剧”了：“对那些表现现代题材为主的剧种，我们要求形式的真实（美是含于其中的），而对那些以表演古代题材为主的剧种，我们则要求形式的美。对于不真实的细节（它们是如此频繁的出现）我们则认为是在‘演戏’而加以原谅……这两种不同的要求，就为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派别在题材上划下了它们的分野。……如果我们抛弃了京剧在化妆、表演、念辞等多方面的特点，而只吸收了唱腔音乐和若干个别的技巧，便把这种新剧种称之为京剧，那是不甚妥当的。……就严格意义上的‘古典艺术’的京剧来说，是不适于表现现代题材的。”[③] 这后一种意见得到不少人的拥护，十多天后《北京日报》发表了沈桐的文章，更从京剧艺术的特征出发，强调它只能演古代题材的剧目：“京剧必须演历史剧，因为它有这种义务和必要；而且只能演历史剧，这是由于它的固有程式所决定的。如果破坏了它的固有程式去演现代戏，那它决不可能还是京剧，只能成为另一个什么剧种了。”[④]

这场持续数月的讨论，虽然很难判断是在向着“分工论”占优势的方向发展，但“分工论”至少依然表现为戏曲领域的一个政策选项。当然也有一些仿佛更为折衷和中允的观点。刘心武、黄得人的文章《京剧不宜表现最当前的现实生活》，标题看似夺人眼球，但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京剧创作演出现代戏的功能，只是认为不必要求京剧反映“最当前”的现实生活，可以侧重于选取有一定距离感的现代题材，如“反映现代少数民族生活斗争的现代戏”，“内容富有传奇风味，虽是现代题材，却可以在服装、场景上有异于观众日常生活所见”的现代戏，以及“与观众生活有一定距离的革命历史剧，或反映过去革命斗争生活的现代戏”。[⑤] 陈光炎反驳这种看法，他觉得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京剧反映“最当前的现实生活”的困难，却没有迎难而上的决心与信心，其实是在回避困难。既是探索，也不妨“从最困难的、表现最当前的现实生活入手突破”。他承认“由于表现手段的局限，由于剧种风格的不同，各个剧种在擅长表现的题材上也会各有所长的”，不过他认为当下正是“多做探索，尽量把路子开得宽一些的时候。一开始就说哪个剧种只能演传奇性的题材，哪个剧种只能表现家长里短，是不合时宜的”。他甚至不赞成把现代戏和历史剧放在同等地位，让它们并肩前行的观点，更遑论让它们自由竞争：“有的同志对现代戏和历史戏‘各有侧重’‘长期共存’的主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共存不是并重，只提‘长期共存’四个字是笼统的，不准确的。京剧是不是可以传统戏和现代戏并重，或侧重演历史戏，要决定于一个前提，即它能不能把现代戏演好。如果它能把现代戏演好，为什么不以现代戏为重点呢……在今后滔滔的历史潮流里，新人新事将会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地涌现，新的剧目会不断积累起来，怎么能现在就断定哪个剧种只能把现代戏压在次要地位，哪个剧种的现代戏只能与传统戏‘并重’呢？”[⑥] 确实，戏曲，尤其是京剧这样的古老剧种“能不能把现代戏演好”才是争议真正的出发点。

---

① 李素明：《我对“分工论”的一些看法》，《北京日报》1964 年 1 月 30 日。
② 沙丁：《内容·形式·分工》，《北京日报》1964 年 2 月 5 日。
③ 章周：《京剧不适合表现现代题材》，《北京日报》1964 年 2 月 5 日。
④ 沈桐：《“演什么”和“给谁看”》，《北京日报》1964 年 2 月 18 日。
⑤ 刘心武、黄得人：《京剧不宜反映最当前的现实生活》，《北京日报》1964 年 3 月 3 日。
⑥ 陈光炎：《批判、继承、创新都是为了发展戏曲艺术》，《北京日报》1964 年 4 月 11 日。

这恰恰是“分工论”倡导者最主要的理据——因为现代戏“演不好”，至少演不到传统戏和历史剧那么“好”，才应该“分工”；而反对“分工论”的一方，多半只是从戏剧为现实服务的角度，论证了现代戏在政治上的必要性。

1964 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召开，昭示着政治与戏剧环境的突变，这一讨论也因此消歇，有关“分工论”的讨论，此后再也没有成为热门话题。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分工论”分别在三个阶段出现——“戏改”初期、1958 年和 1964 年。这三个阶段恰好都是提倡戏剧为政治服务而大力强调现实题材剧目创作之时。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要求戏曲作为政策宣传之工具的压力减轻，“分工论”自然也就不再有继续提出的必要。由此可见，“分工论”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有关题材适宜性的讨论，其中所暗含的，是戏曲艺术家避免让戏曲完全成为宣传品的努力。从理论上说，“分工论”既不符合戏曲（包括京剧）发展实际——1964 年之后多部京剧现代戏甚至成为“样板”，就用戏剧创作实践回应了有关京剧是否适宜表现现实题材的疑问；也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分工论”低估了戏曲的表现能力，因为戏曲不仅在理论上可以有非常广泛的题材适应性，而且自古以来就有无数戏曲表现当下题材的成功例证，戏曲特有的音乐唱腔和舞台表演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从未成为戏曲表现现实题材的障碍。在某种意义上说，“分工论”只是“戏改”以来京剧界用以抵御和回避政治功利主义的权宜之计，因此，随着工具论的消退，它也自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二、话剧加唱

戏曲讲究“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在表现形态上与话剧的差异十分明显。戏曲现代戏作品经常遭受批评，认为其不像戏曲，只是“话剧加唱”。诚然，偶尔也有历史题材新剧目遭受类似批评，但现代戏“话剧加唱”的现象更显突出。“话剧加唱”在多数场合都是贬义词，它同样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戏改”时期。尽管数十年来“话剧加唱”这个说法经常被提及，但它的具体含义并不清晰。当戏曲批评家指某出新戏是“话剧加唱”时，指的究竟是什么？就舞台形态而言，“话剧加唱”有哪些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大致这样推断：那些被指为“话剧加唱”的新剧目中运用了戏曲唱腔，否则就无所谓“话剧加唱”，直接成了话剧；但除开“唱”这个重要因素，戏曲与话剧仍有重要的区别，一是念白，二是做工。假如念白满是话剧腔而没有戏曲味，假如表演丢弃戏曲的做工而呈现生活化的形态，就成了仅仅保留戏曲唱腔的话剧，于是就成了“话剧加唱”。

从当代戏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话剧加唱”的内涵应该比这更复杂。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话剧加唱”的批评超出了念白与表演动作的范畴。有文章指出：“‘话剧加唱’已是我们同行一致公认的一个不够戏曲化的形式。它的缺点，是仅仅部分地运用了戏曲‘唱’这一手段，其他方面仍然是话剧的。解放后，我们为了吸收话剧真实的布景，创造了一种折衷的演出形式，那就是先是在二道幕前表演着小过场（幕后有布景）然后是二道幕拉开，现出布景，便是时间和空间固定了的大场子。一出现代戏就是这样一小一大，交替进行地把戏演完。”[①] 作者承认所谓“话剧加唱”的形式“不够戏曲化”，但把原因主要归之于写实布景引入后，换景的过程破坏了戏曲原有的连续性。而对戏曲音乐有深入研究的于会泳有更多的思考，他试图从唱腔的角度改进与解决“话剧加唱”的问题，说明在他看来，许多戏曲现代戏被称为“话剧加唱”，不只是念白与表演的问题，还与戏曲音乐处理得不够好有关：“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是京剧音乐方面最中心的课题，也是京剧音乐现代戏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增强京剧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因此它对提高现代戏的艺术质量关系很大。此外，从另一角度说，它也是克服现代戏‘话剧加唱’这一缺点的措施之一。”[②] 这两位作者都指出了克服“话剧加唱”的“缺点”的路径，从不同角度说明“话剧加唱”的定义并不那么简单。不过，有一点几乎是戏曲界多年形成的共识：如于会泳所说，“话剧加唱”是京剧现代戏的“缺点”，因而需要“解决”，

① 辛人：《戏曲现代戏创作的“戏曲化”》，《黄梅戏艺术》1983 年第 2 期。

② 于会泳：《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下）》，《上海戏剧》1964 年第 7 期。

而且“话剧加唱”从最初且在多数场合，都是对戏曲现代戏背离戏曲艺术风格的批评。从相反的角度同样可以看到，较好地解决了“话剧加唱”的问题就是对成功的现代戏作品的褒扬：“过去演革命的现代戏，不注意戏曲特点，往往改成‘话剧加唱’。在表演方面，也不注意继承传统艺术表演的长处来表现现实生活。看了《游乡》后，才得出了正确的答案。”[①] 如何避免成为“话剧加唱”，显然是现代戏创作演出中的关键问题，它也成为推动现代戏创作的瓶颈。

在 1964 年现代戏演出的高潮中，“话剧加唱”的争议又一次兴起，并且出现了倾向于为“话剧加唱”辩护的文章，认为“话剧加唱”不仅不应该受到批评，反而应该大加鼓励，因为它“必然会受到群众欢迎”。“有的人看了秦剧、京剧、豫剧、越剧演出的现代剧以后说，‘这是话剧加秦腔’、‘这是话剧加京剧’，含有轻视和鄙薄的意思，也有人感到不习惯，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可以断言，西皮加二黄的京剧受到了千百万人的喜爱，京剧加话剧这个新歌剧，也必然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戏曲上演现代剧，用话剧的表演方法来表演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是打破旧框框，脱离旧轨道，转上新轨道，使整个舞台打了个顺倒。”[②] 用西皮加二黄两种声腔融合为受欢迎的京剧证明京剧加话剧两种表演形态可以相结合，实在有些牵强，但如此理直气壮地声张“话剧加唱”的合理性，却需要罕见的勇气。另一种观点相似但在表达上较为折衷的意见，则首先承认“话剧加唱”的形态或不是戏曲现代戏的最佳状态，但认为这可以成为戏曲现代戏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既然如此，不仅不应完全排斥，反而是戏曲现代戏的方向：“‘话剧加唱’对于我们今天来搞京剧现代剧，是意味着向话剧学习的问题……把话剧的优点取来，再加上戏曲的特点——唱，使之能够更好地表现新的英雄人物，这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以为：京剧的现代剧，在今天，如果能达到‘话剧加唱’的程度，那就应该说是好得很；而且，我还以为，在今天来搞京剧的现代剧，就必须‘话剧加唱’；——当然，将来是一定会创造出京剧现代剧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形式的。”[③] 作者试图去除“话剧加唱”的贬义色彩，但依然承认“话剧加唱”并非戏曲的理想状态。更普遍的意见仍然认为“话剧加唱”的现象应克服和避免，他们并不赞成在京剧加唱的方向继续探索与发展就有可能形成京剧现代戏独特风格的观点，认为它混淆了不同艺术样式之间借鉴与取代的差别：“京剧演现代戏一定要向话剧学习，而且也要向其它兄弟艺术学习。可是总要以‘为我所用’为前提，使其尽化为京剧的东西。用‘加法’是不成的。京剧的特点，我想也决非仅止是唱，还有表演、念白和器乐，等等……认定今天必须‘话剧加唱’，那将来它的‘独特风格和形式’又从哪里来呢？”[④] 如果话剧加唱可以看成京剧现代戏发展过程中的必经或初级阶段，那么它当然是可以允许或“暂时”接受的，但多数戏曲理论家并不想给“话剧加唱”留下这样的空间。

对“话剧加唱”的持续批评和相关讨论，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现代戏舞台呈现上的“戏曲化”追求成为戏曲表演界的普遍认识。通常认为，“样板戏”的成功，一定意义上就是包括于会泳在内的主导者都力图避免让现代题材戏曲新剧目成为“话剧加唱”，确实，它们之所以较少受到“话剧加唱”的指摘，不只是由于不允许尖锐的批评，更是由于这些剧目做到了较大程度的“戏曲化”。而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对“话剧加唱”的持续批评与争议，对“样板戏”最终朝着更趋于“戏曲化”的艺术呈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有关现代戏和传统戏曲表现形态的关系，仍未有共识。1978 年以后，尽管传统戏大量回归舞台，现代戏仍在戏曲界得到重视和鼓励，如何评价“话剧加唱”的现象，仍有异议。河南省戏曲学校在总结他们克服现代戏教学中遇到的困难的经验时指出：“教好现代戏，我们的做法是：从人物性格出发，从生活出发。继承、革新、发展、活用戏曲程式，克服话剧加唱……解决好戏曲化的问题，以加强现代戏的技巧性与艺术性。”[⑤] 然而恰逢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涌入，

① 参加中南会演节目汇报演出办公室《简报》第 1 期，1965 年 9 月 7 日。
② 陈人之：《为现代剧喝彩》，《甘肃文艺》1964 年第 4 期。
③ 张艾丁：《明确认识深入生活》，《北京文艺》1964 年第 4 期。
④ 张胤德：《也谈“话剧加唱”》，《北京日报》1964 年 4 月 25 日。
⑤ 河南省戏曲学校：《教好现代戏》，《戏曲艺术》1981 年第 4 期。

戏曲界也出现质疑传统观念的风潮，有关“话剧加唱”的争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浮现，并且呈现出全新的趋势。

1984 年 12 月，在上海召开的戏曲现代戏年会上，破天荒地涌现出一群“话剧加唱”的拥戴者，他们认为现代戏的“戏曲化”是一种僵化和老化的观念，限制与束缚了戏曲走向“现代化”。从张庚在会后写的一篇文章里，可以看出他对这次会议的强烈不满：“这次上海的会……不约而同集中在‘话剧加唱’这个问题上面，而且听起来意思似乎在说，现代戏之不能长足进步，乃是由于一些人提倡戏曲化束缚了创作者的手脚，只有搞话剧加唱的人才做出了真正的成绩，在讨论会的过程中，上海《文汇报》发了一条消息，说与会的代表提出……‘“戏曲化”已成为传统化、程式化、繁琐化、老化、僵化的代名词，它似紧箍咒束缚了从事现代戏创作的同志的手脚，成为现代戏发展的障碍。’”[①] 张庚还指出，会议主持者的总结刻意误导，回避了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学者并不赞同戏曲现代戏走“话剧加唱”道路的意见。上海会议为“话剧加唱”辩护，且举上海沪剧的成功为例证明典型的“话剧加唱”亦无不可，这一观点激发了许多反驳：“‘戏曲化’的提法是针对至今戏曲现代戏发展过程中尚未趋向完美，甚至出现异端的情况下产生的。从戏曲文学到舞台体现没有典型的范例，没有完美的舞台艺术，总之现代戏未能继承发扬传统戏曲的特性，话剧加唱的弊病严重存在，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戏曲化是十分必要的。尽管我们承认，编排现代戏是从戏曲特性出发的，然而现代戏的创作及艺术实践还不是戏曲。……目前一些同志提出‘话剧加唱’是戏曲的一种形式，主张戏曲现代戏走‘话剧加唱’的路子，甚至把沪剧说成是‘话剧加唱’的样式，提倡戏曲走沪剧的路子，提出给‘话剧加唱’一席之地，这些提法都是不妥当的，将导致戏曲现代戏走向邪路。”[②]

数十年来，这是“话剧加唱”第一次得到众多学者公开拥护，尽管有人为策划的痕迹。从一边倒地批评“话剧加唱”到试图为之“除罪”，转向希望更宽容、更客观地看待戏曲现代戏和让时间证明“话剧加唱”的取向是否有前途，舆论的天平似乎开始向另一方向倾斜。这并不是上海和北京的对垒，北京学者吴乾浩就为“话剧加唱”辩护：“‘话剧加唱’是在扩大戏曲现代戏的题材范围、思想深度时所进行的一种表演形式上的探索，意在继承戏曲的表现手段与手法，在此基础上，向姐妹艺术，主要是话剧借鉴一些可行的方法和有益的经验。尽管在这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因此得到不少微词，但对于探索戏曲现代戏的表现形式，不能说它没有产生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说，它为戏曲现代戏踏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话剧加唱’实际上是戏曲现代戏‘现代化’的一种补充、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种特例或‘又一体’。……‘戏曲化’与‘话剧加唱’完全可以在艺术竞争中共荣并存，它们谁也没有‘束缚’谁，谁也不能‘束缚’谁。”吴乾浩虽然不同意“戏曲化”束缚了“话剧加唱”的创作，但他认为所谓“话剧加唱”就是运用较多写实表演手法，因而接近于“戏曲减舞”的戏曲形态，其优点是“扩大戏曲表现范围，并使其适于表现更丰富的人物思想感情，展示出人物生动的精神面貌”。[③]

这场争论让“话剧加唱”与“戏曲化”之间在美学和戏剧表演领域的分歧转向更深层次，但是只要在创作上没有大量表现人物思想感情和展示精神面貌方面堪称优秀的作品作证，理论争辩就只能是纸上的讨论。不过，这次争论结果与初衷似乎完全背离，它反倒触发了现代戏走“戏曲化”道路的自觉意识。有关“话剧加唱”的争论并不是在理论上解决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戏曲现代戏应该遵循“戏曲化”规律的意识逐渐得到强化，并且创造了许多较成功的范例，这一争端才得以逐渐平息。戏曲现代戏创作演出中，“戏曲化”当然比“话剧加唱”有更多困难，但恰恰是由于出现了一些较成功的现代戏剧目，让戏曲艺术家看到了现实题材与戏曲传统手法之间互相融合、相得益彰的可能性，“戏曲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才得到充分证明；“话剧加唱”式的现代戏虽然仍时有所见，为之辩护者却再也找不到足够的

① 张庚：《上海戏曲现代戏年会会后感》，《戏剧报》1985 年第 3 期。
② 夏鹰：《戏曲现代戏应该走自己的路》，《戏曲艺术》1985 年第 4 期。
③ 吴乾浩：《“话剧加唱”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文艺研究》1985 年第 4 期。

理论奥援。

三、程式与程式化

数十年来，戏曲现代戏创作鲜有成功之作，理论家们认为这是因为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和表现现代生活之间存在根本的矛盾、尖锐的冲突。戏曲的基本表现手段源于古人生活方式的抽象，这些手段是否可以运用于现实题材剧目，或如何运用于戏曲现代戏，始终是争论的焦点。

其实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现代戏的创作演出还有另一个焦点，就是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到“革命英雄人物”的塑造。舞台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的形象、造型和动作，如何才能做到既是戏曲的，又不至于严重背离当代生活中关于“正面人物”形象的预设，这些都被认为是戏曲现代戏成败的关键。冯健民曾经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一矛盾：“在戏曲现代戏的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莫过于是戏曲表演程式同现代生活内容的矛盾。大家都承认，时代发展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因而在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旧程式，已无法再用来表现现代生活。如旧戏中普遍运用的水袖功、甩发功、翎子功等，在现代生活中都没有了它的用武之地。而矛盾的另一头是：戏曲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全面程式化。现代戏曲如不能自由运用程式化的表演，戏曲就会变味。如果既要戏曲‘不变味’，又要表现现代生活，那么矛盾的焦点就全部集中在能否创造出表现新生活的新程式这一问题上。”[①] 冯文有关戏曲的程式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论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认知；而寄希望于创造可用于表现现代生活的“新程式”解决这一矛盾，同样是极具普遍性的观点。

20 世纪 50 年代初，阿甲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有了较完整的表述。他看到了运用戏曲程式表现现实题材的关键，在于“戏曲的程式是古代人物生活、思想、感情的形象创造，是带有概括性的东西，它是千百年来艺人的生活体验的积累，它是一种特殊的造型方法，但表现现代戏有限制”。但他并不想将戏曲现代戏创作的障碍完全归之于戏曲表演的程式，他指出“程式有它的限制性和适应性，不会演戏的人程式对他是僵硬的框子，会演戏的人程式对他是有利的武器”，[②] 李少春编创的《白毛女》在努力解决传统手法与现实题材的冲突上所取得的成就，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后来针对该问题的争论，多数并没有达到阿甲的高度。

阿甲真正面临的困难，是如何调和演员“内心体验”和“程式”关系，在戏曲程式化表演与斯坦尼表演理论体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间找到一条互相兼顾的道路。这个表演体系最初是被当成苏联“先进经验”引进到中国并被机械搬用的，对传统戏曲表演方法形成了巨大冲击，张庚曾斥之为“洋教条”。阿甲说：“程式不是人物创作的出发点，而是借用这种手段结合体验的结果。如果不讲究舞台体验，只追求形式，就要成为程式的俘虏。”[③] 他并不是在程式与体验之间和稀泥，在谈到具体创作过程时，他显然是站在戏曲程式一边的。他指出某些导演“要求演员在排戏的时候，不应该运用‘程式’，认为一个戏的形式，一个角色的性格外形等，只能在排演场中在导演的启发之下根据角色的体会自自然然地产生出来……在这种种有了内心体验、技术相应而生的理论指导下，当导演的和当演员的就不必去研究戏曲艺术的表演特点和它自己的一整套的舞台规律，演员也更不必练功。”[④] 这里所包含的尖锐批评，说明他始终在质疑片面强调“内心体验”而忽视外在技术手段的表演理论，并不认为这是戏曲现代戏的未来之路。阿甲的创作实践始终积极探索在现代戏表演中运用程式化手段，更说明在现代戏创作表演的场合如何保持戏曲的程式化特点，一直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

戏曲现代戏表演如果运用了程式化表演手段，必然与现实生活相疏离，违反必须遵循的“现实主义”

---

① 冯健民：《戏曲能创造“现代新程式”么？》，《当代戏剧》1990 年第 2 期。

② 阿甲：《戏曲程式不是万能的》，《戏剧报》1957 年第 8 期。当然，此文讨论的是话剧《虎符》借用戏曲手段是否合适的问题，不过借此很好地阐述了戏曲程式在表现现代生活时的运用原理。

③ 阿甲：《戏曲程式不是万能的》，《戏剧报》1957 年第 8 期。

④ 阿甲：《生活的真实和戏曲表演艺术的真实》，《天津市第一届戏曲导演学习班讲稿汇编》第 1 辑，天津市文化局编印，1953 年，第 1 页。

原则，这是将程式与现代戏相对立的典型表述。当涉及当代英雄模范人物塑造时，这样的对立就更尖锐。许多极具成就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因此遭到批评，认为他们在舞台上塑造当代英雄模范时，没有充分了解“体验生活的重要性”，或“只‘体验’外形，而不体验人物的思想本质和性格特征”，所以“对新生活对新人物不够熟悉，因此在舞台上不能把新的英雄形象树立起来”。[①] 这里，既有思想观念层面的考量，更是技术层面的质问，尽管在话剧创作领域，对舞台上的英雄模范形象苍白无力的现象也多有批评，但是在戏曲现代戏中，抛弃程式化手段确实是被看成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在技术层面分析现代戏与程式的矛盾和在思想感情与生活体验层面要求抛弃程式，是戏剧理论家在现代戏领域的两个预设。从演出实践看，如同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大量优秀现实题材剧目一样，具有创造性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自然能够找到合适的手段，运用程式化的手段表演现代戏。楚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沈云陔介绍他们当年的演出时说，《白毛女》里的杨白劳运用了抢背、跪步、硬倒等程式，《罗汉钱》《小女婿》里运用了云手、圆场和碎步，《小二黑结婚》里因为三仙姑唱的是《大补缸》，就借用了王大娘的动作，戏曲程式化手段与现代戏之间的冲突似乎并不存在，然而他也深表遗憾地说：“但是后来一阵风刮来了，强调‘生活的真实’，这样一来大家就都不敢用了。怎么办呢？只好采取话剧的形式。不敢再用程式动作，演员在台上就没有办法去动，所以戏就显得干巴巴的。”[②] 正如沈云陔所说，现代戏运用程式化手段真正遇到的挑战不是演出实际，而是理论家对“生活化”的强调和对程式化的批评，只要不为外力干扰，戏曲表演艺术家本可以很好地解决现代戏与程式的关系。他认为他们编创的楚剧《刘介梅》之所以比较成功，就是因为打破了禁忌，他说他们“开始也不大敢用戏曲程式，后来才运用了一些”，于是才“给人感觉这是戏曲了”，而程式的运用“才能更好地将人物的心情交待给观众”。当然他也认为“传统的程式一定要发展，要创造出新的程式动作来，才能充分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物”。[③] 如同张梦庚1964年提出的那样，要演好现代戏，“要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京剧来，那我们就必须敢于触动和打破为封建主义服务的表演程式，创造表现新人物的新程式”。[④] 经历多年的讨论，戏曲现代戏的人物塑造出现了摒弃程式、改用生活化的表达和创造新程式这两个重要的选项，既然摒弃程式手段完全用生活化表达这条路不被多数人接受，程度不同地运用一些程式化手段才符合人们的欣赏需求，那么，在原有的许多程式确实难以在现代戏里运用的前提下，创造新程式似乎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戏曲现代戏创作演出中，对戏曲程式和传统表现手法的认同意外地成为普遍趋势。具有官方色彩的署名为“《智取威虎山》剧组”的创作体会明确指出，假如“样板戏”丢弃了京剧的程式，“就会失去京剧舞蹈的风格特色，丢掉了有利于我们创作的借鉴对象，也脱离了群众”。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样板戏”的创作者们显然不希望人们认为他们对传统的认同是毫无保留的，而希望显示对传统手法“批判地继承”，因此文章紧接着说：“‘要程式，不要程式化’。这句话准确地提示并辩证地解决了京剧舞蹈创作中艺术与生活、内容与形式、批判继承与革新创造等一系列矛盾。……既反对了那种刻板摹拟生活动作、死板限制活动空间、因而缺乏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自然主义，又反对了那种到处套用旧程式、靠旧程式吃饭、因而妨碍和破坏思想内容的表达的形式主义。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可说是艺术创作上的懒汉主义。它们不想创造，只知照搬。一个是照搬生活中的原始动作；一个是脱离生活照搬旧有程式。两者的结果是一致的：破坏了艺术内容，也破坏了艺术形式，最后导致艺术的死亡。”[⑤] “要程式，不要程式化”的观点，既保留戏曲中程式的运用，又回避程式化与现代戏之间存在的天然的矛盾，这一暧昧的态度，确实令更多人容易接受。但假如从“样板戏”

① 贝叶：《记文化部第一届戏曲演员学习会》，《戏剧报》1955年第9期。

② 沈云陔：《对楚剧表现现代生活的一些感想》，《戏剧报》1958年第14期。

③ 沈云陔：《对楚剧表现现代生活的一些感想》，《戏剧报》1958年第14期。

④ 张梦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京剧》，《北京日报》1964年2月22日。

⑤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关于用舞蹈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人民日报》1969年12月17日。

的表演角度看，这些现实题材剧目的表演并没有照搬传统戏里那些具体程式，却始终保留了从生活内容到舞台表演之间的程式化转化过程，所以才使这些剧目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这些剧目之所以仍然被看成是“京剧的”，不是由于它们运用了具体的程式或创造了“新程式”，而是由于保留了京剧特有的基本功。

在这个意义上说，“样板戏”如果在表演上有其成功经验，应该说更像是“要程式化，不要程式”，即为了让表演更符合新的戏剧内容和贴近新的人物特点，大胆舍弃或化用具体的传统程式，但同时又始终遵循着戏曲特有的程式化的表演艺术规律。把现代戏与程式的矛盾转化为程式与程式化的区别，让戏曲传统手法与现代戏之间找到了内在关联，至少消弭了两者的对立。

无论如何理解“程式化”，新时期以来的戏曲现代戏逐渐摆脱了观点与概念的纠缠，而要求戏曲现代戏放弃程式、走“现实主义”的生活化道路的理论更失去了市场；尤其是因为“样板戏”按这样的理念创造出了诸多英雄人物，认为现代戏表演，尤其是英雄人物塑造必须舍弃程式、走生活化道路的观点，越来越显得缺乏依据。当然，一些著名学者仍然坚持“程式化”是戏曲表演不能舍弃的基本规律。[①] 但无论如何，为戏曲现代戏创造“新程式”的努力，还是成为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普遍追求。从汉剧《弹吉他的姑娘》里的“电话舞”、京剧《骆驼祥子》里的“洋车舞”到京剧《华子良》里主人公挑担下山的“挑担舞”，都被称为戏曲现代剧目创造“新程式”的突破而备受肯定。如果从程式和程式化之差异的角度看，这些“新程式”的创造未必符合“程式”原初的含义，因为它们都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舞台表演手段，戏曲现代戏表演是否应该和可以遵循程式化的路径，仍有待回应。

在某种意义上，“戏曲化”就是指舞台表演的程式化。戏曲现代戏完全可以运用各剧种固有的程式化手法，关键在于如何为适应场景、人物及其戏剧内容的变化而予以适当的化用；而且假如一味拒绝传统戏曲的深厚积淀及表演美学规律，现代戏就有成为“话剧加唱”之虞。在这里，遵循程式化的美学原则比机械地套用某些具体程式更重要，因此，现实地解决传统程式与现实生活表现之矛盾的道路，恰恰就是“要程式化，不要程式”，即程式化的表演原则必须遵循，而只要充分调动京剧基本功的表现力，即使所有传统戏里运用的具体程式都被舍弃，仍能保持戏曲的特点。新世纪以来现代戏的“戏曲化”越来越成为自觉与普遍的追求，而由此出现的优秀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恰恰都是因广泛运用程式化手段，化用而非套用传统程式，用之以表现现实生活题材，才成为戏曲现代戏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戏曲现代戏的发展历程，“分工论”“话剧加唱”和“程式化”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这三个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与解决的背后，是中国戏剧界对戏曲传统表演体系越来越清晰与自觉的深刻认同。正因为有这样的认同，戏曲才有可能充分展现出它对不同时代题材的适应性与表现力。这些基本共识的形成，说明戏曲现代戏的创作表演，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诚然，在整体上，戏曲现代戏的成就仍然无法与传统剧目相提并论，甚至在表演中如何像历史题材剧目那样娴熟地化用程式化原则，也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但值得肯定的是，戏曲现代戏创作表演的最重要的关隘已经被跨越，只要尊重戏曲艺术的根本规律，就有可能逐渐缩小、直至最终抹平不同题材戏曲剧目的美学落差。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参见王元化：《京剧与文化传统》，《艺坛》1995 年第 4 期。

论身体美学的“身体”

郭勇健

[摘　要]身体美学的身体，不是赛博格、全息影像、平面图像，而是梅洛－庞蒂现象学所揭橥的“肉身”。肉身是会生老病死的身体，是自然身体，是非人工的身体和前文化的身体。今天在身体美学中混用两种身体观，福柯的社会学身体观和梅洛－庞蒂的本体论身体观。包括舒斯特曼在内的不少学者都用福柯的身体观去质疑梅洛－庞蒂的身体观，这是一种思维层次的错位。肉身作为本体论的概念并不落入社会文化的经验领域。肉身作为前文化的身体保证了审美经验的普遍性。审美主体是肉身，审美对象则是肉身性对象。审美对象的第一层次并不是形式，而是肉身，形式也应当是肉身化的形式。

[关键词]身体美学　肉身　前文化　梅洛－庞蒂　审美普遍性

〔中图分类号〕B83-06；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153-07

一般认为，身体美学由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所创立。他在 1992 年出版了《实用主义美学》一书，该书的第十章名为《身体美学：一个学科的提议》，从此世上就有了身体美学。身体美学在今天中国的崛起，与舒斯特曼有莫大的关系。然而，身体美学这个名称是有缺陷的。“身体美学”完全可以在经验的层面展开，那么它就可能把健美、体操、瑜伽、太极拳等纳入其中，变成了“体育美学”；还可能通往美容、整形、化妆、时装等方向，变成“时尚美学”的一部分。事实上，舒斯特曼确实以“身体美学”之名把“体育美学”和“时尚美学”都收编了。但是我们认为，身体美学应当保持其哲学品质，因此，它的严格的称呼应当是“作为身体哲学的美学”，与以往的“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并肩而立。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偏于美学问题的客观方面，作为身体哲学的美学偏于美学问题的主观方面。身体是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的主体。当然，“身体美学”这个名称已经约定俗成了，我们也不妨从俗，把“身体美学”视为“作为身体哲学的美学”的方便说法。正如实践美学的第一问题是何谓实践，生命美学的第一问题是何谓生命，身体美学的第一问题是何谓身体。舒斯特曼并没有很好地回答“何谓身体”的问题，这与他的美学思想缺乏形而上眼光和理论维度是有关系的。本文将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出发，回答何谓身体美学的“身体”。

一、作为肉身的身体

任何哲学都预设了某种人的形象，或者说，哲学始于对人的理解。当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试图建构自己的哲学时，他把“骨肉之人”视为“整个哲学的主体”。所谓“骨肉之人”，亦即“有血有肉的人，就是由出生到受难，最后要死亡的人，尤其要强调的是，一个终究要‘死亡’的人”。骨肉之人的对立面是“理念的人”：“这样的人既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也不是其他世界的人；既不属于这个时代，也不属于其他时代的人，是一个无性别无祖国的人，简单说来，就是一个理念的人。”[①] 按照乌纳穆

作者简介　郭勇健，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 厦门，361005）。

① [西班牙]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段继承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年，第 2 页。

诺的倾向，康德哲学的“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就是他所批判的“理念的人”。理念人是思辨的产物，是不存在的人、非现实的人。真正的哲学应当从现实的人出发，从“有血有肉的人”出发。这正是胡塞尔晚年探索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关注“此在”、梅洛-庞蒂强调“知觉的首要地位”的缘由。作为身体哲学的美学，顾名思义，即是从身体出发的美学。不过此处“身体”指的是“肉身”。

今天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四种身体：（1）作为“赛博格”（Cyborg）的身体。“赛博格”这个概念由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率先提出，用以表示机器与生物体的结合体。在科幻电影中，赛博格身体大量存在，今天的技术社会似乎使之从幻想变成了现实。譬如一个人安装了假肢或心脏起搏器，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人机合体的赛博格。不过在雕塑家罗丹看来，欣赏雕塑的手如同“情人之手”，与雕像的整个躯体交谈，感受雕像肌肉的起伏、柔软、温暖，这是一只机械手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据说罗丹的触觉“像听觉一样灵敏”，而机械手完全没有触觉。可见，作为赛博格的身体与审美关系不大。（2）作为全息影像（Holographic Display）的身体。这是使用全息影像技术在三维空间的投影，制造逼真的幻象。例如 2017 年 8 月，为纪念邓丽君逝世 22 周年，日本某电视台的《金 SMA》节目使用了全息影像技术，在嘉宾眼前投影再现了邓丽君演唱日语歌曲的过程，令人疑为邓丽君“复活”。这种技术制造的身体，不可能是审美经验的主体。（3）平面图像中的身体。例如日本动画片中的身体，这种身体连同整个动画片，主要是观众的审美对象，并不是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4）作为肉身的身体。这是活生生的、有感知能力的、有自我意识的身体。审美经验的主体，是也只能是作为肉身的身体。法国哲学家莫罗·卡波内（Mauro Carbone）指出，是现象学家梅洛-庞蒂首先揭橥了这种作为肉身的身体：“众所周知，正是梅洛-庞蒂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了‘肉身’概念的哲学意义，描绘出这种‘在任何哲学中都还尚且没有名称’的存在，因为它既非物质，也非精神，亦非实体，而是一切存在者所属的共同肌理组织，其中每个身体、每个事物都仅仅作为与其他身体、其他事物的差别而出现。对他来讲，‘肉身’概念最终意味着所有存在者隶属的共同界域。”[①] 卡波内对“肉身”的解说主要着眼于本体论即存在论，说它是“所有存在者隶属的共同界域”，这当然没错，只是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中，还有一个认识论的维度。身体首先是认识的主体，是“作为多重知觉主体的身体”以及“作为情感与知觉经验核心的身体”（舒斯特曼语）。除此之外，作为肉身的身体，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肉身是会生老病死的身体。有生，有死，说明肉身是“活的身体”。活生生的、有活力的肉身是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的主体。这个主体所指向的对象，或者说肉身的意向性客体，也是活生生的、有活力的对象。因此，审美的世界是生气弥漫生机盎然的世界，是草长莺飞鸢飞鱼跃的世界。理学家周敦颐往往“绿满窗前草不除”，人问何故？答曰：“与自己意思一般”。周敦颐说“与自己意思一般”，也许着眼于物与人一样洋溢着生命，但未尝不可在现象学的意义上理解为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都拥有肉身。周敦颐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另一位理学家程颢也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这些都是审美活动。古代中国的审美家喜欢“观生意”，而古代中国绘画则追求“气韵生动”，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相对来说比较重视身体，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已无意中触及作为审美主体的肉身。[②] 有生，有死，说明肉身是时间中的身体；有老，有病，说明肉身是会毁坏的身体。这对于审美经验至关重要。南朝山水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依宗炳此说，山水画得

---

① [法] 莫罗·卡波内：《图像的肉身：在绘画与电影之间》，曲晓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5 页。

② 西方文化拥有灵肉二分的传统，表现于哲学上则是身心二元论，较之西方文化，可以说东方文化自古以来就重视身体。老子哲学已有明显的身体维度，但他的身体生物学的意味浓厚，首先是生殖的身体。儒家也有其身体观，儒家的身体有两个维度，即生殖的身体和伦理的身体。当然，老子和儒家的身体概念都或多或少从生殖的角度发挥出形而上的维度。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庄子的身体观最具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意味，他明显有“道成肉身”的思想，所以说“目击而道存”，并有“姑射神人”等“道成肉身”的身体描写；不仅如此，庄子还首次发现了作为经验的身体，留下了大量关于身体经验的描述，并“无意中触及作为审美主体的肉身”。

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身体的“老病”，因为“老病”之后只能“卧游”，而“卧游”乃是山水画审美。还可以放大来说，一具会朽坏的肉身，正是一切审美活动的基本前提。一切审美活动都是肉身与世界的邂逅，正因为人类不可能长生，肉身不可能永存，才使得邂逅成为可珍惜的和有价值的经历，也才使审美经验得以生成。王维诗《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正是由于朋友将一去不复返，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才使此次的相聚成为独一无二，使当下的送别成为审美事件。于是有日本茶道所推崇的“一期一会”，把任何相逢都视为一次性的、不能重现的，以尖锐的形式突出了审美活动的特征。审美活动的时间性，源于审美主体的肉身性。

第二，肉身是自然身体。人们常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自然相对于人工、人为，自然身体就是非人工的身体，是尚未被技术改造和加工过的身体。如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催生了名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思潮。“超人类主义者正凭借其拥有的非常可观的科学手段和物质资源，宣扬新技术，支持采用新技术，支持大量使用干细胞，支持克隆繁殖，支持人机混合，支持基因工程及胚胎操纵，这些或将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我们人类，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从而，“医学不再仅仅局限于‘修复’，还可以‘改善’人，超人类主义者称之为‘提高’和‘增强’”。[①] 超人类主义者不再满足于“自然身体”，而是提倡用科技的力量改造自然身体，增强自身，克服疾病、衰老，甚至克服死亡。然而如前所述，人类之所以有审美经验，正是由于肉身会生老病死。人身难得，生命短暂，因而才需要审美愉悦和审美慰藉。“病中吟”“悼亡诗”在古诗中数量巨大，正是由于诗歌对于疾病和死亡有安慰、治疗或救赎的功能。“超人类”在“增强”了身体、超越了“老病”之后，或许便没有了审美需要，也没有了审美体验。人工身体还包括“把身体作电子装置来看待”，如前面提到的“作为全息影像的身体”。舒斯特曼指出：“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身体美学也被应用到了高新科技设计领域。在我看来，这并非出自对此领域本身的兴趣，因为身体美学主要发端于古代具身化的哲学生活观念，发端于亚洲传统身体实践（比如瑜伽与坐禅），或者是西方当代身体实践（比如亚历山大疗法或费尔登克拉斯肢体放松法），它们都不把身体作电子装置来看待，具有相似的有机性。”[②] 显然，舒斯特曼也反对以科技改造（制造）身体，坚持身体的“肉身性”（他的说法是“有机性”）。我们不妨说他也肯定了作为肉身的“自然身体”。不过，舒斯特曼虽然否定科技改造的身体，却肯定了文化塑造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放弃了“自然身体”。

第三，肉身是“前文化”的身体。自然相对于人工，也相对于文化，自然身体亦即“前文化”的身体。当然，我们说“自然身体”和“前文化的身体”，并不是把身体等同于自然物或物理性存在。身体美学并不是生物学美学。身体既然是审美主体，那就不可能是自然物或物理性存在。但另一方面，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是现象学的身体，尤其是梅洛-庞蒂现象学所阐发的身体，也不是文化造就之物。我们或许可以说，身体是介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模棱两可的存在”，相应地，关注这种身体的梅洛-庞蒂现象学也便成了“模糊暧昧的哲学”。梅洛-庞蒂的身体观大致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现象身体”，以《知觉现象学》一书为代表，此时身体是知觉主体，虽有本体论取向，但比较而言偏于认识论；第二阶段为“肉身”，以《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为代表，指向一种现象学的本体论，梅洛-庞蒂称之为“肉的形而上学”。梅洛-庞蒂自己承认，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还“几乎没有谈到文化和历史”；[③] 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作为肉身的身体“既非物质，也非精神，亦非实体”，是“一切存在者所属的共同肌理组织”，因此“肉身”首先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概念，“肉身”不可能落入历史、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形而下”的领域，一言以蔽之，“肉身”不可能落

① [法] 吕克·费希：《超人类革命》，周行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第 4、6 页。

② [美] 理查德·舒斯特曼：《通过身体来思考：身体美学文集》，张宝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2 页。

③ [法]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王东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第 32 页。

入文化的领域。综上所述，梅洛-庞蒂的“肉身”基本上就是一种“前文化”的身体。

二、社会学身体观与本体论身体观

然而，在梅洛-庞蒂之后，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阐发了另一种身体观，与梅洛-庞蒂的身体观分庭抗礼。“福柯关注权力通过实践、话语和技术被烙印或‘铭刻’在人的身体上。”[①] 换言之，福柯将身体置于历史文化之中，主张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对身体的建构。有人指出：“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与梅洛-庞蒂的身体在世存在理论共同构成了身体研究的基石。”[②] 福柯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人物，他的身体观可以勉强归之于社会学。福柯的社会学身体观与梅洛-庞蒂的本体论身体观，有如双峰并峙，令人高山仰止。然而今天有不少学者接受了福柯的身体观，纷纷起而质疑梅洛-庞蒂的身体观，甚至在美学领域也是如此，因此有必要加以回应。

台湾社会学学者黄金麟深受福柯的影响，他指出：“当身体的生成不单牵涉一个生物性的存在，还牵涉文化性的区辨和认定时，各种政治和社会的任意就可能渗入身体的建构过程中，使它成为一个无始无终的生成过程。”这个说法自有道理，问题在于，身体有受文化塑造的一面，还有不受文化塑造的一面。福柯突出了受塑造的一面，梅洛-庞蒂发现了不受塑造的一面。黄金麟立足于福柯的身体观，转而质疑现象学的身体观：“虽然我们都拥有一个身体，而‘我’的存在也源于我的‘身体’的事实存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或经常掌握、主控身体的全部发展样貌。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层次上的‘我等同于我的身体’的声称，容或可以给予我们一个体悟身体触觉，以及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生活世界建构的关联的思考，但这并不能去除身体的存在必然交杂着许多力量的同时存在，以及身体必须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场域的这个事实。这些牵涉着身体的生成，甚至外于身体而存在的客观力量，它们的实际存在和对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清楚说明意向性这个概念并不能用来解释身体生成的全部过程。”[③] 这个质疑其实是一种思维层次的错位，它是用社会文化学的身体观去批判哲学本体论的身体观。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也曾有过思维层次的错位，他在自传中声称海德格尔的“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思想，早已为中国思想家庄子所表达，甚至是对庄子“处世”思想的剽窃。[④] 其实，海德格尔的“世界”是一个本体论概念，这个概念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都毫不相干，因为无论处于哪个时代、哪些文化、哪种制度之中，人都“有一个世界”。海德格尔提出“在世界中存在”的命题时，已经把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经验之物“还原”掉了。反之，庄子“处世”的“世”并不是本体论概念，而是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概念；它并不是“世界”，而是“社会”，且特指君主专制社会。庄子的“处世”思想，首先是探索如何在君主专制社会保全性命。由此可见，海德格尔不可能抄袭庄子。就思想渊源而言，“人在世界中存在”是对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一种发展；就问题意识而言，“人在世界中存在”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一种超越。假如我们声称“世界”必然随着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并因此质疑海德格尔，那无疑是犯了混淆思维层次的错误。同样地，用文化参与身体的建构去质疑梅洛-庞蒂的本体论的“肉身”概念，也是犯了混淆思维层次的错误。

本体论也是大多数现象学家的理论诉求。延续并发展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身体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处于前文化或超文化的形而上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用“各

---

①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276 页。

② 欧阳灿灿：《当代欧美身体研究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0 页。

③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第 5、6 页。

④ 今道友信的自传《寻求智慧的光——一个哲学家走过的路》尚未有中译本。关于“海德格尔剽窃庄子思想”的这件事，我见过此书日文版的相关部分。大致过程如下：1906 年，冈仓天心用英语写就并出版了《茶之书》，书中将庄子“处世”一词表述为“being in the world”。在 1908 年《茶之书》的德文版中，“being in the wolrd”被译为“In-der-Welt-Sein”（也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1919 年，今道友信的老师伊藤吉之助将德文版《茶之书》赠送给海德格尔。看来海德格尔似乎是读过此书的。1927 年，海德格尔出版了令他名声大噪的《存在与时间》，揭橥“在世界中存在”的思想，然而并没有提及庄子。若干年后，伊藤吉之助在日本指责海德格尔剽窃。今道友信沿袭了伊藤吉之助的观点，并曾于 1968 年赴海德堡大学讲学时将“海德格尔剽窃庄子思想”的观点告诉伽达默尔，令伽达默尔大为生气。

种政治和社会的力量参与身体的建构”来质疑它，是无效的。而且在这个层次上，现象学家并没有否认“身体必须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场域的这个事实”。梅洛-庞蒂警告道：“我们不可沾沾自喜地以为可以在科学中通过运用纯粹且非处境的理智抵达那不带任何人类痕迹的对象——正如上帝所见那般。”并呼吁“重新将人的处境放回到世界中去”。[①] 这正是伽达默尔提出“诠释学处境”以及“视域融合”概念的理由。伽达默尔坚称自己的诠释学是哲学诠释学。《真理与方法》的第一部分是艺术作品本体论，这并非写作或编撰的偶然，而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必然。然而，形而上的层次只能为形而上的眼光所瞥见。倘若缺乏形而上的眼光，那就不免混淆不同的思维层次。

身体美学家舒斯特曼也与黄金麟相似，混淆了思维的不同层次，因此，舒斯特曼也质疑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身体观，或者说有意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身体观拉开距离：“我的身体美学与这种现象学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第一，我不会试图揭示某种原生、基础和普遍的具身化意识，即那种（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永恒持续、确定不移’又为所有族群文化和时代‘众所周知’的意识，而是认为，身体意识总是会随文化，因而也会随对不同文化形式（或相同文化中不同的主体立场）的包容吸纳而做出调整。第二，身体美学的兴趣点，不单单在于描述已由我们的文化塑形的身体意识形式及身体实践模式，它也会去改善它们。第三，为达成这种改良目的，身体美学还纳入了身体训练实际操作这一环节，而不只是进行哲学说教。”[②] 的确，文化会塑造身体，身体意识总会随文化发生变化，总会因应不同的文化形式而做出调整，但是，这并不构成反对现象学身体观的理由。因为现象学的身体是“前文化”或“超文化”的身体，因而是“原生、基础和普遍”的身体。进行审美活动的身体，正是这种前文化的肉身。由于作为肉身的身体是本体论的概念，加之肉身是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的主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审美是一种形而上的活动。整体地看，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缺乏形而上的维度，倒是充满了形而下的因素。他没有意识到审美是一种形而上的活动，反而将审美朝形而下的领域扩展，把美食、健美、武术、养生、文身、美容、时尚等等一股脑儿地纳入美学，但这种“扩展”未必是对美学的“发展”。舒斯特曼在福柯的影响下注意到了文化对身体的建构，从而意识到身体塑造的可能性，因而鼓吹“身体美学的实践维度”，主张身体训练，改良身体，提高身体的敏感性。可是，并非所有的身体训练都有助于审美。慢跑、游泳、瑜伽、太极拳等身体训练，都能改良身体，却可能与审美毫无关系。的确，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应当是敏感的身体，马克思有言，“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③] 可见身体训练乃是审美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譬如经过一定的声乐训练，对如何运气发声有所了解，必然对欣赏歌曲大有裨益。但是，审美方面的身体训练与舒斯特曼所说的身体训练显然大异其趣。

三、审美的普遍性与形式的肉身性

“前文化”的肉身保证了审美的普遍性。对美学来说，审美（审美判断或审美经验）的普遍性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与普遍性对峙的是相对性。倘若审美判断和审美经验是相对的、主观的、言人人殊的，那么美学的“科学性”或“学科性”便不成立了。正因如此，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现象学美学和接受美学仍在批判“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④] 美学这一学科在 1750 年由鲍姆嘉通创立，但美学史总要将美学追溯到柏拉图，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柏拉图首次注意到了美的普遍性问题。柏拉

---

① [法]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世界：论哲学、文学与艺术》，王士盛、周子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0、38 页。

② [美] 理查德·舒斯特曼：《通过身体来思考：身体美学文集》，第 4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91 页。

④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常常被视为接受美学的口号，这是莫大的误解。这句话的发源地可能是英加登的代表作《论文学作品》。英加登指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作品乃读者在阅读时所感受的一大堆体验，这也是不对的，而且它会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因为这样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叫做《哈姆雷特》的剧本，它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有许多不同，因为事实上每一个读者的体验都有很大的不同。……既然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每一次新的阅读事实上都会产生一部全新的作品。”（[波兰] 罗曼·英加登：《论文学作品》，张振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3-34 页）英加登反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继承并发扬英加登思想的接受美学也同样反对。

图的普遍性是概念的普遍性。康德的美学是审美学，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审美判断的普遍性问题，并主张“非概念的普遍性”“主观的普遍性”，将普遍性诉诸“共通感”，这其实就是情感的普遍性。时至今日，审美学大都把普遍性的根据从“情感”亦即“心灵”转移到“身体”，以身体保证审美经验的普遍性。人类学家雅克·马凯指出：“人类学强调的是所有人类都具备的根本一致性，而这正是组成现实的基本要素。由于人体的组织结构，特别是神经系统，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群基本上都毫无差别，因此，我们就可以假设，人体的主要功能，例如：行动、思考、赏评、受情感和情绪支配等等，这些都不只是某些人群才拥有的特性。艺术的创作与欣赏既然是心理过程，那么就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在所有的文化中都能寻找到它们的表现形态。艺术现象到底是不是普遍的，我们并不知道，也不会先入为主地断定它们就应该是普遍的。我们只是认为，它们可以是普遍的。”[①] 人类学本来极重视文化的相对性。20世纪初，以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及其弟子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为首的一些人类学家，倡导“文化相对主义”之说，对于突破“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颇有功劳。然而，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现在看来只是人类学史的一个阶段，今天的人类学显然更关注“跨文化”或“超文化”的问题。在《审美经验》一书中，雅克·马凯关注审美（和艺术）的跨文化或超文化的普遍性，把普遍性的根据落实于“人体”。这可视为人类学领域对梅洛-庞蒂“原生、基础和普遍”的身体观的一种支持。事实上，梅洛-庞蒂还能从格式塔心理学那里获得学理支撑。无数的艺术作品可以令全世界的人都为之折服、为之感动，例如中国人也欣赏巴赫的音乐作品，但中国人并没有巴赫音乐的基督教文化背景，这本身就说明了审美经验的跨文化的普遍性，除非诉诸现象学的身体——肉身，否则我们很难解释这种超文化的审美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审美就是超越文化的特殊性而返回到肉身。

肉身，是作为身体哲学的美学的第一范畴。这首先是就审美主体而言，同时也是就审美对象而言。审美主体是活生生的、作为知觉与情感经验之聚集点的肉身，根据意向性的主客相互契合的原则，审美对象也应当是“肉身景象”，即具有肉身性的对象。因此梅洛-庞蒂强调：“艺术品也是一个肉身性的总体”。[②] 肉身并不是审美对象的表层“皮肤”，而是审美对象的构成“质地”。如果说审美对象是一种多层次的复杂结构，那么最基础性的层次显然是肉身。一个对象必须肉身化才能成为审美对象。在《眼与心》中梅洛-庞蒂有一句名言：“人们也不明白一个心灵何以能够绘画。正是通过把他的身体借给世界，画家才把世界转变成了画。”[③] 这句话最好从主客体两个方面来理解：在主体方面，画家必须出具身体，因为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的主体是身体、是肉身；在客体方面，世界必须身体化、肉身化，才能进入绘画作品，也才能成其为审美对象。

于是我们可以谈论审美对象的“肉身性”，比如“图像的肉身”“语词的肉身”。古人虽然没有“肉身”这一学术概念，但他们基于现实的审美经验而对审美对象的“肉身性”有所感受，并用一些隐喻性的表达，努力诉说审美对象的“肉身性”。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谈论文章：“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④] 这段话好像预先说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界定悲剧时，曾说悲剧是对“单一而完整的行动”的模仿，强调悲剧作品的有机整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18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如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进一步把艺术品比拟为有生命的存在物，将作品整体的“有机论”与“机械论”相对立。当然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柯尔律治，他们的有机整体观都以生物或植物为原型。古代中国的艺术家则直接把艺术品比作人体，如苏轼《论书》：“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王淑《论书滕语》：“作字如人，然筋骨

① [美] 雅克·马凯：《审美经验：一位人类学家眼中的视觉艺术》，吕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页。
② [法]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世界：论哲学、文学与艺术》，第77页。
③ [法] 莫里斯·梅洛-庞蒂：《眼与心》，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5页。
④ [古希腊]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50页。

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备而后可为人，阕其一行尸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类似的言论不胜枚举。根据现象学对艺术作品与审美对象的区分，与其说它们谈论的是作为艺术作品的书法，不如说它们谈论的是作为审美对象的书法。因为现成给定的艺术作品本身只是一物，是纸张和墨迹，并无生命和肉身，只有在审美经验中，或在现象学的视域中，书法作品才能生成为或显现为“活的形式”。姜夔《续书谱·血脉篇》有云：“予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划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这句话说的正是书法审美经验。严格说来，惟有在审美经验中，审美对象才是“活的形式”，才具有“肉身性”。

20 世纪的美学经历了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洗礼，充分意识到形式的重要性，因此不少美学家认为审美对象的第一层次是形式。例如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论艺术，探讨了艺术作品与审美对象的关系，并且指出：“只有当某种人工制作的物质对象以其形体存在诉诸人的此种情感本体时，亦即此物质形体成为审美对象时，艺术品才显示地出现和存在。”易言之，审美对象是艺术作品的现实存在，是艺术作品的实现或完成。李泽厚又说，“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只存在于当人们去欣赏它们时”。[①] 这个观点有几分现象学的意味。那么艺术作品都有什么样的结构？是一个三层次的结构：形式层、形象层、意蕴层。如此形式就是审美对象的第一层次。但是，没有肉身的形式只是抽象的形式、空洞的骨架，犹如几何形，还不是审美对象。抽象画似乎是几何图形构成的“纯形式”，其实它们也是肉身化的形式，譬如至少被赋予了色彩，而色彩出之以笔触，表面有肌理。肉身化，才有感性，才有活力，才能打动人。形象、意蕴也是一样，形象和意蕴必须肉身化才能进入审美对象。审美对象的一切构成因素都必须肉身化，因此可以说，审美对象的基础层次乃是肉身。

四、结语

身体美学的“身体”是作为肉身的身体，亦即会生老病死的身体，与此同时，肉身是一个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概念，具有形而上的维度，并不会落入经验性的文化领域，因此，肉身也是前文化的自然身体。但是，说肉身是前文化的自然身体，这并不意味着落入自然—文化的二分法。如前所述，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所阐述的肉身可视为介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模棱两可的存在”。进一步说，身体可以视为一种“间性”（inter-sexuality）存在，即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一个中介，它处于自然的最高点、文化的最低点。因此，虽然肉身是前文化的身体，但它并不站在文化世界的彼岸。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吃了智慧果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对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羞愧，赶紧用无花果叶遮掩自己的身体，这个基督教“神话”的隐喻意义是，一切文化都是围绕着身体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甚至说，“文化就是身体”。或许还可以做一个比较，自然和文化的二分，相当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意识和无意识的二分。无意识又被弗洛伊德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两部分。“潜意识”处于无意识界的底层，犹如矿物潜藏在幽暗的地底，而“前意识”处于无意识界的表层，往往会被意识之光照到，从而被意识化。在我们的身体美学中，文化—肉身—自然的三分法，大致对应于弗洛伊德的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的三分法。根据这个三分法，我们完全可以主张肉身是前文化的身体、自然身体，却又不必陷入文化—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总之，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是肉身，而肉身是前文化的自然身体；相对于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作为审美客体的身体更接近于是一种经过文化濡染和文化塑造的身体。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李泽厚：《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150、154 页。

论后人类审美的三个维度 *

王坤宇

[摘　要]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等高科技的影响下，人类有可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性和审美化的生活或可成为后人类存在和生成的常态。因此，探讨后人类美学的可能维度，对于正在经历和即将到来的后人类生存及审美诸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后人类美学对人机交互这一前景的可能性维度做了较多推演，但对切近的后人类艺术体验、媒介—身体的后人类新主体，以及如何平衡后人类虚拟沉浸成瘾症候等现实问题还缺少研究。推演性后人类影像审美是当前大众媒介播撒后人类话语和意象的抓手，后人类媒介—身体的虚拟体验兆示着审美主体和审美样态的重要变革，这两种审美是当前和未来后人类审美的主要样态，其虚拟现实成瘾问题需要通过某种实践性来平衡，而后人类生态审美正可以扮演这一角色。

[关键词]后人类审美　推演性后人类影像　媒介—身体主体　生态后人类审美

〔中图分类号〕B83-06；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160-07

后人类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语言概念，但后人类状态本身仍然是一个迷思。我们习惯了在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或学术畅销书中推演后人类的各种可能性，却忘记了后人类就是当前人类正在经历着的生活审美实践的重要内容；抑或没有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后人类的旁观者，而且是后人类的在场者。事实上，正如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说，“我们都是赛博格，赛博格就是我们的本体”，[①] 或者如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认识到的那样，我们就是后人类本身。[②] 同时，后人类也是一个生成中的开放议题，其发展是多向度的，既可能预示着人类主体性的丧失，抑或某种末日危机（这是当前后人类话语讨论的焦点），也可能是人类走进理想社会和审美性存在或生成的奇点。审美性生存是后人类发展的一个可能向度，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工智能有可能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进入一种自在自为状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菲力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延续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解放了的人类应该是沉浸在创造和审美活动中的人类。[③] 从另一个角度讲，后人类发生的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升了人类的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当代中国生态电影的类型化研究”（17EC2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坤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美国佛蒙特大学博士后（重庆，401331）。

①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Feminism and Visual Cultural Reader*, Amelia Jones edit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475-497.

② 凯瑟琳·海尔斯在其名著《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用“成为”过去式（became）来提醒我们的状态是业已实现的后人类。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③ Felix Guattari, *The Three Ecologies*, translated by Ian Pindar and Paul Sutton, London and New Jersey: The Athlone Press, 2000.

野和认识水平，同时艺术媒介的介入也将这些新的认识具身化、科普化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审美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后人类生成过程中，审美范式的变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后人类审美，有学者认为："后人类美学尽管还在生成中，但已经展示了超越传统感性学的特征：其一，它是一种涵括了人类、机器、自然存在的交互美学；其二，它是彰显人类—机器连续性的具身性美学；其三，它是涵括了机器主体的加强版的生态美学。"[①] 指出了人工智能可能对后人类美学造成的影响这一维度，同时强调其作为加强版生态美学的特点。我们认为，进入后人类审美的维度是多元的、生成中的。其中，对后人类相关主题的科幻小说和影像审美已经成为重要的娱乐和审美潮流；人类正在从传统意义上单一肉身的主体向着与各种新媒介和软件交互的媒介—身体的新主体发展；后人类生态审美是保证守住生态红线、改善生态环境，使得后人类的生活不至于滑向"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式后人类的重要内容。笔者拟从这三个维度对后人类审美现象进行探索和反思。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何为后人类以及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后人类审美这一术语。

一、如何认识后人类和后人类生活

"后人类"概念的产生根源于"人类"这一被人文主义奉行了数个世纪的"普世范式"成了问题。这首先来自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其主要内核是解构，换言之，后人类的先导可以被视为后现代的一个分支理论。[②] 后人类研究学者往往祖述后现代哲学家福柯、德勒兹、伊哈布·哈桑，甚至推溯到尼采，正体现了这一层面的逻辑。这种后人类话语主要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的资产阶级白人男性中心）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消费社会、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我们可以化约地称之为批判性后人类，与近期兴起的新技术后人类状态存在着巨大的分野。[③]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人工智能、生化技术、纳米科技和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人的身体与媒介、人的后人类社会性与生物性未来等新问题。这是新技术倒逼而出的全社会响应的后人类状态，而批判性后人类则来自对机械、物理、化学等传统科学或技术对人的威迫。如果机械对于人类和人类伦理的威胁还只是少数如卢梭一样敏感人物的担忧，那么人工智能、纳米技术、新媒介所带来的变迁就是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现实。这两种逻辑（解构人本主义思维和新技术、新媒介后人类）在后人类话语拼图的逐渐显影中得到了相互印证。这二者，特别是后者，还体现出强烈的物本性倾向，这一点又可以从很多后人类学者开始追溯哲学家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一书中所阐发的宇宙哲学得到印证。怀特海认为，运动中的事物都应被赋予主体性和活性，各自成为摄入（prehension）和被摄入的矢量织网上的一个点。在这个万维立体的网之中，每个点都是在交互生成和交互死亡中的生成物。这与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如出一辙。怀特海的当代诠释者之一史蒂芬·施瓦罗（Steven Shaviro）认为世界无非是"物的世界"，[④] 而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则直接提出了客体导向（object-oriented）的概念。[⑤] 这很像是庄子的"齐物论"。我们还注意到，后人类同时是一组仍然在变化和生成中的现实和概念的合集。因此，反思中的我们也成了生成中的后人类，或者后人类成了我们确认自己还是人类的背景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类是人在新技术语境中对自身的动态生成性的捕捉、反思和自认。

后人类概念在传播和大众文化领域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和发展趋向。第一种是通过虚拟现实艺术（特别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推演后人类世界的政治、伦理、性爱、人机关系等议题。我们可以称为"推

---

① 王晓华：《人工智能与后人类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② Ihab Hassan, "Prometheus as a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 *The Georgia Review*, 1977-12-01, Vol.31(4), pp.830-850.

③ [匈] 佐尔坦·西蒙：《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与技术后人类：两种后人类未来的文化讨论》，张峻译，《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 8 期。

④ Shaviro Steven, The Universe of Things, Theory & Event, *Baltimore*, Vol. 14, Iss. 3, (2011): N_A.

⑤ Graham Harman,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 Pelican Books, 2018, 3.

演性后人类”（speculative posthuman）。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凯瑟琳·海尔斯认为后人类有四个主要特质：一是生命的本质不在身体，而在信息；二是意识对人类进化起次要作用；三是身体并非自然物；四是人工智能机器和科技装置与生物有机体无本质差异。[①] 这种后人类思维虽然在现实中也有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但是它更多地是一种推演和想象，是后人类（反）乌托邦。该书中文版封底直言此书是“一把开启科幻小说和电影世界的钥匙”，这也许无意中揭示了一个事实：科幻电影是想象后人类的媒介或抓手。然而，今天人类社会的边界和后人类状态的现实离海尔斯所指出的后人类特质相去甚远，或者说，这种认知也许根本上就是本末倒置。这种后人类想象充斥着缸中脑、薛定谔的猫、矩阵等似是而非的“高概念”，以及心理焦虑、身心分裂、反乌托邦、末日情结、废土叙事、技术—话语—想象的杂糅。即使是后人类理论的著名研究者似乎也无法弥合科幻小说与影像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因此其理论内部体现出无法自洽的特点。这种“异想天开”的本质是新技术对于人本主义旧认知的解构的戏剧化。如果我们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将这些“后人”元素替换成各种玄幻、魔幻、奇幻影视中的巫师、道士、金刚狼、时空骑士、外星人，故事似乎也无特别的变化，可见其底色的一致性。这种后人类更倾向于是人类给自己的后人类未来所描画的戏剧性肖像。

第二种后人类认识主要是根植于技术、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相对于第一种后人类更加切近现实，也就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相关。科技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在她的新作《后人类知识》（*Posthuman Knowledge*，2019）中就试图从我们正在经历和生成中的新状态或语境（大数据、虚拟生存、媒介剧变等）中来思考后人类亦即正在变化中的人类自身。[②] 有学者在总结了中外相关研究后认为：“所谓后人类，就是反身体、反生育、反环境、反自然、反神性存在的人类。或可说是技术化存在的人类……”[③] 这种认知和思维方式是一种相对切近的认识，也是一种正向发掘后人类认知的尝试。但是，这种立足于现实的后人类仍然有很多不为人类所认识的理论内核，目前来看，与后人类审美最为相关的是媒介与身体关系的剧烈变革。

除了这两种相关又相异的后人类审美之外，另一种可能的后人类审美维度是后人类生态审美。有学者指出脱胎于后现代的生态文化（其核心为反人类中心主义）正有与后人类相向而行，并媾和出后人类生态主义之势。[④] 其基本的逻辑在于，随着后人类媒介和物本主义的发展，人类将会逐渐认清自己在茫茫太空和勃勃生物圈中的真实位置，从而实现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生态新认知和新感性。

二、维度之一：作为审美对象的后人类影像

后人类生活景象创造了未来和未知的奇观世界，也为身处当下同时又充满对后人类可能性的好奇和焦虑双重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了审美和自反的空间。这种影像推演的未来人物和景象往往有一个现实中的技术作为点染的原点，但为了戏剧性而做了极大的夸大处理。如果我们已然是后人类，那么他们（科幻后人类影像）就是我们对后—后人类的想象，这种想象被资本介入，具身化为类型化的虚拟影像并成为我们后人类审美的一部分。

首先要明确的是，虚拟世界是否可以被看作存在和生成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虚拟影像都被当成资本主义操控人民、培养消费欲望的工具，其潜台词是这种廉价的“复制品”是失真的、欺骗性的。让·博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都表达了精英知识分子对这一声—光—电媒介的批判。然而，在持续了数十年的批判之后，这种媒介不但没有消亡或减弱，反而日渐兴盛，甚至即使是批判它的精英知识分子也争先恐后地通过各种新媒介来继续批判媒介，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正如美国哲学家阿德里安·伊瓦克耶夫（Adrian Ivakhiv）在《运动影像的生态学：

① 参见林建光、李育霖：《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台北：华艺学术出版社，2013 年，第 3-9 页。
② Rosi Braidotti, *Posthuman Knowledge*, Polity Press, 2019, 8.
③ 唐代兴：《技术化存在的后人类社会取向》，《江海学刊》2019 年第 1 期。
④ 王峰：《后人类生态主义：生态主义的新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电影、情动、自然》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所生活和运动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激荡着视听影像质料之流的漩涡。照片、电影和电视节目、录像和电脑游戏——这些以及其他的运动影像和来自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全球化工具生产出来的影像搅拌、混合。"[①] 影像不仅成了组成我们生活的质料，事实上也建构了当代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已然是后人类，虚拟影像就无疑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后人类影像世界作为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媒介，以"后视镜"和"前视镜"的方式将大量可能的后人类奇观、后人类形象、后人类伦理、后人类处境通过银屏展示给观众，成为后人类想象、反思和审美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影视审美分成相互纠缠和生成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奇观层，第二个层次是逻辑层或叙事层，第三个层次是外指层或意义层。[②]

在第一个层次，观众实现的是一种生理化的即时审美，特别是在 3D、IMAX 等技术的加持下，这种审美变得更具直接性和生理冲击力。这种奇观审美又可以被归纳为三个因素：一是地理形态审美，二是装置审美，三是人物形象审美。在地理形态审美中，比较突出的后人类奇观景象是赛博朋克的"高科技、低生活"场景的设定，例如《银翼杀手》中的立体都市和贫民窟相互映衬的地理景观，《瓦力·E》中的后人类垃圾星球，《疯狂麦克斯》中的废土景象，《流浪地球》中的地下城等。装置审美是后人类科幻电影的重要方面，比较典型的如《普罗米修斯》中的休眠仓、宇宙飞行器，《星球大战》中的激光剑，《第五元素》中的扫地机器人等。在人物审美层面，后人类影像的人物已经泛化为"人类形态物"，[③] 通过各种生化改造、机械与肉体的拼接、硅基和碳基的相连实现一种类人（这样才能为人理解）、非人（这样才能实现奇观）的形象创生，比较典型的有《战斗天使阿丽塔》中阿丽塔的头部以下身体的替换机制，《攻壳行动队》中的脑机接口，以及漫威系列电影中通过机械、生化和纳米等技术机能获得了大大加强的身体等。这种审美是表层的，带给人的更多的是审美感觉意义上的快感。

奇观层之下是逻辑层或叙事层。在这个层次，后人类审美需要实现在逻辑和叙事上的自洽。这个层面是后人类影像非常重要的"推测圆环"或高概念推演，如果没有合理自洽的故事逻辑，即使创造了较好的奇观效果，也很难实现电影的深度审美。一般情况下，这种逻辑是线性和因果关系的，但也有不少影视剧试图通过交织的故事线形成网状结构从而实现陌生化、延异或开放性的效果。比较典型的案例是《西部世界》。故事的主线来自一部好莱坞经典电影，被 HBO 演化出了多个线索交织的电影电视剧集。这部探讨人类的创生游戏、人性的杀戮本性、创生者与被创生者之间的对立等问题的影片，被开发出了西部世界公司内部、西部世界各个园区、人造人与人类世界的交错矛盾等多条线索，可以说逻辑极度巧妙和繁复。在这个层面，逻辑的自洽主要体现为"推演"。然而，有学者仍然指出其所谓的意义探寻不过是某种叙事套路，[④] 换言之，由于科幻影视的类型化需求，这种叙事已经形成了某种既定的"轨迹"。大多数的影视作品具备奇观和逻辑叙事层，已经完全可以称为合格的作品，而少量的高质量作品将会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层或外指层。

当前的后人类影像往往诉诸奇观和高概念，故事难免套路化，多数为传统意义上"软科幻"，能够具有丰厚完整的深层意义的作品并不多见。但最好的作品往往能够开创一种哲学思维，为观众反思未来和未知的可能性提供艺术空间，其中较为典型的哲学思考包括身体与意识关系的反思、后人类性爱伦理、创生反思、存在反思等，典型的有《第六日》《人工智能》《黑客帝国》三部曲等。以《黑客帝国》为例，这部电影开创了一种新的存在反思：人的感觉和意识很可能是一种被机器和代码操控的虚幻感觉，被称为矩阵的虚幻世界是人类的操纵者为了让"人肉电池"保持稳定输出而设计的安慰剂。这个巨大的脑洞

---

① Adrian Ivakhiv, *Ecologies of the Moving Image: Cinema, Affect, Nature*,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13, p.8.

② Ibid, p.10.

③ Ibid, p.10.

④ 王峰：《后人类的超限人性——〈西部世界〉的叙事"套路"与价值系统》，《学术论坛》2018 年第 2 期。

事实上借鉴于威廉·吉布森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最为核心的矩阵（也就是本片的英文名字）概念来自于控制论思维。“码成肉身”的具象化表达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审美和观众理解力的需要。[①] 在影片中，“违法”的黑客成了人类觉醒者，而法则制定者是程序和机器，执法者史密斯是杀毒软件。到头来，先知和救世主尼欧都是程序在充分认识了人性的脆弱之后为了更好地安抚和统治他们而安插的双面人……这部电影重构了主客体关系，颠覆了所有实体的价值观，建构出一套“矩阵世界观”（Matrix）。

后人类显然是一种颠覆传统世界观、价值观的新认知，而这种认识体系需要通过感性方式在人群中得到播撒。在影像已经成为后人类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存在方式的时代，影像正是这种“理性的感性显现”的最佳手段。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推演性的后人类影像虽然构成了当前后人类想象的重要内容，却并不等同于后人类状态或后人类生活的真实场景。这种由影像建构起来的后人类世界更多地扮演着一种当下的人类娱乐、消费和少许的哲理播撒的功能。

三、维度之二：媒介—身体作为后人类审美的新主体

在后人类语境中，审美的主客体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传统审美认识中，人被当成主体，而审美的对象被当成客体。后人类的审美逐渐在向媒介—身体共同构成的感知场的方向转变。随着媒介技术的大发展，影像沉浸的时代正在来临。如何扬弃机械性的主客体对立关系，建构出后人类的审美观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在此尝试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理论作为基本框架来建构后人类审美的模型。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强调主体的生成性、体验性、主客体之间的交互摄入性。在他的哲学巨作《过程与实在》中，将实在实有（actual entity）、事件（event）和遭遇（encounter）作为宇宙存在的基本要素。首先是生成性，怀特海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超体（superject）概念，就是说，主体每时每刻都在摄入和被摄入，[②] 从而由过去的状态进入到一种新的状态，而这种吐纳是持续发生的。过程哲学特别强调体验（实践）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变化都是在体验中被感知和发生的。实践和体验是所有审美活动得以发生的动力因素和实现场所。同时，正是在体验中，主体融入客体，客体也得以呈现在主体里，二者在此时此地合而为一，形成了一个主客体交互的场。这种交互并非是单向度的，也不仅是简单的双向的，而是在一个互为主客体的万维织网里：每一个客体都是一个主体，每一个主体又都是一个客体。审美活动正是在这种主客体交融的遭遇、碰撞、影响和分离中发生的一个个具体的事件。

后人类时代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长期以来作为客体的媒介和作为主体的身体都在发生着剧变。身体的媒介化和媒介的身体化这两股相向的力量正在将身体和媒介融合为一，主体的边界不再是皮肤，而是新的媒介—身体体验的主体场。虚拟现实（VR）和加强现实（AR）正在将身体的各种体验以电子和机械结合的方式复制成形。后人类正在从一种单纯的影像商品（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变成一种现实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的高级形态中，虚拟和现实已经融为一体、水乳交融。虚拟现实和加强现实技术在军事、考古和医疗等领域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推广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它同时也具有双面性，也可以使人在影视和游戏中日渐沉浸，忘记身体，使得《黑客帝国》中的“码成肉身”的比喻变成“肉身成码”。还可能让人类迷失在《盗梦空间》一样的虚拟空间中，甚至这并不只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很多沉溺于仿真游戏的青年的常态。

交互游戏是重要的后人类媒介—身体审美的沉浸场域。游戏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日渐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有学者将这种“身心分置”的存在状态视为后身体美学出场的征兆，因为后身体美学强调的是身体在赛博空间里的多重在场。[③] 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加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在游戏和电影中广泛应用，使得虚拟现实和现实的边界日渐模糊。这说明，我们现在目力所及的后人类时代

---

① 参见王坤宇：《人工智能影像与后人类身体》，《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②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corrected edition, London: The Free Press, 1979, pp.8-9.

③ 简圣宇：《后人类纪语境中的身体美学问题》，《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是一个影像沉浸（Image Immersion）的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代偿性或模拟性影像，这是虚拟现实的影像，而这种沉浸的来源在于资本主义对媒介的操控和对人们生活方式的诱导。由此可见，这一媒介—身体的后人类审美的样态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无限地延伸了人的身体，使人类的想象力具有了视觉和实感的具身性，另一方面，这种具身性又很可能对人的身体和欲望进行绑架，使得人类脱离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生活，沉浸于虚拟现实中而不能自拔。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在科幻电影《虚拟革命》（*Virtual Revolution*，2016）所刻画的未来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人类生活在游戏创造的逼真世界里，觉醒者们经过长时间的心理斗争自己下线，并通过暴力革命准备把游戏摧毁；然而此时，醒来的人们不是感谢这些“救世主”，而是将他们几乎全部杀死，又重回后人类虚拟世界之中。从当前青少年对游戏的依赖程度来看，即将到来的虚拟影像成瘾无疑会更加致命。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需要认识到后人类审美的这种精神成瘾症候的危害，用另一种后人类的审美来平衡这种倾向性，这就是后人类生态审美。

四、维度之三：后人类生态审美

有学者敏锐地发现了后现代生态主义与后人类之间的交集和分歧：“后现代生态主义更多是观念上的说服，以克制技术发展的负面作用；而后人类则通过技术将人类发展重心从外部转向内部，改造人的身体，部分消解人类向外部扩张的能量，从而可能达成人与自然生态的新的平衡。”[①] 人类不管以何种方式存在，都需要以一定的力量源泉为基础。作为有机物综合体的人类的力量源泉就是氧气、大地、森林、草原、海洋、冰川、环流，一言以蔽之，环绕我们的生态系统。在后人类虚拟身体即将成为重要的存在样态的趋势下，探寻后人类的生态审美维度就变得非常迫切了。否则，后人类就将成为人类在虚拟世界的“自激反应”，直到有关自然的存量信息和能量消亡为止。

目前学界讨论最多的后人类负面前景来自对技术的批判性哲学一脉。这种哲学认为，未来多数人类会沦为“过时的人”[②] 或无用阶层：“‘我们能做何事’和‘我们有何事可做’将成为后人类进程所有危机中最现实也是最根本的危机。”[③] 这种认识因为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不断被各种科幻电影所展示，从而成为一种“想象后人类的方法”，或者说心理路径依赖。但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环境的极度恶化之后，我们更应该相信人类作为“万物灵长”的自我反思能力和再调试能力。人类要走向延续，就不得不扬弃既有的将自己特例于自然万物的世界观，不再任性而为。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逐步认清世界的本来面貌以及自身和万物的真实定位，从而有可能走向一个新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化生存的状态之中，一种后人类的生态感性也将应运而生。这种新感性在过去数十年的生态运动中多有探讨。在哲学领域比较著名的案例包括德里达的“小母猫”、哈拉维的“牧羊犬”、德勒兹的“生成—动物”和“根茎”、哈曼的“客体本位”、史蒂芬·施瓦罗的“物的宇宙”等。究极而言，就是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建构自我与他者（动物、植物、自然、尘埃、粒子、能量）的新认识、新感知、新关系的过程。

以生化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后人类状态是人类历程的奇点时刻，由于生产力的极大丰富，大多数人都有可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阶级剥削中解放出来，广大的人类获得了足够的物质和闲暇时间，有望实现马克思、加塔利等理论家所论的创造和审美性生存。后人类生态审美在这样的语境中就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能力，一种后人类“可做的事”。这种自由是一种实现了的主体自由的实践，过去数千年来它只为少数人拥有，普通民众所拥有的一直都是一种代偿、抽象、拟像的自由，真实的生态主体的自由只有在实现了的后人类生态审美中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但是，我们除了展望这种生态自由的前景，还应该认识到为了获得这种前景所做的付出。首先，后

---

① 王峰：《后人类生态主义：生态主义的新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② “过时的人”（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的提法来自德国思想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认为现代科技会使人类被淘汰，成为过时的人。参见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第 1 卷，范捷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③ 唐代兴：《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人类向后人类演进的不可逆风险与危机》，《江海学刊》2020 年第 3 期。

人类生态自由的前提条件是生态义务，[①] 这一义务既是针对后人类他者的，也是针对自然和万物的责任。当代生活是以工业化生产、都市化生存和消费主义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根脉已经被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斩断了，多数人类已经丧失了在自然中生存以及和自然相处的能力。这就要求在生活日益虚拟化的后人类时代，人们在复归自然、走进荒野之前首先要做好对可能接触的环境和动植物负责的准备，当然，这更是对自己负责。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生态电影《走近荒野》《灰熊人》等悲剧反映了当代都市人重新走进荒野的破坏性和荒谬性，甚至是自毁性。这些文本都在警示着经工业化和城市化沾染后的人类的生态角色的重建问题。在后人类角色和管理游戏《动物森友会》中，游戏的玩家成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创造者，摄入和付出的管理者，最终成为动物以及森林（自然）的朋友。这一类文本可以成为虚拟生态与现实自然之间的桥梁，是对后人类完成生态教育和生态感性重建的很好案例。如有可能，我们也许应该进而开发一系列生态后人类游戏，作为后人类进入荒野前的先行练习，在获得了充分自然责任认知、自然生活技巧之后，再到自然中去进行实地的劳动、创造体验和审美。

其次，后人类生态审美以创造性为重要的特征。在后人类时代，真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自由，真的审美不是少数人的审美，真的创造也不是少数人的创造。创造将是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创造不用思考其实用性，是一种对可能性的推演和具身化，从而形成创新的森林和完善的遴选、循环系统。这种创造是一种后人类的浪漫主义。为了实现这种创造性，我们应该转变一下思考的方式。传统的思考方式最大的忧虑是后人类的“工作问题”，而理查德·富勒指出，在生产力极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应该实行“思想补助金”制度，即由社会供养人类没有实际目的的创造，使人们成为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他指出：“每十万名研究人员中，只要有一个人有突破性发现，其成果收益就会大大超过其他 99999 人的补助金”[②] 这种半个世纪前的奇思妙想直到今天看起来还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也许这正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真实路径。这种创造暗合了康德所论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就是审美性的创造。我们需要做的是要转变既有的劳动只是肉体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固化思维，认识到后人类的劳动即创造，创造即审美。

最后，后人类生态审美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其日常生活的审美性。身处农奴和工业转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将生活当成了美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他指出：“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③] 在车氏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美的。如果我们将这个命题倒置过来，即“生活是美”显然是不能被从事着繁重劳动、被各种“大山”压迫的阶层所接受的，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在今天的人工智能和后人类时代，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替代。后人更需要的并不是有关劳动和生产领域的进步，而是人类社会的认识、伦理、分配和审美的变革。如果这种变革可以实现，加塔利意义上的三种生态（自然、社会、精神生态）都有可能发展到一个和谐之境，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后）人在自然中的“诗意栖居”。换言之，后人类的生态审美，就是其生活本身。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参见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49 页。

② [美] 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设计革命：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陈霜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27 页。

③ [俄]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第 6 页。

论《金瓶梅词话》的药物叙事

史小军　王舒欣

[摘　要] 药物叙事在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中占据较大的分量，全书近一半的章回中都有叙写药物名称及用药过程之处；曲词中频繁出现的中药材将药性寒凉与西门家族的繁华热闹相映衬，展现了小说冷热对照的叙事格调。药物叙事的主要文学功能包括串联人物关系、编织小说结构，塑造医患群像、展现人情世态，暴露社会丑恶、深化小说主旨三个方面。讽喻手法的频繁出现使文本的修辞美学特征更为明显，也使小说的写作意图更加鲜明。

[关键词]《金瓶梅词话》　药物　叙事　修辞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167-10

《金瓶梅词话》作为一部针砭时弊的世情小说，作者在叙事中精心构建了一个由疾病、患者和医者组成的世界。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对文本中的医家与疾病多有论述，然而，对与医疗息息相关的治病之药却留意较少，对药物的论述多聚焦在药方或单纯的药理药性之上，对药物叙事的综合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文拟在整理全书药物种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药物叙事的文学功能与修辞特征，借此窥探《金瓶梅词话》的创作主旨以及世情小说的发展进程。

一、药物叙事的文本概况

（一）药物的数量、药理及用途

据笔者统计，《金瓶梅词话》中提到药物之处多达 113 次，100 回《金瓶梅词话》中叙写药物名称及用药过程之处有 45 回，占全部章节的 45%。作为长篇世情小说鼻祖，词话本中所写真实的药物多达 68 种：砒霜（人言）、艾草、沉香、白蜡、水银、胡椒、百草霜、金灯花、玉马樱、金雀藤、瑞香花、十姊妹、金雀花、鹅毛菊、望江南、枸杞、迎春花、蔷薇花、玉簪花、红娘子、桃花、金盏草、红花、紫草、转枝莲、石榴花、丁香花、茉莉、黄柏、知母、地黄、黄芩、三七、木樨、玫瑰、紫河车、白鸡冠花、棕灰、牛乳、薄荷、金银花、朱砂、金箔、牛膝、蟹瓜、甘遂、定磁、大戟、芫花、斑蚕、赭石、硇砂，芒硝、桃仁、通草，麝香、凌霄花、葱白、蜂蜜、甘草、藜芦、巴豆、半夏、乌头、杏仁、天麻、牛黄、人乳。以上所列药物，有 20 种在文中所提到的用处与现实情况相符，以李瓶儿使用的三七为例：李时珍在万历六年至万历十六年间著成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三七“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此药近时始出”。[①]《金瓶梅》中也描述花大舅“过世公公老爷，在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②]

作者简介　史小军，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舒欣，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632）。

① [明] 李时珍编纂，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新校注本本草纲目》（第 4 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年，第 535 页。为行文方便，《新校注本本草纲目》下文统一简称为《本草纲目》。

② [明] 兰陵笑笑生原著，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台北：里仁书局，2009 年，第 982 页。为行文方便，《金瓶梅词话》下文统一简称为《金瓶梅》。

可见，三七约于明中期万历年间出现，小说中三七的出产地点也与药书相符，证实《金瓶梅》的写作时间与《本草纲目》的问世应处于相近时代。第十六回李瓶儿把价格高昂的沉香、白蜡、水银和胡椒当作货物托付给西门庆，与明代真实社会状况相吻合；第七十五回孟玉楼吃牛黄丸以及第七十九回提及的人乳等，也是时人常用药。第七十九回中，西门庆向如意儿讨要人乳，以人乳配合服药。明谢肇淛《五杂俎·人部一》记载，穰城（今河南邓县）有位长寿者，“不复食谷，惟饮曾孙妇乳”。[①] 大概服乳长寿之传闻，是明代流行以人乳进补的原因之一。而人乳补脾益肾之功效，也更适合恣情纵欲的西门庆服用，与第六十七回应伯爵喝“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对照，牛乳亦可“补虚羸，止渴。养心肺，解热毒，润皮肤”，[②] 同样是时人流行的进补方式。

另外，《金瓶梅》作为优秀的世情小说，在情节设置中有 14 种药物用于医家治病救人，药性与病理丝丝入扣。如任医官于第五十五回中诊治李瓶儿时所用黄柏、知母、地黄、黄芩，均为清火止血之药，与李瓶儿产后之症对合。《本草纲目》：“知母佐黄檗，滋阴降火，有金水相生之义。黄檗无知母，犹水母之无虾也。”[③] 情节中设置黄柏与知母同用，与医道完全符合，证明作者医理精湛，药物信手拈来便成章法。《金瓶梅》第六十二回中提到三七，用来治疗李瓶儿“崩漏之疾”，《本草纲目》有证，三七（主治）“崩中经水不止，产后恶血不下”，[④] 是切合实际的对症之药。胡大尹为李瓶儿寻的药方白鸡冠花与棕灰，有止血效用，棕灰散治妇人“崩漏下血”，[⑤] 白鸡冠花可止肠风血热，治妇人“崩中赤白带下”，[⑥] 都是明代治妇人失血的验方。另有一些文中没有直接说明药物成分的中成药，如第六十七回任医官给西门庆的百补延龄丹，《丹溪先生心法》卷三“补损部”有“延龄丹”的记述，主治“脾肾不足，真气伤惫，肢节困倦，举动乏力，怠惰嗜卧，面无润泽，不思饮食……其功不可具述”。[⑦] 第七十五回孟玉楼心口疼痛，吃广东牛黄清心蜡丸，第七十六回腹痛吃暖宫丸，此药见于明代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女科》以及《妇人大全良方》《仁斋直接》。[⑧]《金瓶梅》诊脉开方的成药品种十分丰富，药方中有相当多的部分在中医典籍有记载，书中提到的中医学科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多个学科。

《金瓶梅》对人物病情的描述与药物的使用相当详细备尽。第五十九回潘金莲蓄意以猫扑人使官哥惊风，“搐的两只眼直往上吊，通不见黑眼睛珠儿，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犹如小鸡叫，手足皆动”。[⑨] 而与之相比较，宋代医书《幼幼新书》载《小儿初受惊风候歌》中小儿惊风的症状如下：“小儿如得惊风候，指甲青兼黑似烟，口吐白虫便黑血，眼开不闭半抬肩，咬人白日多惊汗，忽作鸦声不可看。”[⑩] 官哥口吐白沫、吊眼以及声音情态都与医书相同，显见是惊风无疑。刘婆为治疗熬制灯芯薄荷金银汤，又以金箔丸研化灌下。这里灯心薄荷汤主治心烦失眠，金箔丸中的金箔可以“疗惊痫风热肝胆之病”，[⑪] 宋代医师刘昉记载有“金箔镇心圆”，“治小儿一切惊气，夜睡不稳，喉中涎声，梦中狂叫，精神躁闷，并宜服之”。[⑫] 对症下药并无讹误，应当说，到这里刘婆的表现都没有什么问题，即便没有太医院的高明医术，但也至少展现出了一个医生的基本合格素养。而后刘婆失手，艾炙无效反而使官哥转为了慢风，西门庆请小儿科太医来看，也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用接鼻散试之，“若吹在鼻孔内打喷嚏，还看得；

---

① [明] 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 89 页。
② 《本草纲目》，第 1808 页。
③ 《本草纲目》，第 1329 页。
④ 《本草纲目》，第 535 页。
⑤ [明] 张介宾：《景岳全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年，第 1111 页。
⑥ 《本草纲目》，第 668 页。
⑦ [元] 朱震亨撰，[明] 程充编订：《丹溪先生心法》，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29 页。
⑧ 李晓梅、王忠禄：《论〈金瓶梅〉中的医者叙写》，高原、朱忠元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 9 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9 页。
⑨ 《金瓶梅词话》，第 922 页。
⑩ [宋] 刘昉：《幼幼新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年，第 315 页。
⑪ 《本草纲目》，第 327 页。
⑫ 《幼幼新书》，第 326 页。

若无喷嚏出来，则看阴骘守他罢了”。[①] 这里的接鼻散，较少为人所留意，但也是当时儿科所用验方。《幼幼新书》卷十引《茅先生方》详细描述了治疗慢惊风中的药物搐鼻散，即小说中的接鼻散，处方为“瓜蒂一钱，细辛半钱”，制法“右为末”，功能主治小儿惊风四十八候。每“用半字吹入鼻中，打喷嚏，候眼开，便将大青丹取下积热，并下惊涎后调气。”[②] 小说中的药物用法与医书中记载完全相同，主治病症也契合。在官哥之死情节中，有着几乎完全贴近生活的真实病症与真实药物，这些药物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也使叙事变得更加合乎情理。作者的叙述植根于明代社会生活，这种叙述的真实性有着浓厚的现实主义观感。再配合恰到好处的叙事结构，以这样的真实引领读者走进虚构的生活氛围中，平添不少直面死亡的沉重感。

（二）曲词中的中药材

《金瓶梅》中所统计 68 种药物，都属于传统中医所用药材。文本中的中药材不仅体现在一般的叙事情节中，也展现在曲词中。《金瓶梅》中曲词较多，其中有四个曲词涉及中药材，较为典型的是第三十三回潘金莲罚陈经济唱《山坡羊》：“我听见金雀儿花眼前高哨，撇的我鹅毛菊在斑竹帘儿下乔叫。多亏了二位灵鹊儿报喜，我说是谁来，不想是望江南儿来到。我在水红花儿下梳妆未了，狗奶子花迎着门子去咬。我暗使着迎春花儿绕到处寻你，手搭伏蔷薇花口吐丁香把我玉簪儿来叫。红娘子花儿慢慢把你接进房中来呵，同在碧桃花下斗了回百草。得了手我把金盏儿花丢了，曾在转枝莲下缠勾你儿遭。叫了你声娇滴滴石榴花儿你试听知，被九花丫头传与十姊妹什么张致？可不教人家笑话不了。”[③] 整首曲词由花名构成，风格活泼新鲜。首先，花名可喻动物，如“金雀儿花”喻“金雀儿”叫，“狗奶子花”象征“狗”“迎着门子去咬”，生动形象且富有趣味。其次，花名可喻人物，一语双关，如“迎春花儿”可指迎春花，又可指李瓶儿的侍女迎春；“玉簪儿”指玉簪花，李衙内的妾也叫玉簪儿。值得注意的是，曲词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称指代“望江南儿”，应作名词解。望江南并不是花名或动物名，但其他人称都以植物作代，望江南若以曲牌名解释，则于理不通，因此它应当是豆科决明属植物望江南，也是时人所熟知的一种中药，《药性论》《开宝本草》与《本草纲目》中都有记载。在密集的花名中间穿插一种中药，显得格外突兀，难道是作者已经绞尽脑汁，却并没有其他种类的花可以用来安插在曲词中，只能用中药来填补空缺了吗？显然并不可能。那么是否为作者刻意留的一个破绽？中药非花，但若将所有的花名都看作中药，疑惑则可迎刃而解。

事实也确实如此。金雀花：“能透发痘疮……解毒攻邪。”[④] 鹅毛菊：菊花。疏散风热、清肝明目、清热解毒。望江南：“清肝明目，健胃润肠……解毒。”[⑤] 狗奶子：枸杞。[⑥] 性微寒，枸杞苗“消热毒，散疮肿”。[⑦] 迎春花：解毒，“治肿毒恶疮”。[⑧] 蔷薇花：清暑解毒，“可罨金疮”。[⑨] 丁香花（雌丁香）：主治“风水毒肿，霍乱心痛，去恶气”。[⑩] 玉簪花：“甘、辛，寒，有毒。捣汁服，解一切毒，下骨哽，涂痈肿。”[⑪]

---

①《金瓶梅词话》，第 925 页。

②《幼幼新书》，第 336 页。

③《金瓶梅词话》，第 475 页。

④ [清] 赵学敏辑：《本草纲目拾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年，第 256 页。

⑤《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编：《全国中草药汇编》（第 2 版）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 年，第 749 页。

⑥ 狗奶子的含义有多种说法，《金瓶梅大辞典》中将狗奶子解释为蒲公英之俗称。《现代北京口语词典》认为狗奶子是小蘖，《本草纲目·木部》称小蘖为山石榴，“子细黑圆如牛李子及女贞子”（《本草纲目》，第 1331 页）。然而若以山东方言而论，狗奶子其意为枸杞，明晚期诗僧释函可曾作诗《狗奶子》，描述有“味酸性微寒，嘴尖腹渐大。丛生缀短枝，浑疑人血洒……陈列俎豆间，明明格上帝”（ [明] 释函可：《千山诗集》卷三，清刻本），从味觉、药性、外形与作用来看，似乎都与枸杞更为相似。故本文取枸杞之说。

⑦《本草纲目》，第 1416 页。

⑧ [明] 胡濙：《卫生易简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年，第 207 页。

⑨ [清] 汪绂撰，江凌圳等校注：《医林纂要探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年，第 127 页。

⑩《本草纲目》，第 1304 页。

⑪《本草纲目》，第 828 页。

红娘子：即樗鸡。[①] 有小毒，破瘀，散，攻毒，“主瘰疬”。[②] 桃花：治心腹痛及秃疮、头上肥疮、手足癞疮。[③] 金盏草：长春花。酸、寒，治“肠痔下血久不止”。[④] 红花：活血，解痘毒，散赤肿。[⑤] 转枝莲：祛风除湿，活血止痛。[⑥] 石榴花：凉性，解毒，治“九窍出血”。[⑦] 十姊妹：又名佛见笑，清热化湿，“治伤寒危笃立效”。[⑧]

可见，曲词中所有的花表面上看上去是给文辞增加艳色，实质上在文中以中药的性质出现才能达到文意的和谐统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 15 种中药，药性与功用惊人地相似，都作清心解毒之用。这种现象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但强行进一步深入阐释，又有过于穿凿之嫌。不妨比较一下小说文本中出现过的其他花及其药性。以花入膳在《金瓶梅》中是常事，饮食中常见花以木樨、玫瑰为例（玉米面玫瑰果馅蒸饼儿）。木樨：桂花。甘、辛，大热，温中，坚筋骨，通血脉……补命门不足，益火消阴。[⑨] 玫瑰：气香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肝经，和血行血。[⑩] 可以看出，同样是花，曲词中的药性凉解毒，而饮食用花药性却甘热。除花之外，膳食中包括牛乳、人乳以及西门庆常吃的鸽子雏儿等等，无一不是味甘性热的滋补佳肴，大热之性对比下，愈发衬得曲词中的中药药性格外寒凉。膳食辛热温补的作用，的确适合滋补养身，但西门庆狂欢纵欲热度不减，以中医医理来看，未免火热淤积，病邪上攻，郁结成毒。小说中连应伯爵也看不下去，劝西门庆：“你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这等厚味，岂无痰火？”[⑪] 作者以人乳等补品预先埋伏下西门庆的死因。《本草纲目》说人乳“有饮食之毒，七情之火也。”[⑫] 这与西门庆临终前“下卵肿毒”的现象——“太极邪火，聚于欲海”[⑬] 的诊断正好相符，西门庆之死的表象病理明显是热毒无处泄泻，根本原因是耽于自身纵情声色，药石回天无力。这时我们再折返至第三十三回看曲词中药的寒凉之性与解毒之功效，更像是作者一片苦心，预先伏线千里，是对文中人物的告诫与警醒。《金瓶梅》全文中着力写病亡三人，即官哥、李瓶儿和西门庆，官哥病时有朱砂丸、灯心薄荷汤等治惊风的药，李瓶儿病时有归脾汤、三七等止血之方，然而全文最重要的男主角西门庆，应是着墨最多之人，却竟然从病到亡，在叙事中并无一个药方出现，仅都是以“抓了些药”这样敷衍的手法匆匆带过，似乎不合情理。曲词里出现的多种药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种疑惑。

学界已有共识，冷热对照是《金瓶梅》的叙事格调。西门家族沉迷于娱乐纵情于声色，以追求“真乐”“快活”为人生目标，作者以此致力于展现扭曲、黑暗、病态的社会。病者自有医家对症下药，然而病态的社会又用什么医疗？在《金瓶梅》曲词中的中药里似乎也能找到答案。西门家族看似一团“热腾腾”，人生得意时花团锦簇，有烈火烹油般的繁华风流；园中常见观赏植物与之相衬，也艳丽多姿，一派富贵景象。如第十九回中花园赞词：“木香棚与荼蘼架相连，千叶桃与三春柳作对。也有那紫丁香、玉马樱、[⑭] 金雀藤、黄刺薇、香茉莉、[⑮] 瑞仙花。[⑯]”然而这些植物美则美矣，却也几乎都是寒凉之物，均有解毒清火的效用。张竹坡所谓冷热金针之法，即既有一热，必有冷针锋相对，“夫一部《金瓶梅》，

---

① 红娘子并非花，而是药用昆虫。见程淦藩：《红娘子考》，《昆虫知识》1964 年第 2 期。
②《本草纲目》，第 1514 页。
③《本草纲目》，第 1172 页。
④《本草纲目》，第 734-735 页。
⑤ [清] 张璐著，赵小青、裴晓峰校注：《本经逢原》，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 年，第 76 页。
⑥《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编：《全国中草药汇编》（第 2 版）下，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 年，第 358-359 页。
⑦《本草纲目》，第 1198 页。
⑧《本草纲目拾遗》，第 231 页。
⑨《本草纲目》，第 1294 页。
⑩《本草纲目拾遗》，第 220 页。
⑪《金瓶梅词话》，第 1069 页。
⑫《本草纲目》，第 1808 页。
⑬《金瓶梅词话》，第 1387 页。
⑭ 玉马樱（杜鹃），又称羊踯躅，主治“温疟恶毒诸痹”。见《本草纲目》，第 830 页。
⑮ 茉莉，“清热解表，利湿……镇痛”。见《全国中草药汇编》（第 2 版）下，第 355 页。
⑯ 瑞仙（水仙），“清热解毒，散结消肿”。见《全国中草药汇编》（第 2 版）下，第 124 页。

总是冷热二字，而厌说韶华，无奈穷愁，又作者与今古有心人，同困此冷热中之苦”。[①] 世情人情概不例外，药性亦如此。这里的药物，可清书中人物永不止息追逐欲望之火，解社会污浊风气所引病邪之毒。药性的冷与环境的热集中在一起展示，热闹中渗透着清冷。冷与热的互渗形成了浑然一体的戏剧性对比，从中呈现出家族的兴衰和社会的变迁。

二、药物叙事的文学功能

《金瓶梅词话》中直接描写药物的情节较少。全书中的药物叙事主要源于医者与病者之间的互动，或家族内外人情往来之间的交流，可以说大量的用药情节是药物叙事的核心内容。药物情节主要分布在第四十九回到第七十九回之间，即官哥、李瓶儿、西门庆三人死亡的情节，是全文药物频率出现最密集的章回。小说中的主角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都或多或少地服食过不同的药物，各种不同类型的药物交叉作用于人物身上，起到串联整体叙事构造的作用。

（一）编织小说结构，串联人物关系

首先，药物是小说中无法忽视的一个结构性要素。小说主角西门庆从出场便经营着一家生药铺，由此开始，药物勾勒出五条互相交错的线索：西门庆由卖药发家，借毒药杀人，因春药纵欲，吃补药延寿，最后又死于医药。从生至死，一生与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每一种药都不是孤立存在于西门庆的生活中，而是互相影响产生新的意义。西门庆服用春药纵欲伤身，因此用补药平和养生；使用毒药害人性命时冷酷无情，自己生病时又遍寻医药救人性命。实质上，这些药物在文本表层意义上看似性质完全不同，药物叙事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最终殊途同归，全部成为了西门庆丧命的催化剂。再看李瓶儿出场时，说丈夫花子虚在外胡行，为此“气了一身病痛在这里”，[②] 暗示情欲得不到满足，需要精神上的“药”来医治。为了表达对西门庆的一片痴心，交给西门庆贵重的药物沉香、白蜡、水银和胡椒。而后又因孤枕难眠，得了梦交之症靠蒋竹山治疗才能康复；嫁入西门家族后，李瓶儿又靠西门庆这种“药”治疗情欲才能活命，但她同时又是西门庆泄欲的牺牲品，暗示了李瓶儿必死的结局。西门庆与李瓶儿二人都试图通过药物获得更好的“生”，却反被药控制导致死亡，这种由生到死的变化巧妙地完成了药物叙事情节的循环闭合，与作者所点明的“天道循环”主旨相呼应。

其次，不同人物使用药物的交集也会碰撞出情节上的火花，作为叙事暗线埋下伏笔，引出主旨。吴月娘为了求子使用坐胎药，潘金莲也因使用坐胎药而与吴月娘大吵，这里引起的冲突是文章叙事一大转折，此前家庭中暗流涌动，表面上却是一团和气，从坐胎药事件后，勾心斗角的算计暴露于人前，为潘金莲被月娘赶出家门埋下伏笔。另外，当吴月娘使用坐胎药时，西门庆偏偏为了讨好吴月娘使用春药。这也使吴月娘产生一种必定有子的预感，“他有胡僧的法术，我有姑子的仙丹，想必有些好消息也”。[③] 需要注意的是，赠春药的胡僧和赠坐胎药的薛姑子在小说当中从来没有碰过面，二人留下的药物都是世间遍寻不到的方药，在壬子日当天的同一叙事时空借西门庆和吴月娘交汇在一起，也为后续情节埋下伏笔。僧尼作为世外之人，代表佛家解脱轮回万法皆空的世界观，因此，胡僧赠送给西门庆的春药和薛姑子的求子药融汇在一处时，结胎生下的孝哥这一人物有着浓厚的宗教象征意义，是全然虚幻的存在。因此，孝哥天然具有与尘缘无关的出世性质，并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入世的凡人继承吴月娘的家业。接下来，这个因药幻生的人物又承担了揭示真相的叙事功能，第一百回显示，睡在床的孝哥原是披枷带锁的西门庆转世，可见，吃药生子原是痴心妄想。作者设置这一段药物情节的主要目的就是点明六道轮回、因果循环的主旨，从而起到勘破世情、劝示读者的作用。

（二）塑造医患群像，展示人情世态

《金瓶梅》中的药物叙事，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医患形象的丰富性。书中花子虚患有伤寒，官

---

① [明] 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13 页。
②《金瓶梅词话》，第 173 页。
③《金瓶梅词话》，第 811 页。

哥受惊，李瓶儿气血两虚，西门庆肾气衰竭，春梅贪淫骨痨等，病症五花八门，病情或轻或重。以书中道德视角批判，西门庆等人或死有余辜，但书中没有一人所患之病为不治绝症，只要方法得当，都可以治愈。因此他们最后纷纷死亡的结局，就直接原因来看，是死于庸医之手。庸医是杀人的凶手，庸医所开出的药物正是杀死病人的凶器。

下面试以李瓶儿之死为例说明。医师中唯一看似稳重可靠的任太医，却也间接将李瓶儿送上黄泉路。官哥死后，李瓶儿怀着失子之痛，又经潘金莲每日喝骂，“把旧时病症，又发起来，照旧下边经水淋漓不止。西门庆请任医官来看一遍，讨将药来，吃下去如水浇石一般，越吃药越旺。那消半月之间，渐渐容颜顿减，肌肤消瘦，而精彩丰标无复昔时之态矣”。[①] 李瓶儿曾吃任医官药极有效果，为何如今却不见效应了，反而越吃越重？最后一个阶段李瓶儿下血不止时，任医官治疗李瓶儿时说：“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些。七情感伤，肝火太盛，以致木旺土虚，血热妄行，犹如山崩而不能节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犹可以调理，若鲜红者，乃新血也。学生撮过药来，若稍止则可有望，不然难为矣！”[②] 乍一看，任医官称李瓶儿血热妄行，肝火太盛，以病因而论头头是道，亦有医书可证明。医科典籍中称“女子之性执拗偏急，忿怒妒忌以伤肝气。肝为血海，冲任之系，冲任失守，血气妄行也”。[③] 看上去合情合理。但在明清医学资料中，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与小说中的疾病情节对照。晚明时期医学名家傅山所著的《傅青主医学全书》中有一段疾病症状恰巧与李瓶儿之病极其相似，可供参考比对。现摘录如下：“妇人有经水过多，行后复行，面色萎黄，身体倦怠，而困乏愈甚者，人以为血热有余之故，谁知是血虚而不归经乎！夫血旺始经多，血虚当经缩，今曰血虚而反经多，是何言与？殊不知血归于经，虽旺而经亦不多；血不归经，虽衰而经亦不少。世之人见经水过多，谓是血之旺也，此治之所以多错耳。”[④] 这段话从根本上推翻了任太医的诊断结果，依此来看，李瓶儿并不是血热，而是血虚之症，任太医不仅不能治病，所下之药反而害人不浅。李瓶儿在任太医诊治之前，形态是“下边似尿也一般只顾流起来，登时流的眼黑了……忽然一阵旋晕的，向前一头拾倒在地”。[⑤]《傅青主女科》中有“妇人有一时血崩，两目黑暗，昏晕在地，不省人事者，人莫不谓火盛动血也。然此火非实火，乃虚火耳”。[⑥] 两相对照，李瓶儿明显完全贴合血虚的症状。此外，在小说的治疗过程中，任太医认为，紫血可治愈，红血则无药可治。《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中则称“经水过多，清稀浅红，乃气虚不能摄血也。若稠粘深红，则为热盛有余”。[⑦] 可见，李瓶儿当为血虚之症无误，任太医做出的血热诊断是完全错误的。血虚导致的下血之症，似乎完全不在任太医的医疗知识范围内。[⑧] 故李瓶儿吃了任太医治疗血热的药，“其血越流之不止”，病情日益加重。

整部《金瓶梅》的医生中，任医官已是公认最端庄持重之人，连任医官诊病都如此稀里糊涂，其他医生自不待言。刘婆失手治死官哥，使李瓶儿眼睁睁看着儿子搐死在自己怀里导致身心俱损；赵龙岗的自我夸耀与他开出荒谬绝伦的处方相映成趣，全面立体式地展现出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形象；胡太医治疗病人医术毫不见效，反倒擅长配置害人性命的堕胎药，还振振有词地称“天地之间，以好生为本”，言辞之虚伪与态度之做作实在忍不住令人发噱。一部书“骂尽诸色”，又令人可叹。李瓶儿曾坚信医生的职业道德，替这些丑态百出的医生辩解，“孝顺是医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⑨] 然而李瓶儿高估了《金

---

①《金瓶梅词话》，第 937-938 页。

②《金瓶梅词话》，第 966 页。

③ 张奇文主编：《妇科医籍辑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年，第 47 页。

④ 张存悌主编：《傅青主医学全书》，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年，第 18 页。

⑤《金瓶梅词话》，第 964 页。

⑥《傅青主医学全书》，第 6 页。

⑦ [清] 吴谦等撰，鲁兆麟等点校：《医宗金鉴》，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年，第 420 页。

⑧ 任太医早在第五十四回为李瓶儿诊病时已切实诊断出李瓶儿血虚的病症，“元气原弱，产后失调，遂致血虚”。(《金瓶梅词话》，第 836 页）第六十回作者亦明确写李瓶儿是“旧时病症，又发起来”(《金瓶梅词话》，第 937 页)，而后却错诊李瓶儿为血旺之症。

⑨《金瓶梅词话》，第 925 页。

瓶梅》中所有医生的良知与技能，有着职业道德的任太医，尚且因无心误诊而断送了她的性命，那些走街串巷满嘴胡言的巫医与神棍们将如何对待病人更可想而知。这些荒唐可笑且使人警醒的对比，尖锐而深刻地揭露了草菅人命的庸医的危害。

（三）暴露社会丑恶，深化小说主旨

《金瓶梅》不遗余力对用药情节的大书特书，使药物叙事成为一条贯穿全文的主线。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出现的第一种药物便是毒性剧烈的砒霜。实质上，以《金瓶梅》构思之精妙，布局之细密，我们对文中出现的第一种药物不可以等闲视之。砒霜作为毒药，足以奠定全文药物的主要内涵，即《金瓶梅》中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药物，几乎都是要命之药，没有一种真能治好病，使人健康安乐。这种设定与世俗意义上的药物价值背道而驰，却也正是《金瓶梅》劝世主旨展现的一种具体形态。

首先，《金瓶梅》中叙写药物形象地暴露了社会黑暗及其无药可治的现实，因此在药物叙事中，倾向于对丑恶欲望的极度摹写。第一，药物外形丑陋。《金瓶梅》中胡僧传药时对春药外形的描写："形如鸡卵，色似鹅黄……外视轻如粪土，内觑贵乎玕琅。"[①] 丑陋到如粪土般被轻视的药物外形，使人一见便想敬而远之，但西门庆却丝毫不觉，满心欢喜以为得到至宝，自此走上荒淫恣肆的道路，因此，药物的审丑意象包含西门庆纵欲罪恶的意义。第二，药物气味恶劣。《金瓶梅》中吴月娘在求子使用坐胎药时，服下头胎衣胞，"虽则是做成末子，然终觉有些生疑，有些焦刺刺的气子难吃下口……先将符药一把罨在口内，急把酒来大呷半碗，几乎呕将出来，眼都忍红了，又连忙把酒过下去。喉舌间只觉有些腻格格的。"[②] 其味经作者描述实在腥恶难闻，令人几欲作呕。这里的头胎衣胞即人体胎盘，在中药中可称为紫河车，确实是有滋阴补阳的效用，也可用来治疗不孕症。然而自汉代开始，民间便流传丢失损毁胎盘对新生儿不利的说法，尤其忌讳为人食之。唐代崔行功在《小儿方》曾云："胞衣宜藏天德月德吉方，深埋紧筑。若为猪、狗食，令儿颠狂；蝼蚁食，令儿疮癣；鸟鹊食，令儿恶死；弃火中，令儿疮烂；近社庙、井、灶、街巷，皆有所忌。"[③] 自唐至清，历代都有医者反对以胎盘入药，更普遍的做法是埋于地下。清代张秉成在《本草便读》中称："小儿之胞衣，宜藏安妥之处，或深埋紧筑，令儿长寿。若为虫蚁所食，儿即有病。"[④] 因此吴月娘食用他人胎盘，于习俗而言是非常明显地损人肥己的行为，这与她素日展现出厚道大方的形象背道而驰，在这里，作者通过隐笔展现出月娘的道德缺陷与人性之恶。第三，药物毒性猛烈。《金瓶梅》第五十四回胡僧传西门庆药物时，明白地告诉他药物的毒性猛烈程度："恐君如不信，拌饭与猫尝。三日淫无度，四日热难当，白猫变为黑，尿粪俱停亡。夏日当风卧，冬天水里藏。若还不解泄，毛脱尽精光。"[⑤] 以此警告西门庆不可纵欲过度。然而西门庆为了服药后寻欢作乐抛弃了胡僧的劝解，沉溺于肉欲不能自拔，以此突出《金瓶梅》中的纵欲内涵。明代中后期，国家政治腐败，皇帝昏乱荒淫，沉迷方术，朝野上下多向皇帝进贡各类性药或长生不老药，以此希获圣宠。上行下效，于是社会风气日益腐化堕落，人欲泛滥的思想风靡一时，各类性药借此精神土壤而蓬勃发展开来。西门庆借药纵欲淫乱无度，正是当时市井民间人欲泛滥现象的剪影，药物意象浸透着时代风气的污浊与糜烂。

其次，是以药物极写人性之恶自私自利，刻画凉薄世态。潘金莲为了追逐欲望，不惜以药谋杀相随多年的亲夫，又为了欲望，毫不体恤病中的西门庆，以春药送了他性命；潘金莲与陈经济偷情怀孕后做出吃下堕胎药的决定时完全秉持着维护自身现有利益的原则，作者没有分出一丝笔墨描绘她是否对腹中掉下的骨肉有所牵挂；陈经济每每借取药为由与潘金莲偷情，又在道观中吃黄酒做的"毒药汁"，将清

①《金瓶梅词话》，第 739 页。
②《金瓶梅词话》，第 808 页。
③ [清] 汪昂编撰，余力、陈赞育校注：《本草备要》，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年，第 298-299 页。
④ [清] 张秉成撰著，张效霞校注：《本草便读》，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年，第 269 页。
⑤《金瓶梅词话》，第 739 页。

规戒律抛诸脑后，与娼暗通奸犯案吓死了任道士；庞春梅在嫁入守备府后乔张做致，做出许多病态吃药，目的是为了与陈经济偷欢。《金瓶梅》中的药物是一切欲望实现前的铺垫，又在细枝末节处借药物情节为引，为纵欲狂欢推波助澜。在西门家族中，如果从药物角度来观察人物的生理与心理状况，会发现除了官哥病重时李瓶儿因母爱产生的本能焦灼外，全文几乎看不到真正因病吃药而体现的人性关怀，只是以药物之丑影射人性之丑，进而给读者展示了享乐、纵欲、拜金思想所构建的黑暗世界一角，人人都在食色财气的狂欢中迷失，走向自我欲望的膨胀与毁灭之路。

三、药物叙事的讽喻修辞特征

修辞是文学作品在写作过程中一道不可或缺的加工流程。修辞使文本内容富有文学美感，也使文章立意更加鲜明。《金瓶梅》中的修辞形式使药物叙事更加有针对性和指向性，在药物叙事中，讽喻世情，揭穿世人真面目的意味体现得格外明显。

第一层面，通过药物药性与人物行为之间的悖论，起到反讽作用。作者将药物与各类人物言行联结在一起，形成极不协调的叙事语境，以此生发出讽刺效果。

（一）春药与毒药

文本中的药物，首次出现是在第五回，即潘金莲用西门庆赠予的砒霜毒杀武大郎。本来潘金莲对与西门庆偷情行为已经感到满足，并没有杀掉武大郎的念头，在武大郎被踢伤后，她也只指望武大郎自死。然而在王婆和西门庆的怂恿下，她下毒杀夫，又千方百计地嫁入西门家，踏上了疯狂追逐欲望的道路。自毒杀武大郎后，潘金莲的人性之恶被彻底激发，这也是小说中人性之恶通过药物首次展现出来。毒杀武大郎这桩案件并未随着武大郎死去而湮没，而是作为一根暗线潜伏在文章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提起，使做了亏心事的潘金莲与西门庆不得安宁。更离奇的是，每一次文中出现毒药，都有人间接地因此死亡。第一个提及毒药的人是孙雪娥，第十一回她背地里对吴月娘和李娇儿说潘金莲“当初在家，把亲汉子用毒药摆死了，跟了来”。[①] 由此二人结下深仇。后春梅为了替潘金莲报复孙雪娥，将其变卖为娼，导致孙雪娥上吊身亡。第二十五回中，西门庆因来旺儿得知了潘金莲毒药杀夫之事，将其发配徐州，来旺儿的妻子蕙莲因此上吊。第八十七回，武松归来后又一次翻出砒霜旧事，手刃潘金莲。全文看似被毒杀者只有武大郎一人，但文本中共有四次提及毒药，有四人因此而死，可以说每一次毒药出场，都是人物死亡的导火索。《金瓶梅》开场就以砒霜这种毒性剧烈的药物奠基，讽刺书中糜烂的狂欢生活就像砒霜一样有着剧毒，人物浸淫日久而不觉其害，因此大多都不得善终。

看似无害的春药，同样起到了毒药的效用。小说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得到了胡僧所传春药，就此进入了纵欲享乐的极乐世界，仅文中所描写西门庆使用春药的段落就有十余次，忘乎所以因此亡身。此外，潘金莲喂服西门庆过量的春药，亦曾强灌武大郎砒霜，直接将二人性命断送在其手上。第一次谋杀亲夫与第二次害死西门庆的情节何其相似，可见，春药也是实质意义上的毒药，作者有意设置潘金莲杀夫的雷同情节，使读者将二者联系起来，春药与毒药的隐喻关系从而凸显。值得注意的是，潘金莲是文本中唯一将春药和毒药二者特性合二为一的标志性人物。以男性视角观察，潘金莲风流婉转令人销魂蚀骨的媚态定是春药无疑，但其自私冷漠又刁恶凶狠的性格亦是剧毒不可沾染。作者不遗余力地反复描绘潘金莲的美貌与狠毒，时时提醒读者贪恋色欲易亡身、不可不慎的主旨，再一次点明色空观念，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

另一个死于“春药”的人是李瓶儿。李瓶儿的死因表象是庸医杀人，而张竹坡点出深层原因，胡僧施药“盖为死瓶儿、西门之根”。[②] 整部小说中，只有蒋竹山在第十七回曾治好过李瓶儿肉体的病，然而仅仅肉体健康不能使她满足，因此李瓶儿为西门庆抛弃蒋竹山，“蒋竹山者，又将逐散也”。[③] 象征她放

①《金瓶梅词话》，第 142 页。
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 766 页。
③《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 264 页。

弃了健康正常的生活转而追逐纵欲狂欢的世界，蒋竹山在她的眼里，确实只是一个治疗躯体病痛的医生，根本不能作为丈夫看待，“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①] 因此她才口口声声地对西门庆表白“你是医奴的药一般”。[②] 张竹坡评价瓶儿是痴人，她的“痴”，集中体现于对病态情欲的执着追逐，对治疗疾病的医药视而不见，却对害人性命的毒药——纵欲狂欢甘之如饴。《金瓶梅》第六十一回前评道：“瓶儿本是花瓶，止为西门是生药铺中人，遂成药瓶。而因之竹山亦以药投之，今又聚胡、赵、何、任诸人之药入内，宜乎丧身黄土，不能与诸花作缘也。”[③] 李瓶儿因痴生病，因药而愈又不知悔改，沉迷于肉体欲望而埋下死根，终因药而送命。

（二）堕胎药与坐胎药

求子主线最早出现于第二十一回，吴月娘烧夜香时发愿：“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见嗣息，以为终身之计，乃妾之素愿也！”[④] 一个贤良大度的妇人形象自此树立起来。然而吴月娘又在李瓶儿已经生子，西门家族有继承人的情况下通过祝祷吐露了自己的真心话：“若吴氏明日壬子日，服了薛姑子药，便得种子，承继西门香火，不使我做无祀的鬼，感谢皇天不尽了！”[⑤] 可见，吴月娘实际上认为只有自己亲生的儿子才能“继承西门香火”，其他妾室的儿子都不在思量范围内。使用坐胎药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自身地位和利益的的考量，母以子贵。作者在这里大书一笔，将吴月娘温厚贤良中暗含争名夺利的心思给戳破了。

吴月娘使用坐胎药成功怀孕后，潘金莲也希望通过坐胎药获得孩子。潘金莲求子的目的与吴月娘不同，主要是为了获得宠爱，留住西门庆的心。然而潘金莲壬子日服下药生子的计划受阻，阻碍者正是上一次使用求子药成功的既得利益者吴月娘。这种刻意设置的差异叙事使潘金莲也因此格外记恨了一层，和正身怀有孕的吴月娘吵架时冲口而出：“像这等的却是谁浪？”“你不养下汉，谁养下汉来？”[⑥] 看似胡搅蛮缠，却句句暗讽吴月娘因药有子之事，而吴月娘也因心虚而大怒，两下里撕破面皮，闹得不可开交。坐胎药的冲突标志着潘金莲使用求子药的彻底失败。潘金莲嫁入西门家后一直有着强烈的生子愿望，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成功。然而在西门庆死后，她却事与愿违地怀孕了。这个胎儿不仅不能为自己增添荣光，反而是与女婿陈经济偷情的铁证，会让她颜面尽扫，在西门家无地容身，这无疑是对潘金莲平日喜欢“掐尖儿”，争强好胜性格的一种强烈讽刺。从小说中的现实意义去考虑，潘金莲如果不堕胎，“弄出个怪物来”，就只能是“寻了无常罢了，再休想抬头见人！”[⑦] 而如果想再体面地活下去，胎儿就不能留住。因此，堕胎药在这里同样有着双重反讽的性质，它既是治潘金莲“病”的药物，也是取腹中胎儿命的药物。《金瓶梅》中的药物叙事，通常都有其两面性，治病与要命两件看似性质完全相反的事情，却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可见作者构思的奇巧之处。

第二层面，通过关于医药的趣事与笑话，在幽默中传递讽刺现实的思想。笑话本身就有幽默夸张却反映现实的功能，因此讽喻时弊最为切当。张评本第五十四回任医官给李瓶儿看过病后，因不收诊金，西门庆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人说道：‘人家猫儿若是犯了癞的病，把乌药买来煨他吃就好了。’旁边有一人问：‘若是狗儿有病，还吃甚么药？’那人应声道：‘吃白药。’吃白药，可知道白药是狗吃的哩。”那任医官拍手大笑道：“竟不知那写白方儿的是甚么？”[⑧] 这是一个讽刺患者的笑话，但在文中，这个笑话起到了多重反讽的作用。任医官在听过笑话拍手大笑的同时，又站在正统医者的角度上以良医自居，

①《金瓶梅词话》，第 259 页。
②《金瓶梅词话》，第 268 页。
③《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 939-940 页。
④《金瓶梅词话》，第 289-290 页。
⑤《金瓶梅词话》，第 804 页。
⑥《金瓶梅词话》，第 1272-1273 页。
⑦《金瓶梅词话》，第 1459 页。
⑧《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 842 页。

嘲笑一些不学无术的庸医开无效的药方，形成了文中对医生和患者的双重嘲讽。然而之后任医官自身诊断错误，开出的药方有导致李瓶儿死亡的可能，因此自己也意外地被囊括进了庸医的范围，成为被嘲讽的对象，这就使任医官对“开白方儿”医生的嘲讽显得格外荒谬可笑，呈现出了一种戏剧化的怪诞效果，也使文本外的读者从高于文本现实的视角感受到了浓厚的讽刺氛围。除此之外，西门庆讲给潘金莲的蒋竹山看病笑话也是典型的反讽。一个人请蒋竹山看病时，蒋在街上买了一尾鱼，看病时挂在病人家的帘钩儿上。“手把着脉，想起他鱼来……只顾且问：‘嫂子，你下边有猫儿也没有?’不想他男子汉在屋里听见了，走来采着毛，打了个臭死，药钱也没有与他，把衣服扯的稀烂，得手才跑了。”[①] 这个笑话将蒋竹山的狼狈刻画得淋漓尽致，蒋竹山先前在潘金莲眼中还是“谦恭”“文墨人儿”的端庄医者形象轰然倒塌，讽刺之意不言自明。作者在叙述中语言简练，也无需发表评论，而是用最为直观的画面，寥寥数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表现出浓重的反讽情态。

第三层面，由医药直上升至主题层面，讽喻整个社会。小说第十七回中，宇文虚参蔡京本中提到，“譬犹病夫在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气内消，风邪外入，四肢百骸，无非受病，虽卢、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势，正犹病夫尪羸之极矣。君，犹元首也；辅臣，犹腹心也；百官，犹四肢也”。[②] 这一段中以身体喻国家，以疾病喻奸臣，以医药比喻治理社会的运行法则。从医药角度切入小说主题，表明国家亦犹如身体，不经治理就会病入膏肓。从这一角度来看，“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不得已籍小说以鸣之”。[③] 讽刺的范围扩大到最宏观的规模，对以蔡京为首的一干国家蛀虫的弹劾与指控，正是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现状的控诉。这种宏观反讽赋予了作品一种强大的暴露社会黑暗现实的力量，也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沉责任感。

综上，从《金瓶梅词话》的药物叙事角度可以探索药物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脉络，揭示文本中医学、文学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药物叙事可鉴人情世态，人物形象借此也得以丰满。同时，药物叙事也有着营造小说的结构、推动情节的发展、深化小说主旨的作用。《金瓶梅》中讽喻的修辞形式使药物叙事更加有针对性和指向性，使文本内容富有文学美感，也使文章立意更加鲜明。《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先驱，能够承前启后，在包括药物叙事等许多艺术手法的表现方面都作了可贵的探索和准备。《红楼梦》的药物叙事既受到《金瓶梅》的启发，也有对《金瓶梅》的超越，在具体的写作方式和美学旨趣上都有不同，从中以看出药物叙事在中国古典长篇世情小说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金瓶梅词话》，第 258 页。
②《金瓶梅词话》，第 230-231 页。
③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 1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68 页。

Main Abstracts

Why Is It Possible to Pursue Academic Career from the Reflection of Weber's Modern Academic System?

Zheng Fei 22

A hundred years ago, in the speech of which was that "Science is the bounden duty", Weber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ymbolic concepts such a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pecialization, bureaucracy and value neutrality. These concepts provided us important clues to reflect on the modern academic system.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academic division of labor advocat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orceful. Research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ation, demonstr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which aims at pragmatism and utilitarian pursuit, has replaced grand narrative and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modern academic system. Algorithm has become the core concept of modern academic system. However, the progres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uch as algorithm, cannot bring about the settlement of value rationality. Weber, with a strong neo-Kantian color, left us an important academic legacy, in which he put forward the methodology of modern academic system, demarcated the boundary between academic and political, and insisted on value neutrality.

From "Momentary Trend" to "Constant Trend" : Stage Reflection and Long-term Arrang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onsumption

Fan Hesheng and Liu Kaiqiang 39

Consump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escape a crucial task in our country, it precision in solid propul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heald melting progressive "material help" to "strengthening the aspiration" to "intelligent help"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consumption" link chain, wisdom-innovation "online-offline marketing" form has the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the current social from all walks of life force in the process of specific consumer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lso emerges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phase deviation, such as: supply and demand of mismatch, fixed-point procurement and freedom bought administrative conflict, network sales mode and deal double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the combination of short-term support and long-term planning of suspension, etc.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scheme in terms of market arrangement, education arrangement, technology arrangement and policy arrangement in the future social actions, so as to turn consump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to a long-term and effective systematic project of mutual benefi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Organic Connection among Government, Market and Farmers: A New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Chen Tianxiang and Wei Guohua 49

Within the scheme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defined as an fundamental, long-term strategy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poor households.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tasks of fu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practic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ainly includes three types: the government-led, the enterprise-led and mixed model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misalign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misalignment of target targeting, and elite capture, which has not established the organic connection among government, market and farmer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ke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market force behind th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Curre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do not provide a sufficient solution as to how to balance these two forces and to empower each other. The practice of Guangqing agricultural mass innovation space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with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builds the normalized interest connection mechanism among government, market and farmer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dilemma of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Income Polariza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Tang Can, Sun Wenkai and Zhao Zhong 80

Using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onducted from 2011 to 2017 by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firstly calculates the change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migrant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reasons. Secondly,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at change on income polarization of migrants. We find that the career choices of the migrants have changed greatl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e propor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of businessmen both increased by more than 1% in 7 years,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of civil servants and of construction personnel all decreased by more than 1%. Besides, we also find the share of routine manual jobs among migrant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share of routine cognitive job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Moreover, the change i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has led to income polarization of the migrants, because they has entered into high-income or low-income occupations, and partly withdrawn from middle-income occupations.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DER index, which measures the degree of income polarization, further shows that income differences between occupations can explain 90% of the level of income polariz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on income cannot be ignor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roduct Attributes Consistency on Time-honored Brand Extension Evaluation

Yang Yimiao, Deng Jingjing and Guo Jiawei 92

The effects of product attributes consistency on brand extension evaluation were studied by using two inter-group experimental designs of single factor and two levels (product functional attributes consistency: high vs. low; product functional attributes consistency: high vs. low). Analysis results of 306 valid data show that the consistency of these two attribute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brand extension evaluation.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functional attributes consistency, consumers' evaluation of time-honored brand extension with hedonic attributes consistency is high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attributes consistency and time-honored brand extension evaluation, perceived self-continuity has mediating effect, while nostalgia tendency has positive reinforcement effect. That is, the higher the consumer's nostalgia tendency, the greater the positive impact of product attributes consistency on time-honored brand extension evalu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ime-honored brand extens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he consistency of functional attributes or hedonic attributes between extended products and original products, to enhance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self-continuity, and to carry out effective market segmentation according to nostalgia tendency and to develop and disseminate nostalgia or innovation elements in time-honored brands.

Earlier Period from Reimbursement Scandal in Yunnan

ChenYong 120

The exposure of the reimbursement scandal in Yunnan in 1882 revealed the existing system of military reimbursement had been caught in a dilemma and difficult to sustain.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led to the corrup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WaiXiao finance of the provinces. While organizing the officers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and trace the responsibility, Qing government launched a series of measures in succession to make it bring into play in auditing nation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gain. However,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expense reimbursement system had not been eradicated,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rules and financial practice still existed. Some technical improvements made by Qing government under the original system had not brought expected results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his showed that the traditional way of financi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end.

Three Theoretical Issues About Modern-subject Drama

Fu Jin 144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subject drama creation, the three most complicated theoretical issues are the "separation of roles theory" "drama with aria" and "convention and conventionalization". First, the "separation of roles theory" emphasiz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traditional opera genres such as Peking opera and emerging opera genres to avoid instrumentalization of opera, while underestimating the theme adaptability of these mature opera genres. Second, modern-subject drama is accused of being transformed into a form of "drama with aria", which represents the idea of requiring the opera to stick to its essence. Third, some critics believe that conventionalization fails to vividly represent real life and heroic characters, which confu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vention and conventionalization. All traditional convention in th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modern-subject drama can be discarded, but if the creation deviates from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it will be far from the essence of opera. In this case, the creation of modern-subject drama should avoid the s convention, but should emphasize the conventionalization.